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

西北革命根据地史

XIBEI GEMINGGENJUDI SHI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北革命根据地史》编委会

主 任： 安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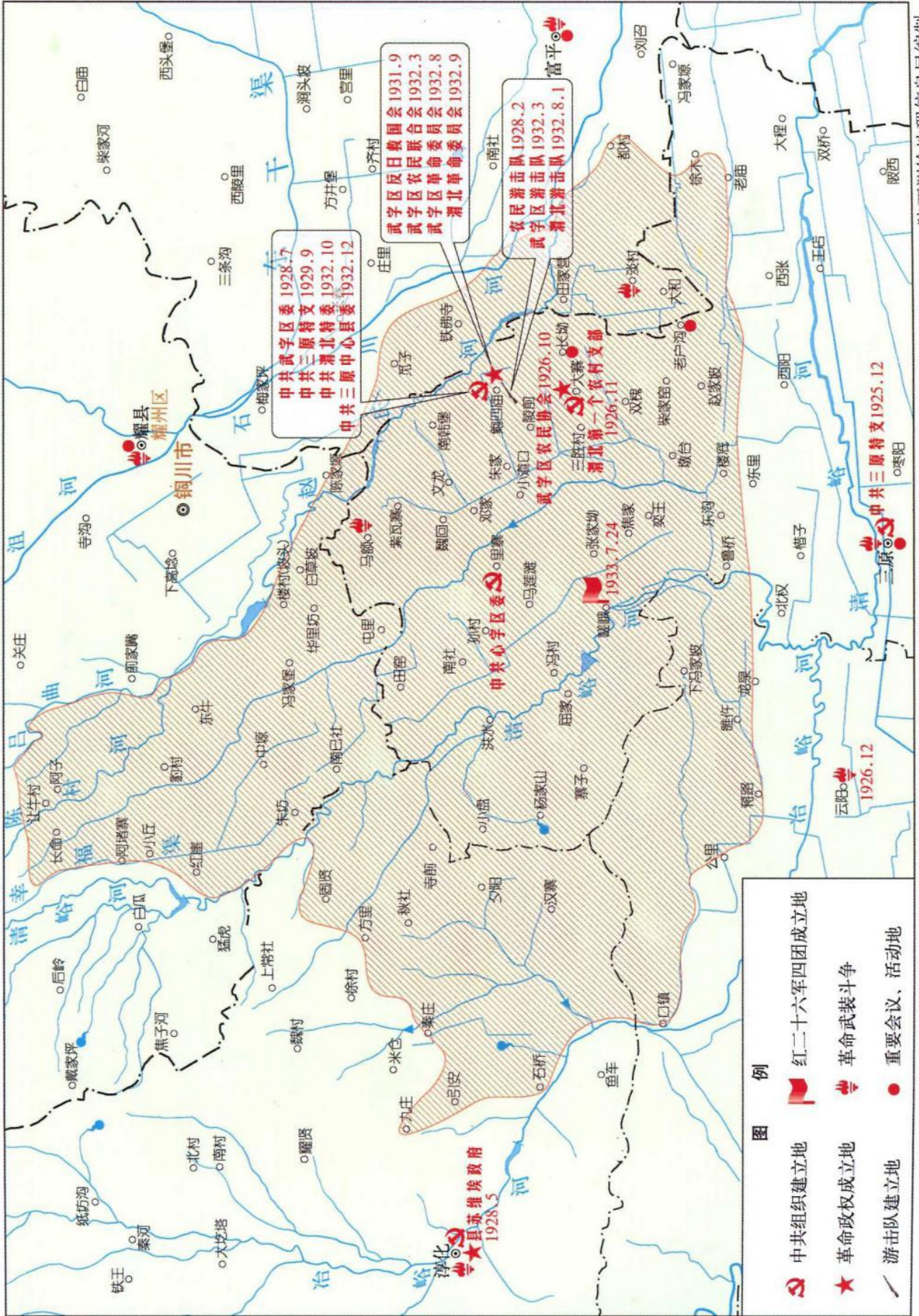
委 员： 姚文琦 余少松 王顺铭

《西北革命根据地史》编辑组

主 编： 姚文琦 姬乃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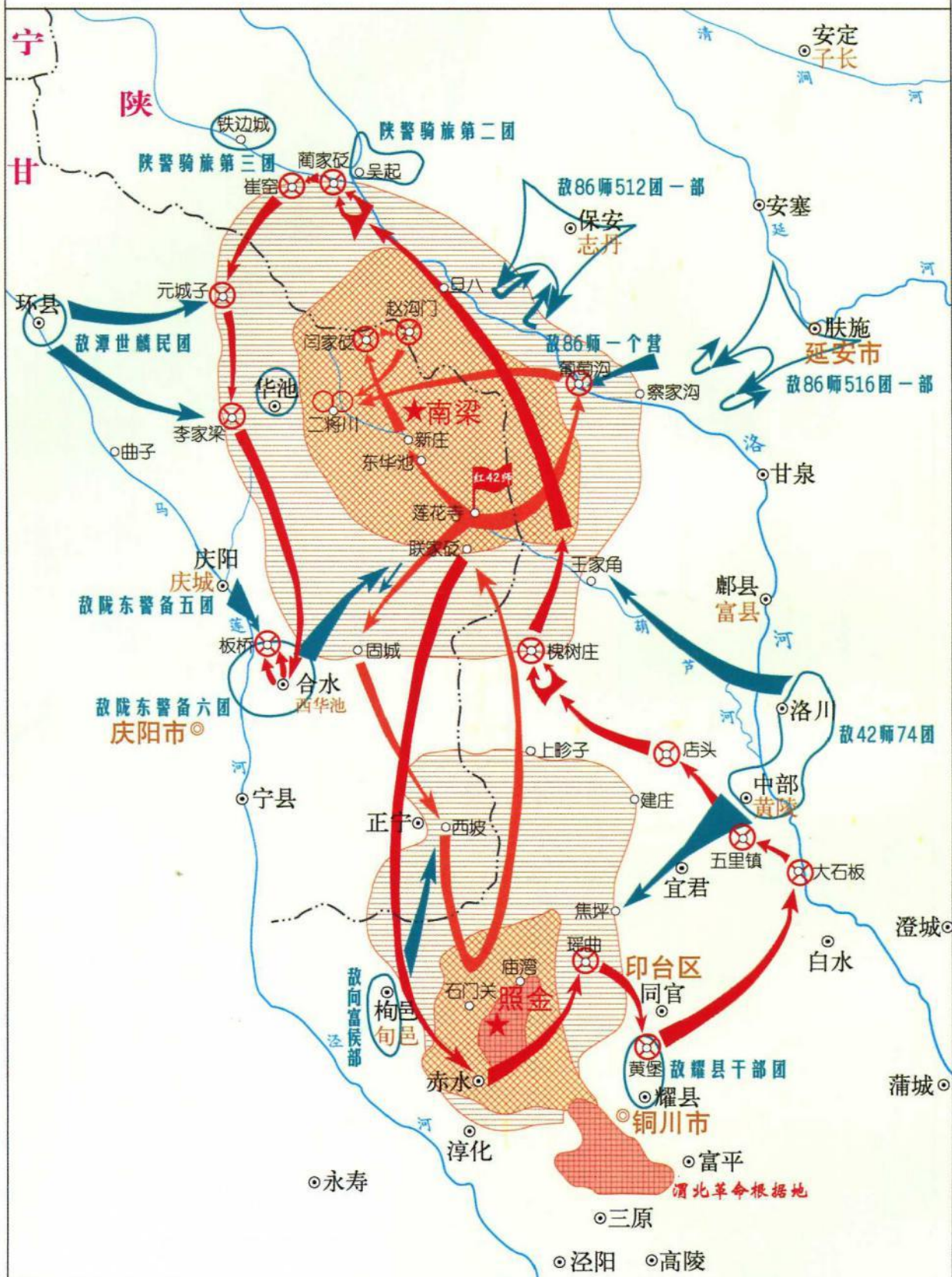
副主编： 刘玉平 姬 睿

审 稿：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委员会



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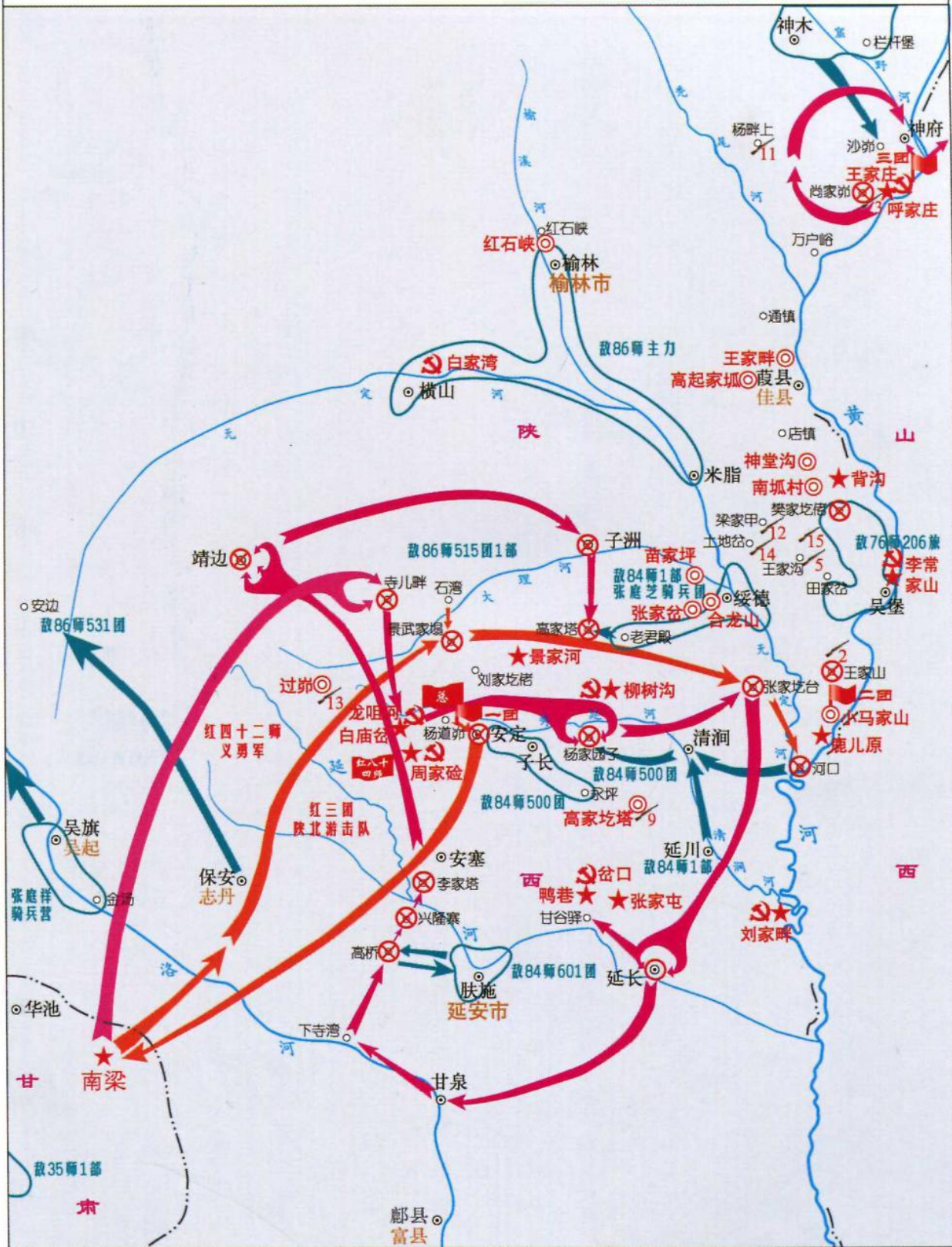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示意图



图例	★	根据地工农民主政权驻地	→	1933年11月—1934年1月 红军行进路线	→	国民党军行进路线
	▨	1932年9月—12月开辟的根据地	→	1934年2月—1934年4月 红军行进路线	→	国民党军退却路线
	▩	1933年开辟的根据地	○	国民党军集结地	⊗	歼灭国民党军地点
	▨	1934年开辟的根据地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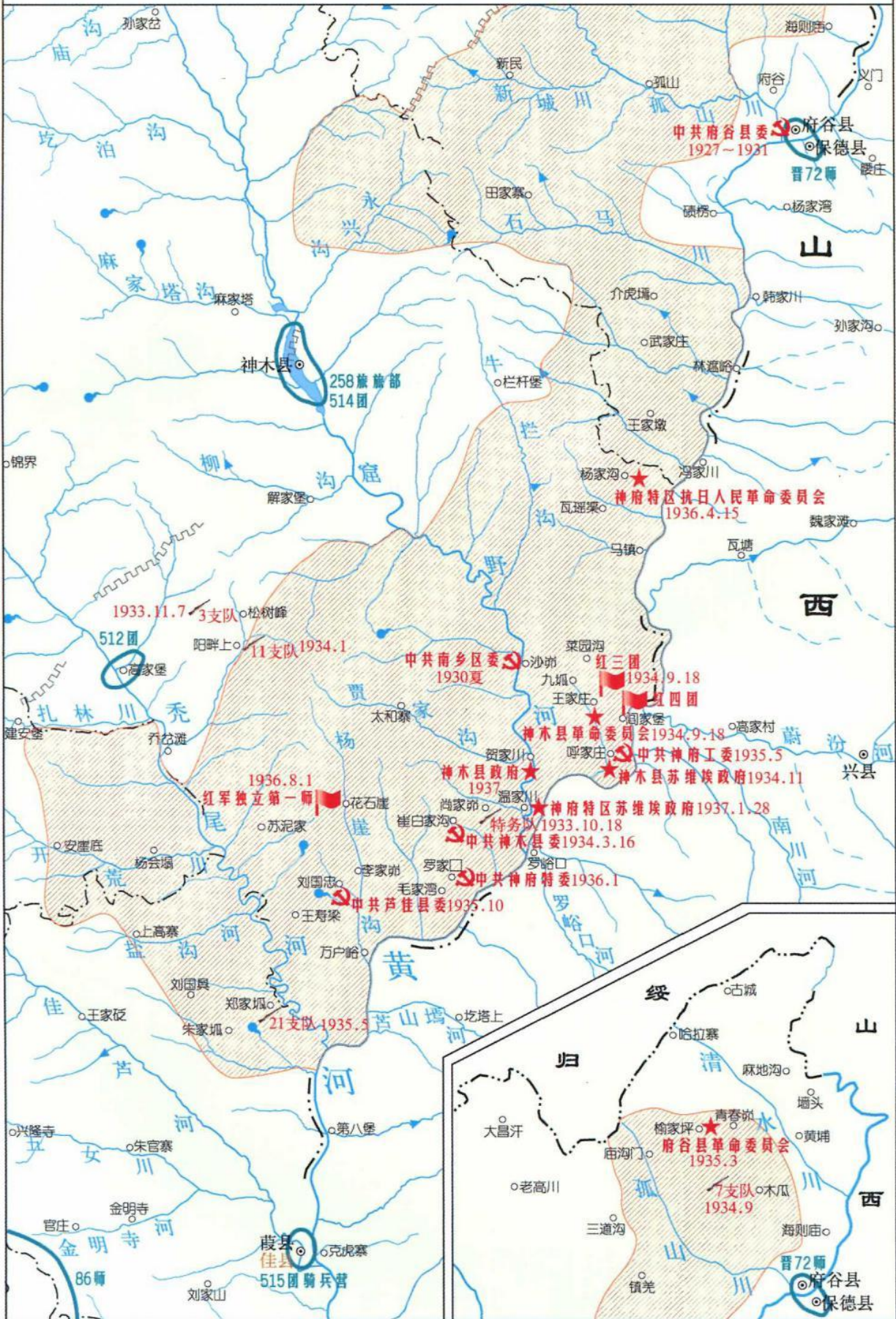
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示意图



- | | | | |
|---------------------|-------------------|----------------|-----------------|
| ◎ 陕北特委会议地址 | ➔ 红军攻克六县行进路线 | ➔ 国民党军行进路线 | ○ 国民党军集结区 |
| ➔ 1934年红军行进路线 | 🚩 红八十四师成立址 | ➔ 国民党军退却路线 | ⊗ 歼灭国民党军地点 |
| 🚩 红军各团成立地址 | ★ 陕西省、各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地址 | 5 陕北红军游击支队成立地址 | 🚩 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地址 |
| 🚩 西北工委、陕北特委及各县委成立地址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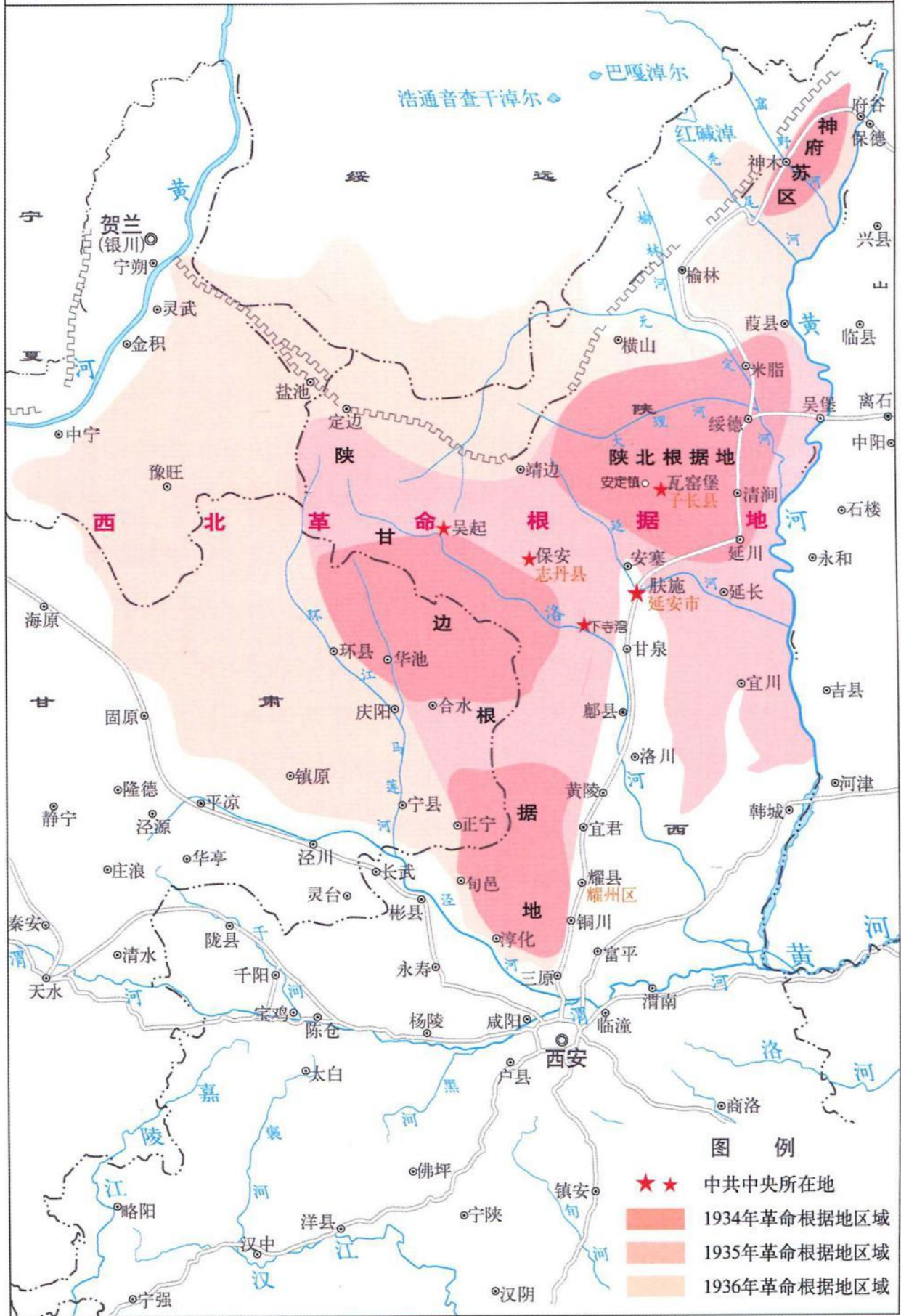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编制

陕北革命根据地神府苏区创建示意图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编制

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与发展示意图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编制

西北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帜^①（代序）

习仲勋

我国西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 1922 年至 1923 年中间就开始了。起初，是由少数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者，在关中、陕北等地的学校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和发展了共产党。有了这个条件，就使 1926 年至 1927 年的大革命期间，西北革命运动以西安为中心，有了很大发展。当时，我们曾与国民党进步势力结成统一战线，在军队、政权、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党员发展到几千人。但是，当时的领导者，不懂得国民党右派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没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郑州会议^②一开，西北的国民党公开反革命了，对共产党人杀的杀、赶的赶，共产党和革命人民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失。

共产党人并不灰心丧气，重新集合起来与敌人战斗。而且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首，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到 1935 年的八个年头内，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与敌人斗争，主要的是要采用什么方式？我们制定了主要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拿起枪杆子。为着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就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根据地，又必须是在乡村，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开始是在陕、甘边的桥山中段建立了一处根据地，以后，为了在敌人优势兵力面前获得高度的回旋余地，便在陕北、关中建立了几处根据地。在根据地里，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动了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财产及富农的出租土地，加以分配；发动了农民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了红军和赤卫队（即民兵），采取游击战争的战术，与敌人作战，不断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取得胜利。但当时党

内“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打游击战是“逃跑上山”，认为创造游击根据地是“梢山主义”，要红军打正规战，向城市和平川出击，把陕、甘根据地和四川、青海、新疆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打通国际路线。这在当时红军只有几千人，显然占劣势的情况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

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来往。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因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唤都很有成效。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说这是“勾结军阀”。连在根据地内分配土地时，对待地主与富农加以区别的政策，也被他们认做是“富农路线”。他们是何等愚蠢，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绝大多数同志是团结在刘志丹领导的正确路线下，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斗争。其结果，是聚集了革命力量，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大块革命根据地，成为西北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帜。可是当时是紧张的战斗环境，还没有可能把这些经验都系统地总结起来，并用以教育全党。这就使“左”倾机会主义者钻了空子，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外衣，几度占据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并采取极端宗派主义的作风，给了革命事业极严重的损害。

1935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了陕北，立即停止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罪恶活动，挽救了西北的革命，并领导着我们继续胜利前进，扩大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再次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原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们不仅听任国民党反动派把根据地的许多边沿地区劫去，而且提倡“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即一切经过国民党、蒋介石，把自己束缚起来。毛泽东早就指出这个错误，领导我们把它彻底纠正了。随后毛泽东总结了全国的也包括西北的革命经验，在1939年给《共产党人》写了一篇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1941年，毛泽东又领导我们召开了陕甘宁边

区参议会，实现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是中国第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的施政纲领。此后，经过了必要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于 1942 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下，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过去的历史，做出了系统的结论。做得对的，给西北人民立了功的，当然是由刘志丹所领导的正确路线。而反对这个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会议，把西北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从 1935 年秋季到 1948 年春季，这 13 个年头内，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驻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着我们，在这不足 200 万人口的地区，教育人民，依靠人民，打破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人民的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都获得发展，支援了全国的革命。延安，成为世界闻名的民主圣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又指挥了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毛泽东那些丰富的理论著作，关于政治的、军事的、财政经济的、文化思想的以及哲学问题的，其大部分是在这里写出的。毛泽东热爱边区人民，当胡、马匪军进攻边区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常是在行军转移中指挥西北和全国的战争。这是当时全体军民经常有着旺盛斗志和胜利信心的源泉。直到 1948 年延安光复，胡、马匪军全线溃退之后，毛泽东才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工作，离开了陕北。毛泽东给我们西北地区党和人民的教育，真是太广阔了，太深刻了。

①本文是习仲勋 1951 年 7 月 1 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所写文章《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的一部分，标题是作者加的。

②1927 年 6 月 1 日，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与北伐军会师郑州。6 月 10 日至 13 日，冯玉祥、于右任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人在郑州开会。冯玉祥在“调解宁汉纠纷”的幌子下，促使会议决定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将河南与西北的军政大权完全交给冯玉祥独揽。郑州会议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在河南与西北地区“清党”反共。

目 录

第一章 土地革命的兴起	001
第一节 大革命后期的陕西政局.....	003
一、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发展概况.....	003
二、大革命后期的陕西地方武装.....	007
三、中共组织在陕西地方武装中的活动.....	011
第二节 大革命在陕西的失败.....	015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陕西局势.....	015
二、冯玉祥“清党”反共.....	021
第三节 土地革命在陕西的兴起.....	025
一、中共陕西省委成立.....	025
二、“九二六”会议.....	030
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033
第四节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艰苦奋斗.....	052
一、对“左”倾盲动错误的纠正.....	052
二、领导灾民为求生存而斗争.....	055
三、省委领导的兵运工作.....	059
四、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纠正.....	062
第二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067
第一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069
一、渭北地区早期的革命斗争.....	069
二、中共陕西省委为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而不懈努力.....	075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组织的发展壮大·····	079
第二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与反“围剿”斗争·····	087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087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092
第三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发展及失守·····	095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095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失守及其经验教训·····	100
第三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05
第一节 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	107
一、陕甘边地区的早期革命武装·····	107
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建立·····	122
第二节 建立以寺村原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33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33
二、根据地建立初期的游击战争·····	138
第三节 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151
一、贯彻中共中央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	151
二、创建红二十六军期间的武装起义·····	161
第四节 开辟照金新苏区·····	172
一、首战焦坪与南下香山·····	172
二、庙湾战斗失利与扫清照金外围·····	173
三、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	177
第五节 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80

一、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成立·····	180
二、组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	181
三、重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183
第六节 照金苏区的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	186
一、实行土地革命·····	186
二、开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188
第七节 照金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1
一、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	191
二、北梁会议与红二团南下失败·····	193
三、耀县起义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成立·····	196
四、建立耀县游击队·····	199
五、陈家坡会议·····	200
六、陕甘边红军主力转战外线·····	202
七、照金苏区失陷·····	204
第八节 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206
一、包家寨会议的重要决策·····	206
二、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	209
三、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211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213
第九节 南梁时期的反“围剿”斗争·····	216
一、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一次“围剿”·····	216
二、阎家洼子会议·····	218

三、红二十六军进一步发展壮大·····	221
第十节 南梁苏区的土地革命与经济、文化建设·····	226
一、南梁苏区的土地革命·····	226
二、与民生息，发展经济·····	227
三、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229
第十一节 刘志丹率部北上，筹划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231
一、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革命根据地·····	231
二、刘志丹与谢子长筹划统一两块根据地·····	233
第四章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235
第一节 中共陕北特委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探索·····	237
一、中共陕北特委成立·····	237
二、红石峡会议与“三色”革命理论的提出·····	243
三、中共陕北特委坚持土地革命的方针·····	245
四、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兵运工作·····	250
五、晋西游击队与红二十四军相继入陕·····	254
第二节 陕北革命武装的创建与发展·····	259
一、淮宁湾夺枪与红军西北先锋队的建立·····	259
二、陕北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	265
第三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277
一、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建立·····	277
二、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282
第四节 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	288

一、组建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	288
二、红二十七军的建立·····	290
第五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经济、文化建设·····	293
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293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	299
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	302
第六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神府苏区的开辟·····	304
一、中共神府地区组织的建立·····	304
二、神府地区的早期武装斗争与红军游击队的建立·····	307
三、神府苏区的形成与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312
第七节 神府苏区的巩固与发展·····	314
一、神府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314
二、神府苏区的土地分配·····	317
三、神府苏区的经济建设与教育文化建设·····	318
第五章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	323
第一节 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325
一、周家硷会议·····	325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组织的统一与发展·····	327
三、白庙岔会师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成立·····	331
第二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334
一、国民党当局第二次军事“围剿”的部署·····	334
二、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二次“围剿”·····	336

三、神府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343
第三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349
一、反击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围剿”·····	349
二、神府苏区的艰难复兴·····	352
第四节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	355
一、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	355
二、红十五军团成立·····	359
三、劳山战役与榆林桥战役·····	360
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364
第六章 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371
第一节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	373
一、哈达铺会议与榜罗镇会议的决策·····	373
二、中央红军长征到吴起镇·····	375
三、下寺湾会议·····	378
四、纠正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381
第二节 彻底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围剿”·····	387
一、直罗镇战役·····	387
二、神府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390
第三节 巩固与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	393
一、东征战役·····	393
二、西征战役·····	401
三、神府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405

第四节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408
第七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413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415
一、	瓦窑堡会议·····	415
二、	改变阶级政策·····	419
三、	调整经济政策·····	423
四、	调整社会政策·····	425
第二节	西北地区联合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432
一、	中共中央对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432
二、	中共中央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435
第三节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	437
一、	西安事变的爆发·····	437
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439
三、	重建中共陕西省委与恢复陕甘省·····	443
四、	神府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445
第四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使命的转换·····	448
一、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448
二、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	449
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453
结束语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及经验总结·····	457
	主要参考书目·····	472
	后 记·····	475

第一章

土地革命的兴起

第一节 大革命后期的陕西政局

一、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发展概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些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团员，根据当地党、团组织的指示，相继返回陕西，开展建党、建团活动。

1924年6月，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指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在渭南^①赤水职业学校正式成立，会长张浩如，书记王尚德。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陕西的第一个基层组织。赤水支部后改为赤水独立支部、赤水特别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成立，张性初任书记。同年底，又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二支部。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三原特别支部、榆林支部、瓦窑堡支部、华县支部、澄城特别支部、西安临时支部、西安特别支部等相继成立。1925年11月13日，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吴化之任书记。隶属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同年12月，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马瑞昌任书记，隶属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2月后改由共青团北方区委领导）。陕西各地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10月，中共豫陕区委在河南开封成立，王若飞任书记，负责领导河南、陕西两省党的工作。当月，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成立，有党员五人，安存真任书记，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

同年11月，中共豫陕区委指派区委委员黄平万前来西安，发展党、团组织，领导工农运动。1926年1月，黄平万在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的基础上，领导建立了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黄平万任书记。中共西安地委隶属于中共豫陕区委，下辖关中各地的党组织。1926年6月，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田伯英，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中共绥德地委先后下辖绥德、榆林^②、米脂等地十多个党组织。

1926年12月，鉴于西安解围后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云集西安的状况，为加强领导，中共西安地委在未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③，领导成立了陕西党团联席会议，作为临时性的党团组织最高领导机关。黄平万任书记，吴化之任副书记，魏野畴、雷晋笙、张性初等任委员。陕西党团联席会议辖中共西安地委、渭南地委及10个特别支部和共青团西安地委、渭南地委、三原地委及14个特别支部。

面对迅猛发展的陕西革命形势，中共中央于1927年1月28日做出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委，具体领导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到会的代表有耿炳光、魏野畴、李子洲、阎揆要等11人，分别代表9处党组织。会议选举耿炳光为陕甘区委书记，魏野畴为宣传部长，李子洲为组织部长，亢维恪为农委书记，陈家珍为军委书记。中共陕甘区委的成立，使陕甘地区的党团组织实现了统一，促进了陕甘地区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首先抓住加快发展党的各级地方组织这一环节，大力发展党的组织。1927年3月22日，中共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张性初。三原地委负责泾阳、三原、蒲城、富平、高

陵 5 个县党的工作，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下辖 5 个特支、3 个支部。三原地委机关设在三原县渭北中学。4 月 1 日，中共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正式成立，书记田伯英，宣传委员陈俞廷，组织委员易厚庵。延安地委隶属陕甘区委领导，先后下辖 7 个特支、5 个直属支部，有党员 110 多名。同年 5 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将中共泾阳特别支部改为中共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耿觉，宣传委员马云藩。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也于 5 月初成立，书记马云程，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周家干。地委机关驻榆林中学平民学校。在此前后，中共陕甘区委还领导建立了中共咸阳、岐山、礼泉等特别支部。

到 1927 年 4 月底，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的地方党委发展到 7 个，特别支部发展到 41 个，党员增加到 2177 名。

与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发展同步，共青团组织在陕西地区也得到迅速发展。1927 年 2 月 26 日，共青团陕甘区委在西安桃胡巷成立，书记曹趾仁，组织委员吴化之，宣传委员张金印（张慕陶），青年委员王文彬，学生委员王林（王芾南）。共青团陕甘区委隶属共青团中央和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先后下辖西安、绥德、三原、渭南、延安、泾阳 6 个地委，直辖 37 个特别支部和 2 个支部。截至 1927 年 4 月底，全省团员达 2400 余人。同年 6 月，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了共青团陕甘区委，由潘自力任书记，曹趾仁任组织委员，张金印任宣传委员。

在党、团组织发展的同时，陕西的青年组织也得到快速发展。1925 年 10 月底前，陕西各地先后建立了青年社 20 多个，有社员 1000 余人。1925 年 11 月 2 日，共青团豫陕区委做出指示，要求西安团组织切实推进陕西青年的联合工作，使青年社成为在共青团指导下训练、吸收革命分子，从事国民革命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先进组织。1926 年 2 月，共青团西安地委主持成立了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决定同年 6 月正式成立陕西青年社。此后，由于西安城被围困，陕西青年社的组建工作无法进行。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后，留在西安的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人员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加

强对陕西各青年团体的指导。1927年5月18日至24日，陕西青年社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来自21个青年团体的4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推荐王文彬等组成主席团，王林任主席团秘书长。由苏联回国的邓小平在大会上介绍了苏联近况，杨明轩、雷晋笙等发表了演讲。大会通过了《宣言》和《陕西青年社章程》，选举王文彬等9人为执行委员。

陕西党、团组织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蓬勃发展，也为日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干部基础。

①今渭南市临渭区。

②今榆林市榆阳区。

③1926年4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部围困西安，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中共西安地委与上级组织关系中断。

二、大革命后期的陕西地方武装

大革命后期，活跃在陕西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武装，主要是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联军。

1926年9月17日上午，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在绥远^①五原被国民军将领推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当天中午，国民军联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冯玉祥宣誓就职，并率全体将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国民军各部闻讯后，纷纷向五原集中。旬日之间，总兵力达20余万人。9月下旬，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下辖七路大军，第一路司令方振武（兼），第二路司令弓富魁，第三路司令孙良诚（兼），第四路司令马鸿逵，第五路司令石友三，第六路司令韩复榘，第七路司令陈希圣。11月28日，在西安守军配合下，西安城围被解。1927年1月17日，尚在甘肃平凉的冯玉祥电令取消原国民军各军和援陕军各路的番号，改编了驻陕北的井岳秀部队和驻陕南的吴新田部队，将国民军联军统编为十七路，冯玉祥任总司令，石敬亭任总参谋长，薛笃弼任政治部部长。第一路总司令方振武，第二路总司令弓富魁，第三路总司令孙良诚，第四路总司令马鸿逵，第

五路总司令石友三，第六路总司令韩复榘，第七路总司令门致中，第八路总司令李虎臣，第九路总司令井岳秀，第十路总司令杨虎城，第十一路总司令田玉洁，第十二路总司令卫定一，第十三路总司令张维玺，第十四路总司令孙连仲，第十五路总司令徐永昌，第十六路总司令吴新田，第十七路总司令邓宝珊。^②1月26日，冯玉祥抵达西安。2月22日，冯玉祥通令颁布《军政长官应遵守者十条》。3月12日，冯玉祥又颁布了《告诫高级军官十条》。3月27日，冯玉祥发布《敬告陕西各军队书》，郑重告诫他们：对以往的不良行为，必须即刷洗净尽，要赶快猛醒。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还颁布了《注意纪律期与民众合而为一》《赔偿倒毙民间驼骡》《不准践踏禾苗》等一系列通令和命令，明确规定：各路、各师、各旅层层组织执法处，监督军纪的执行情况，如有违纪行为，一经查出，即行严办。

国民军联军在陕西成立了由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的驻陕总司令部，在甘肃成立了由刘郁芬任总司令的驻甘总司令部，并任命宋哲元为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驻宁夏。

为了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国民军联军在陕西开办和续办了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军官学校等。

中山学院是在原国立西北大学的基础上开办的，于1927年3月10日正式成立。院长刘含初，副院长兼总务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延震东。学院先后开办了组党、军事政治、农民运动、妇女运动、行政人员养成等5个专业班及劳动夜校。学员大都是陕甘各地中共组织通过当地国民党党部保送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开设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各国革命史、关税问题、不平等条约、孙文主义、国民党党史、军队中政治工作、土地问题、农民运动等。学院以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才”“妇女运动提高人才”为宗旨，先后培养学员1000余名。

中山军事学校筹建于1927年3月，5月12日正式上课。校长史可轩，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李林，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总队长许权中。学员共400余名，分编为3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3个分队。校址设在西安城内北院门。学校开设课程有军事与战术、军事理论、野外作业、中国革命史、孙文主义、国民党党史、形势任务教育、政治经济学等。

国民军联军军官学校也称西北军官学校或国民军军官学校。该校于1926年12月27日在甘肃平凉正式成立。1927年1月迁至西安后，校址设在东厅门。该校“以培养国民革命实际斗争的军人初级干部人才，实现三民主义达到世界革命为宗旨”。1927年4月，该校改名为“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续范亭，副校长王文彬，政治部主任唐澍。该校先后招收学员1200余人，分编为步队6个队，骑兵、炮兵、工兵、机关枪队、迫击炮队各1个队，共11个队。

这些学校的开办，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对后来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玉祥统率国民军联军入陕后，迅速稳定了陕西的局势，有力推动了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冯玉祥与陕西一些军事将领的芥蒂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军联军内部的团结。^③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多方努力下，陕军将领与冯玉祥的矛盾虽然有所化解，但并没有最终消除。1927年3月，曾长期担任陕西督军、又率部围攻西安的刘镇华率镇嵩军投靠冯玉祥，得到冯玉祥的重用，也进一步加深了陕军将领对冯玉祥的积怨。特别是户县惨案的发生，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两安城解围后，户县发生春荒，当地大多数农民断粮。而驻防户县的国民军联军某部军官何经纬却勾结当地豪绅，借机摊派苛捐杂税，私囤粮食，哄抬粮价。1927年4月底，中共户县组织发动群众查出何经纬私囤粮食750多石。消息传出，民怨沸腾。何经纬气急败坏，以武力包围农民协会。5月11日，何经纬又调集4个营的兵力，包

围了新阳操东索村农民协会，屠杀农协会员 11 人，伤害 40 余人。当天晚上，何经纬又派兵捣毁各村农民协会，杀害农协会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户县惨案。

户县惨案发生后，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和户县农民协会连续发出宣言、通电，揭露何经纬的罪行。5 月 15 日，西安各团体在东大街中山俱乐部召开追悼户县死难农友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提出了严惩凶手等 10 项要求。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冯玉祥被迫给何经纬以“革职留任”处分，并要何经纬随军东出潼关，“将功折罪”。冯玉祥对户县惨案元凶的宽容和包庇，不仅使当地民众义愤填膺，也引起一些陕军将领的愤慨，从而使陕军将领与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加深。

由于国民军联军统帅冯玉祥既倾向于革命，又在面对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强大压力和受到陕甘地区农民运动冲击的情况下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使得国民军联军在大革命运动的浪潮中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动摇性和不确定性。

①旧省名，1954 年撤销，辖区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国民革命在陕西》（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819—820 页。

③1921 年 6 月，时任直系军队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冯玉祥，随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入陕。冯玉祥入陕后，将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师。8 月 13 日，冯玉祥奉阎相文之命，在西安西关军事学校设宴，诱杀了原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在陕西靖国军内掀起轩然大波。8 月 22 日，阎相文因直军内部矛盾激化而服毒自杀。冯玉祥随即接受北洋政府任命，出任陕西督军。此后，冯玉祥在改编陕西靖国军时，与一些陕军将领结下积怨。冯玉祥再次入陕，并没有消除这些陕军将领对他的戒惧心理。

三、中共组织在陕西地方武装中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方武装中的活动有着长期的历史。

早在 1922 年秋，曾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的杨虎城率部由凤翔北上，退据陕北，部队被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当时，在榆林中学任教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团员魏野畴就开始同杨虎城接触，向这支部队传播马克思主义。魏野畴离开榆林中学后，前

往北京，并于 1923 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魏野畴返回陕西后，开始从事建党、建团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的重要创始人。

1924 年 11 月，担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杨虎城率部南下关中，途经绥德时，受到共产党员、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及全校师生和当地群众的欢迎。当晚，杨虎城下榻四师校内。李子洲与他进行了晤谈，向他介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李子洲还邀请他为全校师生做了一次生动的讲演。通过魏野畴和李子洲卓有成效的工作，杨虎城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5 年 8 月，杨虎城在耀县^①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经魏野畴等推荐，一些党、团员开始进入杨虎城的部队。在艰苦卓绝的西安反“围城”斗争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与守城部队密切合作，共渡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 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中的支部成立，由曹力如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队中建立的第一个组织。

在此之前，陕北党组织于 1926 年春分别在井岳秀所部石谦团中建立了两个军队特别支部——中共宜川（军队）第一特别支部和中共宜川（军队）第二特别支部。中共宜川（军队）第一特别支部在宜川集义镇，书记李象九^②。中共宜川（军队）第二特别支部在宜川县城，书记谢子长^③。这两个军队特支均属绥德党组织领导，并受中共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

1927 年 1 月，井岳秀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军联军第九路总司令。石谦升任第九路第二师第六旅旅长，该旅扩编至 1000 余人，部队分驻延川、延长、宜川、安定^④、清涧等地。中共绥德地委先后派李瑞阳、杜衡、阎揆要等来到部队，与时任营长的李象九和时任连长的谢子长等一起，开办青年军官训练班，并发展新党员，使部队中党的力量不断加强。同年春，李象九营被调往清涧县城，中共宜川（军队）

第一特别支部改称为中共清涧（军队）特支；谢子长连调往安定县瓦窑堡^⑤。中共宜川（军队）第二特别支部改称为中共安定（军队）特支。中共清涧（军队）特支和中共安定（军队）特支改由中共陕甘区委直接领导。此后，两个军队特支大量吸收进步官兵入党，使石谦旅的共产党员总数达到 100 多名。由于受到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的影响，石谦对共产党人在其部的活动采取了默许与宽容的态度，使石谦旅特别是李象九营与谢子长连成为中共组织基本掌握的武装力量。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冯玉祥的请求，相继从苏联莫斯科、广州黄埔军校和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宣侠父等 200 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使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和提高。1926 年 9 月 27 日，国民军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成立，刘伯坚、王一飞、卢绍亭等共产党员分别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下设参谋部和政治部，薛笃弼任政治部长，刘伯坚任副部长并代理部长工作。国民军联军各部队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军和独立师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师以下部队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工作的领导骨干，大多由中共党员担任，如：国民军联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贾大容、宣传科科长曾晓渊，第一路（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卢绍亭，第三路（孙良诚部）政治部主任宣侠父，第四路（马鸿逵部）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第六路（韩复榘部）政治部主任李世乐，第十路（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国民军联军驻甘肃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贾从周，国民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唐澍，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主任邓小平，等等。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为国民军联军“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战略方针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军联军中，还有一支由中共地方组织直接掌握的部队，这就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政治保卫队的前身是国民军联军第二路第二师，师长史可轩、团长许权中、营政治指导员马

明方均为共产党员。1926年12月22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史可轩被任命为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队队长。联军第二路第二师随即被改编为政治保卫队，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中共还在这支部队中成立了特别支部。1927年1月，政治保卫队被改编为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一师，史可轩仍任师长。在史可轩、许权中、马明方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这支部队成为大革命后期陕西的重要政治力量。

此外，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王泰吉等还在陕军甄寿珊部队内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广泛开展活动，发展新党员。

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陕西地方武装中的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方武装中的影响，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的发展，也积累了军事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一批军事和政治工作骨干，从而推动了陕甘地区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

①今铜川市耀州区。

②一说李致煦。

③一说杜振庭，即杜衡。

④今子长县。

⑤今子长县县城。

第二节 大革命在陕西的失败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陕西局势

1927年4月12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由蒋介石等任委员、胡汉民任主席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发出“通缉共产党首要”秘字第一号令，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4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告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往南京，即日开始办公。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巨变与分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此而遭到局部失败。

4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4月21日，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力的北伐军开始沿京汉铁路向河南进军。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陕西后，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于4月24日发出通电，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通电指出：“似此拥兵自重，残民以逞之反动行为，何异于万恶军阀。本会誓与此叛党之徒奋斗到底，肃清反侧用奠党纪。”^①

4月25日出版的《陕西国民日报》刊登了这个通电，并发表了题为《打倒蒋介石便是护党》的社论。

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新城^②广场召集军民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誓词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中华民国）十六年‘五一’劳动节，在西安新城整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予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与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更促进世界革命之成功。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誓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③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以石敬亭为总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代部长。冯玉祥命驻甘总司令刘郁芬、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留守甘肃、陕西后方，其余部队分编为六路，分别向湖北、河南、察哈尔^④、绥远进发。中路军由冯玉祥自兼总司令，孙良诚为总指挥，东出潼关，自河南洛阳、郑州方向推进；右路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

出紫荆关，经河南南阳向郑州一带进军；左路军总司令徐永昌，率部由陕北东渡黄河，假道山西，出娘子关，直趋石家庄，截击奉军退路；东路军总司令刘镇华，率部由河南孟津北渡黄河，向河北京汉铁路沿线活动，绕攻郑州后方；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率部出武关，向豫西一带推进，以截击直系军队残部；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率后方各部队集中于宁夏，待命出击察哈尔、绥远，以牵制奉军。5月5日，冯玉祥命令各路军出动，并将各路兵力部署电告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为了解决东征部队的粮食和经费问题，冯玉祥发行了军用流通券、富秦加字票和地方公债。陕西民众不仅承受了这些沉重的负担，还不分昼夜地承担各种差役，以保证冯玉祥所部东出潼关策应北伐。西安、周至、户县、渭南等地先后召开群众大会，拥护冯玉祥部出师东征，各地农民协会、农协会员和农民自卫军日夜运送军用物资。冯玉祥部所经之处，群众箪食壶浆，热烈欢送。陕西民众在遭受长期战争浩劫、民力财力已近窘迫的情况下，仍然竭尽所能，给冯玉祥部以全力支持。

5月6日，冯玉祥在行至潼关时，获悉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于北京的噩耗，异常悲愤。他当即在潼关第二集团军总部召开追悼大会，并电令全军各部队和西北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冯玉祥在追悼李大钊的电文中写道：“李同志之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地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⑤5月9日，冯玉祥沉痛赋写并亲书《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自由诗一首，命人刊刻上石，立碑于老潼关县城。

5月8日，冯玉祥部占领河南陕州^⑥，15日攻克洛阳，30日占领郑州。6月1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也到达郑州，与冯玉祥部会师。6月2日，贺龙率领的北伐军独立第十五师率先进入开封，北伐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也于当日到达开封，与冯玉祥部会师。至此，冯玉祥部与武汉国民政府派遣的第二期北伐部队胜利会师中原。

在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同时，蒋介石也制订了三路北伐计划：第一路由何应钦为总指挥，从镇江、常熟渡江北上，肃清江北之敌；第二路由蒋介石任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由浦口渡江北上，在津浦路正面作战；第三路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进袭津浦路直鲁军侧背，联进陇海路。5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的三路北伐军相继渡过长江，向江北推进。5月27日，蒋介石赴津浦路沿线督战。6月2日，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攻占徐州。其他各路部队也相继推进至苏北、皖北地区。

蒋介石乘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不断指示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地方军阀进攻湖南、湖北，并秘密策反驻扎在湖南、湖北的武汉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叛乱。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政府通电。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于5月13日发出通电，宣布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夏斗寅所部于5月17日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迅速反击，击败了夏斗寅叛军。武汉国民政府于5月25日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叛军。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所部逃往巴东。在湖北相继发生叛乱的同时，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叛乱，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6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转向反动，宣布“江西共产党人限期出境”，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逐出江西。

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部封锁和内部策反，把持着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汪精卫的反动面目也开始逐步显露，反革命活动也开始表面化。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革命危机加剧。

在宁汉暂时对立的局面下，拥有二三十万重兵的冯玉祥，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和南京方面都竭力争取、拉拢冯玉祥。

6月10日，汪精卫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史称“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唐生智、于右任、刘骥、鹿钟麟、张发奎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会上，汪精卫和唐生智等希望与冯玉祥联合，共同反蒋和反共，冯玉祥对武汉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湖南、湖北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却没有片言谴责，反而一再要求武汉方面停止宁汉对立，同南京方面联合起来，共同北伐。郑州会议对党务、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在党务方面，决定撤销北京、西安两个政治分会，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甘肃、河南三省的党务和政务，冯玉祥为主席。在政治方面，决定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冯玉祥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军事方面，决定将唐生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撤回武汉，巩固后方；将河南留给冯玉祥所部，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郑州会议的召开，暴露了汪精卫的反共真面目，也是冯玉祥从参加革命到投身反动阵营的转折点。

冯玉祥在东出潼关参加第二期北伐后，始终对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李鸣钟常驻南京，同蒋介石保持联系。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文电、信使往返不断。6月14日，冯玉祥电令李鸣钟面见蒋介石，报告郑州会议情况，并转达冯玉祥欲与蒋介石会面的意愿。6月17日，蒋介石携李鸣钟等抵达徐州。6月19日，冯玉祥由开封乘火车抵达徐州，蒋介石率白崇禧等到车站迎接。20日至21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行营驻地花园饭店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李鸣钟、何其巩、董鄂、钮永建、贺耀祖、方本仁、陈立夫、何成浚、李宗仁、白崇禧等。会议就党务、政治建设、对共产党的办法、继续北伐、武汉政府、军事等八项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就“清党”反共问题达成一致，冯玉祥表示，将立即在他所统率的军队及辖区内实行“清党”。会议决定蒋冯联合作战，肃清革命军境内之敌，第二步进

行北伐。蒋介石还应允从7月起，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50万元。会议决定由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汪精卫等人，要求将苏联顾问鲍罗廷解职并驱逐回国，并劝武汉政府自动取消。徐州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与冯玉祥于当天发表联合通电，称：两人与所部“为三民主义信徒，凡百诱惑艰险牺牲，均所不顾，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⑦。

徐州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大为加强，加速了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步伐，促使宁汉合流，最终造成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①《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25日。

②今西安新城。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国民革命在陕西》（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52页。

④旧省名，1952年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入山西省和河北省。

⑤《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5月31日。

⑥今河南陕县。

⑦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57页。

二、冯玉祥“清党”反共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返回开封，立即开始部署“清党”反共。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步，要政治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出党；第二步，出党之后，请他们当顾问；第三步，如果不愿当顾问的就资遣出境。”^①6月25日，冯玉祥电示驻陕总部，命令国民党的陕西各级党部一律解散，另做组织；各民众团体，立即停止活动。6月28日，冯玉祥进一步命令：（一）不准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二）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的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加以严密监视；（三）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②7月7日，冯玉祥在洛阳官佐及总部人员朝会上宣布：“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冯玉祥宣称：“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要注明何

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收容之。至于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③

在冯玉祥“清党”反共政策的推动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境内掀起了一片反共声浪。刘伯坚、邓小平等 240 多名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中共陕甘区委候补执行委员、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刘天章等共产党员被逮捕。7 月 13 日，冯玉祥电令驻陕独立第一师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合并，由史可轩率领，分别开赴郑州、开封“整训”，欲伺机加以消灭。在此形势下，刚刚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该部抗拒冯玉祥的命令，不开赴河南，而由史可轩率领离开西安，经渭北地区前往陕北，向受中共组织影响较深、倾向革命的石谦旅靠拢。7 月 14 日，史可轩率部离开西安，到达临潼交口一带。7 月 29 日，部队到达富平。为了借道北上和筹措粮草，史可轩带十余人来到美原镇，与盘踞此地的地方军阀、曾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的田生春交涉。早有预谋的田生春不顾旧交之谊，将史可轩扣押杀害，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美原事件”。

在国内一片甚嚣尘上的反共声浪中，汪精卫于 7 月 14 日晚在武汉秘密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实行“分共”。7 月 15 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做了有关“分共”问题的报告。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开始实行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动，表明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已被国民党集团抛弃。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随着汪精卫反共面目的彻底暴露，冯玉祥也加紧了辖区内的“清党”反共步伐。7 月 15 日，西安街头出现了以西安警备司令部名义发布的布告，宣布“严禁共产分子活动”。7 月 17 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宣告结束。第二天，反共的陕西省政府在西安正式

成立。由于原定的省政府主席于右任托故不就其职，冯玉祥决定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此前后，西安“红城”被改名为西安新城。陕西境内的革命群众组织相继被改组或解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或杀害。8月4日，长期统治陕北、素有“陕北王”之称的地方军阀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强行查封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聚集的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后，绥德四师的师生被武装遣送回乡，进步书籍被焚烧。担任中共肤施^④县委书记的延安四中校长田伯英被软禁，多数教师被迫离校回家，学生也被逼离开学校。榆林中学也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中共绥德县委和中共肤施县委被迫解体。8月18日，共产党员刘含初被杀害。

9月15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并发表宁汉合作宣言。10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重组陕西省政府，任命于右任、宋哲元、石敬亭、岳维峻、井岳秀、邓宝珊等为省政府委员，于右任为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仍未就职，由宋哲元代理。

冯玉祥的“清党”反共，最终葬送了大革命在陕西的大好局面，使陕西和全国一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反思了对冯玉祥的错误政策。《报告》指出：“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政策之错误，由国际^⑤，中央^⑥以至陕甘区委，都是对冯的估量太过，‘无条件’的对冯帮助！我们不是领导政治，而变成冯的宣传机关；在冯方工作的同志对冯不能影响，而只是做了冯的秘书主任，还说是取得冯的信仰了！”^⑦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指出：“冯既反动之后，党对冯的政策还是动摇不定，以为冯的反动是一时的政策，还有转还的余地，以为冯是中国革命的支柱，不敢轻反，须得到中央的指示！冯的反动在政治上已完全表现出来了，才进一步决定准备反冯，还不敢提出坚决的政策！”^⑧18年之后，周恩来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

《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总结说：“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⑨

①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62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国民革命在陕西》（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622—623页。

③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62页。

④即延安，今延安市宝塔区。

⑤指共产国际。

⑥指中共中央。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03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9页。

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213页。

第三节 土地革命在陕西的兴起

一、中共陕西省委成立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党57967名党员。黄平万代表陕西出席了会议。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任务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会议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并且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

监察委员会。党的五大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改造武汉国民党，如何建立和扩大党绝对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重大问题，没有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也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因而党的五大没有解决如何从危难中挽救中国革命的问题，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大任务。

党的五大闭幕以后，中共中央常委会于5月14日做出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任书记。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了陕西等地的工作，决定：“陕西省委：耿炳光（书记）、黄平万（宣传）、李子洲（组织）。在陕西之汪泽楷调回。李秉乾回后（现在莫斯科）即加入省委。”^①

根据中共中央常委会议的决定，7月上旬，耿炳光、黄平万、李子洲、魏野畴、张金印等在西安城内红埠街召开会议，成立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委由委员13人、候补委员5人组成。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部长）、崔物齐（崔孟博，宣传部长）3人为常委。^②魏野畴负责军事工作，亢维恪负责农民运动，张金印负责共青团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将原中共西安地委改组为西安市委，原中共渭南、绥德、延安、三原、榆林地委分别改组为中共渭南、绥德、肤施（延安）、三原、榆林县委。此外，新成立了五一县委。^③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共辖市委1个，县委6个，直属区委、支部22个，有党员2177人。

7月7日，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张金印为书记。当时，共青团陕西省委下辖共青团西安市委和长安、渭南、五一、肤施等县委。全省有共青团员1924名。

7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陕西的政治经济情况，报告特别提出：“杨虎城开赴河南兰封，杨虎城心欲骗冯^④，冯之诡计多端，未必受骗，请中央对杨部注意，他在豫还是一个有作用的

军队。”^⑤报告还提出：“对冯在未得中央政策前，我们决定不能作反冯宣传与反冯运动，因为冯与第三国际尚未完全断绝关系，他过去与我们无大恶感，目前还不可破面；而且我们的羽毛尚未丰满，反冯也非时机；但不宣传一军^⑥好，对冯右倾也不袒护。”^⑦报告还提出：“以暂时的退守保存实力为工作原则，停止一切斗争，充实群众的组织，并加内部训练。”^⑧“党内各机（级）关系须密切”，“继续发展组织，但须比较以先紧严”。^⑨

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便于指导各地工作，决定在陕西各地实行特派员制度。全省分为六路，每路各设特派员一人，直接向省委负责。东路特派员何挺杰（后为潘自力）；西路特派员耿炳光；北路（三原、富平地区）特派员李子洲^⑩；南路（长安、蓝田、周至、户县）特派员陈嘉惠；东北路（渭南地区渭河以北的五一、蒲城、澄城、合阳、朝邑^⑪）特派员蒲克敏；陕北路（陕北地区）特派员魏野畴。魏野畴和省委军委成员唐澍、白乐亭（白明善）等于8月初到达陕北后，因白色恐怖严重，魏野畴无法立足，遂应杨虎城之邀，前往皖北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唐澍、白乐亭留井岳秀部石谦旅李象九营工作。

在此之前，李子洲于7月20日离开西安，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李子洲到达武汉后，于8月6日写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的请示》，希望中共中央“将陕西今后工作的大方针决定示知，以便省委本此方针，拟定详细计划”^⑫。《请示》还提出：“冯（玉祥）反动后，因未得到兄方^⑬的指示，只得暂取退让，究竟今后对冯应取如何态度，要兄方详为决定。”^⑭

在李子洲给中共中央写下书面报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制定了继续进行

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时期。

八七会议闭幕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于8月12日接见了李子洲。在听取了李子洲的汇报后，张太雷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中央认为：“陕西的政策与河南有同样的错误，不打冯^⑤事实上就是帮助冯的反动，此政策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不能完全怪地方，中央也要负责任。冯在河南将不能立足，将抓陕西来作为其根据。我们要计划根本推翻冯的统治，现在他的统治并未稳定，我们要使他不会稳定，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有一错误，即仅是利用此打彼，这种仅仅上层的工作完全是军阀政客的把戏。我们党的一切都应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在民众中我们要提出代表民众真正利益的口号。”^⑥中央要求：“根据此次紧急会议^⑦决议回去改组，将告同志书^⑧交到下级党部去讨论，取消反对新政策的分子，在渭河农民同志多的地方应加入至少二农民同志到领导机关”，“改变党员的质量和成份，即要增加农民的数量”，“消极的分子要洗刷出去，吸收在斗争中勇敢的分子入党，或加入领导机关”。^⑨中央明确指示，“农民集中重要几县即可开始暴动，反对土（豪）劣（绅）贪污，抗租、抗捐、抗税”，“要注意红枪会和土匪的工作，尤其要作破坏军队的工作（农民加入军队），我们不要怕拿政权，要勇敢的去拿，失败可以上山”。^⑩中央指示：“可以利用二、三军^⑪反冯，但要注意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政策，主要的是要造成我们自己的力量。”^⑫

八七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为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鼓舞了陕西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蓬勃兴起。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2页。

②黄平万因身份暴露，在陕西无法立足，于同年8月调任中共无锡县委书记，离开陕西。

③1927年5月1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在渭南渭河以北地区设立五一县，县治设固市镇，故习惯称之为固市县。

④指冯玉祥，下同。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5页。

⑥即原属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第一军。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6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6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7页。

⑩一说李秉乾。

⑪旧县名，1958年撤销，辖区并入大荔县。

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0页。

⑬即中共中央。

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1页。

⑮指冯玉祥，下同。

⑯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4页。

⑰即八七会议。

⑱即告全党党员书。

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5页。

⑳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4页。

㉑指原国民军第二、第三军。

㉒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5—96页。

二、“九二六”会议

1927年9月上旬，李子洲回到西安，立即向陕西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立即决定，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精神。

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红埠街9号院召开，史称“九二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李子健）、张金印、张秉仁（张性初）、蒲克敏、杜衡、何挺杰、张国藩、陈嘉惠、潘自力、萧明等15人。^①

李子洲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决议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并做了《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耿炳光做《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组织工作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共进社进化社问题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

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明确提出：“我们惟有在我们正确的指导与策略之下，坚决的有计划的斗争，注意‘部分的深入’，渐取得广大的民众，巩固我们的组织，使革命得到重新的进展。”^②在军事政治方面，《决议案》提出：“在西北坚决的反冯^③，使冯的统治不能稳定以至于崩坏。”^④《决议案》还要求：“我们自己的武力，也要在斗争中积极培植，使之生长发展。”^⑤《决议案》还分别就农民运动、手工业工人及商民工作、对国民党工作、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党务工作、共青团工作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决议案》号召：“我们要努力工作，使党的影响在斗争中扩大并巩固起来！”^⑥

会议通过的《组织工作决议案》响亮地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⑦

会议通过的《宣传问题决议案》分别就各级党组织对内宣传、对外宣传和注意地方问题的宣传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提出：“共产党时时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军事的知识与训练，每个党员都应具有的，但过去党对于此很少注意，而有部分同志甚或鄙视！此后我们要努力纠正，使每个同志都受相当的军事训练，学习相当的军事知识，作武装民众暴动指挥者。”^⑧

会议通过的《农民斗争决议案》指出：“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⑨要求：“要勇敢的改正以前的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取得新经验。我们确信农民在此种加重的剥削之下，其革命的情绪，必于最近爆发起来。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我们确信‘在斗争中组织农民’，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坚〔决〕的领导农民斗争，为农运要着；我们不要怕人说或跟着人家说：‘幼稚’、‘过火’！”^⑩《农民斗争决议案》还提出“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耕者有其田”“取消高利贷”“武装农民”“铲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打倒新旧军阀”等 17 条口号。^⑪

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提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短兵相接作殊死战，以争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候，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西北的特要任务。”^⑫

会议改选了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亢维恪、刘继曾、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委员；张含辉、潘自力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为组织部长，李秉乾为宣传部长，亢维恪负责农运工作，刘继曾任秘书长，张金印为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

会议结束后，中共陕西省委于 10 月 8 日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通报了“九二六”会议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指出：“这次大会后，党的策略、党的组织，转入一个新的时期。所以这次会含了极其重大的意义！”^⑬《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均应即时按当地的政治环境，召集各式的会议，执行下列的任务：（一）顺序讨论大会的重要文件；（二）改选执委，尽可能的参加农民分子；（三）制定当地工作计划（须具体）；（四）一切结果，即将经过详细报告省委”。^⑭《通告》强调指出：“各地对中央文件应择要讨论，尤其是告党员书，应在支部中详细分析，使每个党员明了这个重大的意义！”^⑮

“九二六”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克服了错误倾向，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并结合陕西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路线和政策。会议的召开和做出的决议，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时期。

①在会议召开之前的8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农运负责人亢维恪和共产党员吕佑乾等在华阴县组织农民开展抗粮斗争时，遭到地方当局的逮捕。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③指冯玉祥，下同。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2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3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8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0—131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3页。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4页。

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7页。

⑬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1页。

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2页。

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2页。

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一）清涧起义

“九二六”会议之后，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首先在驻守陕北清涧的井岳秀部第十一旅内加紧展开。

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后，即密谋在共产党员活动频繁的第十一旅中清除共产党员。井岳秀要该旅旅长石谦交出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员，被石谦拒绝。于是，井岳秀决心除掉石谦。他以自己50岁生日为由，请石谦赴榆林参加祝寿活动。石谦先以种种借口推辞，后在同僚的劝说下，仍然前往榆林。石谦到榆林后，于8月22日被井岳秀杀害。第十一旅的官兵得知石谦被害的消息后，一片哗然，军心不稳。井岳秀任命其亲信康子祥代理旅长，随后又指使第二师师长高双成调第十一旅李象九营由清涧换防延安，调谢子长连由安定到清涧换防，企图分而歼之，消灭由共产党员掌握的这支武装力量。为了安抚人心，井岳秀还下令将石谦灵柩运回其家乡白水县，准备厚葬。

井岳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石谦旅广大官兵的愤慨。谢子长和李象九决定，李象九营暂不离开清涧，而谢子长连借故移防，向清涧方向移动，以形成合力。唐澍则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并请示下一步行动方针。唐澍于9月底返回清涧后，立即组建了由唐澍任书记，白乐亭、李象九、谢子长为委员的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开始部署起义行动。

10月12日清晨^①，在唐澍、李象九、白乐亭、谢子长等领导下，驻清涧的第十一旅部队以“为石旅长报仇”为号召，毅然发动起义，从而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先后占领了清涧县警察局和县政府，缴获了一批枪械。当天下午，起义部队离开清涧县城，沿清涧河川道向延川县城推进。当天黄昏，起义部队抵达延川县城，与驻守延川的共产党员王有才率领的第一营第四连会合。10月13日，起义部队又赶往延长县城，击毙了驻守延长的第一营营长齐梅卿，并收缴了驻军两个连的枪械弹药。随后，起义部队又经雷池、云岩等地，于10月15日抵达宜川。在共产党员李瑞成领导的一个连的策应下，起义部队占领了宜川县城。这时，起义部队已拥有1000余人，步枪1500余支，短枪200余支，战马百余匹。

清涧起义部队占领宜川，引起井岳秀的极大恐慌，急令驻防延安的高双成部围攻宜川。

这时，起义部队仍沿用原第十一旅番号，由李象九任旅长，孟澄斋任参谋长，辖 3 个营，营长谢子长、韩子丰、李瑞成均为共产党员。

由于与李象九在部队发展方向和任用干部等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唐谢遂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李象九则率部队驻守宜川。

高双成率部队抵达宜川附近后，采取麻痹劝降的办法，对起义部队进行分化瓦解。高双成在麻痹劝降产生效应后，即组织部队向宜川城发起进攻。驻守凤翅山的连长雷进才在战斗打响不到 20 分钟时即叛变，凤翅山阵地失守。驻守虎头山阵地的一个排也发生叛变。在失去这两处外围主阵地后，李象九只得命令部队仓促向城南方向突围。突围部队经大岭、白马滩等地抵达韩城后，仅剩以谢子长营为主要力量的三四百人。李象九接受了韩城驻军首领王保民的改编，将部队改编为独立旅，李象九仍任旅长，驻韩城西庄镇一带。

中共陕西省委十分关心清涧起义所保留下来的部队。11 月 14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说：“延安高双成（师长）向宜川进攻，初败，后来又增加兵力，李^②乃退至韩城，与杨虎城部之王保民联合，徐图发展，此亦为预备之计划。”^③

同年 12 月初，唐澍和阎揆要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来到韩城西庄镇，随后开始整训部队。12 月 30 日，部队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的旗帜，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部队编为 4 个分队，共 100 余人。为了保证党的领导，部队中成立了由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史唯然组成的新的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陕北军委决定将部队重新开回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28 年 1 月 1 日，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离开韩城，向宜川方向前进。在进攻宜川城时，部队严重受挫。随后，部队北撤到延长，在交口镇遭敌袭击，再次受损。之后，部队经延川、安塞、保安^④等

地，来到甘肃省陇东地区的豹子川一带。在转移途中，部队屡遭国民党地方武装袭击，损失严重。在此情况下，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先后辗转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其余人员分散隐蔽。至此，清涧起义最后失败。

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三个多月，转战十多个县，给国民党陕北地方军阀以沉重打击，点燃了革命武装斗争在西北的希望之火。由于起义领导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主观指导上的某些失误，同时并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导致了起义的最后失败，但是，这次起义却为后来建立和发展西北红军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并且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其他各地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

①关于清涧起义爆发的具体时间，历史文献与当事人回忆有所不同，另有10月10日、10月14日之说。

②指李象九。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56页。

④今志丹县。

（二）渭华起义

渭华起义是继清涧起义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北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有着深远影响的武装起义。渭华地区即今渭南市临渭区、华县及附近地区。这一地区是陕西党、团组织建立较早，群众基础较好，革命活动开展较为集中与广泛的地区。

192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就陕西工作问题发出《中央陕字第九号公函》，对陕西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信中指出：“省委应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反对新军阀战争，以工农暴动消灭军阀战争。”^①指示信还提出政权问题，明确要求陕西省委：“须以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工农群众中利用广东两湖继续不断的暴动事实和陕西省内统治军阀的暴横剥削作广大和经常的宣传，务使工农群众坚强的组织和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自己苏维埃政权的决心在群众中经常地

发展起来。依陕西现实主客观上的情形说自然还没到一个总暴动时期，但乡村中斗争已经开始。而且许多地方又有我们的军队驻扎，果使农民群众已实际地参加日常斗争，农民群众有了坚强的组织，城市工人亦有相当工作，党的领导亦相当健全，则工农暴动割据的局面，至少农暴的割据局面必可在陕西出现。因此，政权的宣传和工农群众对于实现苏维埃政权的决心更须在经常的斗争中培养出来，乡村政权归农协的口号应改为乡村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②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月12日发出《省委通告第二十六号》，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③《通告》提出：“在我党目前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之下，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的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战争，杀尽所有的豪绅、地主、官吏，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农民协会）。”^④“依据天然的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汉南^⑤、陕北三区。汉南、陕北两区，在省委指导之下，各设有一特别委员会，根据党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代表省委执行职权，指导汉南、陕北党内党外一切工作。”^⑥《通告》还决定将关中地区划分为五个重要区域：（1）省东区，以华县、渭南作中心；（2）渭北区，以泾阳、三原作中心；（3）省西区，以乾县、礼泉作中心；（4）中区，以长安作中心；（5）东府区，以蒲城、固市^⑦作中心。《通知》指出：“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以便沟通各县动作，很灵活的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⑧

省委第二十六号通告发布之后，渭南发生了“宣化事件”，加快了陕东地区武装暴动的进程。

位于渭南县城西北槐衙村的宣化高级小学，是当地农民自建的一所学校，也是中共渭南县城关区委机关的所在地。2月28日，当地劣绅刘铭初及反动分子薛明璋、田宝丰、王武轩带领四五十名暴徒，捣毁了宣化高小，将学校师生强行逐出校门，并打伤数人。事件发生

后，渭南党、团县委于当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以暴力驱逐反动势力。2月29日清晨，二三百名学生和四五百名农民冲进宣化高小，当场打死了刘铭初、薛明璋，打伤了田宝丰（后因伤重毙命），将王武轩投入水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宣化事件”。

“宣化事件”发生后，渭南地方当局和当地军警立即展开血腥的逮捕和镇压。渭南中学、渭南东关小学、渭阳中学等学校被封闭，共产党员、渭南中学校长王文宗和教师冀月亭被残酷杀害，4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白色恐怖笼罩着渭南一带。

3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三十九号《通告》，通报了“宣化事件”的全过程，并指出：“宣化斗争有日渐扩大深入，一直发展到渭南全县大暴动的趋势与可能。”^⑨《通告》指出：“沉寂无斗争的陕西的党今已开始了正确的群众斗争，我们只有本党的新政策，坚决的勇敢的站在群众的前边，领导民众继续延长扩大宣化斗争，并不断的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开发群众的游击战争，猛烈的杀豪绅地主官吏及其走狗，夺取他们的武装，破坏他们的统治，掀起全陕东的大动乱，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的民众大暴动，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同时各地皆须努力发动群众斗争，引起全陕大骚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这固然不是一天两天急切所能做到的事，可是这是由此开始，一直继续延长扩大而形成的，决没有什么阶段可分，亦决不容许徘徊观望而有所等待的。”^⑩

3月16日，前往上海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陕西省委代理书记潘自力和省委常委张金印、王松年向中共中央做了《陕西党团组织情况的报告》。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潘自力等陕西代表出席。会议做出《陕西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陕西的反动统治已在崩溃之中，因此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决议案》分别对陕西的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军事工作、党的组织、全省工作的布置和反国民党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陕西省委一方面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一方面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使之成为真正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坚强组织机构。会后，由于党的六大延期举行，张金印留团中央工作，潘自力和王松年将中共中央作出的《陕西工作决议案》带回陕西，予以传达贯彻。

3月20日，中共中央向许权中发出指示信^⑩，信中指出：许旅寄生在李虎臣下面不是出路，要随时准备脱离。目前主要工作是肃清内部，发展壮大组织，扩充军队；加紧党的训练，明确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⑪要求许旅或开赴陕中，帮助并发展农民暴动，相机形成割据局面，或开赴豫西，帮助河南农民暴动，或开赴鄂北，准备与两湖革命势力连贯起来。^⑫

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划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和固市县为陕东暴动区，并成立陕东特别委员会，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准备暴动。陕东特委于4月1日在华县成立，书记由省委常委刘继曾担任，组织委员为渭南县委书记萧明，宣传委员由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李昌英）担任。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加紧部署陕东大暴动之际，时任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宋哲元与陕军渭河以南总指挥的李虎臣在潼关一带发生战事，许权中旅奉命开赴潼关。许权中旅的调动为渭华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5月1日，渭南县崇凝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这是西北地区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点燃了渭华地区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揭开了渭华起义的序幕。5月3日，渭南县阳郭县暴动群众抄没和分配了土豪的粮食财物；华县薛家村暴动群众武装袭击本村大恶霸，没收分配了他们的粮食、财物。5月4日，渭南县三张镇暴动群众收缴了警察分局的枪支，处决了税务所所长；华县高塘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5月5日，华县东王村宣布成立村苏维埃政府。固市县暴动农民组织特别武装处决土豪五人，成立了信义区和隆兴区苏维埃政府。旬日之间，在南起秦岭，

北至西（安）潼（关）公路，东起少华山，西迄临潼 200 多平方公里的关中大地，武装起义的烈火熊熊燃烧。

渭华起义爆发后，中共陕东特委于 5 月 4 日在渭南县城南的望岗岭召开群众大会，宣告陕东赤卫队正式成立。陕东赤卫队共 150 余人，枪支 50 余支。其中 28 名成员是在许权中旅进行过专门培训的武装骨干。李大德任大队长，副大队长薛自爽，党支部书记冯义生，副书记孙敬堂，下设四个中队和一个大刀队。陕东赤卫队成立后，即在渭南塔山一带构筑工事，使塔山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堡垒。

5 月 10 日，许权中旅由潼关一带赶至华县瓜坡镇，参加渭华起义。5 月 16 日，起义部队定名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刘景桂）任军委主席，许权中任总顾问。军委委员包括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王泰吉、高克林、许尚志、赵雅生等。西北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委，王泰吉任参谋主任，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政治部副主任，许尚志任秘书长。全军编为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赵雅生，第二大队长武培谋，第三大 队长谢子长，第四大队长雷天祥。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发出了由军委主席刘志丹、总司令唐澍、政委刘继曾联名签署的《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西北工农革命总司令部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一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要账手提光光子，打人不论亲弟兄。于今穷人要睁眼，大家团结来求生。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大家同心一起干，铲除土豪和财东。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光景。

切切此布！

军委主席刘景桂 总司令唐澍 政委刘继曾

中华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⑭

西北工农革命军与农民暴动紧密结合，打击反动民团，惩治土豪劣绅，先后建立了区、村苏维埃政府 48 个，处决土豪劣绅 60 余名。渭华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渭华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动摇了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基础。为此，6 月初开始，冯玉祥先后调集三个师的重兵，在宋哲元指挥下，向渭华起义部队发起血腥围攻。面对敌人的强大进攻，唐澍、刘志丹等指挥部队展开浴血奋战，但终因敌强我弱，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廉益民、吴浩然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6 月 20 日晚，唐澍、刘志丹等率领起义部队撤离渭华地区，进入秦岭山区。部队先后撤至洛南县的两岔口和保安镇一带。7 月 1 日，李虎臣派方少海率五个旅向保安镇发起进攻。驻守两岔口的唐澍率部 100 余人增援保安镇，被敌人包围。激战中，唐澍英勇牺牲，年仅 25 岁。

保安镇之战后，起义部队余部 200 余人在刘志丹、刘继曾率领下转移到蓝田山区。7 月 15 日，刘志丹和许权中分别率领的起义部队在蓝田县张家坪会合。当天，刘志丹、刘继曾主持召开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番号，并决定刘志丹、谢子长回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起义人员分散离队，坚持地下斗争。余部由许权中率领，与共产党员尹耕辛领导的蓝田地方民团合编，争取暂时编入李虎臣部刘文伯师。此后，许权中部被刘文伯收编，改编为第九旅，许权中任旅长。后来，第九旅向河南确山转移时，在邓县被当地反动武装红枪会打散。许权中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至此，渭华起义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武装起义。关于这次起义的重要性，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继曾在 1959 年 6 月总结道：“渭华起义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主要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扩大了革命影响，也取得一些经验。这对推动陕西地区的革命运动有巨大作用。”^⑮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的潘自力在 1959 年 7 月回忆说：“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⑯，而且在三大起义中是规模和影

响最大的一次。它不仅是陕西、西北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当时全国重大事件之一。它是陕西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清涧起义比较，是进了一大步。它虽然失败，但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它深刻的教育了陕西广大劳苦群众，向他们指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起义中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许多人成为后来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因此，可以说渭华起义是西北十年内战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起义本身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给后来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⑩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88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89—190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94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94—195 页。

⑤即陕南。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95 页。

⑦即五一县。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95 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27 页。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27—228 页。

⑪史可轩遇害后，所部由中共党员许权中领导，先后改编为原国民军二军冯子明部独立第 3 旅、李虎臣部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这是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1928 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指派刘志丹、唐谢、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进入许权中旅，以加强对该旅的领导。当时，许权中旅驻扎在商洛地区的洛南县寺坡、三要司（黄村）一带。

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6 页。

⑬《陕西通史》第 10 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20 页。

⑭《陕西通史》第 10 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22—23 页。

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36 页。

⑯陕西三大起义，通常指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

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28 页。

（三）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及围城斗争

在部署和领导发动渭华起义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先后在关中地区领导发动了旬邑、淳化等武装起义和围城斗争。

旬邑起义是关中地区一系列武装起义和围城斗争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吕佑乾于 1927 年冬前往旬邑，整顿中共组织。1928 年初，吕佑乾任中共旬邑区委书记。他和曾担任过中共旬邑特别支部书记的许才升等人一起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抗粮“交农”，准备发动旬邑农民暴动。5 月初，吕佑乾在旬邑安仁村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九号《通告》精神，部署农民暴动计划。随后，许才升前往清水塬，在郝村药王庙召开中共郝村支部会议，决定以抗粮为导火线，发动全县农民暴动。

5 月 6 日傍晚，许才升以击鼓为号，召集清水塬郝村、班村、蒲社等 18 个村庄的 140 多名农民，手持农具首先起义，并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在行进途中，队伍扩大到 400 多人，进逼旬邑城下。7 日拂晓，在吕佑乾、吕凤岐等组织下，旬邑城内的学生和贫苦民众砸开东城门，农民起义队伍随即攻入旬邑城内，首先打开狱门，营救出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王廷璧、王日省、王子健等人。起义队伍随即又攻占了粮食局和旬邑县政府，处决了县长李克宣及恶差数人。随后，起义队伍控制了全城及附近村庄。

5 月 12 日，吕佑乾和许才升等在县城宝塔小学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主席，吕佑乾为秘书长。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程永盛任委员长；土地委员会，

程百印为委员长；经济委员会，蒲玉阶任委员长；交通委员会，程国柱任委员长；宣传委员会，王浪波任委员长；外交委员会，王日省任委员长；革命裁判委员会，程雨顺任委员长。会议还宣布：将起义队伍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路，下辖三个连，程永盛任总指挥。会后，吕佑乾、许才升、程永盛等分别前往张家村、马家堡、职田、土桥、张洪等村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全县，并波及邻近的彬县、淳化、永寿以及甘肃省的宁县、灵台等地。

旬邑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彬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一面调动部队准备围攻起义队伍，一面指使逃亡豪绅在起义队伍内进行收买、瓦解活动，并任命李焕章代理旬邑县县长。5月30日拂晓，混入起义队伍内部的巡警刘兴汉和程振西、郭金科、连怀印等人被敌人收买，策动所掌握的两个连武装发动叛乱，逮捕了吕佑乾、吕凤岐等起义领导人。随后，刘兴汉等又窜至张家村，将许才升用长矛戳伤后逮捕。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将吕佑乾、许才升等人押至张洪镇。5月31日，旬邑县代理县长李焕章下令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王廷璧、王浪波、程永盛、程国柱等七名起义领导人杀害于张洪镇。旬邑起义至此失败。

旬邑起义失败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等率领起义队伍余部，成立了旬邑游击队，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旬邑起义是土地革命初期由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的一次较为重要的武装起义。旬邑起义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影响深远。尤其是起义后宣布成立的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不仅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而且政权内部机构较为健全，职能分工较为明确，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内县级红色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28年4月，根据省委指示，王泰吉在麟游发动起义。王泰吉是广州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毕业后，王泰吉先后任国民军二军胡景翼部学兵营排长，陕军甄寿珊部教导营学兵队队长、教导团第一营营长等职。根据中共陕西省

委第三十九号《通告》精神，王泰吉于4月在麟游驻地率本营军官队、军士队、学生队及营部部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处决了反动军官，并于起义当晚离开麟游县城。在经崔木镇到达礼泉县南坊镇时，起义部队受到甄寿珊教导团和南坊镇反动民团李世龙部的夹击。起义部队腹背受敌，人员有的失散，有的被迫缴械，麟游起义失败。王泰吉脱险后前往渭华地区，参加了渭华起义。

1928年四五月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中共三原县委发动了农民“交农”斗争和武装围城行动。4月24日清晨，三原县武字区农民汇聚起来，手持农具向三原县城进发。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在武字区农民向县城行进的同时，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的“交农”大军也一起向县城进发。当天中午，两三万“交农”大军将县城团团包围。农民群众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并焚烧了一些农具示威。三原县县长马润昌被迫答应免除当年的粮款。“交农”大军方始离去。

5月1日，中共三原县委决定组织农民武装围城，并成立了以黄子文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指挥部。5月3日，三原农民武装围城斗争爆发。在第一次攻城时，由于驻军早有准备，攻城未克。随后又发起第二次攻城。在第二次攻城时，参与武装围城的地方武装马仙舟叛变，缴了武字区农民武装的枪支，并扣押了围城总指挥黄子文。三原农民武装围城斗争遂告失败。

4月26日，中共泾阳区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发动农民“交农”围城。当天，在总指挥张焕文、副总指挥雷志学等人的领导下，1万多名农民手持大刀、铁矛和农具等，从崇文、鲁桥、永乐、口镇等地向泾阳县城进发。当天傍晚，起义农民将县城团团包围，并开始攻城。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警巡守严密，攻城未克。27日黎明，国民党地方当局调动三原驻军骑兵连等部队前来镇压围城农民，起义农民被迫撤退。泾阳“交农”与围城斗争即告结束。

4月29日，中共礼泉县委书记秋步月主持召开礼泉县党团县委扩大会议，部署发动礼泉起义，决定由秋步月担任起义总指挥。当时，礼泉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已近300名，各级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的成员达6000多人。5月1日，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带领下，礼泉县18000多名农民手持农具等器械，分别从南路、北路、东路和东北路拥向礼泉县城。农民们高呼口号：“免粮免款度饥荒！”“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晚，围城农民攻城遇阻。5月2日下午，秋步月等组织工匠制造云梯，准备于当晚再度攻城。此时，礼泉县长朱家骥指示城内军警和民团武装冲出城外，向起义农民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烈搏斗。起义农民奋勇抗击，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群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秋步月等为避免农民遭受更大损失，下令撤退，礼泉农民围攻县城斗争即告结束。

①

在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相继发动后，中共淳化区委决定以“交农”的方式，领导全县农民举行起义。5月9日清晨，在总指挥、共产党员赵新三等领导下，淳化县东北乡、西北乡、北乡及县城附近的1万多名农民，手持农具等器械，拥向淳化县城，并包围了县城的北门、南门和东门。围城群众高喊口号：“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并提出了开仓放粮、县长段桂田和县保安队离开淳化等条件。围城农民的条件遭到拒绝。5月11日中午，赵新三、田望秀等指挥农民开始向县城进攻。县长段桂田和保安队被迫逃出县城。6月19日，起义农民代表五六百人汇集淳化县通润镇。田望秀主持大会，宣布淳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赵新三任主席。淳化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恐慌与不安。6月30日，国民党当局调集军队和保安团队六七百人将淳化县城包围，并发起攻城行动。起义农民在田望秀、赵新三指挥下，进行了顽强抗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突围。田望秀在突围中不幸牺牲。赵新三等被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存在了仅仅11天的淳化县苏维埃政府就此夭折。

5月16日，在担任暴动总指挥的中共长安县委组织委员李良的领导下，100多名农民手持马刀、长矛等，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咸阳东张村。随后，李良率领暴动农民冲进马家寨，准备处决横行乡里的大恶霸白辛太及其侄儿白云祥。暴动农民冲进白家后，适逢白辛太外出，白云祥又乘乱脱逃。愤怒的群众即将白辛太的3个侄儿当场处决，并焚烧了白家的契约、账簿等。暴动农民的革命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土豪劣绅的气焰，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这次暴动，被史家称之为“咸长暴动”。

在礼泉、旬邑等县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永寿县农民窦玉明、张策合、张文正等于5月18日发动5000多名农民群众，以“交农”方式拥向永寿县城。5月19日，“交农”群众将县城包围，提出：“粮款太重，我们不做庄稼，向县长交农。”“交农”群众还要求将恶绅李风清等交出，由农民裁决。慑于“交农”群众的斗争锋芒，永寿县政府不得不于21日答复群众：三年内不征不派，但却没有对交出恶绅李风清等条件予以明确答复。愤怒的群众于当天午后发起攻城行动，遭到县保安队的武装镇压。张文正等壮烈牺牲，攻城群众数人受伤。群众被迫撤退，永寿“交农”围城斗争失败。

渭华起义爆发后，中共东府特委决定驱逐驻防澄城县韦庄镇的地方军阀赵桂堂。打入各地红枪会组织的共产党员王育真、吴卜亭、雷振东等人领导组建了澄城县西南区农民问政总团。问政总团先后指挥武装农民占领了酥酪、原畔、临皋、东白、西白等地，对韦庄形成了包围态势。6月22日，武装农民逼近韦庄，澄城县城周围大荔、朝邑、蒲城等县数千农民也纷纷赶来参战。由于赵桂堂防守严密，攻城行动连连受挫。问政总团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术，终于将赵桂堂的主力部队歼灭。困守无望的赵桂堂于7月5日晚，利用出城求和之机，率余部逃走。澄城农民围城斗争宣告结束。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各地党组织相继发动的以“交农”围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起义，除咸长暴动和澄城农民问政总团取得暂时的胜利外，其余斗争均告失败。这些起义和“围城”斗争，是尚处

幼年时期的陕西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步尝试，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西劳苦大众所具有的大无畏的奋斗精神，教育和锻炼了陕西的共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对后来渭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

①礼泉起义失败后，秋步月于5月3日主持召开党团县委扩大会议，鼓励大家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此后，秋步月进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通缉。他先后前往西安和湘赣边界及武汉等地，希望与中共组织和工农红军取得联系。但都没有结果。1929年4月，秋步月回到礼泉。5月，他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取得联系。根据临时省委指示，秋步月开始积极组建地方游击队。1930年1月，礼泉游击支队成立，秋步月任中共礼泉县委书记兼游击支队司令员。同年5月9日，秋步月在礼泉县张冉村驻地被礼泉县政府收买的土匪王振邦部逮捕。当天下午，秋步月被王振邦等匪徒残酷杀害，年仅35岁。

第四节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艰苦斗争

一、对“左”倾盲动错误的纠正

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的引导下，从1927年10月下旬起，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11月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宣言》和《通告》对中国革命形势及条件不做客观分析，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进而推翻一切反动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决议。会议通过的文件否认中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据此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

从 11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11 月，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的刘志丹回到陕西，带回了中央号召全国普遍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1928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向陕西省委发出第九号公函，明确提出以工农暴动消灭军阀战争，造成一个割据的局面。2 月 13 日，陕西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文件和中共中央第九号公函精神。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即《陕西 CP^①目前工作方针》指出：“中国目前一般的政治状况，依然一方是国民党新旧军阀连环纷争与混战；一方是工农斗争暴动之前仆后继（继），可见豪绅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办法来巩固其反动的统治。工农民众的革命怒潮，必不可遏止的愤发，分明的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到了长期的非间断的直接革命形势，当前即是苏维埃革命阶段。”“陕西的革命趋势与全国革命趋势并无二致。”^②决议案提出：“近数月以来，全省各地民众反抗斗争之屡屡，东府、汉南、渭北、省西等地农民自发暴动之前仆后继（继），处处证明陕西工农群众革命潮流之高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分化，日益显著，陕西客观上亦到了直接革命形势之阶段中。”^③决议案还提出：“陕西 CP 目前工作之总方向，必须本中央的新政策，过去的实际经验，彻底的打破不信任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念，刻苦耐心的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从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去使工农群众认识自己必须武装暴动，自（己）动手的夺取政权，没收土地之必要。使民众自发的暴动，历久潜伏的积愤尽（快）的开发高涨，由局部的暴动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割据的局面，以（一）直到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④

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和此前发出的第二十六号通告，明确提出了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標。这无疑是陕西土地革命运动的大的进步。但是，由于陕西省委受到当时中共中央“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开始出现“左”倾盲动倾向，并将这种盲动错误推向全省各地。

1928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得到纠正。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中共中央的这一通告未能及时传达到陕西，使陕西的“左”倾盲动错误还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1928年6月13日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全陕总暴动决议案》，在渭南、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已经失败、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各地继续组织暴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把工作中中心从组织暴动转移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指示信明确指出：“陕西目前的工作总的路线就是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的革命的情绪，建立群众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来加强革命的主观的力量。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的纠正。因为不单是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并且可以损害革命的力量。”^⑤指示信还要求：“省委接到此信，必须马上加以讨论，并即做一详细报告来，详述陕西政治经济状况，群众生活与斗争情形，党的组织和工作等，以便中央根据这些报告来指导陕西详细的工作方法与策略。”^⑥此后，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总结了“左”倾盲动错误对陕西的影响和教训，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失误。“左”倾盲动错误开始得到纠正。

①CP 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18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19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19—220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61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62 页。

二、领导灾民为求生存而斗争

1929 年，陕西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严重的自然灾害无情地席卷着三秦大地。面对严峻的自然灾害，陕西的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领导灾民，开展了求生存的斗争。

从 1927 年起，陕西全省旱象就十分严重。1928 年，全省夏秋两季粮食歉收。旱情持续发展到 1929 年，全省粮食作物几乎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据国民党政府有关资料统计：1928 年陕西全省 93 个县（含西安、长安）共有 210 余万户，1180 余万人。到 1929 年 11 月，旱灾波及全省 80 余县，全省死亡达 250 余万人，外出逃荒者 40 余万人，共有灾民 535 余万人。全省人口锐减至 860 余万人。^①

据中共中央 1929 年 6 月 22 日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所述：“陕西 500 万灾民流离饥饿，卖妻鬻子，今年雨量稀少，战祸加重，灾荒更加扩大，国民党军阀不但无积极赈济办法，他们反加重各种苛捐杂税（如西安一市即有杂捐十余种之多），囤集食粮来供军需，使民众更加痛苦饥饿而无生路。”^②《决议案》还指出：“现在陕西不但是大多数贫苦的农民只有吃树皮草根以为生，而且还不免于成千（成万）的饿死，便是城市工人贫民亦因为粮食缺乏，价格比以前腾贵过十倍，感觉得无法生活下去；小商人则一方苛捐杂税之繁重，一方又饱尝生意萧条的痛苦；学生的失学与失业，亦成为最普遍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兵士不但要在军阀战争中当炮灰，并且成年没有饷发，军队中的生活待遇亦异常恶劣，甘肃回民与边界的蒙民，更加上民族的地位不平等，生命与权利丝毫没有保障。”^③

中共中央在《陕西问题决议案》中明确要求陕西党组织：“领导灾民的斗争，而且要使灾民斗争与农村日常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陕西党应当利用各种方式，发动灾民的群众示威行动，例如吃大户、自动分配粮食等，有时甚至于可利用群众要求赈济的机会，将成千上万的饥民团结起来，向统治阶级豪绅地主示威，而且逐渐领导他们走入有组织的农村斗争的路上。农村日常斗争如反苛捐杂税、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应当与灾民斗争有很好的联系，以形成广大有力的农村斗争，这样便更容易领导灾民走向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④《决议案》还要求：“党要深入灾民群众中去，在‘吃大户、分配豪绅地主食粮’的中心口号之下发动斗争，在斗争中组织起来向统治阶级示威，同时党要配合这个广大的斗争，加紧城市工作、士兵工作、农村工作，使这个斗争扩大到反军阀战争以至摧毁乡村反（动）豪绅地主的统治，走到土地革命的道路上去。”^⑤

面对着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陕西人民开展了勇敢的斗争。中共陕西临时省委^⑥在1929年7月19日向中共中央做出的《陕西政治现状及党务报告》中汇报说：“陕西民众在这种水深火热中，自发的斗争已日渐勃兴，汉南石泉、〔城〕固等县佃农自动的抗租，得到最后的胜利；三水^⑦与灾民混合攻入县城，杀戮县长，各机关人员全被掳去，三原、经阳等地农民自动的吃大户。”^⑧《报告》还指出：尽管“这些都是原始式的零零碎碎的斗争，还不能形成大的斗争，但是这些零乱的自发斗争，就是说明陕西革命高潮将要不可避免的来临，党绝不能忽视这些事实，党要加强主观力量，深入群众中去，领导一切群众的斗争，促起革命的高潮”^⑨。《报告》还汇报了陕西等地灾情不断加重的情况。

9月20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再次向中央报告，陕西灾荒严重，冯玉祥部队到处搜刮民财，群众斗争有所发展，但党的力量薄弱，悲观情绪浓厚，同时也存在盲动情绪。10月2日，中共中央给陕西临时省委发来指示信，指出反军阀战争是陕西目前在政治上最主要的任务，要坚决地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同年 11 月，周至、户县一带灾民在农民周七的率领下，攻克周至县城。随后，周七又率领两县灾民围攻户县县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闻讯后，迅速指派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和李特生前往户县，以进行领导工作。陈云樵和李特生赶往户县途中，围攻户县县城的灾民已遭到地方当局和驻军的镇压。陈云樵、李特生又联络周至、户县、兴平等地农民约 2000 余人，再次攻打周至县城。由于敌人防守严密，未能攻克。随后，围城农民沿秦岭北麓向西转移，到眉县境内时，因遭受敌人追剿而失败。

在周至、户县灾民暴动前后，关中、陕北、陕南地区相继发生了灾民自救斗争。如陕北米脂县成立了“饥民自救团”，横山、神木县组织了“发赈请愿团”和“要吃会”，绥德、清涧、延长等地发生了灾民围城“交农”，要求减免粮税、救济灾荒的斗争。在关中地区的岐山、扶风、武功、乾县等地，灾民开展了“吃大户”行动，进行了多次分粮斗争。临潼县交口镇的灾民将下乡搜刮粮食的保安队十余人全部缴械。三原县成立了“灾民自救军”。陕南石泉、城固两县的农民抗缴地租，取得了胜利。在这些灾民自救斗争中，党的各级组织和共产党员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党的影响逐步扩大。各级党组织还充分利用公开的组织“济难会”，救助和接济灾民，凝聚了人心。

①《陕西通史》第 10 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65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84—285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85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87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94—295 页。

⑥1929 年 2 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领导人大部被捕。3 月 1 日，幸免被捕的省委委员张国藩、王林、薛永寿以“现存之省委”的名义，在渭南龙背乡白家庄召开紧急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1930 年 7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

⑦今旬邑县。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99 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99 页。

三、省委领导的兵运工作

从 1929 年下半年起，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高度重视兵运工作，把打入国民党军、瓦解国民党军，变国民党军为人民武装的革命兵变，作为陕西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中共中央在 1929 年 6 月 22 日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中，要求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士兵运动不当限于已有线索的一部分，更不应倚靠下级军官干部去做士兵运动，要指导各级党部注意这一工作，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使他们从日常斗争中接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组成党的士兵支部，以备成为武装暴动中的主要力量之一”^①。《决议案》指出：“积极参加一切贫农组成的土匪队伍与其他原始武装组织，并且注意在斗争中组织农民的武装，在他们中间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确立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②

7 月 19 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向中共中央做出第一号书面报告，汇报了陕西的政治现状及党务工作。关于陕西的兵运工作，报告写道：“士兵工作在陕西有很好发展的机会，因冯^③派部队回陕西以后，大（肆）扩充，招募新兵，党可乘此机会尽量派同志打入，士兵工作可以普遍发展。军队中旧有的组织，马鸿宾部有同志十余人，但有些同志被人发觉，现将这些同志调入别的部队中去，其余同志组织军支，直（辖）临委^④指导。冯之嫡系庞炳勋部亦派同志打入，目前尚无正式组织。陕西土匪遍地，常出没于农村中，尤其是渭北临潼一带，土匪很多，党可设法使前在军队中失败后的同志进行工作。南北三山中

大半（股）土匪，北山有 400 多人在同志影响之下，不过这些同志表现不好，临委最近另派同志进去工作。陕甘连接之旬邑山中有数百人，枪枝很多，已派 20 余同志打入活动，最近未接报告，详细的情形尚不得知，临委将派同志去巡视该地工作。”^⑤

1930 年 4 月 7 日，临时省委发布第九号通告，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的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⑥临时省委在 4 月 15 日发出的《致陕北特委函》中指示：“组织兵变——应首先打破过去太得重视军官运动的倾向（并不是不注意军官而是要特别注意兵士），在有军支组织的军队中，积极的策动兵士的日常斗争，扩大党的政纲（兵士要土地），建立苏维埃与兵变的宣传，开始兵士委员会的组织（秘密或公开），加深兵士与军官的对立。在没有军支组织的中心部队应开始派遣同志进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在将受编的土匪中，应尽量影影响使其不受改编，加强其下层的群众的工作（对首领当然要拉拢，但时刻准备在行动中消灭他的决心），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伍，形成变相的兵变。”^⑦

同年夏季，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领导下，中共乾县县委领导发动了乾县兵变。当时，中共乾县县委书记王敬之根据临时省委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联络了吴好善、许更晨等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为了扩大力量，王敬之接受了驻乾县、永寿、礼泉等县的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部第十七师师长张西昆的收编，被任命为该师第十团一营营长，驻防于乾县县城。王敬之在接到临时省委关于开展士兵工作、准备组织兵变的指示后，与共产党员上官克勤等积极筹措枪支弹药，准备发动兵变。由于谋事不周，兵变之事被泄密。紧急关头，王敬之带领上官克勤、许桂林、吴好善、吴宗汉、许更晨等隐蔽于乾县陆陌村油坊，随即遭到张西昆部丁万林团的包围。激战中，王敬之、上官克勤奋力冲出包围。其余被包围的人员，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被俘后遭到杀害。乾县兵变至此失败。

1930年7月，中共蓝田特支联络当地红枪会首领曾老三及窄峪、白石河、南界牌等地的农民武装，共1000余人，准备发动暴动。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了蓝田特支的暴动计划。8月30日，由红枪会首领曾老三担任总指挥，暴动队伍兵分三路，向蓝桥镇驻军刘汉三营发起进攻。在暴动队伍的进攻下，除刘汉三率极少数部下侥幸逃脱外，其余100多人均被消灭。暴动队伍无一伤亡，蓝桥暴动取得胜利。蓝桥暴动后，蓝田县县长派两名士绅前来调解，表示不向上禀报此事，暴动队伍也答应不围攻蓝田县城。随后，暴动队伍又合力攻打盘踞于五凤山的王老九民团。王老九闻讯后连夜撤走，暴动队伍扑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参加暴动的农民无心再战，暴动队伍随之解体。蓝桥暴动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武装，也为后来秦岭山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88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88页。

③指冯玉祥，后同。

④指临时省委，后同。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02—303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14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18页。

四、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纠正

从1929年到1930年，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迅速增长。在国内，蒋桂战争、第二次蒋（介石）冯（玉祥）战争和蒋（介石）唐（生智）战争相继爆发。军阀混战削弱了这些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新军阀力量受到进一步的削弱。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内部“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在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产国际多次发来带有“左”倾错误的指示信和决议案，对中共中央及其个别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对革命形势做了过高的估计，认为“革命新高潮是在日益开展”。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4月2日，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在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6月9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从4月4日至1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分别向西路、陕北、各军支等党组织传达了中央第七十号通告精神，要求各级组织按照通告精神部署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路特支，指导西路各特支、军支工作。

1930年7月1日至8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县巩村小学召开。临时省委委员杜衡、王林、薛永寿、李凌云及西安、陕北、陕南党组织的代表赵伯平、焦维炽、吉国桢、张文华、陈征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兵运、组织、宣传及共青团等七项决议案。会议提出陕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武装暴动。总的策略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创造并扩大红军。会议决定以西安、榆林、三原为中心，延安、绥德、潼关为次，建立全省的中

心工作。会议决定，改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省委委员杜衡、王林、吉国桢、焦维炽、陈征、张文华、陈冠英，候补委员赵伯平、黄子文。省委书记由杜衡担任，常委王林、吉国桢。

7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指出，陕西革命的客观条件要比全国成熟，党的任务是在全党政治路线和任务之下，努力加强主观力量，准备总的革命斗争，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局部的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通告认为目前陕西党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和取消观念。通告强调指出，反右倾的政治斗争与加强指导和中心工作建立，是省委今后工作的主要方针。

8月1日，中央交通黄平带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9日至11日通过的各项文件。黄平还向省委负责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布置汉南、渭华工作，以配合武汉的取得”的口头指示。8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常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讨论了陕西省委的工作，认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对政治形势的估量仍然不足，犯有右倾错误，因此会议形成的决议应予推翻。会议决定由杜衡另行起草新的决议，同时发一告同志书，指出五次扩大会议的严重错误。

9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由杜衡起草的《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决议案草案》包括“中央政治决议的确是全党唯一斗争武器”“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新的革命高潮与争取陕西革命的胜利”“陕西革命高潮逼近严重问题”“改组派、取消派”“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党的组织问题”等七个部分。《决议案草案》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党的战略总方针是坚决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创建与发展红军，会合各种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在陕北、西安、渭南、华县、蓝田、陕南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武汉的夺取，特别要以陕北为首先胜利之区，以促进全陕的革命高潮。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文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调整了一些省市党组织的隶属关系。10月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向陕西省委发函通知，陕西省委归北方局领导，并要杜衡、王林等到北方局参加11月10日召开的北方局扩大会议。10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通知陕北特委归其领导，陕北特委与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

杜衡等陕西代表于11月到达天津后，北方局扩大会议已经结束。遂由北方局代表向杜衡等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10月29日给陕西省委发出的指示信精神。在这封指示信中，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陕西省委9月14日做出的《陕西省委政治决议案草案》，要求陕西省委根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迅速纠正认识上的“左”倾错误。指示信强调指出，陕西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城市和乡村中自发的群众斗争，鼓动与争取公开的群众运动。

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告，宣布北方局改为河北省委，辖顺直、晋、陕、甘及河南北部党的组织，陕西省委改为陕西特委。通告还指出，陕北特委归河北省委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共同领导。当月下旬，杜衡和北方局派往陕西工作的高维翰（李杰夫）回到陕西。

同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吉国桢、张文华、张国藩、焦维炽、高维翰及共青团陕西省委的一名代表，高维翰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杜衡传达了北方局关于解决陕西工作问题的决定，吉国桢汇报了省委临时常委会一个多月来的工作。会议决定接受和拥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并通过了年关斗争计划。会议调整了省委成员

分工：杜衡任书记兼党报编辑，高维翰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吉国桢任省委常委兼管组织，张国藩改任省委委员兼西安市委书记，张文华协同李艮回渭南开展工作。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陕西省委在极为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顽强地领导着陕西的土地革命运动。尤其是兵变和暴动斗争的开展，为创建西北革命武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培养了一大批坚强忠贞的领导骨干队伍。英勇无畏的陕西共产党人，踏上了更为艰险崎岖的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征程。

第二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节 渭北^①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一、渭北地区早期的革命斗争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位于关中地区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处，现分别属于咸阳市、铜川市和渭南市。渭北革命根据地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高李、康家洞、宋家河、石桥、觅子等地；西南接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西邻淳化县的夕阳、固贤、方里、石桥等地；北至耀县的华里坊、楼村（坡头）、东牛、让牛村、小丘等地；南到三原县的白鹿原、天齐原南畔。东西长 30 公里，南北宽 25 公里，总面积约 750 平方公里，有 4 万多人口。

民国初期的渭北地区，曾经是陕西民党武装讨袁（世凯）逐陆（建章）^②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发动的护法运动兴起后，渭北地区又成为陕西靖国军总部的所在地和主要辖区。当地民众为护法倒陈（树藩）^③运动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4 年 12 月，时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杨虎城率部抵达耀县。驻防耀县期间，杨虎城以随部队南下的安边^④教导队为基础，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该校共招收学员 500 余人，于 1925 年 8 月在耀县城内文庙正式开学。共产党员刘含初、吕佑乾等先后在该校担任教官。学校开办期间，陈云樵、卫志毅等学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西安反“围城”斗争期间，杨虎城命第五旅李子高部坚守三原，以策应西安的反“围城”斗争。1926 年 10 月中旬，围困三原的镇嵩军撤退后，于右任经甘肃回到三原，在三原成立国民军第二、三军联军临时总司令部，以作为西安以外的陕军领导中心。在此期间，

当地民众为支援国民军解西安之围，夺取西安反“围城”斗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渭北地区还是陕西党、团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之一。1925年2月23日，隶属于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成立，特支机关设在三原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月，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青年同志共进社”为基础组建的渭北青年社正式成立。到同年6月，渭北青年社社员发展到70多人，在三原县立中学、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等学校都建立了支部或小组，并出版有《渭北青年》杂志。同年12月，中共三原特别支部成立，张仲实、贾子明先后任书记。三原特支成立初期，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后，三原特支改由西安地委领导。三原特支下辖中共岐山小组、云阳小组和中共高陵支部。1927年3月，三原特支改为中共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张性初任书记，贾子明负责组织工作，王云负责宣传工作，农委书记庞诚斋，妇委书记王爱玉。三原地委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负责泾阳、三原、蒲城、富平、高陵等地党的工作，下辖5个特支、3个支部，地委机关设在三原县渭北中学。同年5月，中共泾阳特支改为中共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耿觉，宣传马云藩，隶属中共陕甘区委。同年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中共三原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中共泾阳地委改为中共泾阳区委。与此同时，共青团三原地委和共青团泾阳地委也分别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和共青团泾阳区委。

渭北地区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渭北的农民运动首先兴起于三原县武字区。1926年11月，共产党员乔国祯从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到陕西。他来到三原县武字区，和共产党员唐玉怀（唐亦民）、郭明效一起，宣传组织群众，从村到区普遍地建立起农民协会，并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中共支部——大寨支部，成立了农民自卫队。乔国祯在三原县开展的农民运动，为武字区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奠定了基础。

1927年1月，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地区办事处成立，负责指导三原、泾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地的农民运动。此后，三原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领导6个区、154个村的农协会。泾阳县设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4个区、50个村的农协会。富平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3个区、284个村的农协会。耀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则领导9个区、65个村的农协会。淳化县的西区亦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出席了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会后，张性初向渭北地区党组织传达了会议精神。1927年11月，共产党员黄子文（黄成章）从武汉辗转回到三原，任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三原县委派黄子文回到家乡武字区开展工作。12月，张性初在泾阳县云阳镇指挥农民自卫团收缴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30多支枪。1928年1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省委通告第三十号（军字三号）》，决定将“第四军支，改隶三原县委”。^⑤第三十号通告还决定：“第五军支于富平县委未成立前，亦暂隶（中共）三原县委。”^⑥第四军支成立于1927年10月，设在杨虎城留陕部队的补充团和炮兵营，由张汉民任书记。第五军支设在有“富平王”之称的冯子明所属部队中。

192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二十六号通告，决定将三原、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旬邑等县划为渭北暴动区，并以三原、泾阳为中心区域，组织农民暴动。2月9日，三原县武字区抗敌委员会成立，孙志刚为主任，李天保为副主任，下设五个分会。2月22日，由武字区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成立，唐辉智任队长，孙平章为副队长，黄子文为总指挥，有队员30多人。游击队成立后，活跃在三原县心字区、武字区和富平县石川河西的淡村一带，开展抗粮抗捐和打土豪斗争。到当年9月，游击队先后处决了勾结驻军捣毁武字区农民协会的前民团团总王泰安、武字区区长李致泰、武字后区民团团总王伯哲等贪官恶霸。

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的同时，渭北地区学生运动也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的三原县城，是陕西省仅次于西安的第二大城市，城内设有渭北中学、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著名学校。1927年12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用赤色恐怖以抵白色恐怖，渭中^⑦学潮须要坚决的领导，作积极的斗争，对杨某^⑧应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对付之，愈速愈好。”^⑨在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渭北中学党组织发动了“驱杨”运动，于1928年3月将杨少农赶出校外。不甘心失败的杨少农勾结当地政府和驻军，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了共产党员8名、共青团员3名和进步学生10多名。

在渭北中学开展斗争的同时，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也在中共三原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等人的领导下，同该校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当时，在第三师范上学的习仲勋也参加了学潮。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的镇压，武廷俊和三师党支部负责人李少华及习仲勋等14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被捕入狱。武廷俊在狱中坚贞不屈，惨遭杀害。习仲勋在狱中坚持斗争，同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习仲勋等人获释出狱。

渭华起义爆发前后，三原、泾阳、淳化党组织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先后领导发动了农民“交农”以及武装围攻县城的斗争。这些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统治基础，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28年7月，隶属于中共三原县委的武字区委成立，由孙平章任书记。武字区委下辖大寨、蒙家、西王、鲍四庙、南原、宋家河、上河七个支部。同年9月下旬，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因国民党地方当局通缉，无法在三原立足，被迫离开三原。张性初离开后，中共三原县委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三原县武字区的党组织在黄子文、唐玉怀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1929年5月，由黄子文任主任、唐玉怀任副主任的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在西王堡正式成立，在筹赈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黄子文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地方行政人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筹赈工作”。^⑩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成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筹赈80余石粮食，解决了3700多名无粮群众的暂时困难。在三原县武字区开展筹赈活动的影响下，富平县淡村先后四次筹粮3万多斤，分配给无粮群众。秦悦文、郭效曾还率领淡村赤卫队，于当年11月武装突袭民团驻地石家堡，俘获民团团总张长庆，并缴获枪支10余支。

1929年8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组建中共三原临时县委，领导三原和泾阳、淳化、旬邑、彬县及甘肃正宁等县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三原临时县委未能成立。同年9月，中共三原特别支部正式成立，黄子文任书记。10月9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报告中共中央：三原农协确实能代表群众利益，与豪绅地主做英勇的斗争。报告还说：中共三原特支辖7个支部，有党员35名，管辖淳化、旬邑、正宁等县的工作。

1930年2月2日，三原县地方当局及驻军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子文和其弟黄子祥逮捕。一个月后，经党组织和群众多方营救，黄子文、黄子祥获释。

①泛指关中渭河以北的地区。

②陆建章（1862—1918），安徽蒙城人。1914年率北洋陆军第七师入陕，任陕西军务督办。1916年5月被逐出陕西。

③陈树藩（1885—1949），陕西安康人。1916年7月接替陆建章任陕西督军。1921年5月，在陕西各界的一片反对声中被免职。

④今属定边县。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7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7页。

⑦指渭北中学。

⑧即渭北中学校长杨少农。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3页。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5 页。

二、中共陕西省委为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而不懈努力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对渭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极为重视。1930 年 5 月下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集省委渭北巡视员黄子文和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开会，讨论渭北工作。会议“估量了渭北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即具体地马上决定开发游击战争”。^①会议决定以三原北区为中心，恢复农民协会，组织灾民自救队，以广大农民、灾民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根据会议的决定，黄子文、陈云樵于 6 月上旬在三原武字区召开党员会议。会议确定：黄子文负责武字区，并去高陵联系王学道领导的武装力量；陈云樵前往三原陂西镇，联系王德修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前往富平开展工作。会议决定 6 月中旬在武字区成立灾民自救队。会后，黄子文率武字区的武装力量和群众，于 6 月 14 日捣毁了国民党武字区区公所，分了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豪绅岳海洲家的粮食，并将岳海洲处决。

6 月 16 日，由黄子文和陈云樵分别联系的各路武装力量汇聚武字区，宣布成立渭北灾民自救队。汇聚于武字区的武装力量包括三原陂西镇的王德修部 30 余人，21 支枪，由张成义（外号刀客遂儿）率领；高陵王学道部 100 余人，数十支枪，由赵干甫带领；武字区的农民武装和富平田裕国组织的独立大队，共四五十人，40 余支枪。渭北灾民自救队队长陈云樵，政委黄子文，下辖 4 个大队，每个大队编为 3 个分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德修，政委李秉容；第二大队大队长王学道（由赵干甫代理）；第三大队大队长刘铁山（刘树模）；独立大队大队长田裕国，副大队长张振河。渭北灾民自救队共 200 余人。自救队还成立了中共军支，由黄子文任书记。

渭北灾民自救队成立后，适逢宜君前县长潘恩桐离任返回西安，途经武字区，遂将潘恩桐逮捕并予以处决，同时缴获长、短枪 7 支。

6月下旬，渭北灾民自救队在三原县长坳堡分了地主豪绅赵应科、牛振和、叶子青的粮食，并捣毁了武字后区马额乡公所。

渭北灾民自救队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当局的极大恐慌。7月上旬，国民党当局调集毕梅轩部和王平部围攻渭北灾民自救队。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渭北灾民自救队被迫于7月13日由武字区向富平转移。转移途中，在富平康家洞与富平民团遭遇，自救队猝不及防，损失了部分枪支。随后，自救队继续前行，在瓦窑头附近的法华洞，遇到前来视察工作的陕西省常委王林。自救队指挥部遂决定就地休息，向王林汇报工作。就在这时，第一大队的分队长张成义所部突然发动叛变，打死了正在参加汇报会议的独立大队分队长王笃，并收缴了其他大队的枪支。毫无准备的自救队指战员大都逃散。混乱之中，王林与陈云樵脱险，返回西安，黄子文则前往富平美原一带活动。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指派黄子文前往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工作。渭北灾民自救队至此失败。

渭北灾民自救队失败后，中共武字区委和所属支部的负责人及大多数党员被迫出走，武字区的革命斗争陷入低潮时期。对此，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会同陈云樵等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中共陕西省委在9月13日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陕西工作报告》中，认真总结了渭北灾民自救队失败的原因：“党内右倾阻止了正确策略执行”，“富农路线的严重”，“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与富农意识”，“党组织问题严重”。《报告》指出：“以上是游击战争中给我们的几个严重教训。党的右倾富农路线，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的组织问题，不仅是目前党的错误与缺点了，而是陕西党目前革命形势极剧烈转变中的严重危机，党必须用最大努力和这些敌人斗争，才能推动陕西群众斗争的开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②

9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秋收斗争决议案》，要求渭北和西路灾荒严重地区的党组织，积极领导农民、灾民开展以减租、减息、抗债为主要内容的秋收斗争。

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恢复，马先民任书记，黄子祥、侯守愚、孙平章、胡德润、孙铭章为委员。武字区委恢复后，即开始组建革命武装，在各村成立了赤卫队，并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30多人，组成武字区武装赤卫队，由区委委员孙铭章兼任队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于9月20日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根据省委的决议，武字区委于9月下旬组织成立了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由区委委员侯守愚任主任，唐玉怀任副主任。反日救国会依照农民协会的组织形式，下设五个分会，各村都设立村会。反日救国会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行使农协会的职权，进行反契税、反豪绅、反当地政权斗争。武字区反日救国会的成立，揭开了渭北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序幕。

1931年10月，中共武字区委委员黄子祥和唐玉怀、王曲贤等组织的武字区教育促进会成立。教育促进会通过开办学校，普及基础教育来提高当地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并通过学校掩护中共组织的工作。

在渭北地区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于12月7日做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决议》。决议指出：“三原、富平、蒲城广大农民群众中，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很迅速的扩大起来。在一部分农民群众中，已经感觉到开发游击战争（如三原、富平），分配土地，建立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才能有根本的出路。”^③决议指出：“在三原、富平、蒲城、西路这些区域的农民武装斗争，已经成熟，党要特别努力集中力量领导这几个地方的农民斗争。”^④决议要求：“我们的党更加艰苦的、耐心的在日常斗争中，宣传鼓动中，运用农民的政治经验，给农民群众解释，靠共产党来‘干’是不够的，靠红军苏维埃政府打到这里来是不够的，必须自动的有决心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学习湘、鄂、赣等省农民群众的榜样，推翻

豪绅地主以及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后，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后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直至开发游击战争，开辟新的部分苏区的道路。”^⑤

以 1931 年 5 月中共三原武学区委恢复为标志，渭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中共陕西省委为创建渭北根据地进行了不懈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479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40—341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47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48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48 页。

三、渭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群组织的发展壮大

进入 1932 年以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党军政群组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壮大时期。

1932 年 1 月 15 日，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组织 2000 多人，在三原城东北大操场举行集会，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民众抗日。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震动了三原城乡及附近地区。紧接着，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在春节期间，组织各村以演出社火等形式，编写以抗日内容为主的歌曲、顺口溜等，进行抗日宣传。

面对渭北等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陕西省委从 1932 年 2 月至 4 月，接连发出关于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或报告。

2 月 15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报告第一号》中指出：“群众斗争与政治影响：在这些区域内（三水、淳化、三原、富平、耀县、宜君、

同关^①)群众斗争自去年秋收后,斗争是非常普遍的。”^②报告还指出,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在三原、富平等地普遍深入。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也很普遍的。因此在群众斗争形势与政治影响方面,也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③

中共陕西省委在3月7日做出的《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中指出:“党要集中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渭北农民斗争,立刻开始农民和灾民自动的分配豪绅地主食粮,焚毁一切契约账簿,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地主的国民党政府剥削的迫切斗争,普遍建立或加强各种群众组织(如同心会、穷人会、分粮会等),建立农民和灾民的武装组织,夺取豪绅的地主的武装,武装自己。”^④决议还要求:“游击队新到的地方,党要动员农民起来,召集欢迎或慰劳大会,组织担挑队、做饭队、缝衣队、洗衣队等等,以提高游击队战斗员勇气和决心,以开展农民斗争,立刻号召广大农民参加游击队,以扩大或加强游击队的力量。”^⑤

4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指出:“如果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没有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因此,在三原、同官、蒲城一带去开展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为迫切的任务。”^⑥

①应为同官,即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0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0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1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1—52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3页。

（一）渭北根据地党团组织的发展过程，充满了艰难曲折

1932年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维炽和从北平返回陕西的黄子文到达武字区。为了深入开展游击战争，为根据地培养干部，焦维炽和黄子文在长坳堡开始举办党员训练班，每期三四天，历时一月多，先后培训40多人。训练班的授课内容主要有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分粮斗争和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等。到渭北地区活动的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等，也为党员训练班讲过课。

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函《通讯第三号》中汇报说，准备组建中共渭北特委，并由省委书记杜衡兼任渭北特委书记。

中共武字区委成立后，多次遭到破坏。4月12日，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捕。5月31日，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被捕。6月初，在渭北地区巡视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高维翰指定孙海章任武字区委书记。两个月之后，高维翰又以孙海章“右倾”，犯了“富农路线”“尾巴主义”的错误为理由，将其撤职。根据高维翰的指示，武字区委选举孙铭章为区委书记，胡德润、赵应奎、邓万祥、孙平章为委员。

同年7月，新的中共三原县委成立，金理科（李逵）为书记，黄子文、赵应奎、马宗德为委员。

9月，中共陕西省委改组了三原县委，同时决定组建渭北特委。10月初，中共渭北特委正式成立，高维翰任书记，常委李冲霄、黄子文、汪锋（王烈）、程建文。渭北特委领导三原、富平、蒲城、耀县、白水等地的党组织，特委机关设在三原县武字区。渭北特委成立后，于10月8日至9日召开了有三原、富平、耀县、蒲城等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了陕西省委10月6日做出的《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根据决议精神，会议研究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问题。

在中共渭北特委的领导下，共青团渭北特委也于10月成立。共青团渭北特委由程建文、金天华、习仲勋等人组成。10月27日，中

共渭北特委和共青团渭北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土地分配问题。会议决定各支部用革命竞赛方式，集中五六天时间，在武字区进行土地分配工作。

渭北根据地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为根据地内军事组织、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保障。

（二）渭北根据地的军事组织，是在武字区各村赤卫队和武字区武装赤卫队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1932年3月中旬，在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维炽的主持下，武字区委在孙家壕连续召开七天会议，主要讨论在根据地开展分粮斗争等问题。为保证分粮斗争的顺利开展，会议决定建立武字区游击队，由孙铭章任队长。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高维翰和武字区委决定，由武字区委委员黄子祥负责组建武字区游击大队。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武字区游击大队于5月上旬正式成立，孙铭章任大队长，共有队员40余名，长枪30余支、短枪4支。游击大队下设三个分队，邓万祥、康尚武、王化海分别担任分队长。武字区游击队的主要活动范围：西至三原心字区，东至富平石川河，北至耀县西原，南至心字区和武字区的原畔一带。

8月1日，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游击大队的基础上组建成立，队长马志舟，政委金天华。渭北游击队共60余人，30多支枪。渭北游击队成立的第二天，即在苗家祥领导的泾阳游击队^①的配合下，攻打马额王茂臣民团，歼敌一个班，缴获步枪四支。

9月中旬，习仲勋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来到三原县武字区，特务队被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②，队长陈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武字后区游击队主要活动在三原、富平、耀县交界地区。

在积极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渭北根据地还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拥红扩红”活动。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来到武字区。第二天，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在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大会。“到会人数有3000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森林似的排列起来。游击队各大队各去一个中队，骑兵中队、少年先锋队都去参加。会场警卫、各路口步哨，完全由农民担任。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殷勤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一样。”^③

会议还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地红军武装、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劳苦群众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通电。会议召开的当晚，第五支队获悉国民党军进剿的消息，连夜撤至耀县上卢村。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的黄子文亦随部队撤离。6月13日，担任陕甘游击队政治部副主任的黄子文回到武字区，进行“扩红”。中共武字区委立即分片动员。三天之内，有近百名青壮年男子报名参军。随后，这些新参军的青壮年由黄子文带领，加入了陕甘游击队。

①泾阳游击队，又称苗家祥游击队。1932年3月，在中共泾阳特支的策划下，担任杨虎城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副官的苗家祥和王福茂、侯振西回到泾阳，组建了泾阳游击队，苗家祥任队长。泾阳游击队人数最多时发展到七八十人。

②又称武字区第二游击队。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9页。

（三）渭北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经历了一个由“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到革命委员会的演变过程

1932年3月上旬，中共武字区委决定将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改为武字区农民联合会，黄子祥任主任。

4月22日，武字区欢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大会通过决议：“成立革命委员会，由游击队、三原党（组织）、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代表七人组成，责成革命委员会颁布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①由于种种原因，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未能立即成立。

同年8月，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祥任主席，唐玉怀任副主席，李鸿儒、康德宽等为委员。

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②成立大会在武字区举行，会议选举1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其中5人为主席团委员。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教育等五个部。会议通过了立即公布和实行苏维埃土地法，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组织并向周围发展，各村堡成立少先队、赤卫队、雇农工会等组织，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禁止种植鸦片等12项决议。会议通过了《革命委员会宣言》。《宣言》指出：“革命委员会明确的表白自己的主张与态度，是要站到工农穷苦群众的阶级利益上，在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与领导原富耀几十万劳苦群众，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立刻坚决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武装与组织广大的群众为创造原富耀苏维埃区域而斗争，创造陕甘新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③会议通过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给中华苏维埃政府暨红军全体战士的通电》表示：“我们热烈的拥护我们的苏维埃和我们的红军，我们希望你们坚决的与敌人作战，加快速度取得我们的胜利。我们要领导原富耀几十万劳苦群众，为拥护苏维埃红军而斗争，创造原富耀新苏区。”^④会议还通过了《给陕西共产党省委通电》《拥护东北义勇军通电》和《给陕甘红军的通电》等。

10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给三原县委发出指示信，明确要求：“巩固与加强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要绝对保障党在这临时政权的领导）。”^⑤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创造原富耀新苏区是渭北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党必须立刻加紧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要保证雇农苦力与党在革委中绝对领导的作用，千百倍的加强领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雇农苦力的斗争。目前最中心的是秋收斗争的领导，在广大的开展群众斗争的当中，立刻实现扩大革委的工作，吸引后区、许字区^⑥、武字区、耀州、富平、高陵的斗争的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⑦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和中共渭北特委联席会议精神，10月18日，渭北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改组。主席团主席黄子文，马志舟为土地部部长，郑彦青为军事部部长，孙平章为财政部部长，邓万祥、郝祖义、马宗德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团，先由黄子文、李冲霄、孙平章三人组成，李冲霄任书记，后由黄子文、马志舟、郑彦青三人组成，郑彦青任书记。渭北革命委员会改组后，武字区有三个村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60页。

②又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85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87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76页。

⑥即肃字区。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94页。

（四）渭北根据地的群众组织，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2年4月，武字区雇农工会举行会议，到会50余人，选举执委7名，其中共产党员3名，共青团员1名。会议通过了经中共组织讨论的《雇农斗争纲领》。与此同时，武字区还成立了妇联会，由中共武字区委委员孙平章代理主任。

10月下旬，共青团渭北特委成立后，在各村堡普遍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近10个村的妇女联合会，并在青年雇农中成立了青年雇工小组。

在9月22日举行的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地各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参与了革命委员会的选举。

在艰苦的斗争中，渭北根据地党军政群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二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与反“围剿”斗争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从打土豪分粮食逐步发展到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利，还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奋斗目标。

1931年10月，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在大寨堡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斗争反动区长薛荫堂，迫使其取消了按地亩登记契税所摊派的款项。担任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的豪绅地主崔福成，对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责令其将霸占他人的土地归还原主一事，一直心怀不满，企图反攻倒算。此事被揭发后，武字区武装赤卫队烧毁了崔福成所记的“变天账”，并将其处决。

1932年3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焦维炽主持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在根据地开展分粮斗争等问题。会后，参加会议的中共耀县组织负责人张仲良和杨仲杰等，组织耀县西原2万多名农民群众“交农”围城，要求减免粮款。这次围城斗争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的残酷镇压。张仲良等人被捕，耀县“交农”围城斗争遂告失败。

4月上旬，黄子文指示王瑞琪等组织农民分了武字区太和堡地主张玉泉家的粮食20多石。此后，分粮斗争在渭北地区掀起了高潮。根据中共中央4月27日收到的陕西省委报告记载：“最近在渭北一带的农民，已由普遍的抗粮抗租过渡到分配粮食和武装冲突。在三原武字区由五六十人发动，以至很快发展到一千五百人之多，整个的继续的

分配五六天之久，分配了武字区二十余家所存的粮食与财产，……富平农民自动起来攻下美原城抗捐，捣毁区公所，分配了区公所积的粮食。蒲城农民抗粮以后，又有三四次农民抗款缴农，捣毁区公所分配粮食……”^①

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得到陕甘游击队的大力支持。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陕甘游击队五支队南下三原后对渭北农民斗争的推动情况：“渭北农民斗争，五支队南下时，形势是非常高涨的，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②，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食粮分配，共分配粮食二百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队，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器。国民党派军队一排去，被二百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③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渭北地区的农民斗争逐步由分配粮食向分配土地发展。1932年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革命委员会立即公布并实行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令，没收豪绅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与中农。”^④

10月1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做出《关于冲锋季工作决定》，决定指出：“团要领导农村广大青年群众抗租抗债分粮吃大户的斗争，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领导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与红军战士，在分配土地中团要保障青年（18岁以上）雇农、贫农利益的获得，建立苏维埃政权，普遍的成立革命委员会。”^⑤

10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三原县委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号召之下，首先在武字区要立即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富农祠堂庙宇的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将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富农在他不反革命而且自己耕作的条件之

下，可以按劳动力为标准分给坏地。残余地主，绝对不能以任何借口分给土地。”^⑥

10月5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指示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的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发动游击战，帮助建立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打击土豪劣绅，保护群众开展分粮斗争。

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中明确要求：“革委会立刻领导并实行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令及一切法令，依照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没收豪绅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与游击队队员，一切官田庙产务必分配给群众，把不好的劳动份土地，分给未反动的富农。党应进行广大解释工作，在农民自愿条件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⑦

此后，分配土地的斗争在渭北根据地逐步展开。10月10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决定在武字区南原开始土地分配工作。10月20日，中共渭北特委召开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南原土地分配中的经验教训，决定在有利于贫农雇农的原则下（如将麦苗地分给贫雇农），立即以农民联合会分会为单位分配土地。为了加强对土地分配工作的领导，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三原县委各委员分片负责指导土地分配工作。27日，中共渭北特委和共青团渭北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各支部用革命竞赛方式，集中五六天时间，在武字区进行土地分配。28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召开武字区38个村堡的代表会议，总结南原土地分配经验，并进一步学习苏维埃土地法令。会议决定在全区各村堡立即开始土地分配工作。

在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武字区各村堡的群众迅速投入到分配土地斗争之中，掀起了分配土地的高潮。上河村党支部领导群众分私地200亩，公地20亩，有10多户农民分到了土地。

口外庄共分配公地 70 亩，私地 13 亩，分到土地的农民有 10 余户，其中常庆绪分到的 5 亩公地，一直耕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武字区开始的土地分配斗争，在渭北根据地掀起了巨大波澜，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贾拓夫在 1933 年 1 月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陕西渭北特派员报告》中写道：“在渭北群众斗争突飞猛进发展下面，武字区已深入了土地革命的斗争，在革委领导之下，南原上已实行了分配土地，三天内依靠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刀阔斧的初步解决了分土地中一切困难的问题。在群众自愿条件下平分了豪绅地主的土地，给雇农分土地以优先权，给游击队战斗员也分了土地，其他许多地方都在群众会议上计划讨论并解决了如何分地的一切问题，但因白军的围剿没有赶着执行。”^①贾拓夫在报告中写道：“这一土地革命的影响，一直深入到整个渭北群众中间去，在富平、耀州、高陵、白水许多地方的群众都知道武字区实行了分土地，以前在群众中，我们只能听到分粮抗粮等的呼声，现在分粮、杀豪绅、分土地差不多成了渭北群众普遍的呼声，而且在武字区周围，群众在武字区土地革命影响之下，实地动手起来了（如耀州西原），到处群众都说：‘分粮还不算，非分土地不可。’”^②

渭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而遇到了挫折，未能在大部分地区得以实施，但这一工作的开展，却集中体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崭新特点，也成为渭北根据地一段光辉而不可磨灭的奋斗历史。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54 页。

②即心字区。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58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83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69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76 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94 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54 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54 页。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渭北革命根据地北接陕甘边，南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仅 50 多公里，距当时陕西省第二大城市的三原城仅 10 多公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加之根据地所在的三原、泾阳、高陵号称关中平原的“白菜心”，是重要的粮棉产区。因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嵌入关中腹地的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反复“围剿”。

1932 年 4 月 12 日，三原、泾阳、高陵三县民团进剿武字区。共产党员周兴茂被杀害，中共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捕。5 月 31 日，三原民团团团长李养民率部进剿武字区，中共武字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共产党员孙太章和进步群众张树宏被捕。

10 月 6 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节，同时又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纪念日”，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运动。在武字区必须召集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的准备这一工作”。^①第二天，陕西省委又做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提出：“在（陕甘）边区与原富耀游击区域，党必须公开的动员群众组织十一月七日广大群众的示威，大会通过各种议案与通电，并发动群众收秋分粮分土地的斗争。”^②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渭北革命委员会党团于 10 月 30 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

11月6日至8日用3天时间，盛大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1周年。

就在渭北根据地广大群众与游击队员积极准备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始向根据地进犯。10月22日，驻守三原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向武字区南原进犯，并一度进入长坳堡。在游击队和赤卫队的合围下，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撤回三原城。当天，驻富平庄里镇的胡景铨民团也派出八九十人，进犯武字区后区，随即被游击队击退。10月23日，驻守耀县小丘的陕西警备师第一团三营派出一连兵力，在侯家堡进行短暂扰乱后，又退回小丘。

11月6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在武字区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与会群众达1400余人。会议通过五项通电。会后，与会群众整队前往马额，向当地民团示威。11月7日，中共渭北特委在武字区再次组织有2000多人参加的集会。会后，整队游行。习仲勋等率领武字后区游击队，全副武装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队伍从武字区下原后，从距三原县城仅五六公里的西阳镇穿街而过，又经富平的瓦窑头、淡村等地，返回武字区。11月8日，武字区举行游艺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共散发传单7000余份。中共渭北特委汪锋和武字区的妇女干部周凤鸣、俞世庄、李桂芳等化装演出了新剧，受到了热烈欢迎。

令沉浸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欢快气氛中的渭北根据地群众猝不及防的是，从11月9日起，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个县的民团和三原、富平等地的驻军开始联合“围剿”武字区。国民党军以“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为口号，对武字区发动了疯狂进攻。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犯，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等严令当地游击队“死守阵地击而不游”，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国民党军进占武字区后，进行了三天的大搜查。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的家乡陵前镇甘涝池村遭到洗劫，留在村内的30多名群众被抓，群众的衣箱被褥被掠夺一空。黄子文家的十余间大房被烧毁，骡马被牵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字区先后六次遭到洗劫。高维翰等渭北特委领导人被迫分散转移。渭北

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地方游击队被冲散。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下，渭北根据地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渭北根据地陷入困境。

13年后，渭北根据地的领导人习仲勋在1945年7月召开的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总结渭北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发动了万余群众在三原的马路上游行示威。但在敌人‘围剿’时，则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都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③

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失败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地区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踏上了更为艰苦的恢复根据地的斗争征程。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00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04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2页。

第三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发展及失守

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为了恢复渭北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组织，中共陕西省委指派省委委员贾拓夫作为渭北特派员，从1932年11月下旬起开始巡视渭北。贾拓夫先到武字区，后前往富平。12月，贾拓夫在富平城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省委撤销高维翰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的决定，并决定以李冲霄、郑彦青、汪锋、金理科、顾先臣组成新的中共渭北特委，李冲霄任书记。新的渭北特委组建后，派特委委员郑彦青前往白水巡视，贾拓夫与特委书记李冲霄等回到武字区开展工作。此后，杜衡来

到武字区，在渭北特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组渭北特委的指示：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渭北特委，金理科任书记。会议讨论了反攻武字区的计划及重建中共武字区区委等问题。

12月中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贾拓夫在武字区主持召开中共渭北特委扩大会议，宣布取消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三原中心县委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刘林生为书记，孙金钩、曾楚川、赵应奎、王金彦为常委，马志舟、顾先臣为委员。此后，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成立，李盛弟、习仲勋、李纪善、魏光波先后任书记。

1933年1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整三原中心县委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由书记刘林生、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汪锋、宣传委员孙金钩、军事委员阎文必、秘书余海丰组成常委会。刘林生和孙金钩均系从农民中选拔的贫雇农党员，任职一段时间后即离开县委回家务农。3月29日，陕西省委再次调整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组成人员，刘映胜（杨声）任书记，赵伯平（周中）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并暂代军事委员，李俊藻任常委兼宣传委员、秘书，习仲勋、姚万忠、王仲云为委员。5月上旬，陕西省委任命赵伯平为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李俊藻、姚万忠为常委，周芝轩、黄子祥为委员。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加强了基层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2月中旬，三原中心县委决定，中共武字区委由5名正式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赵应奎任书记。1933年1月20日，三原中心县委改组了武字区委，马志舟任书记。在此期间，武字区委在全区恢复了18个党支部。同年3月，中共心字区委成立，宋士斌、韩学理先后任书记。

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中心县委还为恢复渭北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渭北革命委员会这一政权组织，终究未能重新组建。经过多方努力，武字区几个村堡农民联合会分会的组织得以恢复，并开展了一定的工作。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从渭北革命根据地失败这一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根据地是很难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所以，根据地革命武装的恢复被摆上了中心县委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1932年12月中旬，中心县委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曾楚川将冲散后返回武字区的游击队员集中起来，在武字区南原和武字后区各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南原游击队有20多人，十七八支枪；武字后区游击队有20多人，10多支枪。三原中心县委指派金天华为特派员，到南原游击队做党的政治工作。随后，黄子文将两支游击队合并，恢复成立了渭北游击队。同年12月底，金理科、金天华和黄子文在太和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整顿渭北游击队的方案，决定由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下设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各有20多名队员。第一中队队长李天保，由刘鸿儒（刘庚）暂代，指导员马志舟；第二中队队长赵立魁，指导员王瑞琪。1933年1月上旬，渭北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

在此之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苗家祥，副大队长姚德顺。全大队共50余人，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侯振西，第二中队队长吴世昌，第三中队队长赵启民。三原中心县委还在第二大队建立了党的支部，书记刘清和。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成立后，三原中心县委指派汪锋前去巡视。汪锋于1月24日向中心县委递交了巡视工作报告，报告写道：第二大队“在最近帮助当地的贫民分了一次粮，有群众六十七人，群众在这一次分粮斗争表现非常积极勇敢”。“他们对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摧毁也是有相当的成绩，例如他们杀了七八个差人，杀了区长一人，民团团附一人，国民党豪绅地主一切统治机关的摧毁，统治阶级不敢向西北原一带去催款，豪绅地主不敢去讨账，群众非常的高兴，群众说：‘红军是我们的好军队’。”^①报告还提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应向三原武字区、泾阳、淳化发展，与武字区连成一片。

1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刘映胜与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召集武字区委成员开会，讨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行动去向。会

议决定，第一中队在武字区和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活动；第二中队由心字区向西发展，与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相呼应。1月26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决定调整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领导成员，由马志舟任大队长，政委仍由金天华担任。此后，第一大队向耀县照金一带发展。2月4日，第一大队奉命配合红二十六军二团的突围行动，在照金芋园一带阻击夏玉山民团，顺利完成了任务。

渭北游击队恢复以后，还积极帮助各地组建游击队。到1933年2月初，富平的都村、淡村一带建起一支游击队，其中有共产党员六七人，全队有三四支枪；三原武字区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共有40多名队员，其中共产党员七八名；耀县西原的游击队，有30多人，七八支枪；耀县三条沟游击队，有灾民七八十人，30多支枪。3月中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金天华组建了三原心字区游击队，有队员10多人。心字区区委书记韩学理兼任政治指导员，李青云、安大元先后任队长。这些游击队成立后，有力地配合了渭北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3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对敌人‘围剿’做有计划的反攻。”^②3月15日，陕西省委又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积极开展游击运动，只有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③及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才能保障根据地的巩固和创造。”^④指示信还指出：“你们提出把渭北游击队编成为二十六军的一连，省委认为是不适合的，因渭北游击队恰在敌人围剿二十六军的后防上，保障渭北游击队的强有力的行动，是对红军有更大的帮助，是使红军更能迅速的有利的执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支队的行动，并且为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更密切的配合起来，二十六军在渭北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名义用‘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⑤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于同年3月成立，总指挥刘捷三（李平），政委金天华，参谋长李天保。金天华离队后，政委由张培述接任。同年4月，武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补充支队，心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二补充支队。

4月27日，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率第一大队，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全歼了驻侯家堡的国民党军一个骑兵排。

同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委派黄子祥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映胜为政委，以接替离队的刘捷三和张培述。此后，刘映胜奉省委指派，前往耀县协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张秀山接任政委。在此期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二团700余人，黄子祥率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100余人，与苗家祥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会合，在泾阳县西苗村召开军人大会。会上，刘志丹发表了讲话。大会正式授予苗家祥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队旗和“陕西渭北游击第二大队关防”。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14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38页。

③指陕甘边根据地。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38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39页。

二、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失守及其经验教训

1933年6月17日，红二十六军党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和下

一步行动计划。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采用压制手段，强行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创建渭（南）华（县）蓝（田）（商）洛新根据地的决定。6月21日，红二团离开照金地区，开始南下。6月22日，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受到了黄子祥、张秀山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欢迎。6月23日拂晓，红二团在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配合下，开始攻打驻长坳堡的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准备营救被捕的渭北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部长孙平章。战斗进行中，红二团因急于执行南下命令，于黄昏撤出战斗。第三天早晨，孙平章在长坳堡西城门口被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壮烈牺牲。

7月上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心字区安社村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战斗中，支队政治指导员赵永华等不幸牺牲。

红二团南下后，于7月中旬在秦岭山区被打散。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7月24日，红四团成立，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全团下辖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一连连长马志舟，政治指导员王伯栋；二连连长高占胜，政治指导员王安民。7月26日，在小道口举行了红四团授旗典礼大会。武字区各村堡农民联合会分会的代表带着衣物、鞋袜等慰问品参加了大会。

7月27日，王泰吉、刘映胜率领耀县起义后组建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武字区，当晚在陵前镇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王泰吉等率领义勇军前往淳化途中，在心字区轳轳把村与孙友仁率领的特务二团展开激战，义勇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为策应王泰吉率领的义勇军北上，减轻国民党军给照金苏区的压力，红四团于7月30日在三原、富平交界的老户沟设伏，全歼张德润民团，处决了张德润。此战共缴获长短枪30余支。在这次战斗中，一连连长马志舟和排长秦福善不幸牺牲。

7月28日，杜衡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在西安被捕。随后，两人叛变投敌，并带领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及甘肃的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在此情况下，担任“渭北剿匪司令”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刘文伯，调动六个团的兵力，从8月上旬开始，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围剿”，红四团随即撤离渭北根据地，前往照金地区。

国民党军队进入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武字区后，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根据地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达四五百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和县委秘书李俊藻等也于8月中旬被捕。坚持了两年多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最后失守。

渭北根据地失守后，苗家祥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坚持斗争。苗家祥隐藏在泾阳王桥街一名群众家中。9月5日，苗家祥的行踪被驻社树村的一名国民党军连长侦知，遂派兵抓捕。苗家祥在与敌激战中不幸牺牲，年仅26岁。苗家祥牺牲后，中共泾阳特支于9月20日在徐家堡学校召开会议，研究整顿处于解体状态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问题。会议决定由吴世昌、刘清和代理正副队长，本着“好的集中，坏的清除”的原则，重新组建游击队。但终因一些游击队员不听从命令，无法统一指挥。刘清和、吴世昌在各带四支短枪，北上陕甘边根据地途中，遭到叛徒张步成杀害。10月中旬，游击队的杨德林将张步成处决。至此，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完全解体。

渭北根据地失守后，许多干部和共产党员被迫转移他乡。担任过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兼组织委员的姚万忠坚持留在富平淡村一带，继续领导群众与敌斗争。1934年春的一个夜晚，姚万忠不幸被田世俊民团逮捕，杀害于淡村镇东门口，年仅39岁。

从1931年5月创建，到1933年8月最后失守，渭北革命根据地坚持了两年多时间。在两年多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

为根据地的创建、恢复和发展英勇献身。渭北根据地的创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陕西地区活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创造了鲜活的富有创造性的经验，也留下了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

首先，渭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在陕西地区复兴革命运动而创建的农村根据地。但由于根据地地处关中腹地，根据地的中心三原武字区距当时陕西的第二大城市三原县城仅 10 多公里，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也不过 50 多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必然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和反复的残酷“围剿”，加之根据地创建初期没有一支正规红军部队，所以，面对优势之敌的“进剿”，就难以给予有效的抗击。尽管 1933 年 7 月下旬成立了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但部队只有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力量过于单薄和弱小，在国民党军重兵进攻的情况下，只能避敌锋芒，离开根据地，从而导致了根据地的最后失守。

毛泽东在 1928 年 10 月 5 日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①同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②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失守，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这些论断的正确。

其次，渭北革命根据地从建立到最后失守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王明“左”倾错误方针在各地得到贯彻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渭北根据地时，在很大程度上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最后失守。

1945年7月11日，习仲勋在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总结了渭北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从渭北苏区长期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并且要有正确的政策，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了是条失败的路线。”^③

渭北革命根据地虽然最终失守，但是，根据地人民为创建根据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为创建根据地而英勇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先辈的不朽业绩，也必将永志青史。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5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63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页。

第三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节 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

一、陕甘边地区的早期革命武装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处于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的保安、安塞、甘泉、富县、中部^①、宜君、旬邑、淳化、耀县等县和甘肃省的庆阳^②、合水、华池、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地区。

（一）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活动

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发端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地区领导的兵运活动。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2月，谢子长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同年4月，刘志丹接替谢子长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陕西问题决议案》，要求陕西党组织尽力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和斗争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从部分地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农民游击战争，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明确要求要加强士兵工作，以争取广大的士兵，把士兵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并派人打入农村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争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投入了相当的力量，在陕甘边界地区展开了初创革命武装的工作。

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从1929年春开始，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展开兵运活动。

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和皖北起义^③失败后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的曹力如等人的协助下，利用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矛盾，夺取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

权。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刘志丹等还相机在民团内部安插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建立了党的支部。经过整顿和改造，保安县民团成为共产党人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在此前后，谢子长也前往宜川县，对占据凤凰山的土匪梁占魁部进行改造，但效果不明显。谢子长遂离开宜川。这时，刘志丹也因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密切关注而被迫离开保安县民团。曹力如等则继续在民团中隐蔽，坚持斗争。

1929年秋，冯玉祥委任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驻防宁夏平罗一带。苏雨生本是包头河套一带的土匪，视兵如命，遂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刘志丹和谢子长根据党组织指示，利用苏雨生扩军之机，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先后打入苏雨生部。谢子长被任命为第十一旅旅长，刘志丹被任命为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此后，谢子长到榆林、绥德一带为第十一旅招收了近300名学生兵，其中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这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成为该旅的骨干力量。刘志丹和谢子长还在苏雨生部成立了学兵队。根据刘志丹、谢子长的建议，中共陕北特委先后派遣张秀山、贺晋年、张东皎、高鹏飞等一批党团员进入学兵队，并在学兵队成立了由张东皎任书记的秘密军委会。在刘志丹、谢子长的正确领导下，中共组织在苏雨生部队中的兵运工作得到全面的开展。

1930年春，苏雨生奉冯玉祥之命，由宁夏平罗移驻陇东。但随后遭到马鸿宾部追击，被迫败退至陕西彬县、长武一带。1931年1月，苏雨生部被陕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收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归第十七路军第五十八师师长马青苑节制。骑兵旅旅部驻彬县县城。

在苏雨生部移驻陇东前，刘志丹、谢子长研究后认为，相较于马鸿宾部，苏雨生部实力过于薄弱，苏雨生很难在陇东立足。为保存有生力量，刘志丹和谢子长将学兵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安插到苏

雨生部王子元团。后该团被杨城虎和孙蔚如扩编为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由王子元任旅长，中共党员张东皎任副旅长。

刘志丹和谢子长将在学兵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妥善安置后，决定相机脱离苏雨生部队。马鸿宾和苏雨生之战爆发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所掌握的部队前往甘肃庆阳一带。随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接受庆阳五属（即庆阳、环县、合水、宁县、正宁五县）清乡司令谭世麟的收编，被编为庆阳五属清乡司令部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第三团奉命驻防庆阳北部的三道川一带。刘志丹招收的人马被编为骑兵第六营，刘志丹兼任营长，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等将驻宜川后九天^④民团杨庚武部周维奇营百余人拉到三道川，编为第三团的一个营，周维奇任营长。

同年夏，以金埭坪^⑤为巢穴的土匪头子张廷芝被谭世麟收编后，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竟以其妹做诱饵，拉拢周维奇，将周维奇营缴械后，率部进攻第三团团部和第六营，制造了三道川事件。在三道川事件中，谢子长等少数干部脱险，但部队被搞垮。当时，刘志丹正在庆阳，他获悉周维奇伙同张廷芝发动叛乱的消息后，迅速返回三道川，途中遭到张廷芝的追捕。刘志丹被迫前往永宁山寨，在曹力如、王子宜的保护下脱离险境。

三道川事件发生后，谢子长离开陕北，前往北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在北方局军委工作的薄一波回忆说：谢子长“对武装斗争的道路坚信无疑，对以前的失败毫不气馁，而且‘越挫越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准备投入新的斗争。我们谈得很好。我感到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群众领袖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谦和、诚恳、坦白而又英勇、果断、刚毅。他一见到我，开口就说，北方局能不能给他弄两支枪。那时我们正好筹集到一批款子，通过海外关系买到一些武器。原打算给他一批武器，但因为难于运送，我只好从中挑了两支驳壳枪交给他。子长爱不释手，马上把枪插在腰间。随后，我们又设法通过关系给他办了一个持枪证。不久，他就带着枪返回西北去了”。^⑥

刘志丹脱险后，即与曹力如、王子宜等一起筹划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他们以王子宜任团总的保安县民团为主，联络三道川事件中失散的旧部，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同年9月，谭世麟重新任命刘志丹为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并命令驻甘肃合水县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尽力相助。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等研究决定，趁机收缴第二十四营的枪械。9月8日，刘志丹率领部队，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以商筹粮草为名，进驻合水县太白镇。与刘志丹同行的有曹力如、马锡五等。10月1日，刘志丹、曹力如、马锡五等伺机将驻防太白镇的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等击毙，收缴了该营第一、第三连的枪支，击溃了该营第二连。这次战斗被称为“太白收枪”，共收缴枪支50余支，战马10余匹。随后，刘志丹组建了一支100余人的革命武装，编为两个中队。部队建有中共支部，书记杨树荣。部队活动于陕甘边界地区，并先后消灭了保安、安塞和合水、庆阳等地的小股民团武装。

1931年1月，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保安、安塞一带遭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高双成旅的追剿。为摆脱敌人，刘志丹率部队向陇东瓦子川一带转移。同年2月，刘志丹所部进驻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等率领的武装力量汇合，并在固城川麻峪村进行整顿。随后，几支武装力量在固城进行整编，共400余人。刘志丹任总指挥，部队编为四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别担任连长。整编后，部队进驻甘肃宁县盘克原张皮村。2月24日，甘肃地方军阀陈珪璋所部骑兵向刘志丹率领的队伍发起袭击。在这次战斗中，第一连连长卢仲祥不幸牺牲，刘志丹率领的队伍损失过半。刘志丹带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骨干力量突围后，进入子午岭山区，后转到中部县西部的小石崖进行休整。赵连璧等人则返回南梁一带，收集失散人员，重新组建武装力量。

刘志丹率部队到达小石崖一带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高岗前往部队，向刘志丹传达了省委关于争取苏雨生、石子俊、王子元等三个旅举行起义的指示。根据省委的指示，刘志丹率部队前往驻彬县的陕西

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苏雨生任命刘志丹为补充团团长，杨树荣为副团长。补充团下设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魏佑民，第二连连长同守孝。补充团驻守旬邑县职田镇。此后，刘志丹乘机联络旧部，筹备军需，扩大队伍，使补充团的力量得到扩大和加强。

同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到职田镇，向刘志丹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迅速扩大部队，待机拉出，打击敌人的指示。为准备部队起义，刘志丹等在补充团建立了中共支部，杨树荣任书记，宣传委员刘志丹，组织委员王世泰。支部共有党员二三十人。苏雨生获悉补充团有共产党活动的消息后，以商议军机要务为名，将刘志丹召到彬县，并以职田镇土豪刘日新拒绝向补充团交粮自杀为由，将刘志丹予以关押。苏雨生还命令部队将补充团包围缴械，其中七八十人被苏雨生编为警备骑兵旅直属运输队。

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高级参议、陕西省清乡总局副局长的杜斌丞得知刘志丹被关押的消息后，十分焦急。他立即找到苏雨生部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谷莲芳，要他转告苏雨生：“刘志丹是我的学生，你们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各走各的路，扣押他干什么？”^⑦5月18日，杜斌丞受杨虎城之托，以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特派慰劳专员的名义前往彬县，慰劳和检阅苏雨生部。5月22日，杜斌丞由彬县返回西安。在彬县期间，杜斌丞促使苏雨生将刘志丹释放，并向刘志丹赠送了一支手枪和100块银元。刘志丹获释后，重新踏上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坎坷征程。

①今黄陵县。

②今庆阳市的庆城县和西峰区。

③1928年4月，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等人在安徽阜阳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因进到国民党当局的锁压而失败。魏野畴等人被俘后牺牲。

④今属延长县南河沟乡。

⑤今属吴起县吴起镇。

⑥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320—321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杜斌丞教育思想研究会编：《杜斌丞年谱》，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1月第1版，第88页。

（二）南梁游击队的组建

1931年5月下旬，刘志丹在彬县获释后，经保安同乡、时任陇东暂编第十三师副官处长的李勤甫介绍，前往甘肃平凉。刘志丹在保安同乡、时任暂编第十三师特务二团团团长刘保堂的引荐下，得以晤见甘肃第一路警备司令兼陇东暂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陈珪璋欣赏刘志丹的才干，遂委任他为暂编第十三师第十一旅旅长，率200余人驻防甘肃宁县早胜镇。刘志丹担任第十一旅旅长后，张秀山、刘景范、高岗、王世泰、张文元等共产党员相继来到该旅，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随后，刘志丹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该旅的各级军官。其中曹华民任书记官，张秀山任手枪队队长，陈鸿斌任旅参谋长。不久，陈鸿斌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返回陕北，参谋长一职由朱理凯担任。高岗则负责中共陕西省委与该旅党组织的联络工作。

同年8月10日，杨虎城通令各部队各地方，驻彬县、长武之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通匪殃民，除呈报总司令将旅长苏雨生撤职外，并派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旅长杨渠统（杨子恒）率部前往痛剿，^①早已与苏雨生有矛盾的陈珪璋，随即命令部队前往长武，参加进攻苏雨生部的军事行动。在杨渠统和陈珪璋两支部队的夹击下，苏雨生部迅速被击溃。苏雨生只身离开彬县，向北逃窜。其残部被改编为第十七师补充团。

就在陈珪璋所部参加进攻苏雨生部队的战斗之后不久，驻防宁县的陈珪璋部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哗变，将特务二团团团长刘保堂所率的四个连武装缴械，并在宁县早胜镇扣押了刘志丹，将第十一旅也予以缴械。随后，高广仁部押着刘志丹和刘保堂等向合水进发。在合水附近的骆驼巷，高广仁部被陈珪璋的主力部队蒋云台的第五旅击溃。刘志丹和刘保堂得以脱险，来到合水县城。刘保堂所部此时正驻扎合水，刘志丹在合水县城东关一所客店安身之后，接到刘保堂报信，说蒋云台以刘志丹防务不力，丢失早胜镇为借口，将扣押刘志丹。刘志丹接到报信后，即与马锡五、王璧成连夜冒雨进入子午岭山区。刘志丹离

开合水时，将刘景范、张秀山、王世泰、曹化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安排进入特务二团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刘志丹进入子午岭山区后，在篙嘴堡找到了时任合水东区民团团总的贾生财。在贾生财的掩护下，刘志丹脱离了被蒋云台部骑兵追击的险境。随后，又来到太白川夏家沟赵连璧处。刘志丹让马锡五协助赵连璧整顿部队，自己则返回保安和南梁一带开展工作。

同年9月，刘志丹将分散活动于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武装力量集合于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组建了南梁游击队，全队300余人，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下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武；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这是陕甘边地区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部1个骑兵连，缴枪20余支，战马40余匹。接着，游击队又击溃了合水县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活动于南梁东华池一带，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打击反动民团，在当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一时之间，声威大震。

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武装的斗争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折，即实现了从军阀手中拉队伍到在农村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转变，从而使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43页。

（三）晋西游击队的建立及西渡黄河

1930年10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兵败后，阎锡山避居大连，商震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的部队失败后退入山西，山西政局陷入混乱之中。在这些败退进入山西的部队中，大都有中共地下组织。如驻平定的高桂

滋部，驻汾阳的冯玉祥军官教导团和太原炮兵团等。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以兵运工作骨干为基础，在山西创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为配合这一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组建中共山西省委，由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刘天章抵达太原后，一面着手恢复和发展地方组织，一面派人分赴平定、汾阳、侯马、晋城等地，联系驻军中的中共组织。刘天章还秘密前往汾阳等地考察，认为吕梁山脉中段群众基础较好，又西靠黄河，可以与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革命力量互为呼应，遂决定在这一带建立一支由山西省委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经过刘天章和山西省委的努力，中共太原市委和中共河东特委得以恢复建立，并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 260 余名。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并将中共山西省委改为中共山西特委，归中共河北临时省委领导。刘天章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候补委员、山西特委书记。

在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特委的安排下，中共组织先后从汾阳军官教导团和高桂滋部抽调出共产党拓克宽、杨重远、吴岱峰、胡廷俊等，从太原兵工厂中抽调出共产党员马佩勋、尹子安、安世人等 10 余人从事兵运活动。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中共陕北特委派遣阎红彦、白锡林等 10 余名共产党员东渡黄河，帮助建立红军游击队。

1931 年初，刘天章和山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一起到太原南郊党组织秘密联络点——并州养蜂场，召集拓克宽、阎红彦等开会，确定了筹建中的工农武装旗号，通过了领导人选名单，讨论了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针。会议还决定：如遇到意外情况，工农武装与山西特委失去联络又无法在吕梁山区立足，可以西渡黄河，参加创建陕北根据地的斗争。

同年春末，被抽调参加创建红军游击队的人员在汾阳县城东关万兴客栈秘密联络站陆续聚齐，计 30 余人。5 月上旬，这些人员分途进入吕梁山区，并在孝义县的大麦郊娄底村（今名西泉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拓克宽，政治委员黄子

文，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总支书记杨重远，财经员白树梅。晋西游击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由阎红彦兼任，辖胡廷俊、李成兰等三个班；第二中队中队长白锡林，辖陈立清、周维仁等三个班。

晋西游击队成立后，开始在吕梁山区广泛发动群众，抗粮抗捐，开展游击战争。不久，汾阳县永安镇驻军一个排发动起义，被编为晋西游击队第三中队。到当年8月，晋西游击队已扩大到100余人，并建立了以吕梁山主峰之一的上顶山附近西宋庄为中心区域，东西宽约40公里、南北长约60公里的游击根据地。

面对日益活跃的晋西游击队，国民党山西省当局决定予以大力围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调集晋军第七十二师和一个炮兵团及地方民团，共计1万余人，从8月初开始，对晋西游击队和吕梁山区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因敌强我弱，晋西游击队活动区域逐步缩小，处境极为艰难。在此情况下，晋西游击队决定西渡黄河，前往陕北。8月下旬，晋西游击队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决定不愿前往陕北者，每人发给30元银元，作为分散潜伏的费用，留在当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晋西游击队共保留了30名成员。这些成员均为共产党员，其中除马佩勋为山西孝义人外，其余均为陕西籍。

9月2日，晋西游击队30名指战员，共携带长短枪60余支，子弹万余发，在石楼县辛关附近的龙王庙渡过黄河，进入陕北，9月3日到达清涧县高杰村。9月4日，部队到达安定县东区的南沟岔柳树坪。在此，晋西游击队改选了领导成员，大队长阎红彦，副大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下辖4个班，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分别担任班长。9月5日，晋西游击队到达安定县西区的枣树坪。在枣树坪，晋西游击队通过谢子长的兄长、共产党员谢德惠，与当时以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的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取得了联系。马文瑞一面指派地下党员任光腾向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一面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晋西游击队。不久，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资平前来枣树坪，传达了特委要求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

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的指示。在此期间，强龙光、强世清、马云泽等一批共产党员加入晋西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 100 余人。

随后，晋西游击队经安塞等地，向保安一带开进。9 月 11 日，晋西游击队在保安县安条岭一带与当地民团展开激战。战斗中，拓克宽不幸被俘，后遭敌杀害。黄子文与游击队失掉联系，遂辗转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安条岭战斗受挫后，晋西游击队调头东返，回到安定县境内。9 月 14 日，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孙家河接收了保运商贩武装杨琪、杨鼎、杨桐及萧永胜部，共 100 余人。双方约定，保运商贩武装不编入游击队序列，在三个条件下，双方联合行动。这三个条件是：（一）服从游击队领导；（二）不抢穷人东西；（三）不强奸妇女。此即约法三章。为了加强对保运商贩武装的管理和约束，晋西游击队给杨琪和萧永胜分别派出政治指导员，并成立执法队，以监督执行约法三章。

10 月 7 日，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南沟岔接收了保运商贩武装师储杰部。晋西游击队同样与师储杰部约法三章，并成立执法队以监督执行。随后，晋西游击队和中共安定县委还向师储杰部派出雷恩钧、李崇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等五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各队政治指导员。

10 月上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精神，晋西游击队与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保运商贩武装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师储杰。这时，陕北游击支队共有步兵和骑兵 300 余人。

（四）林锦庙会师与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

1931 年 10 月中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陕北游击支队经安塞、保安等地向南梁一带进发。10 月 20 日到达合水县林锦庙^①，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会合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谢子长前往南梁，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的指示。10月30日，谢子长到达南梁后，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并决定成立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马云泽、白锡林为委员。为解决两支部队的给养及过冬等问题，经队委会讨论，决定利用陈珪璋谋求扩充实力的机会，与陈珪璋进行协商谈判，将部队暂编为陈珪璋部警备骑兵第二旅。旅长谢子长，副旅长刘志丹。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任。随后，部队进驻庆阳东北的新堡。通过警备骑兵第二旅的番号，部队在陈珪璋处搞到了一批急需的被服和军需物资。

在新堡收编期间，为增强部队的团结，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举行了“拜把子”香堂大会。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我弟兄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离等情，天诛地灭。”^②关于参加“拜把子”的人数，一说为8人，即师储杰、杨琪、杨重远、谢子长、刘保堂、刘志丹、马云泽、阎红彦。另一说为18人，即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廷俊、雷恩钧、白锡林、陈玉清、师储杰、杨琪、杨鼎、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唐青山、刘保堂。

“拜把子”带有浓厚的江湖色彩，但在当时情况下，却对稳定部队、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刘志丹撰写的“金兰谱”既包含个人感情，又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和斗争方向，因此，在客观上有着积极的作用。

新堡收编通过“借水养鱼”，对两支游击队渡过困难、休养生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12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要集中力量领导三原、富平、蒲城和西路等地的农民斗争，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为此，“省委应在最近派一得力同志到陕北游击队去，使他们的游击区域更能扩大到关中道交界与三水、

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汇合起来，使苏维埃运动在陕西更能迅速的扩大和发展起来”^③。

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荣子卿来到庆阳新堡，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游击队的指示，批评游击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其他土匪混合”，要求游击队脱离陈珪璋部，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并立即南下。根据省委的指示，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部队于12月底离开庆阳新堡，向正宁方向转移。行军途中，部队在柳树原村击溃了陈珪璋部两个连的阻截，并缴枪100余支。随后，部队到达正宁县北月明塬柴桥子村。

1932年1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柴桥子村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副官长杨琪。全军共700余人，分编为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大队。两个支队各辖三个大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书记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等为委员。

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的正式合并和统一。

中共陕西省委对西北反帝同盟军寄予了很大期望。1932年2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陕西省委报告第一号——关于陕西游击队》。报告汇报说：“现在陕西有我们领导下的一部分军事力量，现在名义是反帝同盟军，党预备转变成为革命的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④关于部队的名称，报告中说：“当时为什么要叫反帝同盟军，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阶级，到处乱抢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因此即改此名义执行省委指示向陕甘边境——三水、正宁发展，为防止途中抢掠烧杀无所不为，即将我们同志最多，枪枝战斗力最好的一个中心大队改为警卫队（即

执法队)直属军事委员会,镇压土匪,抢掠行动完全没有了,变为公买公卖的好军队。”^⑤

陕西省委的这个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前后的状况。

①今名林镇。

②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46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7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8页。

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建立

(一) 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整训与三嘉原事件

1932年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由柴桥子开赴正宁县的三嘉原。抵达三嘉原后,部队一边发动群众,一边开始进行整训。

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要求西北反帝同盟军“应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区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为主要方向,因为这些地方党与群众是有相当的基础,尤其是在三原、富平一带,是农民斗争最高涨的区域”,“将来必须和这区域的农民斗争配合起来”。^①指示信要求部队要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加强部队的教育,改变部队现有成分;加紧附近白军中的士兵工作,必须选择部队中勇敢积极,认识比较好的群众,派遣打入附近的军队中去。指示信还特别提出:“健全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成份,树立铁的纪律”^②,“支部中的铁的纪律亦必须建立起来,尤其是在成份不好的部队内更为重要。必须分配每个同志以具体工作,团委与支部书记经常检查,如果消极

怠工，不执行党的决议时加以毫不客气的自我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的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的异己分子逐渐淘汰出去”^③根据省委的安排，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来到西北反帝同盟军驻地三嘉原，传达省委关于部队立即改编为红军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开辟苏维埃区域的指示。

整训期间，部队开办了有 30 多名班、排长参加的干部训练班。中共队委会通过加强政治学习，对指战员进行反帝爱国教育、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通过整训，两支游击队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整训过程中，部队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如何进一步加强部队整顿，部队行动方向，在何处开辟苏区及“官兵月薪一律 10 元”等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2 月 6 日，是农历壬申年春节。这一天，中共同盟军队委员会以贯彻陕西省委反右倾主义、反调和倾向指示的名义秘密召开会议。部队主要领导人 and 队委会委员刘志丹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清洗“内部不纯分子”。会后，中共队委会立即召开反帝同盟军全体指战员大会。总指挥、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首先讲话，强调要加强部队纪律，对部队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谢子长讲话刚一结束，第一支队突然将第二支队包围，当场打死了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和第三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等四人，白冠武被打伤。第一支队随之强行收缴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第二支队指战员的枪械。这就是“三嘉原事件”。

赵连璧被打死后第二天，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以二三十块现大洋、一头毛驴的代价，被打发离开了部队。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当时正外出搞枪支，听说此事后，就远走他处。2 月 8 日，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率领旧部离开部队，投奔了杨虎城的部队。

三嘉原事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建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曾在西北地区广大干部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50 多

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 1985 年 5 月 21 日批转了冯文彬、宋时轮《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其中对三嘉原事件做出结论性意见：“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④三嘉原事件的深刻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3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5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6 页。

④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 年第 7 期。

（二）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

中共陕西省委在 1932 年 1 月 20 日发出《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后，又进一步就游击队的组织等问题做出“实际工作布置”，其中包括：（一）“省委调大批军事的政治的干部到部队中去，建立党的领导骨干”。（二）“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政治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树立党的领导骨干”。（三）“名义现在暂是陕西游击队。经过改造与整理后，即改为‘中国红军陕西游击队’”。（四）“党的组织方面，成立游击指委为最高指导机关，队委书记省委已指定由杰夫同志去担任，其余的吸收士兵同志、政治工作同志担任。队委以下以中队为中心，组织支部，暂时可成立一两个支部”。（五）“对地方党部工作，省委已派一个比较得力同志负责地方党部书记。加强当地群众工作，以与这游击队的任务配合”。^①

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原细嘴子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礼。正宁县和旬邑县的数千群众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

在改编誓师大会上，高维翰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宣布陕甘游击队组成建制和总指挥部及各大队军政领导干部的任命：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政治部主任黄子文。陕甘游击队下辖三个大队、一个警卫大队和一个骑兵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委高岗；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委由杨重远兼任；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政委陈玉清；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团团长强龙光，副团长杨琪，政委杨森。全队共400余人，300余支枪。命令宣布后，中共旬邑特支书记第五伯昌将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授予部队。总指挥谢子长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先后发表了讲话。

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组建后，又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委员谢子长、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雷恩钧、陈玉清、白锡林、胡廷俊等。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刘志丹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2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拥护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告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书》，指出：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官长和士兵都是穷人或穷人的子弟，因为不出捐款，分配食粮，抗租、抗税、抗债与政府豪绅地主等斗争；因为他们受不住国民党政府以及豪绅地主的压迫，所以就把自己武装起来，要打倒现在的反动统治”^②。号召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团结起来，为自己切身利益而斗争，拥护红军陕甘游击队，反对‘围剿’陕甘游击队”^③。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建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界地区创建的革命武装，第一次打出了红旗。曾参加了授旗典礼的阎红彦回忆说：“望着那迎风飘扬的红旗，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党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在陕、

甘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为了这个，有多少同志流出了鲜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红色军队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了，在陕甘高原上正式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色旗帜。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呢！”^④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0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2—33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3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68 页。

（三）攻占职田镇与阳坡头战斗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将仅有民团驻守的旬邑县职田镇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当天晚上，陕甘游击队将职田镇包围，于次日凌晨攻克，捣毁了区公所，并捕杀了职田民团团长。随后，游击队将职田原附近的主要豪绅全部逮捕，并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唐碧武等劣绅。

2 月 14 日，是正月初九，恰逢职田镇集日。游击队在职田召开群众大会。根据游击队同年 3 月给陕西省委的《工作报告》所述：“在大会上推选了三个农民主席，参加大会者有四五百人。议事日程，第一，宣布本军的任务，解释红军是什么？红军的任务是什么？第二，宣布解散区公所，向民团开火，区公所及民团一切账项焚毁；第三，焚毁一切账债契约，将所被逮捕豪绅的账债契约，当场焚毁；第四，进行分粮^①

陕甘游击队攻占职田镇，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驻防旬邑县城的陕西省政府警卫团第三营樊谅承部及旬邑、彬县、淳化三县民团，共 1000 余人，向职田镇扑来。

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建有中共秘密组织，共产党员、该团团长张汉民曾担任中共第四军支书记和中共三原县委军委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张汉民曾秘密向部队运送过枪支弹药和医药用品。在警

卫团第三营任第七连连长的共产党员李明轩派人将敌人的进攻计划向陕甘游击队做了秘密通报。

谢子长在 2 月 14 日接到李明轩送来的情报后，于当天黄昏率陕甘游击队撤出职田镇，前往职田镇以东 10 公里的阳坡头村设伏，以迎击来敌。

当天晚上，国民党进剿部队进入职田镇扑空后，又于第二天拂晓向阳坡头方向开进。上午时分，敌人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西的涝池畔。这时，隐蔽在涝池畔和村中的游击队员一齐开火，其中的两挺轻机枪猛烈扫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李明轩乘机调转马头，大喊：“红军火力太猛了，快跑！”敌军士兵紧随其后，争相逃命，顿时，队伍大乱。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乘势追击，将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此役共歼敌 300 余人，缴枪 150 余支。

阳坡头战斗胜利后，陕甘游击队于 2 月 16 日重返职田镇。在职田镇，陕甘游击队对被俘的五六十名官兵和阵亡官兵进行区别处理。据陕甘游击队在同年 3 月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汇报：“俘虏中愿意留者在此做事，不愿者随同伤兵回去。留部队者仅七人，其他一律送回，由士兵委员会开会慰问欢送。用士兵委员会的名义买各种礼物同宣传单一并给。阵亡的白军士兵都用大车送至旬邑，留部队的士兵弟兄当日晚召集士兵委员联席会欢迎。”^②

阳坡头战斗大获全胜，陕甘游击队以三人负伤的代价，取得了歼敌 300 余人的重大胜利。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体指战员的士气。这一战斗的胜利以及战后对被俘和阵亡官兵的妥善处理，也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红军残杀俘虏”的谎言，扩大了陕甘游队的政治影响。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3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4 页。

（四）转战同官，袭击照金

阳坡头战斗胜利后，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职田镇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此期间，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对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方向进行了部署。总指挥部分析了敌人态势，“估计敌人必然要调大军来”，“所以决趁敌人的兵力未来集中以前，先向土桥（原）、清水原一带游击，然后直冲淳化向三原发展”^①。

2月19日，陕甘游击队离开职田镇，渡过马栏河，向南运动。部队到达清水原后，根据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的建议，决定经耀县柳林一带，向三原方向发展。

2月20日是农历元宵节，陕甘游击队在前往香山途中，路经耀县西北的照金镇。当天晚上，陕甘游击队乘照金镇闹社火、当地民团毫无戒备之机，突然袭击照金镇，将民团击溃，缴枪30余支。随后，陕甘游击队来到香山。

2月21日，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在香山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鉴于陕西省地方当局调集重兵，在富平、同官、耀县、淳化、旬邑、彬县等地民团武装配合下，全力向陕甘游击队进攻的严峻局面，会议认为如贯彻中共陕西省委原定的关于部队南下三原、富平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很难取得突破口，难以实现预定目标。为避实就虚，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同官、宜君、中部一带运动，开展游击战争。

随后，陕甘游击队向北行动，来到同官县的衣食村。这里有一处煤矿。因春节刚过，留矿工人仅二三十人。游击队为发动煤矿工人，提出了“反对炭捐摊派，工人自己组织炭井”的口号，但由于矿工人少而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陕甘游击队随即向瑶曲开进，在此接收了数名煤矿工人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到达瑶曲的当晚，得到情报说，耀县等地民团300余人集结于柳树村。游击队当即赶赴柳树村，与民团激战半日，击溃了庙湾民团。

击溃庙湾民团之后，陕甘游击队调头北上，进逼宜君县焦坪镇^②进入陕北军阀陆军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的防区。焦坪镇由该师左协中团一个连和当地民团驻守。陕甘游击队向焦坪镇发起进攻，迅速将当地民团和驻军击溃。在当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陕甘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游击队还在焦坪张贴了告陕北农民与井岳秀部队士兵书。之后，陕甘游击队离开焦坪，在宜君县西北的艾蒿窑，与前来进攻的左协中团一个营展开激战。战斗中，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被进攻的敌军逼近。在此紧急关头，游击队童子班的战士们英勇反击，打退了敌军的进攻。谢子长随即指挥部队反击，使总指挥部转危为安。在战后举行的军人庆功大会上，谢子长宣布将童子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并任命王有富为队长。

艾蒿窑战斗共缴获枪支 20 余支，俘虏了包括一名连长和一名排长在内的七名俘虏。在对俘虏进行教育后，游击队将俘虏全部释放。

艾蒿窑战斗胜利后，陕甘游击队挥师西进，于 3 月上旬进入中部县西部的上畛子地区。上畛子西连子午岭，与甘肃正宁、宁县一带接壤，山大沟深，森林茂密，是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陕甘游击队在此进行了一周左右的休整。

陕甘游击队进入上畛子地区进行休整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就陕甘游击队的行动连续做出决议和指示。

陕西省委在 3 月 6 日做出的《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中指出：“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③决议指出：“游击队要执行自己的任务，必须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拼命的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做坚决斗争。”^④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⑤

第二天，中共陕西省委又做出《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决议肯定了陕甘游击队先后取得两次

胜利的积极影响，分析了国民党当局调动重兵“围剿”游击队的严峻形势。决议提出：“在这个形势下面，党的迫切任务无疑的是加强游击队领导，进行彻底的改造，尽量领导和开展群众斗争，把广泛的群众斗争，组织和汇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去冲破敌人‘围剿’，建立新苏区。”^⑥决议要求：“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⑦

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布《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纲领规定游击战争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和苏维埃的影响，摧毁豪绅在乡村的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游击队要努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

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翻越子午岭，回师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在成立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陕甘游击队主动出击，连续作战，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并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4页。

②今属铜川市印台区。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5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9—40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0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2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3页。

第二节 建立以寺村原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一）首攻山河镇与组建赤卫军

在陕甘游击队成立前后，甘肃及陇东的局势出现了波动。1931年12月，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奉命入甘平定新编第十八师师长雷中田的叛乱。驻防平凉的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也率部西进。经定西一战，十七师击败了雷中田的主力。12月10日，第十七师完全占领兰州，甘肃之乱得以平定。12月15日，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兼任甘肃宣慰使。此后，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旅长杨子恒被委任为皋兰警备司令。1932年2月19日，杨子恒以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有“异动”为由，在兰州将其秘密处决。此举在甘肃各界引起强烈反响。陈珪璋的残部在陇东到处骚扰，或结伙为匪，打家劫舍；或派粮派捐，急如星火。新编的第十三师警卫团副官与正宁县官府勾结，狼狈为奸，竟然向全县民众摊派10万元银洋的款项，并派人四处催款。正宁各村镇民众义愤填膺，纷纷组织自卫武装，实行武装抗粮抗捐，并准备围攻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

陕甘游击队回师正宁后，决定支援群众斗争，进而开展陕甘边及陇东各县的游击战争。谢子长派出骑兵，与各路民军联系，定于3月19日拂晓前军民联合攻城。

山河镇南临深沟，其余三面筑有城墙，辟有东、西两个城门，地势险要。城内驻有陈珪璋残部两个步兵连和正宁县民团，并配备有一门迫击炮。但其中的二三十名士兵已约定准备作为攻城军民的内应。

3月19日凌晨，陕甘游击队从月明塬出发。但由于大风飞扬，雾气弥漫，加之积雪初融，泥泞不堪，行军速度较为缓慢。当部队前进至九龙畔时，带路的向导迷路，又延误了时间。部队赶到山河镇城外时，已是当天拂晓。而各路民军也不能如约聚集，形成陕甘游击队孤军作战之势。在不利的情况下，游击队向山河镇发起强攻，但因守敌顽抗，内应士兵又无法发挥作用，游击队攻城失利，当晚被迫撤出战斗，转移至寺村原一带。约定内应士兵因事机泄露而被捕。

陕甘游击队撤至寺村原后，立即召开队委会，总结了攻打山河镇失利的教训，并制订了新的计划。

随后，陕甘游击队各大队配合寺村原地方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工作，在各村镇普遍刷写张贴标语，主要内容包括：“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分财产”，“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摧毁豪绅在乡村中的一切政权机关”，等等。

3月20日，正宁县农民赤卫队正式成立，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随后，各村镇农民赤卫队也相继成立。

正宁县农民赤卫军的成立，为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一红色政权机构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

陕甘游击队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在正宁县的72个村开辟了红色区域。这72个村位于正宁县的东部和北部，包括今正宁县西坡、湫头、三嘉等乡镇所辖区域。这里地处子午岭山区，海拔1500米左右，水源充足，宜农宜林，便于游击队活动。同时，这一区域又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由此南下，可直通渭北，出关中平原；由此北进，可出击陇东。如遇强攻，则可以子午岭为依托，回旋余地较大。

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新庄子召开有正宁县72村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大会期间，72村各推选农民代表1名，共选出代表70余名，其中贫农40余名，雇农10余名，其余为中农。这些代表随即与游击队代表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推翻正宁县的地方政权，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①。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农民委员10名，游击队委员5名，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兼任主席，张静元和唐桂荣^②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这次大会还处决了当地罪大恶极的大土豪赵元亨、龚得功。

当时担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文书的李志和在 1985 年回忆说：“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游击队就着手筹备成立寺村原 72 村革命委员会，物色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时提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条件是要家穷，有威信。为找一个最穷的人，把全寺村原的人几乎都考虑遍了，结果找到车家沟张进元。这个人家里很穷，有父母和兄弟五个。弟兄三个常年给地主拉长工，都是单身汉。张进元人穷志气大，又会说理，语言流利，做事有胆量。因此就选准了他。唐桂荣家里是中农（西城人），很老实、敦厚，在群众中有威信，也被选为对象。”^③

李志和回忆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积极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打土豪劣绅。此间先后没收了西城村豪绅刘西昆、徐家庄豪绅赵元亨、琴宅豪绅赵秉义的粮食和牛、羊，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④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寺村原的 72 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村由五名委员组成，小村由三名委员组成。同时，对赤卫军进行了整顿，禁止豪绅地主和富农参加赤卫军，使赤卫军成为雇农、贫农、中农和劳苦群众的武装组织。赤卫军的编制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以乡（约七八个村）为单位成立大队，分队长和大队长由群众选出，各乡联合组成总队部，总队部在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①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

②一说为一名姓李的农民。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499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00 页。

（三）再攻山河镇与攻克旬邑城

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陕甘游击队再次发起了攻打山河镇的战斗。寺村原 1000 多名农民赤卫军配合攻城。

陕甘游击队再次攻打山河镇的作战部署是：由步兵担任主攻任务，骑兵在山河镇以西集结隐蔽，以阻击由庆阳西峰镇前来增援的敌兵，赤卫军则布置在二线以做接应。

4月1日拂晓，再攻山河镇的战斗打响。由于缺乏攻坚火力，陕甘游击队攻城两日未克，遂撤出战斗，撤往山河镇东十余公里的西坡村休整。4月3日上午，陕甘游击队在西坡坳伏击增援之敌，击毙四五十人。战后，游击队返回寺村原。

陕甘游击队再攻山河镇失利后，一直在捕捉战机。这时，中共旬邑地下组织送来情报：旬邑城只有一个连驻军，并有民团五六十人及警察20余人，防守空虚。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乘机奔袭旬邑县城。

4月12日，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原，前往旬邑。新成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由于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从酝酿、诞生到解体，虽然仅有20多天的时间，但却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一地区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4月13日拂晓，陕甘游击队兵分两路，向旬邑城发起进攻。在中共旬邑地下组织的策应下，陕甘游击队经激战后攻进旬邑城，消灭了部分驻军、民团及监狱狱警数十人。一部分守敌逃走，另一部分守敌退守至城东北山上的魁星楼内。因魁星楼地势险要，难以强攻，游击队遂将这里包围，没有发起强攻。龟缩在魁星楼内的守敌也不敢放枪。

陕甘游击队攻克旬邑城后，立即刷写张贴标语，宣传革命主张，并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旬邑城内的群众群情振奋，很快就分掉城内几家劣绅的粮食、财物。被关押的无辜群众得到释放后，奔走相告，纷纷参加斗豪绅的群众斗争。陕甘游击队还当众处决了旬邑县的警察局长。

当天黄昏，陕甘游击队主动撤出旬邑县城，前往马家堡。这次战斗共缴枪20多支、子弹1500余发和手榴弹7箱。

攻克旬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第一次攻克县城。这一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甘边境地区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也给国民陕西当局以强烈震撼。此后，旬邑县政府被迫将旬邑县治迁往张洪镇。

二、根据地建立初期的游击战争

（一）转战西路与渭北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曾多次就游击队的行动方向与战略任务做出部署。陕西省委在3月6日做出的《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中特别指出：陕甘游击队要“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毫不迟疑的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西路去游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①。3月21日，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报送的《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中提出：“汇合农民士兵的斗争，游击队的行动，建立陕西新苏区，创造红军为陕西党的最迫切任务。”^②

《请示》还提出：“红军游击队迅速回（向）三原发展（很近的一天可到），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已经组织好的，完全是党的领导），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已准备的），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很快地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在这数县内都没有驻军，而且是灾区，党的工作最有历史的几个区域），开辟西北上一大片苏维埃区域。”^③

中共陕西省委对陕甘游击队的要求，显然超出了这支组建不久的武装力量的能力。中共中央在接到陕西省委3月21日的请示报告后，于4月20日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其中指出：“红军的动作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在目前对于敌人（井岳秀、民团等）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但是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④

中共陕西省委在3月21日向中共中央发出《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后，即指派省委书记杜衡前往陕甘边地区巡视工作。

4月中旬，杜衡到达陕甘边地区，同行的还有刘志丹、黄子文等。4月18日，杜衡在旬邑马家堡陕甘游击队驻地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对陕甘游击队没有执行省委南下渭北的要求进行了严厉批评，宣布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杜衡以两打山河镇失利、游击队“游而不击”“梢山主义”为由，撤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会后，谢子长被派往甘肃靖远从事兵运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杜衡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志丹，政委高维翰，参谋长吴岱峰，供给主任刘约三。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重远。

会后，鉴于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围剿”陕甘游击队，两个支队决定避实就虚，分头行动，以打击敌人。刘志丹率第三支队向永寿、礼泉、乾县一带活动，阎红彦率第五支队前往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当地游击队开展斗争。

4月21日，阎红彦率第五支队来到三原县武字区。第二天，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在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第五支队大会。在这次欢迎大会上，黄子文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当天晚上，第五支队得悉敌军“进剿”武字区，为避其锋芒，连夜撤离武字区。次日凌晨，第五支队进至耀县上卢村。

随第五支队来到武字区的杜衡，在参加了欢迎第五支队的大会后，返回西安。

刘志丹率第三支队于4月21日离开旬邑。第三支队分兵两路，一路为骑兵，向永寿县监军镇进军；一路为步兵，直插乾县、永寿、礼泉三县交界处的五峰山。第三支队的骑兵共50余人，在攻打监军镇时，共歼灭当地民团20余人，缴枪30余支。游击队放火焚烧了监军镇的碉堡。随后，第三支队的两路人马会师于五峰山。

4月30日，第三支队分别袭击了永寿县常宁镇和礼泉县南坊、叱干镇的民团，共缴枪50余支。5月1日，第三支队在五峰山与乾县、礼泉民团及吕积成的土匪武装200多人激战一日。

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分别进入关中西路和渭北地区后，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迅速做出反应，调集重兵分三路进行“围剿”：一路从三原、泾阳一线向北进攻；一路从彬县、旬邑一线向东进攻；一路从甘肃正宁、宁县一带堵截。在此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命令第三支队与第五支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

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刘志丹兼任第三支队支队长，高维翰兼任第三支政委。阎红彦仍为第五支队支队长。中共队委会也随之恢复，由高维翰任书记。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8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56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56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62页。

（二）转战富、洛、中、宜及韩城受挫

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重新组建后，决定部队北上，进入国民党整编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的防区，开展游击活动。

5月15日夜，陕甘游击队在北上途中，奔袭旬邑县马栏镇，歼灭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第五一一团一个营部和两个连，并歼灭民团一部，缴获长短枪200余支。5月17日，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凤凰山再歼灭第五一一团两个连。战后，陕甘游击队奔袭焦家坪，全歼当地民团。5月20日，陕甘游击队在咸（阳）榆（林）公路沿线的宜君

县哭泉、大石板歼灭当地两股民团。随后又在宜君城以北的五里镇歼灭当地民团 100 余人。

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宜君连续取得胜利后，进入中部县境，先后歼灭了店头和隆坊的几股民团。5 月 27 日，陕甘游击队在富县吉子峴，与尾追的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二五〇团和整编第八十六师五一一团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陕甘游击队突出重围后向东行动，转移至富县城东的牛武镇。

5 月 30 日，陕甘游击队根据获得的情报，连夜奔袭宜川城西的英旺。次日凌晨，游击队向英旺发起攻击。战斗至上午 8 时结束。英旺战斗，全歼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陈卓武一个营 500 余人，缴枪 300 余支，缴获子弹 2 万余发和战马 20 多匹。随后，陕甘游击队挥师北上，向甘泉县临镇^①发起攻击。临镇驻有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一个营。战斗打响后，陕甘游击队攻占了临镇外围阵地。但由于攻坚部队配合不力，致使战斗失利。陕甘游击队遂撤出战斗。

至此，陕甘游击队从 5 月 15 日起，转战数县，进行大小战斗共 10 次，其中 8 次获胜，两战失利，共歼敌 1400 多人，缴枪 1200 余支。

临镇战斗失利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挥师南下，向韩城进发。

此前，在中共韩城县委的领导下，韩城赤卫队于 5 月上旬在韩城上官庄成立，大队长徐岱云，政委高德辉。韩城赤卫队下辖 3 个中队，有队员 100 余名。

6 月 2 日，陕甘游击队进入韩城县北乡^②，并逮捕了一名土豪、一名提款委员和一名公差。第二天，陕甘游击队迁回至韩城县南嵬山，适逢韩城赤卫队在此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粮食斗争，遂与中共韩城县委接上关系。6 月 4 日，韩城县委负责人在赵烽村与陕甘游击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及“各处建立赤卫队；建立穷人会组织；公开号召以及在韩城建立苏区等问题”。^③

从6月6日起,陕甘游击队先后在高家坡等地展开游击活动。6月8日,陕甘游击队来到上官庄,受到赤卫队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当天中午,陕甘游击队在上官庄召开群众大会,会场气氛热烈,“群众千人,穷人会、妇女队、少年先锋队鼓掌开会,除党^④及游击队员讲演外,还有农民和妇女(劳苦妇女)踊跃宣布富农地主统治阶级的罪恶。会场空气高涨,掌声如雷,极一时之盛”^⑤。当天下午,陕甘游击队又组织上官庄群众开展分粮食,焚烧契约、地契斗争。

此后,陕甘游击队又先后在北寿寺、张家坡寨子、清水村、西赵庄等地展开游击活动。陕甘游击队所到之处,受到了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

陕甘游击队进入韩城,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当局调集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柳彦彪部两个团围攻陕甘游击队。6月12日拂晓,柳彦彪部向陕甘游击队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陕甘游击队在激战两个多小时后主动撤出战斗,退出韩城。

陕甘游击队撤出韩城后,韩城县委领导韩城赤卫队继续坚持斗争。同年11月,韩城赤卫队政委高德辉被国民党韩城地方当局逮捕杀害,队长徐岱云被迫离开韩城避居外乡,韩城赤卫队停止活动。

①今属延安市宝塔区。

②今黄龙县白马滩镇一带。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7页。

④指中共韩城县委。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7页。

(三) 麻子掌会议与梁掌堡会议

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受挫后,兵分两路:刘志丹率主力部队回师陕甘边境地区;阎红彦、杨琪带领骑兵与少年先锋队进入黄龙山区,展开游击活动后,也回师陕甘边境。

陕甘游击队进军韩城后，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前往三原武字区，开展“扩红”活动。6月13日，黄子文回到武字区。在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的动员下，短短三天时间，武字区就有近百名青年报名参加陕甘游击队。随后，这些报名参军的青年由黄子文率领，前往陕甘边境地区。

6月下旬，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主力部队经马栏、刘家店、柴桥子等地，到达甘肃宁县麻子掌。这时，黄子文率近百名新参军的战士也到达麻子掌。由于韩城受挫，陕甘游击队的部分战士情绪低落。刘志丹和高维翰决定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会议在麻子掌村一处烂围墙内召开。当时担任第三支队参谋长的吴岱峰回忆说：“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李杰夫、黄子文、杨重远、杨琪、吴岱峰等十几位游击队主要领导，主要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黄子文提出，要把部队带到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活动，采取‘昼伏夜出’的方法打游击。刘志丹、杨重远等主张把部队带到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活动。因为南梁地区地域辽阔，山大沟深，便于开展游击活动。黄子文不同意刘志丹等的主张，提出‘愿南去者就南去，愿北去者就北去’。会上，刘志丹不愿讲部队分开之事，让我讲话，我讲不同意部队分开行动。而黄子文却坚持非分不可。”^①

在此情况下，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的高维翰支持黄子文的意见，公然提出愿意南下的跟自己走，愿意北上的跟刘志丹走的分裂主张。会后，高维翰、黄子文带领愿意南下的游击队战士另驻一地。陕甘游击队面临分裂的严重局面。

在此紧急关头，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率领骑兵和少年先锋队返回宁县麻子掌。当他听说部队面临分裂的消息后，十分焦急，提议再次开会讨论此事。第二天，在麻子掌以西约10公里的正宁县梁掌堡，陕甘游击队再次召开会议。刘志丹、阎红彦等坚决反对部队分开行动，高维翰和黄子文只得同意这一意见。会议还选举阎红彦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会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

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

会后，陕甘游击队开往正宁县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高维翰返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麻子掌会议与梁掌堡会议期间所发生的关于陕甘游击队“南北分家”问题的争论及其最终解决，其实质就是游击队在何处开辟与建立根据地两种观点的冲突与交锋，这一问题曾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与西北红军的创建史上引起了长期的争论。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指出：“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地区作战失利，部队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这时部队中一度产生了失败情绪，在游击队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李杰夫（游击队政委）、黄子文（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但是，后来‘分家’没有成为事实，没有造成部队分裂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志丹、阎红彦两同志都反对‘分家’，对于纠正这一错误，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②

7月10日，参加西华池起义的170余人到达宁县盘克原，与陕甘游击队会合。7月12日，部队在正宁县湫头原进行改编。其中一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大部分被编为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政委阎润平。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31页。

②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7期。

（四）“秘密队委”与“解决机会主义领导问题”

在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高维翰返回西安后，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李艮前往陕甘边境，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7月23日，李艮到达正宁县南邑。

李艮带着陕西省委关于要求“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绝对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争中的思想”，“改造”和“整顿”部队的指示，来到陕甘游击队。下车伊始，李艮就连续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强调要着重解决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

李艮的做法，引起了游击队广大干部的不满和抵触。李艮为了推行自己的“左”倾盲动主张，竟然违背组织原则，在中共队委会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由他领导的“秘密队委会”，作为陕甘游击队的最高决策机构。

李艮坚持己见，置敌情于不顾，要求在20天内完成湫头原北端的五顷园的土地分配任务，为尽快创造新苏区树立一个“样板”。为此，李艮连续主持召开陕甘游击队干部会议。当时担任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的王世泰回忆说：“五顷园是正宁县湫头原北端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500亩土地。刘志丹、阎红彦等提出当时在那里搞分地活动，建立根据地，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李艮不听正确意见，反给扣上‘逃跑主义’、‘梢山路线’等帽子，加以批判。”^①王世泰回忆说：“李艮坚持己见，一意孤行。他召开各种会议，布置分地任务，我清楚地记得开会时只见李艮一个人在夸夸其谈，总指挥阎红彦常是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低头不语。我们这些党员到群众中宣传、动员分配土地时，遭到群众拒绝。有个老汉对我们说：‘娃呀，分地是好事，可是我们不敢要。白军、民团一来你们就跑，我们要下地，全家性命难保呀。’这些情况我们如实向李艮作了汇报，但他很不以为然，还批评我们不会做群众工作。”^②就在李艮主持游击队连续开会期间，驻山河镇的国民党第四十九旅九十七团趁机进占了从湫头原到寺村原的乡间交通要道，加固了湫头镇民团驻地王郎坡寨子的防

御工事，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陕甘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斗争，五顷原分地运动遂告一段落。

同年 11 月 7 日出版的陕西省委机关刊物《斗争与学习》第 3 期，刊登了李艮（署名愚痴）的文章《五顷园子分配土地的意义与错误》。李艮在文章中总结说：“在五顷园子的分土地中，在我们领导之下执行了富农路线，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③李艮在文章中写道，因为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游击队党的不了解省委路线，不能动员起来，使土地革命还不能普遍的发动起来，只束缚在一两个堡子。这是右倾机会主义。”^④李艮总结五顷园分地中的严重错误，分别是“富农路线”“没有实行雇农苦力的优先权”“侵犯中农利益”“不实行红军的优先权”等。应该指出，尽管李艮在五顷园分地运动中犯有“急躁”的错误，甚至在离开陕甘游击队后，仍坚持认为这次分地运动“给了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迎头痛击”，^⑤但是，作为一名对党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仍然郑重提出：“这一经验希望全党同志研究”^⑥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03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03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02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02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04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04 页。

（五）三嘉原反“围剿”斗争失利

1932 年 5 月 7 日，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任命杨子恒为陇东绥靖司令，以加强对陇东地区的统治。杨子恒上任后，加强了对陇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围剿”陕甘边境地区的游

击队。到8月上旬，杨子恒已完成了对陕甘游击队“围剿”的兵力部署。在此形势下，陕甘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斗争。从8月中旬开始，李艮命令游击队以“进攻战略”打破敌人的进攻，并以湫头镇民团驻地王朗坡寨子为进攻目标。王朗坡寨子南面连接塬地，东、西、北三面均为沟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内民团70多人。陕甘游击队对王朗坡寨子发起强攻后，李艮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游击队强攻一天，伤亡50多人，寨子终未攻克，只得撤出战斗。

王朗坡寨子战斗失利后，在李艮的指挥下，陕甘游击队又坚持死守五顷原。这次战斗，游击队又以伤亡30多人的惨痛代价而失利。游击队被迫退出五顷园，转移到三嘉原的秦曲、狼牙爪、前马塬一带。

陕甘游击队到达三嘉原后未及休整，国民党“围剿”部队又向游击队驻地扑来。游击队迅速组织突围。突围中，部队再次遭受很大的伤亡。当陕甘游击队撤退到旬邑马栏时，全队只剩下200多人。

陕甘游击队在王郎坡、五顷原、三嘉原三战皆败，引起了广大指战员对李艮指挥才能的质疑。8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马栏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指挥上的错误。会后，李艮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

就在陕甘游击队与“围剿”之敌展开激战期间，中共陕西省委于8月16日做出决议，批评陕甘游击队原政委、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在游击队工作期间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撤销高维翰的省委常委、军委书记职务，调往渭北根据地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在对李艮进行严厉批评后，派他前往甘肃平凉，领导兵运工作。8月30日，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返回陕甘游击队，接替阎红彦担任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从193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期间的斗争，在西北红军创建史上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当时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的阎红彦在《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活动》一文中写道：“由于当时游击队的政委李艮，执行了一套‘左’倾冒险的路线，批评我们‘游击习气’、

‘上山路线’、‘逃跑主义’。他主张坚守只有几户人家的五顷原子，要游击队开到敌人城市周围、交通要道去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打掉附近敌人的坚固据点，还限令要在 20 天内分完土地。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左’倾路线，使我们连续打了两三个大败仗，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不得不分散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进行活动。”^①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71 页。

第三节 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一、贯彻中共中央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

（一）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

1932 年 3 月 21 日，中共陕西省委就陕甘游击队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报送书面报告，认为“红军游击队连续不断的胜利，政治影响非常迅速地深入到农民、士兵群众中去，大大提高了农民、士兵的决心与勇气”^①。提出：“准备成立正式红军，怎样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②同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再次向中共中央书面汇报工作，提出陕西省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斗争，开发游击战争及部分革命兵变，建立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以旬邑、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苏维埃区域。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陕西省委关于创建正规红军的建议，并要求“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即刻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红军行动；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即刻开始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③。《决议》要求：“立即开始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指定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实现中央制定的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政

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各种条例。”“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④《决议》明确指示：“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⑤

为将游击队的活动区域“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⑥，《决议》要求在这些区域内“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彻底地摧毁当地的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应该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解除边区的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组织农民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⑦《决议》同时指出：“红军目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立较大的根据地。”^⑧

《决议》要求：“陕西省委及陕西党的组织，必须十倍地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坚决地实现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在光荣与勇敢的斗争中，创造成新的广大的强固的陕甘边苏区与英勇的红二十六军！”^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于6月1日做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决议》“认为中央关于陕西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完全正确”。同时“认为编制一师现在还是不可能的，‘在将来军事的进展’与群众武装斗争的开展当中必定是能够实现的”。现在“应当成立红军一团（据红军编制法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每连可编枪七八十支）并努力在最短期间编成红军一师，该部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⑩。《决议》还提出：“目前的根据地应当是陕甘边区（三原、南梁、职田、镇原），必须积极的向山河北原处发展，肃清那个区域内一切反动势力，在最短期间使那里也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⑪

6月10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杜衡代表陕西省委出席了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杜衡在报告中汇报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认为“省委过去对中央的报告是不实际的，使中央对游击队没有实际的了解，马上成立红军二十六军编制一师，是不可能的。但立刻建立正式红军，完成以上任务是最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目前严重任务。所以决定游击队中成份好的、党员、团员集中起来，成立红军一团，把好的枪枝都集中到红军中来，其余编成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番号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独立团”。^⑫

6月26日，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共临时中央做出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要武装，要土地（如陕甘边、南满等处），要政权，已成为目前北方群众斗争的特征。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生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地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配合全国苏维埃运动，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⑬《决议》明确提出：“在北方革命运动烈火般的发展中，在开展游击战争领导义勇军运动，创造新的苏区，以争取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中，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是“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⑭

在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举行期间，中共陕西省委于6月18日在西安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战线斗争彻底改造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认为群众革命运动急剧高涨，省委领导跟不上形势，工作中存在右倾机会主义。《决议草案》提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改造陕西全党首先是改造省委召集扩大会，所以省委成立这一关于两条战线斗争的决议，把这一决议寄中央要求中央派人来领导陕西工作，最低限度派人参加扩大会议，帮助陕西党解决这问题，并责成各级党部根据这一决议站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上检查省委的错误和自己的错误，作成决议。”^⑮

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指出：“根据北方会议及你们最近的决议，中央认为对于你们的工作，有特别指示的必

要。”^{①⑥}要求陕西省委坚决执行“巩固陕甘边根据地创造新苏区”“创造产业支部开展工人斗争”“肃清富农路线，开展农民斗争”“肃清长官路线，保障士兵工作的发展”“扩大并深入反帝斗争”等基本任务，“立刻成立红军一团，进行广大的征收红军战士运动，要动员工人、雇农及贫农加入红军，积极改造士兵的成份”^{①⑦}。指示信强调指出：“红军必须开始有计划的游击运动，以旬邑、淳化、邠州^{①⑧}及正宁为中心，扩大游击区域，以与三原、富平为中心的农民斗争相配合。”^{①⑨}关于兵运工作，指示信指出：“省委必须清楚的认识，在士兵工作中的长官路线是陕西党严重的错误，他不仅障碍了士兵斗争，而且断送了几次三番的兵变……在士兵运动中，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打击这种官长路线的倾向，要严密保存我们组织的秘密，绝对排除与官长的勾结，禁止横的与不必要的关系。”^{②⑩}指示信要求：“积极的去组织兵变与领导自发的斗争，以与游击队相配合。省委必须严重的注意瓦解敌人的部队与组织革命的兵变，是冲破敌人围剿与发展新的游击区与苏区之一一个主要力量。”^{②⑪}

中共中央在指示信中还指出：“关于甘肃回民中的工作，中央要唤起省委同志的严重注意，陕西省委现在就应该担任创造甘肃省委的工作。过去把甘肃的工作限制在士兵中的倾向，中央认为是错误的。”^{②⑫}指示信还做出决定：“中央同意○○^{②⑬}同志为陕甘边游击队的主要负责者。省委书记中央决定○○^{②⑭}同志，○同志在几天之后即可出发前来。”^{②⑮}

8月中旬，孟用潜来到陕西，就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孟用潜传达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方六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8月1日给陕西省委发出的指示信。会议做出《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要求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富农路线，特别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编成红军一个团，并在最近实现编制一个师的任务。会议

还决定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并派干部去陕南开展工作，配合陕南农民斗争，建立川陕边苏区。

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议和 8 月 1 日发出的指示信，以及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决议和指示信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与影响，要求陕西省委“坚决的执行中央路线，反对一切‘左’右摇摆的机会主义，特别集中火力去打击右倾机会主义”^⑥从而使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革命斗争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46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46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63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63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63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64 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64 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65 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66 页。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70 页。

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77 页。

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00 页。

⑬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03 页。

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04 页。

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76 页。

⑯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79 页。

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1 页。

⑱今彬县。

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2 页。

⑳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2—83 页。

㉑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3 页。

㉒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4 页。

㉓即杜衡。

㉔即孟坚，又名孟用潜。

㉕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4 页。

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1 页。

（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

1932 年 8 月 30 日，谢子长被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回到部队后，首先整顿了部队，以稳定军心。陕甘游击队保留了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中共陕北特委和三原、旬邑党组织又动员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加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马栏进行短暂休整后，挥师东进，前往耀县照金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国民党陕西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一直视陕甘游击队为心腹之患。9 月初，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再次调集部队向陕甘游击队发起“进剿”。其具体部署是：陇东绥靖司令杨子恒所部第四十九旅九十

七团（团长晁广顺）和九十八团（团长王劲哉）从甘肃正宁、宁县一线自西向东进攻；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第二五六旅五一一团从同官由东向西推进；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和陕西省保安第一游击队支队何全升部由彬县、旬邑向东北方向进攻，富平、同官、耀县民团从耀县向西进攻，企图将陕甘游击队聚歼于耀县照金一带。

9月11日拂晓，陕甘游击队进至照金以南约2.5公里的杨柳坪村。这时，谢子长、刘志丹等获悉向西进攻的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即将进犯照金，遂当即立断，主动撤离杨柳坪，向后山一带转移，以诱敌深入，寻找机会，予以歼灭。

当天傍晚，三县民团进抵照金、杨柳坪一带扑空，以为游击队已闻风“溃逃”，遂在照金附近的坟滩、柿坪一带宿营。

当天晚间，陕甘游击队派出武装侦察的突击队员20余人隐蔽进入照金后，未见敌踪，遂向照金以北的坟滩一带侦察前进。当突击队接近坟滩时，宿营的民团正在集合，突击队立即向敌发起进攻。陕甘游击队主力部队听到枪声后，迅速兵分三路，向坟滩、柿坪一带进攻。面对游击队的突然进攻，三县民团手忙脚乱，仓促应战，向游击队发起多次反扑，均被击退。三县民团大部被歼。余部分两路沿石川河和清水河河谷逃窜，也被游击队歼灭。

在坟滩、柿坪战斗中，陕甘游击队共歼敌400余人，缴枪300多支，民团首领党谢芳、蔡子发等7人被擒。战斗结束后，谢子长、刘志丹命令部队严加看管被俘获的党谢芳等人，准备将他们作为人质来换取武器弹药。但由于战斗频繁，这一计划未能实现。陕甘游击队转移到陕甘交界处的艾蒿店后，将党谢芳等人处决。

在坟滩、柿坪战斗中，陕甘游击队不仅没有任何伤亡，而且战果辉煌。这一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战斗结束后，陕甘游击队向西转移。当进至淳化县安子洼时，游击队遭到何全升部队的袭击。激战一天，敌我双方均有很大伤亡。陕甘游击队遂撤出战斗。当部队北上至正宁县刘家店子时，又遭到甘军警备旅第七十八团

的袭击。陕甘游击队奋力抗击，交叉掩护撤退。当部队进入旬邑县马栏一带时，才甩掉了尾追之敌。随后，陕甘游击队北上到达南梁、东华池一带。

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获悉保安县城只有一个连的守军，遂决定奔袭保安城。游击队日夜兼程100多公里，来到保安县城西南的瓦子川石峁湾，计划第二天晚上夜行军进至保安，第二天拂晓向保安城发起袭击。王世泰回忆说：“因向导迷路，部队到达保安城东山时天已大亮，原作战计划被打破，战斗由偷袭变成了强攻。战斗中又发现原情报有误，敌人兵力不是一个连而是三个连，致使我军攻击失利，伤亡较大。”^①

在攻打保安城战斗中，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高山保不幸牺牲，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和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等指战员负伤。战斗失利后，谢子长、刘志丹等被迫撤回陇东。途经富县和保安交界处的墩梁，以及富县张家湾八卦寺时，陕甘游击队又先后遭到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张子英团和高雨亭营的袭击，部队再次遭到损失。

随后，陕甘游击队回到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这时，部队已减员到200多人，元气大伤。为了迅速恢复部队元气，度过即将到来的严冬，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相机消灭小股敌人，设法筹款解决过冬困难。王世泰回忆说：“会后，刘志丹带70余人到合水、庆阳一带活动；杨森带五六十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谢子长带30余名战士掩护、照料30多名伤病员，在平定川山中休养治疗；阎红彦、杨重远率骑兵队进入照金地区，准备设法与省委联系，但他们没有和省委联系上，后来于10月中旬，在耀县老爷岭搞到一大批大烟土，解决了游击队过冬的问题。”^②

经过两个多月的分散活动，12月初，陕甘游击队的四路人马会合于合水县的黑木原。随后，部队挥师南下，进入耀县一带。

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到达陕甘游击队驻地耀县衣食村，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天，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宜君杨家店子^③。12月20日，杜衡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以及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陕甘游击队主要领导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布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给阎红彦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杜衡的无理指责和独断专行引起了陕甘游击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王世泰回忆说：“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在峥嵘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对党决无二心。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偷偷地找志丹、子长诉说。志丹、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④

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杜衡被迫同意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而谢子长、阎红彦两人，则被强制离开部队，前往上海中央局“受训”。

12月22日，杜衡分别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红二团团团长。经两次大会推选，王世泰担任红二团团团长。

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改编授旗仪式在宜君县转角镇^⑤隆重举行。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团参谋长，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长，刘约三任团经理处长，杨琪任团管理处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史克寿任共青团团委书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骑兵连连长曹胜荣，相导员张秀山；步兵连连长李亚夫，指导员李秉荣；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指导员魏武。红二团合计200余人，枪支弹药齐备。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建立正式红军的开端，也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06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06 页。306 页。

③今属旬邑县。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08 页。

⑤今属旬邑县。

二、创建红二十六军期间的武装起义

从 1932 年 4 月至 10 月，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红二十六军的同时，还先后在陕甘边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里发动了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岷口起义和蒿店起义等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工作。

（一）两当起义

1932 年 4 月 1 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刘林圃和习仲勋等在甘肃省两当县城领导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官兵发动起义，史称“两当起义”。

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中的中共营委会，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于 1931 年春建立的。中共营委会下辖第一、二、三连和机枪连四个党支部。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营委会书记。1931 年冬，在部队驻防陕西凤翔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曾派高维翰到部队秘密巡视工作。高维翰当时极力主张迅速发动起义，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实行。

两当起义发动时，习仲勋任该营中共营委会书记，公开职务是该营二连特务长。关于两当起义发动的情况，习仲勋在 1956 年 11 月回忆说：“我们这个营原驻在陕西省凤县双石铺、杨家店子一带。1932

年春，奉命移防甘肃徽县（团部在徽县）。原计划到徽县后起义，行至两当，因为士兵革命情绪十分高涨，遂于当晚 12 时举行兵变。打死三个反动连长，营长王德修越墙逃跑。除机枪连一部分士兵和武器未及时带走外，其余都掌握在我们手中。”^①

当时担任该营一连排长的中共党员吕剑人在 1981 年 5 月所写《我所知道的两当兵变》一文中回忆说：“1932 年初，营党委派刘书林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认为兵变条件已基本成熟。省委又派刘林圃到凤县传达省委指示，决定利用一营由凤县调往徽（县）、成（县）的时机，在部队开往徽县路经两当县宿营时举行兵变。”^②

两当起义发动后，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政治委员，习仲勋任支队委员会书记兼二连副连长，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由许天洁兼任。全支队共 200 余人。起义部队连夜北上，准备前往旬邑，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北上途中，起义部队屡遭当地反动民团伏击，伤亡较大。在行进到麟游岳御寺^③时，起义部队遭当地土匪头子王结子所部阻击，队伍被打散。此后，习仲勋前往旬邑寻找刘志丹。刘林圃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起义的经过。^④起义部队被打散后，吕剑人和许天洁先后被捕。吕剑人被判处 10 年徒刑，在西安事变前假释出狱。许天洁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出狱。

两当起义是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回师陕西后，中国共产党在这支部队中最早组织发动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震撼了国民党陕西和甘肃地方当局以及第十七路军。习仲勋后来总结说：“两当兵暴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是：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在紧急关头其破坏作用很

大；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⑤

尽管两当起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却为中共陕西组织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积累了经验，也培养了领导骨干。

①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索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59页。

②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索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61—162页。

③今属永寿县。

④同年9月26日，因叛徒出卖，刘林圃在西安习武园英勇就义。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45—246页。

（二）靖远起义

两当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又于1932年5月，在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中发动了一次起义，即靖远起义。

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是以甘肃地方军阀苏雨生部王子元团为基础组建的。王子元任旅长，共产党员张东皎任副旅长。早在1929年，张东皎就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安排进入王子元团从事兵运工作。该旅的参谋主任孙作宾、副官主任李罕言、军法主任王儒林、教导队队长苏士杰（苏醒民）、执法队队长石子健、第二团团团长牛化东和第一团一营营长吕振华等均为共产党员。1932年初，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该旅中先后建立了一批党的秘密组织。其中，中共校官支部由李罕言任书记，孙作宾为委员；中共士兵（含尉官）支部，书记石子健；该旅教导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张东皎，副书记苏士杰；该旅第二团中的中共团委员会，书记张东皎，副书记牛化东。

1932年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在旬邑马家堡陕甘游击队驻地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会后，谢子长根据陕西省委的安排，前往靖远从事兵运工作。4月28日，谢子长来

到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的驻地靖远。与谢子长一同到达靖远的还有陕西省委委员、曾任省委秘书长的焦维炽。

谢子长和焦维炽到达靖远后，对第三旅第二团的中共团委会进行了改组，焦维炽任书记，委员张秀山、石子健、苏士杰、高尊德。当时任第二团一营一连排长的张秀山后来回忆说：“团委在开会时，谢、焦传达了省委马上发动起义的指示。张东皎在会上发言时，检讨了自己是机会主义，没有马上发动兵变的思想准备，总以条件还不成熟，想等到将来力量大了再打红旗，没有估计到现在发动兵变的重要性。子长立即向东皎解释说，这不能说是机会主义，是省委过去没有指示。接着子长向大家解释了这次组织起义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靖远、海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也是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在会上还详细讨论了起义计划。当时有过几个方案：有同志提出利用教导队开毕业典礼时扣留王子元，缴警卫连的枪。有的说，如果王子元不来教导队，就打王子元公馆（王的护兵多）和警卫连，把警三旅大部分带走。但这些行动计划都没有定下来，具体的行动时间也没有确定。”^①

正当起义积极筹备之际，5月4日，王子元突然扣押了张东皎和二团一营营长兼军法主任王儒林。由于情况紧急，一团一营营长吕振华于5月5日傍晚率领该营和教导队各一部共200余人在靖远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到达打拉池后，按原计划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焦维炽分别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由于谢子长、焦维炽与部队失去联系，遂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曹炳奎，第二大队大队长张秀山。

起义部队行进到郎山台子附近时，被王子元派来的追兵打散，张秀山被俘。孙作宾利用张秀山曾救过王子元的关系，对王子元晓以“义气”，张秀山得以释放，离开靖远。

在此之后，经过中共组织的多方营救，张东皎、王儒林相继被释放，来到兰州。5月30日，谢子长、张东皎利用王子元派机枪连连长杜鸿范带兵来兰州领军械的机会，将部队拉出来，在靖远水泉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旗号，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参谋长杜润滋。游击队下设三个支队，杜鸿范、张东皎、王儒林分任三个支队司令。部队在水泉堡打死了王子元派来追击的第三团一营营长周维邦。战斗中，张东皎不幸牺牲。

1932年6月，起义部队合编为一个支队，称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司令王儒林，政委杜润滋，在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等县边界地区打游击。到7月，部队已由20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遂决定分设第四支队，由孙作宾任司令兼政委。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各辖三个大队。此后不久，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在集中训练时遭到驻靖远的王云山部的偷袭。部队与之激战后，乘雨夜突围而出。突围途中，又遭到驻宁夏的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的追袭，部队被打散后分散隐蔽。

靖远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和焦维炽返回陕西。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谢子长重新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焦维炽则化名赵仪三以陕西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于7月下旬前往蒲城、澄城、韩城一带组织武装起义。8月初，焦维炽在蒲城县的晋王、永丰等地分别召开党员会议，决定利用党团员在当地民团中供职的有利条件发动起义。8月6日，在焦维炽领导下，永丰民团首先起义。由于联络失误，晋王起义未能同时发动。在当地民团的围攻下，起义失败。焦维炽被俘后，于8月9日晚惨遭杀害。

①《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16—217页。

（三）西华池起义

靖远起义失败后，谢子长指派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杨林等前往庆阳，与在国民党第十一旅活动的共产党员李树林、高鹏飞取得联系，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还分别给李树林、高鹏飞写了一封密信。杨林与郝维新到达该旅第一团驻地合水县城后，担任连长的李树林认为在该连发动兵变条件尚不成熟。随后，杨林等又前往西华池，与担任第十一旅特务营第一连连长的高鹏飞取得联系，并与先期到达该连的苏杰儒、高照璧会合。

第十一旅特务营营长曹又参，是一位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正直军人，当时驻防庆阳城内。该营副营长潘某则率第一连和第二连驻西华池镇。这时，该营已成立了中共支部，支部书记由高鹏飞担任。杨林在《西华池兵变》一文中回忆说：“高鹏飞的第一连班长以上和连部的勤务员多数是共产党员。高鹏飞平时很注意给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士兵们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和对共产党红军的革命主张有一定认识，这些都为兵暴的成功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有利条件。我们和高鹏飞研究了形势，分析了敌我力量，认为依靠第一连，就可控制局势，夺取兵暴的胜利。”^①随后，高鹏飞指派担任班长的宋廷璧前往宁县盘克原与陕甘游击队联系。杨林回忆说：“三天后宋廷璧回来，带来了刘志丹和阎红彦的回信和一批宣传材料。信上说：‘欢迎举行兵暴，三天内红军不离开盘克原，准备接应兵暴部队；如果条件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暴露力量而遭不幸。’宋廷璧还口述了刘志丹的嘱咐：一定要谨慎行事，周密部署，保证万无一失。于是高鹏飞迅速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高鹏飞、二排长曹胜荣、司务长（记不起名字了）、苏杰儒和我，共五人。会上，高鹏飞阐述了举行兵暴的意义，讨论了行动计划，研究了支委分工，决定了兵暴日期等。”^②

7月9日下午，西华池起义正式发动。高鹏飞等乘第二连出操之际，命令曹胜荣等率领第一连将第二连包围缴械，并扣押了副营长潘某。随后，高鹏飞集合部队讲话，讲明了起义的目的，投奔红军的意义，同时宣布了起义部队的纪律。杨林回忆说：“高鹏飞热情奔放、

慷慨激昂的讲话，得到官兵一致拥护，大家热烈鼓掌。原来一些不明真相的士兵，顿时打消了疑虑，个个喜形于色，拍手称快。”^③

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立即组织人员上街张贴标语，撒传单。西华池镇的街道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官僚”“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高利贷”“反对派粮摊款”“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差拉夫”“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三八制”“实行普及教育”“提高女权、男女平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

当天晚上，起义部队在焚烧了所有的文件、印信、旗帜后，开始连夜行军，奔赴宁县盘克原。

7月10日，起义部队与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在盘克原会合。7月12日，起义部队在正宁县湫头原进行改编，其中一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大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第三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原第三大队全部被编为第一中队，路文昌任中队长；西华池起义部队分别被编为第二中队和第三中队，曹胜荣任第二中队中队长，金天华、杨林、姬振元先后任第三中队中队长。此后，高鹏飞、杨林被确定为陕甘游击队中共队委会委员。

西华池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界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由于时机把握得当，加上陕甘游击队的密切配合，起义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一胜利，不仅鼓舞了陕甘边地区人民的斗志，也为陕甘游击队增加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3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3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4—525页。

（四）岷口起义

西华池起义之后，中共组织又于 1932 年 7 月在甘肃省定西县巉口一带，组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第二团一营士兵发动了起义。

1932 年初，在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驻防甘肃定西期间，该团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支部委员会，书记贺修之，党员有骑兵连长杨嘉瑞、三营营附刘敬业、团部军需梁明汉、一营营长赵丕烈和均为三营排长的卢松轩、刘廉君、赵鸿福等。党支部还将担任连长的马济人、担任排长的石庆德、担任军医官的卢济民等同情革命者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为发动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同年 7 月，该团党支部利用团长黄展云和一营营长何冠武的矛盾，在定西县巉口发动一营士兵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在途经会宁城南时改编为一个团，团长马济人，副团长卢济民，下编两个营，一营营长石庆德，二营营长赵丕烈。部队继续北上途中，得知靖远起义失败的消息，遂改向陕西旬邑一带前进，准备与陕甘游击队会师。部队改称人民革命军，马济人任司令员，卢济民任副司令员，两个营改称两个支队，仍由石庆德、赵丕烈任支队长。此后，部队在静宁以南山区与国民党军周旋，进行游击作战，历时两个多月。9 月初，起义部队在清水县关山遭到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尽管几经冲杀，大部分战士仍未能冲出重围。战斗中，马济人、石庆德下落不明，赵丕烈等脱险突围。巉口起义至此失败。巉口起义部队在定西、靖远、会宁、静宁、清水五个县游击作战三个月，扩大了影响，也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武装。

（五）蒿店起义

1932 年 10 月 25 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决议》要求把革命兵变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为统一指挥陇东、陇南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组织，陕西省委决定组建中共陇东军特委，书

记刘杰三，委员王杰、樊世荣。在此之前，原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良奉命前往平凉，指导陇东兵运工作。中共陇东军特委成立后，即领导发动了蒿店起义。

蒿店起义的参与者是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补习队分为军官队和军士队两个队。当年9月18日，南京政府给时任甘肃行署主任的邓宝珊运来五六百支枪及弹药。邓宝珊指派干部补习队前往平凉接收。当时，干部补习队军士队中有共产党员11人（其中担任队长、分队长及班长者9人，担任军士者2人）。一些共产党员认为时机已到，准备发动兵变。他们的计划得到了李良的批准。

10月28日夜，军士队在平凉蒿店发动起义，共拉出34人。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由军士队队长李华峰任队长，李良为政治委员。在部队转移途中，一部分起义人员离开队伍，一部分被打散，蒿店起义失败。

蒿店起义失败后，李良于1932年12月9日向中共陕西省委呈送了《蒿店兵变的报告》，对蒿店起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在陕西省委组织部编辑的内部刊物《斗争与学习》（1932年第9期）上发表了题为《平凉蒿店干部补习队军士队兵变的经过及教训》一文，也对这次兵变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文章最后写道：“一切血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告诉我们，兵变不是几个英雄的官长能搞成功的，他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积极性，和党坚定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正确领导。”^①

蒿店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安排，李良于同年冬前往陕南开展武装斗争。

^①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70页。

第四节 开辟照金新苏区

一、首战焦坪与南下香山

1932年12月26日，刚刚成立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按预定部署，奔袭宜君县焦坪。焦坪战斗共歼灭当地民团60余人，缴枪60余支。红二团占领焦坪后，在当天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没收分配了当地几家豪绅的粮食。第二天拂晓，红二团撤离焦坪，向耀县照金一带进发。

照金地区位于耀县西北50多公里处，地处桥山山脉南端，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西接陕甘边界地区。这里沟壑纵横，丘陵起伏，中心地带薛家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一带土地多为几家大地主霸占，无地农民多达60%。红二团成立之前，这里曾是陕甘游击队的主要游击区。此外，由于连年灾荒，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逃荒饥民也大量进入这一带，生活困苦不堪，因而强烈要求改变困境，曾多次发生群众自发的斗争。因此，照金地区有着很好的实行红色武装割据的群众基础。

1933年1月初，红二团经耀县衣食村到达照金东北部笔架山上的香山寺一带。香山寺始建于唐代中期，以后历代均有修葺和扩建。香山寺建筑宏伟，寺内香火旺盛，是陕甘边界地区的一处著名古迹。寺内拥有庙田10余万亩，贮藏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寺中有和尚千余名和数十名尼姑。当时担任红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回忆说：“时值灾年，四方逃难饥民近万人，流落此地，嗷嗷待哺，见红军路过，同声呼救。红军指战员，面对这一惨景，无不心焦如焚。基于救灾于水火之中，经团党委研究，决意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①

红二团将香山寺贮藏的二三千石粮食分配给了饥民和当地民众，随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叹息的决定——火烧香山寺。关于决定火烧香山寺的经过。王世泰回忆说：“红军进入香山寺后，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照金只有30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②对于火烧香山寺，王世泰惋惜和愧疚地写道：“火烧千年古刹，从军

事角度讲，虽说对巩固根据地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保护祖国的文物古迹来说，却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③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11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11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12 页。

二、庙湾战斗失利与扫清照金外围

1933 年 1 月中旬，红二团组织部署了进攻耀县庙湾夏老么（夏玉山）民团的战斗。关于这次战斗，王世泰回忆说：“在根据地逐渐发展的有利形势下，杜衡头脑开始发热，又把他那一套‘左’倾盲动理论搬出来，大讲利用大好形势，打大仗，创造红军的战绩，加快建立根据地的步子，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极力主张红二团攻打庙湾民团。志丹和杨重远等同志，主张暂时不打庙湾，并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庙湾是夏老么的指挥总部，团丁多是惯匪、地痞出身的亡命之徒，占据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碉堡，目前我们无力吃掉他；二是，夏老么过去和我们有过来往，与游击队保持着互不侵犯、互通敌情的关系，曾给我们卖过物资和弹药。如果硬打，势必破坏这种统战关系，给红军活动带来困难，给根据地老百姓带来危害。”^①王世泰回忆说：“这些，杜衡根本听不进去，凭借军政委的权力，强行下令攻打庙湾。我们虽然反对这次行动，但作为指挥员又不能不执行命令。为了争取把仗打好，部队少受损失，志丹和我们制定出作战计划，由志丹、杜衡、郑毅带领主力走捷路，拂晓发动突然袭击，我带骑兵连绕道走庙湾下川隐蔽起来，堵截逃跑敌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②

1 月 17 日晚，根据作战部署，红二团分两路行动。由于战前对山路距离和步兵行军速度估计有误，步兵未能按计划于 18 日拂晓赶到庙湾后山，而骑兵却按预定部署进入阵地。王世泰回忆说：“时至

早 8 点左右，战斗还未打响，显然偷袭已失掉机会。突然一声清脆枪声（可能是敌人走火），划破了清晨的寂静，骑兵连误认为我军已与敌接火，立即发起攻击。”^③原定的偷袭变为强攻，加之部队缺乏火炮，难以拔除民团固守的碉堡，指战员们虽然英勇作战，但强攻终难奏效，致使部队受到很大伤亡。骑兵连连长曹胜荣壮烈牺牲，骑兵连指导员张秀山身负重伤，一些班、排长和战士也不幸牺牲。

当天下午，红二团参谋长郑毅又组织突击队，反复冲锋四五次，结果均未成功，到下午 4 时，红二团被迫撤出战斗。

红二团撤至石门关一带宿营时，又遭到夏老么民团的偷袭。骑兵连仓促应战，战马损失二三十匹。战后，新任骑兵连连长强世清引咎请辞。团领导再三劝阻无效，只得同意强世清返回其家乡安定县打游击。骑兵连连长由杨琪接任。

庙湾战斗的失利，使红二团遭受重创。杜衡为推卸责任，将团参谋长郑毅撤职，并任命刘志丹为团参谋长。郑毅被降职担任步兵第一连连长，团参谋处长杨重远代理骑兵连指导员，以接替身负重伤的张秀山。杜衡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了庙湾战斗失利的情况，并表示自己不懂军事，不胜任政委职务，要求省委派得力干部来接替工作。

得到红二团庙湾战斗失利的消息，中共陕西省委于 1 月 28 日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了有关情况。

2 月 3 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发出指示信，指出：“在今天红二十六军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还不具有根据地坚大强固能与南方红军所能比拟的。因此他还不能与敌人作对垒战，主要的应当采用游击战术。红二十六军生长成为正式的有力的队伍，还需要一个过程，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广泛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④指示信指出：“省委认为红二十六军今天还不应当用‘撑架子’的办法，勉强按红军条例编制，也不是编成一个大游击队。”^⑤“省委的意见，红二十六军今天应当配合当地群众，编成许多小的游击支队，这种小支队人少的缺点是可以神速的动作，突然的袭击，诡计等等方

法来补救的。”^①指示信还特别指出：“我们这里的意见绝不是取消红二十六军（二十六军的名义固然要保持），相反的，这正是在积极开展游击运动中来巩固和扩大红二十六军。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极广泛地开展当地群众的斗争，摧毁乡村中反动政权，创造许多新的苏区，粉碎敌人对我们‘围剿’。”^②

杜衡接到指示信后，认为省委的指示违背了1932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遂于3月上旬前往西安，以“部队代表”的身份向省委提出反对意见，并“提议”改组省委。

3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会议承认省委2月3日发出的指示信犯了取消主义错误，并对省委进行了改组，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小章）任改组后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孟用潜改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杜衡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会议决定汪锋任红二十六军代政委。

在中共陕西省委向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发出指示信前后，红二团活动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一带。红二团还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组建了耀县的香山、芋园、照金和旬邑、宜君等地方游击队。2月上旬，红二团北上甘肃正宁，在三嘉原、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红二团还在湫头石炭沟口设伏，全歼了赵世坤为首的王郎坡寨子民团。3月初，红二团返回照金。随后，红二团又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在这次战斗中，曾担任红二团参谋长的郑毅不幸牺牲。4月间，红二团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4月27日全歼了驻侯家堡的国民党军骑兵排。

4月间，红二团还先后奇袭了泾惠渠吊儿嘴民团据点、淳化县南村堡民团据点和彬县龙马、高村民团。经过这些战斗，红二团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扫清了照金外围，为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12—313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13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13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69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0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0 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0 页。

三、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为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不断加强部队的整顿改造，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确保部队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1933 年 1 月 4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巩固党的领导是红二十六军的一切工作的前提。”^①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建军原则，红二十六军坚持将“支部设在连上”，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团建立了党的委员会。

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紧张的战斗之余，开始进行正规红军的教育和训练，以提高部队指战员的军政素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参谋长郑毅在 1933 年 1 月 9 日写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汇报说：部队“每日两操，两讲堂，□会自习训练八小时，但行军作战时则停止，并成立军事政治速成训练班（两星期），实行上课”^②。郑毅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出：“关于训练的材料（军事的与政治的）与教授人材，非常缺乏，这是要请你们火速派人来和送教育材料来的。”^③

早在红二团成立前，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就几次指示陕甘游击队，在部队中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以及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各级干部。为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组建不久，即于 1933 年 1

月开办了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由高维翰任校长。从同年4月起，汪锋任随营学校政委。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先后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使红二十六军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为了迅速扩充红二十六军的力量，以达到在较短的时期内组建红军一个师的目标，中共陕西省委于1933年1月10日发出《为号召三千人到红二十六军去告渭北工农劳苦民众书》，“号召渭北三千劳苦群众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巩固健壮红二十六军。首先是一切觉悟的工人、雇农、苦力群众大批大批的到红二十六军去，加强无产阶级骨干与领导作用，把红二十六军造成真正坚强而有战斗力的工农红军！”^④

经过中共陕西省委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红二团的兵力得到进一步补充。1933年1月，红二团组建了步兵第二连，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44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4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4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6页。

第五节 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一、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成立

1932年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决议》指出：“在苏区及红军游击队中，建立坚固的党的委员会是党的组织上的中心任务。这些党部要能够保证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游击队与红军和各种群众组织工作的领导。省委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边特委，并责成游击队队委与旬邑党部用最大限度的力量去建立这一工作。”^①

同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省委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中提出：“为了加强边区工作，省委认为立刻成立陕甘边特委，旬邑、淳化地方党部由边特去领导。”^②时隔四个多月后，中共陕西省委在1933年1月4日给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边特地方党部问题，省委认为应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水受其直接领导，边特书记省委仍决定由○○同志^③负责，现调来省委，日内即行出发。”^④随后，根据陕西省委的安排，金理科前往耀县照金地区，筹备建立中共陕甘边特委。2月2日，金理科就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区工作情况写出书面报告，报告写道：“建立边区特委问题——我与二十六军特派员李妙斋谈到当地党的组织情形。在过去这里只有六个同志，三个参加游击队，三个因为白色恐怖而逃跑，所以当地根本不能提拔干部。因之，建议马上派干部到边区建立特委。”^⑤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特委书记金理科，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李妙斋、史可寿等为特委委员。习仲勋兼任共青团陕甘边特委书记。同年6月，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后，秦武山接任特委书记，同时，增选张秀山为特委委员。

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发展党组织的指示，逐乡逐村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加入党组织，先后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一个区委，形成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核心。陕甘边特委还负责领导中共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77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19页。

③李奎，即金理科。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44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67页。

二、组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

在抓紧组建陕甘边特委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委也密切关注着陕甘边区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工作。1933年2月7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金天华给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写出书面报告，其中写道：“（陕甘）边区最近正式编制起五个游击队，农联会建立起六个，有二三十万灾民分粮斗争非常的高涨，与敌人的武装斗争扩大起来了。”^①根据这一形势，陕西省委于3月7日向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及第二团党委发出指示信，要求：“红二十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指挥部之下应有一中心部队，作为生长成正式红军的骨干。”^②陕西省委在这封指示信中还决定：“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对敌人‘围剿’做有计划的反攻。”^③

杜衡等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信后，于3月中旬在照金兔儿梁组建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此后，黄子文、吴岱峰先后接任总指挥，张秀山接任政委。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15日发出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指出：“你们现在成立的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省委认为是不适合的，应该取消。你们应立即组织边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统一红军和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的领导。”^④由于3月23日省委进行改组，陕西省委的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贯彻。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组建，使边区游击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加强了边区游击队的领导，并从政治上、组织上对游击队进行了彻底整顿，先后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从而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边区特委的领导下，还大力进行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各区、乡、村普

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肃清敌特、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斗争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发动群众，整修薛家寨的天然岩洞，据险筑堡，先后设立了红军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军需仓库和关押豪绅地主的监狱。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不仅加强了边区军事斗争的力量，也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重新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2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3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73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84 页。

三、重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1932 年 4 月上旬在正宁县寺村原成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陕甘游击队撤离后，由于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随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逐步形成，重新建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为中共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的重要任务。

1933 年 3 月 15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明确要求：“根据照金一带政治经济与群众斗争的条件，二十六军应一分钟都不放松的在最广泛的分粮斗争中，立即组织和发动群众没收豪绅地主、香山寺的土地财产，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中农，彻底摧毁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建立边区革命委员会的临时革命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更广泛的动员群众，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为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的粉碎敌人‘围剿’，争取我们的胜利。”^①指示信要求：“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

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革命委员会须很快宣布全国苏大会^②的一切决议与法令，并努力实现这些法令。他应该根据苏维埃的组织法，来组织村、乡、县以至全边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及党的领导。”^③指示信要求：“在现时条件之下，立刻由农联^④、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必须执行一切政权的任务。”^⑤

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肃反等部门。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守祥任粮食委员，杨在泉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重新成立时，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已扩展到北迄马栏川，南抵爷台山，东至沮河，西至淳化原畔，南北长约40多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的广大地区，人口近60万。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后，还先后领导建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并选举一批有觉悟、有威望的干部担任这些基层政权的领导职务，逐步建立起根据地的革命新秩序。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75—176页。

②指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称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82页。

④即农民联合会。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83页。

第六节 照金苏区的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

一、实行土地革命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32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并强调指出：“在边区首先应当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地开展和深入群众斗争（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巩固与加速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要绝对保证党在这临时政权内的领导。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与号召之下，立即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①

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也对陕甘边区的分配土地斗争进行了部署，要求：“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虑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②指示信还要求：“把香山寺、香山堡、照金、芋园、八九堡一带豪绅地主的土地，立刻没收来分配。”“在分土地中立即实施红军优待条例，以提高赤色战士的战斗情绪。”^③

在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相继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重新组建后，金理科、习仲勋、周冬至、李妙斋等陕甘边区党、政、军负责人分别深入乡村，组织群众，在照金苏区掀起了土地分配热潮。土地分配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政策有序进行。分配原则是按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贫雇农享有优先权，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

在土地分配中，一般采取谁租种哪一块土地，就将这块土地分配给谁的办法，将没收的土地首先分配给应当得到土地的贫苦佃农，在田间插标写牌以确定其地界。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县立学堂和香山寺的

庙产土地共 2000 余亩，金盆乡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李卜客和陈家坡地主梅生玉土地共 5000 余亩。

照金苏区的土地分配运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投身革命的积极性。通过加强政权建设和开展土地分配运动，不仅密切了党和红军、红色政权与广大劳苦群众的关系，也使照金苏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04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82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83 页。

二、开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照金一带地处耀县、宜君、同官、旬邑、淳化五县边界中心，群山横亘，森林茂密，沟壑交错，自古就被称做“境僻地阻”之区。当地群众生活贫穷，加之大量灾民拥入，经济更是十分落后。

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特点，在努力粉碎国民党军队军事“围剿”的同时，还竭尽所能，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稳定并改善人民生活。照金苏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屡遭兵荒和战火洗劫的严峻情况下，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广泛组织群众，发展农业生产，以增加粮食产量。广大贫苦农民由于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

照金苏区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根据地当时建有红军修械所和红军被服厂，修械所最初仅有桂生芳、惠子俊等几名工人，他们来自西安兵工厂，后来发展到拥有 40 多名工人。他们在薛家寨的岩洞里，用近乎原始的土设备修理武器，制造土炸弹、土地雷。他们研制的“麻辫手榴弹”威力很大，后来在保卫薛家寨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服厂的 20 多名女工，都是当地的农村妇女，她们除为红军和游击队制作服装外，还承担了为红军医院浆洗纱布、照顾伤病员和站岗放哨等任务。

为了调剂余缺，促进流通，方便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照金苏区还在薛家寨山下的亭子沟开设了集市，每五天一集。由于红军在交易中公平买卖，上市物品种类日益增多，不仅苏区的群众踊跃赶集，而且游击队和周边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少群众也前去出售物品。集市贸易的活跃，几乎形成天天立市，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五天一集的规定。

照金苏区经济建设尽管规模有限，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也为根据地军民的反“围剿”斗争提供和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照金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开展文化建设的难度极大。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创造性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3 年 1 月开始筹办的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几经周折，于同年 4 月中旬正式开办。3 月 15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要求：“立即开始这一工作，第一期 30 人，成份三分之二是工农，由各地和游击队派送，二十六军选择 10 人，限期 1 月。随营学校不仅训练新干部，而且要成为二十六军的中心力量。学生是武装的，前方战事需要，随营学校即全体参加作战，成为全军的模范。巩固后方，参加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这在转变二十六军中是最迫切的工作。”^①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的创办，为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成为照金苏区军事教育事业的重要标志。

照金苏区还在禁烟、禁赌、提倡妇女放足、反对封建迷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使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照金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工作的开展，不仅活跃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娱

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队伍。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85 页。

第七节 照金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一、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与扩大，引起了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大恐慌。1933 年 4 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动十七路军骑兵团、特务团，陕西省政府警卫团，第八十六师五一一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个县的民团，共 8000 余人，兵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照金苏区的“围剿”，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以寻机歼敌。会议决定由陕甘边党政军领导金理科、李妙斋、习仲勋等领导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会后，红二团向西进入旬邑境内，消灭了一些民团。随后，红二团又挥师北上，来到甘肃宁县盘克原武洛堡。在此，红二团遭到驻守庆阳西峰镇的国民党军两个营和几个地方民团的联合进攻。当时担任红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后来回忆说：“志丹考虑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宜交战，决定主动撤离。撤退时，我带骑兵连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敌人火力很猛，用重机枪封锁我们的退路。战斗中，骑兵连新任连长李光明不幸光荣牺牲，其余同志安全撤退。”^①

红二团离开宁县盘克原后，于 5 月上旬进入陕西中部县西部的上畛子一带。5 月 10 日，红二团在上畛子与强世清、李成荣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一支队将所带的七匹马交给了红二团骑兵连，红二团则为一支队补充了枪械弹药。为了加强一支队的领导力

量，刘志丹派杨重远担任一支队政委，马佩勋担任副支队长，并调李成荣去西安工作。

红一支队返回陕北后，红二团来到宜君金村庙原。在金村庙原，红二团收编了一支 80 多人的兵变队伍。王世泰回忆说：“为改造这支队伍，我们曾派许多干部去做工作。但这股变兵，目无红军纪律，旧意识、旧习惯很严重，不安心当红军，常议论逃跑之事。因此，我们便在一个早上，突然缴了他们的械。80 多个变兵，除少数表示愿意革命的留在部队外，余者按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发放路费，打发回家。”^②

在妥善处理兵变队伍后，红二团又进入甘肃宁县境内开展游击活动，并在段家堡歼灭当地民团数十人。

在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的同时，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地方游击队和群众，坚壁清野，袭扰敌军，不断给来犯之敌以打击。加之担任“围剿”照金苏区军事行动总指挥的王泰吉是中共秘密党员，对“围剿”行动敷衍应付，并虚报战绩，国民党军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遂草草收场。

6 月中旬，红二团在完成外线作战任务后返回照金。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18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19 页。

二、北梁会议与红二团南下失败

在红二团返回照金苏区之际，杜衡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回到照金，重新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

6 月 17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红二团党委在北梁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有杜衡、金理科、李妙斋、黄子文、刘志丹、高维翰、汪锋等人。

北梁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红二十六军如何发展，如何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一）李杰夫提出，红二十六军应向北发展，具体是离开陕甘边，到内蒙古去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二）刘志丹提出，应当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三）杜衡提出，红二团应当南下渭华，在渭华地区建立根据地。他认为那里党团组织力量强，群众觉悟高，又有秦岭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会议围绕这三种意见进行了讨论。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议，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了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由于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采取个人专断的压制手段，北梁会议强行通过了杜衡提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的错误决定。

6月21日，红二团离开照金地区，开始南下。第二天，红二团在三原县心字区二台子与渭北游击队会合。由于南下渭华的决定是在杜衡采用政治高压手段下做出的，所以红二团大多数指挥员思想不通，普通战士更是茫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杜衡只得又在二台子召开红二团与渭北游击队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南下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王世泰、汪锋、高维翰、黄子文和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黄子祥、政委张秀山等。王世泰回忆说：“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①

关于二台子会议，张秀山回忆说：“会上，我和黄子祥提出，红二团不应南下。理由是：红二团留下，可以帮助渭北游击队发展渭北苏区，壮大革命力量。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从路线的高度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预料不到南下会遭惨败，只是直觉地认为红二团留在渭北比南下更有利，更能把陕西的革命形势向前推进。但是，杜衡否定了我们的意见，继续强迫红二团南下，致使二台子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积极成果。”^②

6月23日拂晓，红二团在三原长坳堡配合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袭击了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当天黄昏，因红二团急于执行南下命令，撤出战斗，前往三原寇家庄。在红二团到达寇家庄村外场上休息吃饭后，杜衡突然提出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王世泰回忆说：杜衡“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和我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表示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同志代理红二团政委。

杜衡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县境内”^③。

中共陕西省委得知红二团离开照金南下的消息后，派省委书记袁岳栋从西安急赴三原，准备阻止红二团南下。袁岳栋到达三原后，恰巧碰见只身离队的杜衡，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原政委刘映胜以及黄子文等人召开紧急会议，批评杜衡强令部队南下的错误，并决定派黄子文前往高陵阻止红二团南下。但当黄子文到达高陵时，红二团已于6月24日拂晓渡过渭河。黄子文最后虽然赶上了部队，但红二团已经失败。

6月25日，红二团与奉命追击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然后向东转移。进军途中，红二团又连续四次冲破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层层堵截，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到达蓝田县流峪口。

7月中旬，红二团与陕西警备第三旅及地方民团在蓝田激战竟日，部队伤亡严重。刘志丹、汪锋、王世泰率领余部分路突围，在秦岭山中进行艰苦的斗争。

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休、王兆相、康健民、黄罗斌、杨林、曹士荣、牛钢、王有福、谭生彬、韩志成、王安民、赵清杰、魏武、芮四、赵铁娃、师八牛等20多名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

万险，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先后辗转回到照金苏区。

红二团南下失败，是“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延缓了西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程。

在红二团南下渭华、陷入绝境之际，杜衡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于7月28日在西安被国民党陕西当局逮捕。杜衡和袁岳栋被捕后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地区及甘肃境内的中共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21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88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22页。

三、耀县起义与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成立

在陕甘边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领导发动了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他只身前往河南南召，给一家富户当长工，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王泰吉被国民党当地政府察觉。当地政府派人将其逮捕，押往南京监狱。王泰吉在狱方的刑讯逼供下，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1930年3月，时任国民党军陆军第十七师师长的杨虎城获悉王泰吉被关押在南京的消息后，出面将王泰吉具保出狱，接到河南南阳驻地。杨虎城任命王泰吉为第十七师第一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第十七路军回师陕西后，王泰吉先后任十七路军新兵训练处处长、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1933年4月上旬，率部驻防耀县的王泰吉曾一度被任命为“围剿”照金苏区的“剿共”总司令，指挥部队“围剿”照金苏区。由于红二团跳出包围圈，实行外线作战，寻机歼敌，照金苏区地方游击队

和赤卫军坚壁清野，不断袭扰，加之王泰吉对“围剿”行动敷衍应付，使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此后，王泰吉派人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筹备组织骑兵团起义的行动。中共陕西省委指派曾担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刘映胜等参与领导起义。

刘映胜在 1972 年所写《四十年前见闻录一有关陕西省党组织的一些历史回忆》中记述道：接到陕西省委的指示后，“我带了省委介绍信，由武字区一个农民党员作交通，把我送到耀县。我先找到骑兵团里的党员王英（王泰吉的侄子，这时当班长），他领我去见王泰吉，住在王泰吉的团部里。王泰吉对我说了他起义的全部计划。我就和王泰吉进行准备工作”。^①

7 月 21 日中午 12 时许，王泰吉率领十七路军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起义后，王泰吉宣布将骑兵团组编为第三路，由他兼任第三路总指挥。第三路下设五个大队（其中一个为特务大队），共 1200 余人。每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下设四个小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子明，第二大队大队长任建民，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第四大队大队长董崇道（后由周德民任大队长），特务大队大队长谈国帆。

王泰吉起义后，对外发表了通电，并张贴布告、标语，进行宣传。起义部队收缴了驻耀县的三县（耀县、富平、三原）民团总指挥胡景铨所部的全部枪支和两门迫击炮，并收缴了耀县民团团总雷天一所部的枪支。由于雷天一信誓旦旦，向王泰吉表示自己愿意参加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遂将枪支发还雷天一，并将该部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雷天一以率部到耀县城外防守为名，开出耀县城。义勇军从耀县开拔时，雷天一没有跟随，仍任耀县民团团总。王泰吉还拟以第三路所属的特务大队为基础，组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但终未完成组建工作。

当天，起义部队扣押了耀县县长沈育成，收缴了县政府和警察局的全部枪支，控制了县城全境。起义部队根据中共耀县县委提供的名单，逮捕了耀县城内的一些大豪绅、大地主，勒令他们交出现款，作为义勇军军需，并没收了这些豪绅的财物、粮食，分发给贫农群众。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城内驻扎了七天。7月28日，王泰吉率起义部队离开耀县，经三原向淳化转移。7月30日，起义部队在三原县桥头镇辘轳把村与奉命前来“追剿”起义部队的十七路军特务团孙友仁部遭遇，双方展开了激战。由于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龙韬率部投降，起义部队损失惨重，余部100余人于8月上旬进入照金苏区。

耀县起义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指出：“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当时正是红二团南下失败，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火光。它使照金根据地渡过了难关又有新的发展，这个历史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②习仲勋还总结了耀县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起义部队内部而言，缺乏坚强的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王泰吉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情感的人。他本人在一度脱党，部队中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与部属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他原想带出两三千人投奔革命，可是那些人在捞到了一笔钱，腰里装满银元、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③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67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2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52页。

四、建立耀县游击队

在策划组织王泰吉骑兵团起义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耀县县委准备建立耀县游击队。

1933年7月21日，在耀县起义发动的当天，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等即组织了事先已联系好的一部分民众代表，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配合起义部队，逮捕了一些豪绅地主和反动分子，并在西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南三保保长张恒义。临时革命委员会还组织群众开展了分配豪绅地主粮食、财物的斗争。

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还于当天组织成立了以阿姑社村青壮年农民为主体的耀县游击队，由陈学鼎任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兼政治指导员，张仲良任副队长。游击队设三个分队，陈国栋、安天民、张智怀分别担任分队长，全队共100多人。王泰吉指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为耀县游击队配备了19支步枪。

耀县游击队成立后，首先捕捉和处决了阿姑社村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左善处、左国明、左国鼎兄弟三人，并分配了左家的粮食、财产，焚烧了左家的土契和债务契约。随后，游击队由孙家原村党支部书记蔡凤凯做向导，前往孙家原，捕捉了当地作恶多端、企图破坏孙家原村党支部的兵痞、恶棍张廉明。此后，游击队又前往白家庄，发动群众分配了当地一家周姓大地主的粮食。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离开耀县县城后，耀县游击队离开白家庄，经墓坳、高山槐等地，于8月初进入照金苏区。

五、陈家坡会议

1933年8月上旬，随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相继进入照金苏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得

到了加强。耀县游击队到达照金苏区后，被改编为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当时，照金苏区的地方游击队已发展到六七支，旬邑、淳化等地也活跃着十来支地方游击队。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根据地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坚持与扩大陕甘边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于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陕甘边特委委员张秀山，红四团领导人黄子祥、杨森、王伯栋，耀县第三支队领导人张邦英、陈学鼎、张仲良等。已恢复中共党籍的王泰吉和陕西省委巡视员高岗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围绕统一几支部队的领导、根据地向何处发展、红军的战略战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习仲勋回忆说：“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和行动，大家决心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①

主持会议的秦武山回忆说：“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各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争论是总指挥的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争论是高岗任政委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上，我们批评了黄、王的右倾和失败情绪，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②

会议最后通过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因刘志丹当时南下尚未归来，

会议没有宣布他的职务。习仲勋回忆说：“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③

陈家坡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临危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严峻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策，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制定的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陕甘边红军保存和发展自己，拖垮和消灭敌人的重要原则，为以后陕甘边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52—253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83—584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53 页。

六、陕甘边红军主力转战外线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率领主力部队向东出击，寻机歼敌。8 月 18 日，红军消灭庙湾民团夏老么一部。8 月 21 日，红军在耀县高山槐歼灭雷天一民团 100 余人，缴获部分武器。8 月 24 日，红军攻占耀县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8 月 27 日，部队乘胜袭击柳林民团，歼敌数十人。在东线作战取得连续胜利后，部队回师照金苏区。

9 月初，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主力部队离开照金，向西出击，先后在彬县龙马、高村、柏子村一带消灭当地民团 100 余人。随后，部队挥师北上，在正宁县金村庙一带歼灭当地民团武装一部，缴获长短枪 10 余支。

9 月下旬，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进入合水县境内，在固城川与南下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这时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强世清

等人的领导下，已发展到 70 余人，战马 30 余匹。两支部队会合，战斗力增强，部队士气高昂，准备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

张洪镇位于旬邑县城西南 15 公里处，城池坚固，不易强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用诱敌出城的办法歼灭守城之敌。

9 月 25 日晨，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冒雨南下，设伏于彬县底庙一带。负责攻打张洪镇的旬邑游击队在中午发起猛攻后，遭到守敌反击。旬邑游击队遂佯败后退，大部守敌乘机出城追赶。旬邑游击队且战且退，诱敌进入红军主力部队伏击圈，将其全部歼灭。随后，十余名红军战士扮成民团团丁，由被俘的民团班长宋飞带路，骗开张洪镇城门。主力部队迅速攻进城内，击毙了旬邑县民团团总，消灭剩余民团十余人，并活捉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和旬邑县县长谢骞及一批恶霸劣绅，还缴获了一部分物资和一万多块银元。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还召集群众大会，当众处决了国民党旬邑县党部书记长和旬邑县县长谢骞及恶霸劣绅等反动分子 12 人。

张洪镇一战，陕甘边红军共歼敌 100 余人，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无一人伤亡。

第二天，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回师照金苏区。

10 月初，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主力部队回到照金。10 月 4 日，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也在南下脱险后，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就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出任红四团第二连连长，黄子文则被派往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担任领导工作。刘志丹等脱险归来，极大地加强了陕甘边区红军的领导力量。

七、照金苏区失陷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失败，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与不安。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限期攻克薛家寨。

1933年8月，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兼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指挥六个团的兵力攻陷渭北根据地后，又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于9月中旬向照金苏区发起进攻。

当时，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活动于甘肃合水、正宁一带。留在照金苏区的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阻击来犯之敌，照金苏区的中心薛家寨仅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留守，兵力较为薄弱。9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向薛家寨发起猛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奋起还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紧急关头，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的干部、工人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根据地军民凭险坚守，并巧布地雷阵，还用修械所制造的“麻辫手榴弹”投向敌群，给进攻之敌以沉重打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获知敌军猛攻薛家寨的消息后，迅速率部从绣房沟返回薛家寨，与留守军民发起迅猛反击，敌人狼狈溃逃，根据地军民取得了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在这次激战中，李妙斋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10月12日，王泰吉、刘志丹、高岗等率领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离开照金，前往甘肃合水一带捕捉战机，寻机歼敌。

红军主力部队转至外线后，刘文伯指挥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数千人，向照金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0月13日，进攻之敌分别进占照金老爷岭、芋园等地。10月15日晚，在叛变投敌的原龙王寨游击队队长陈克敏的带领下，国民党军沿着后山腰畔旁边的一条石缝攀上薛家寨主峰。红军留守部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此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特委一边组织根据地军民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搏斗，一边迅速做出边区党政机关分路突围、以保存力量的决策。突围人员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率领，从黑田峪方向撤退。

10月16日，照金苏区中心薛家寨失陷。

国民党军攻占照金苏区后，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总结说：“照金苏区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①习仲勋指出：“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有困难的。”^②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53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53 页。

第八节 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一、包家寨会议的重要决策

1933 年 10 月 12 日，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参谋长刘志丹和政委高岗率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离开照金，北上甘肃合水一带，准备寻机歼敌。行军途中，部队获悉合水县城内仅驻有国民党军一个连和一个保安队，共 300 余人，而且战斗力不强，遂决定长途奔袭合水县城。

10 月 15 日下午，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到达合水县黑木原后，即派出侦察人员勘察地形及探听合水城内敌情，进行攻城准备。10 月 18 日晚，红军冒雨行军 15 公里，抵达合水城东。10 月 19 日凌晨 3 时许，在攻城总指挥、红四团第二连连长王世泰的指挥下，该连和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20 多名骨干组成登城突击队，开始架云梯攻城。但由于原来准备的云梯高度不够，突击队员难以达到城墙顶部。紧急关头，突击队员柴正祥拔出三把刺刀，插入城墙之中，双手紧握刺刀刀柄，不停倒换，终于跃上城墙墙顶。登上城墙的柴正祥抛下准备好

的绳索，突击队员迅速攀绳而上，打死哨兵，冲进碉堡，收缴了尚在睡梦之中的守军的枪支。突击队员占领制高点后，立即发出信号。主攻部队在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强世清的率领下，迅速冲进城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占领了合水全城。战斗中，警察局长李彦率部起义，县长康麟乘乱逃脱，其余守敌全部被歼。

在攻占合水的战斗中，陕甘边红军共歼敌 2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并缴获大量的军需物资。红军主力进城后，从监狱里解救出原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等共产党员和群众 80 余人。红军占领合水城后，还发动群众，分配了合水县政府和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

10 月 19 日，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撤出合水城，前往宁县盘克原，并在此与撤出薛家寨的陕甘边区领导机关和游击队会合。

合水县城丢失后，陇东警备第二旅五团赵文治部倾巢出动，欲与红军主力决战。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王泰吉、刘志丹、高岗的指挥下，与敌周旋于合水、正宁、宁县一带，使追击之敌疲惫不堪，锐气大减。10 月 27 日，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歼灭了当地民团。第二天，红军主力又在庆阳毛家沟门^①击溃赵文治部，毙、俘敌 200 多人，缴枪 200 多支。

经毛家沟门一战，赵文治所部元气大伤，余部逃回庆阳城。此后，该团建制再未恢复。

11 月 3 日至 5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陕甘边区红军主力部队整编、根据地建设和红军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任命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为政委，刘志丹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大力开发游击区，分别建立三个游击区，成立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游击区以安定县为中心，成立第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二游击区以庆阳南梁为中心，成立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游击区以耀县照金为中心，成立第三

路游击总指挥部。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建立后，由红二十六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苏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还决定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王世泰回忆说：“与会同志听取了志丹同志关于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计划，一致表示赞同。大家认为，南梁地区具备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早年志丹和子长同志在这一带闹革命，影响很大，同时群众很多是外地难民，深受封建压迫之苦，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便于发动；二是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而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金，连接陕甘宁 3 省 18 个县，山大沟深，梢林密布，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我军回旋，打击敌人；三是南梁是陕甘两省交界处，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虽有小股土匪和地方反动武装，但都不敢与红军对垒。所以南梁地区是建立根据地比较理想的地方。”^②

包家寨会议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建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从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解决陕甘边根据地问题的重要决策。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①今属甘肃省华池县。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34 页。

二、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

1933 年 11 月 8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组建。根据包家寨会议的决定，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正式建立，杨森任书记。

红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骑兵团和警卫连。第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及原红二团南下归队人员合编而成，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后由黄罗斌担任），下辖三

个连：第一连连长赵国卿；第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骑兵团以红四团为主编成，团长黄子祥，政委由杨森兼任，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李志柏，第二连连长高占胜。红四十二师共有 500 余人，战马 200 多匹。红四十二师成立后，于 11 月中旬挥师南下，在宜君县杨家店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团一个连 120 余人，缴枪 120 多支，处决了连长李文杰。

杨家店子一战，红四十二师也有较大伤亡，其中有三四十名伤员无处安置。在此情况下，红四十二师改变了原定南下照金、开辟第三路游击区的计划，调头北上，进入南梁地区。

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以后，派遣习仲勋、张策等在当地发动群众，组建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组织，打土豪，分财物。同时，积极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基层组织。红军主力部队则兵分两路，捕捉战机。

红四十二师师部率第三团东进咸（阳）榆（林）公路沿线，消灭了部分民团。随后，又奔袭甘泉县城。在进攻受挫后，又沿洛河川向西前进，在葡萄沟门击溃第八十六师一个营。

骑兵团则向西北方向活动，在荔园堡歼灭了甘肃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部新兵营 60 余人，击毙营长梁邦栋。随后，又在二将川消灭了赵富奎民团。

11 月底，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与骑兵团在二将川会合。

红四十二师在南梁地区初步站稳脚跟后，成立了由吴岱峰任主任的后方工作委员会，开展发动和组织群众工作。在此期间，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等游击队相继成立。

12 月中旬，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骑兵团再次南下，占领了正宁县南邑后沟，收缴了当地民团的部分枪支。

同年 12 月，南梁地区赤卫队相继建立：小河沟、豹子川为第一大队；玉皇庙、马连岔为第二大队；白马庙为第三大队；二将川为第

四大队。同时，在金岔沟、白马庙、玉皇庙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联合会、贫民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4年1月初，经红四十二师党委同意，王泰吉离开部队，准备前往豫陕边刘桂堂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

2月18日，王泰吉在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淳化三区民团团团长马云从逮捕，随后被押送西安。

王泰吉被捕后，中共组织和第十七路军中的进步人士多方营救，但由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严密监视，终未成功。2月26日，蒋介石密电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将王泰吉“就地正法”。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

1934年1月下旬，高岗调任新成立的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政委，杨琪任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高岗离职后，杨森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接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并兼任骑兵团政委。

2月13日，红四十二师攻占耀县北原生义堡。随后，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先后由张明吾、王安民、陈国栋担任，政委先后由黄子文、张仲良、张邦英担任。

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下辖庆阳、合水、保安、安塞、庆北、定边、华池、环县等游击队和保卫队。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下辖直属特务队、正宁四支队（平子游击队）、五支队、八支队、十六支队（回民游击队），宁县三支队、一支队及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富（县）甘（泉）、旬邑等游击队。

红四十二师以及陕甘边区第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相继建立，不仅加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也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三、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包家寨会议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离开南梁，赴西安寻找上级党的组织，特委其他成员分散在各部队。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不健全的情况下，边区党的工作实际由红四十二师党委领导。

随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逐步扩大，边区基层党组织逐步建立，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工作已经非常必要。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在泉。鉴于师政委张秀山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①师长刘志丹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寨子湾会议决定：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师政委。

同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做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华池为中心，向周边发展，创造中心苏区，并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同时要求创造条件，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权。决议还就党的工作、扩大与加强主力红军、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决议强调指出：“这个决议就是陕甘边区党最近的路线。特委希望全党同志必须深入支部作彻底的讨论，百分之百的去执行，并去把去执行的日程报告特委。”^②

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同年秋，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成立，书记张邦英，区委机关驻中部县小石崖。南区区委下辖中共耀县县委、淳（化）耀（县）县委、永红县委、赤水县委、赤淳工委和甘肃的新正县委，以及富县、中部等县的党组织。

同年8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秀山调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惠子俊接任特委书记。

1935年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生活》创刊，负责人龚逢春。

①在1934年4月下旬进行的淳化五里原甘嘴子战斗中，红四十二师政委杨森负伤，师党委书记、骑兵团政委张秀山接任师政委，高锦纯接任骑兵团政委。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29—230页。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照金苏区失守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部分领导人遇难，革委会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并逐步扩大的新形势下，红四十二师党委于1934年2月25日在南梁小河沟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副主席白天章、贾生秀。革委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等委员，张步清为土地委员，牛永清为劳动委员，武生秀为财政委员，呼志禄为粮食委员，边金山为军事委员，贾生秀为肃反委员。同时，还组建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郭锡山，负责保卫革命委员会机关的安全。同年9月，蔡子伟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秘书长。

1934年秋，在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党委成立的同时，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也在中部县小石崖成立，黄子文任主席。

根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决议中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蔡子伟、张文华先后为政治秘书长，李生华为土地委员会委员长，张钦贤为劳动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文化委员会委员长由政治秘书长蔡子伟兼任，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由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兼任，呼志禄为粮食委员会委员长，郝文明为肃反委员会委员长，高敏珍、张景文先后担任妇女委员会委员

长。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在泉。边区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明、杨在泉（兼任参谋长）。

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法令和文件。11月7日，新成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并举行了阅兵仪式。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边区境内县以下各级地方政权也相继建立。到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边金山）、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强家珍）、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巨德）、赤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宋飞）、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彦）、富西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明奎）、富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尚达）、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等县级地方政权，并成立了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驻宁县办事处（主任刘永培）、南区革命委员会新正办事处（主任郭廷藩）等党政合一的派出机构。

在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不懈努力下，照金苏区也逐步得以恢复。1934年9月下旬，照金台儿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孙启亮任主席。1935年1月，周家河区苏维埃政府在耀县寺坡村成立，赵均歧任主席。

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逐步扩大与巩固的新的时期。

第九节 南梁时期的反“围剿”斗争

一、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一次“围剿”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由照金移到南梁以后，国民党陕西、甘肃地方当局对根据地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从 1934 年 2 月起，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具体部署是：驻守庆阳的仇良民团、王子义团和谭世麟部合围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陕甘边苏区；驻耀县的十七路军特务团、驻旬邑的何全升团、驻洛川的冯钦哉第七军四十二师的一个团、驻肤施的第八十六师张瑞卢团严守驻防地，相机堵截转入外线作战的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共八个团，总兵力达一万余人。

在分析敌情后，红四十二师党委制定了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牵制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到外线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以打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

2 月 13 日，是农历甲戌年除夕，红四十二师攻占了距耀县 20 多公里的北塬生义堡，没收了当地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备好的年饭。2 月 23 日，红四十二师离开生义堡，在耀县和同官境内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回师南梁。

3 月中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转入外线作战，先后歼灭了耀县瑶曲，宜君石堡、五里镇，中部店头等地民团百余人。随后，红军挥师北上，突然袭击了保安藺家砭、崖窑等地，歼灭张廷芝部一个连。3 月 29 日，红四十二师又在庆阳元城高桥活捉了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等 30 余人，缴获 30 多支枪及大批物资。随后，红四十二师又对元城发起攻击，一度攻占元城街道，歼灭谭世麟部一个连，毙、伤守敌 100 余人。元城战斗后，红四十二师直赴赵梁子，歼灭谭世麟之子谭振武率领的一个骑兵连，缴枪 50 余支，战马 50 余匹。

在连续作战并取得胜利后，红四十二师于 4 月 2 日在合水西华池歼灭了陇东绥靖司令部所属王子义团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西华池之战共毙、俘国民党军 600 余人，缴获步枪 600 余支，迫击炮 2 门，重

机枪 2 挺，战马 50 多匹，取得了陕甘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

西华池大捷后，红四十二师回师南梁地区，随后又挥师南下，与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配合，打击苏区南线之敌。4 月下旬，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骑兵团从耀县稠桑出发，攻打同官梁家塬，击毙守敌营长范子畴，活捉区长梁子峰。随后，红三团又进攻咸（阳）榆（林）公路上的重镇黄堡镇，缴获民团枪支二三十支，收缴了一大批烟土、钱财和物资。

在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配合下，红三团于 5 月上旬在淳化县五里原甘嘴子歼灭何全升所部两个连。在甘嘴子战斗中，红四十二师政委杨森负伤，师党委书记、骑兵团政委张秀山接任师政委，高锦纯接任骑兵团政委。

甘嘴子战斗后，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北上正宁。在五顷原，部队遭到陇东警备司令部马恭章骑兵团的突然袭击，人员和物资受到了一定的损失。随后，部队沿子午岭主脉北上，在富县和尚原击溃了冯钦哉所部一个营。6 月 20 日，红三团和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一部北上保安，在瓦子川歼灭第八十六师五一二团二营 100 余人。

在此期间，谭世麟部和仇良民团乘红四十二师在外线作战之际，于 5 月中旬偷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荔园堡，并占领了南梁地区。

6 月下旬，红四十二师回师南梁，迫使仇良民团和谭世麟部退出南梁地区。至此，红四十二师在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配合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大小战斗 30 多次，共歼敌 3000 余人，粉碎了国民党陕西和甘肃地方当局对南梁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二、阎家洼子会议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粉碎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第一次“围剿”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率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五支队及赤卫大队 200 余人，于 7 月 18 日由安定南下，7 月 23 日在南梁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会合。高朗亭在 1980 年所写的《开展陕北红军游击战争的片断回忆》一文中写道：“谢子长、刘志丹等老战友重逢，叙旧言欢。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①和红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表示慰问。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部队生活管理的经验，搞了战术演习，并派人到陕北游击队讲解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以及在陕甘边地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并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兄弟部队之间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的热情场面，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战斗友谊。”^②

7 月 25 日^③，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中共陕北特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谢子长、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郭洪涛、贺晋年、龚逢春及红四十二师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

在这次会议上，谢子长作为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例如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这两封信宣读后，进行了讨论。会后，由四十二师龚逢春整理了记录，送给了中央驻北方代表。

会议决定，免去高岗担任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前往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后因故未去），红四十二师政委一职由谢子长兼任，并决定由贺晋年接替谢子长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陕北，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

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会后，红四十二师向陕北游击队调拨了 100 余支步枪和一部分银元。

8 月初，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陕北。

阎家洼子会议以后，谢子长于同年 9 月 5 日致信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信中写道：“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地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并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四十二师。^④

在此之前，中共陕北特委于 8 月 17 日致信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汇报了有关工作。其中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有关情况，中共陕北特委在汇报中说：“红二十六军最近已彻底的转变脱离群众的倾向，坚决地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获得很好的成绩。建立了陕甘边区庆阳、保安等的群众组织，游击战争也日益扩大，关中游击队有一倍的发展。保安、庆阳、中部的游击队都有扩大，十月革命正式召集群众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府，最近骑兵团向南发展，步兵团向北行动，和陕北独立师汇合，解决敌人弱点。”^⑤

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进入陕北后，在谢子长指挥下，先后参加了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圪台、清涧河口等战斗。此后，红三团又参加了横山董家寺战斗。董家寺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在完成支持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任务后，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于 9 月上旬离开安定县，经保安县到达庆阳北部地区。

①时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677 页。

③一说 7 月 28 日。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32—233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31页。

三、红二十六军进一步发展壮大

阎家洼子会议以后，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和第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线和北线作战，相机歼敌，既策应了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壮大了红二十六军的力量。

1934年10月20日，在陕甘边区党组织的帮助和红二十六军的影响下，活动于陕西黄龙山区的地方武装郭宝珊部120余人在甘肃庆阳新堡宣布起义，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郭宝珊是河北大名（今河南南乐）人。5岁时随祖父逃荒到陕西黄龙山区谢家峁。1929年秋季，投身洛川驻军张金贵部。后转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了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失败后，郭宝珊回到陕西，在黄龙山区组织义勇军，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到1934年初，郭宝珊所部已发展到1000余人，在当地颇有影响。郭宝珊后来在《我的自传》中写道：“这时，刘志丹派黄罗武来争取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当时我认为红军是打富济贫，反对苛捐杂税，杀贪官污吏，和我的想法一致，思想上有向往之意。”^①郭宝珊写道：“下半年，我们的名声很大，杨虎城派兵来剿我们，因自估力量不敌，便去投靠合水固城的另一支国民党军队，约定在某地会师，而离开了东山^②。这时黄罗武又来活动我们，我仍犹豫而未作决定。”^③关于率部起义的经过，郭宝珊写道：“在行军途中，曾碰到红军的骑兵部队，并没有向我们开火（当时红军骑兵想消灭我们是很容易的），到达合水固城时，因误了约定日期，人家部队已调走了，这时山上又呆不住，想投红军又怕被杀，在我拉上部队没有什么去处的时候，碰到马锡五来慰劳我们，刘志丹也派人给我们送了三匹马。这时候我觉得红军对我还是不错，投了他们可能不会有什么危险，就下了决心投奔红军。唯因内部意见不统一，我只带了一个基本连到了南梁堡。”^④

1934年11月，郭宝珊起义部队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政委任浪花，参谋长于振学，隶属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西北抗日义勇军下设三个大队，段荣启、王东来、杨茂堂分别担任大队长。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屡建战功，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主力团队之一。1935年6月，郭宝珊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前后，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保安、庆阳、合水、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在南梁阎家洼子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参谋长王生荣，政治处主任朱奎。第二团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共180多人。此后，红二团又组建了骑兵排。

红二团组建后，消灭了保安旦八寨子民团50余人，并打败了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二二团一个营的进攻。红二团还配合红三团，在头道川的新寨、白家屯，消灭了王希清、王定邦民团。

同年12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正宁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并抽调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的部分骨干力量，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红一团组建初期，下设两个步兵连，共200余人。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炳坤；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稍后，红一团又组建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

红一团组建后，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的配合下，先后消灭了中部县隆坊原、雷庄等地的民团，摧毁了富县、宜君、中部一带的部分国民党基层政权，进一步扩大了富西、中宜游击区。

至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下辖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骑兵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直属独立营及警卫营。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组建时，刘志丹亲自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部队军事训练的教材。1934年10月，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在南梁荔园堡成立，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龚逢春等担任

专职或兼职教员。该校的学员主要是红军、游击队中的连排级干部和少数地方干部。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该校在荔园堡举办了第一期，历时一个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该校迁至豹子川张岔，又先后举办了第二期和第三期。三期共培训干部 200 多人。学员毕业后，分派到红军、赤卫队、游击队中工作。1935 年春末，该校停办。同年 10 月后，该校在安定县恢复办学，并改名为陕甘宁红军军政干部学校。

随着红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的相继组建和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的成立，该师第三团、骑兵团的建制也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加强。骑兵团由组建时的两个连扩编为四个连。红三团在原有两个步兵连和少年先锋连的基础上，新编了第三连和第四连。

至此，红二十六军共有 2000 多人，兵强马壮。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和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陕甘当局的极大恐慌。1934 年 10 月，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了三个正规团和部分民团武装，兵分六路，向陕甘边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发动了新的“围剿”。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做出决策，留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部队转移敌后，寻机歼灭敌之一路部队，以打乱国民党当局的进攻计划。

10 月中旬，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保安县的吴堡川对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当时担任骑兵团政委的高锦纯回忆说：“10 月 13 日，赤安游击队前往吴堡川引蛇出洞，我骑兵团埋伏待敌。敌人在追击赤安游击队的过程中，我骑兵团突然对敌进行袭击，杀敌甚众，余敌狼狈溃逃。因敌系步兵，我是骑兵，在追敌过程中，又俘敌多人。”^⑤

吴堡川伏击战后，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又袭击了保安楼坊坪^⑥张廷芝所部，取得重大胜利。

11月16日，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奔袭环县曲子镇。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占了曲子镇。曲子镇战斗共俘敌100余人，缴枪二三百支，战马四五十匹。战斗中，国民党环县第四区区长朱文成被击毙，保安团团团长李恒泰，保安团队队长崇敬义、刘天云被俘。

在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打击下，进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路国民党军为保存实力，纷纷撤退，国民党陕甘当局分路进攻陕甘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10页。

②即黄龙山区。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11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11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53—454页。

⑥今属吴起县。

第十节 南梁苏区的土地革命与经济、文化建设

一、南梁苏区的土地革命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并逐步得到巩固以后，各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就发动与领导劳苦大众，进行土地革命，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革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工作由各级政权下设的土地委员会具体领导。

南梁苏区的土地革命认真总结了寺村原时期和照金时期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没收地主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的中农。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同时给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一定数量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耕作条件较好的川地、台地，按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耕作条件较差的山地，则按农户的耕地能力按户划块，进行分配。在土地分配中，先分川地、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主要是在根据地的

中心区域进行，而在根据地的边沿区域，则基本未进行土地分配，执行的主要是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

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执行的土地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1. 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
2. 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
3. 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边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沿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
4. 田、青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
5. 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
6. 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
7. 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
8. 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①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58 页。

二、与民生息，发展经济

南梁苏区地处陕甘边界地区，山大沟深，森林茂密，人口稀少，被称为“梢林地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当地群众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土地革命的逐步开展，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根据地各级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与民生息，发展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各级政权从实际出发，一方面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以保障民生。同时，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交“欢迎”粮。部队和政权机关的粮食、财产来源主要是取之于打土豪地主所得，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不足部分则以收买农民存粮来解决。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流动仓库，以分散储藏。1934年6月，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所辖的庆阳游击队没收了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家粮食500多石，牛100多头，羊2000余只，银元1000多枚。同年秋季，庆阳游击队打开了由庆阳大地主开办的商号“恒义和”在悦乐上堡子的储粮仓库，没收粮食2000多石。这些粮食、牛羊和财物，除分配给群众一部分外，其余都用做军需和机关供给。

在分配土地过程中，陕甘边根据地的基层政府还采取了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乡、村苏维埃政府经营的办法来补助军需。这些“红军公田”收获的粮食，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军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接待过往的红军、地方游击队零散人员。各级政府还将打土豪所得的牛羊适当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放养，开办小牧场。饲养的耕牛用于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则主要供做军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兴办互助合作社，以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在兴办荔园堡互助合作社时，边区苏维埃政府号召机关、部队捐款支持，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一次捐款50多块银元。

当时，苏区党政军机关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干部、部队首长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供给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为了调剂余缺，促进流通，繁荣经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后，还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十天一集。每逢集日，赶集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前来经营的商贩不仅来自根据地，附近国民党统治区的商贩也来做生意。苏区各级政府对这些商贩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苏区政府将根据地的土特产品、山货和羊畜等廉价卖给这些商贩，又通过他们把根据地极缺的棉花、布匹和其他物资运进来。各项工商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既使外来的商贩有利可图，也保证了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苏维埃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影响下，一些商贩逐渐开始同情革命，并千方百计地为苏区输送物资。

为了确保苏区经济稳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还在南梁发行了货币，即苏币，群众称之为苏票。苏币木刻雕版，印在白布上，涂以桐油，面值分为一元、五角、二角和一角四种。苏币与银元等值，共发行 3000 元。为了确保苏币的发行和流通，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禁令，禁止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在苏区境内流通。边区革命委员会为解除群众和商贩的顾虑，取信于民，还在荔园堡设立了苏币、银元兑换处，从而使苏币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经济的各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使根据地广大群众得以休养生息，而且为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三、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南梁地区没有一所学校，文化教育极其落后。

1934 年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转嘴子创办了南梁苏区第一所列宁小学，郝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招收学生 60 多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写政治课本。这些课本多为手抄本或油印本，内容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大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课教材。列宁小学没有校舍，学校就将没收地主的房屋开辟为校舍。没有桌椅板凳，师生们就自己动手，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椅子，扫锅底的烟灰为墨汁。

在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后，陕甘边根据地又在太白、九只窑口等地陆续开办了列宁小学。

陕甘边根据地各级政府在兴办普通教育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扫盲识字班，以推动农村的青壮年文化教育。

边区各级政府还颁布了禁烟、禁毒、放足等条例，并广泛宣传，开展以“劝破除迷信、劝诫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革除陋习，移风易俗，使边区的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给偏僻闭塞的南梁地区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源泉。

第十一节 刘志丹率部北上，筹划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一、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国民党地方当局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相继失败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豫鄂皖“剿总”副司令张学良等人的陪同下，于1934年10月12日由洛阳抵达渭南，开始了对西北的“巡视”。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到陕西。10月17日，蒋介石等离开西安，先后前往甘肃、宁夏“巡视”。10月20日，蒋介石等由宁夏银川飞抵西安。10月22日，蒋介石乘火车离开陕西，前往洛阳。蒋介石等在陕西、甘肃、宁夏期间，对“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进行了部署，并决定将驻河南洛阳的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调往陕北绥德，参加“围剿”苏区的战事。

从1935年1月起，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第二次“围剿”的军事调动开始实施。其具体部署是：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三个旅，附陇东警备第二旅第六团，共七个团，进攻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南梁地区；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六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一带，插入南梁与照金地区之间待机；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四个团，布置在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守备咸阳至延安公路，

作为战略警戒线；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以三个团进攻神（木）府（谷）苏区，另外两个团则由横山、靖边一线，前出大理河沿岸，构成第八十六师的右翼战线；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四个团，分别进占绥德及以西地区，该师另外一个团占领瓦窑堡，并分兵一部，控制绥德至吴堡大道；晋军第七十一师沿黄河东岸驻防待机。蒋介石还派出以毛侃为首的参谋团，随第八十四师师部驻绥德，以协调各部队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行动，直接投入兵力达5个师26个团计4万余人。总观全局，这次“围剿”行动实际上部署了五个“围剿”区：神（木）府（谷）区、米（脂）佳（县）吴（堡）区、安（定）绥（德）清（涧）区、南梁区、照金区，其战略中心则是安绥清区。

在蒋介石亲自调兵遣将，安排部署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际，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遣黄翰（张子华）为驻西北巡视员，于1934年10月下旬到陕北根据地。黄翰同意中共陕北特委的建议，集中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主力部队，合力打击进犯根据地之敌。为此，黄翰致信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领导人。这封信经正在养伤的谢子长看过后送出。

接到黄翰的来信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和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第五、第六支队，于1935年1月上旬离开南梁，前往陕北革命根据地。

二、刘志丹与谢子长筹划统一两块根据地

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到达陕北根据地赤源县^①后，前往水晶沟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位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相逢后，十分激动。刘志丹与谢子长交换了意见，决定将分别隶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两位老战友还就建立陕甘边和陕

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达成了一致意见。

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②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任书记^③，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④。西北工委隶属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北特委，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军事委员会。陕甘边特委由李生华任书记，刘景范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陕甘边根据地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一块十分重要的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指出：“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⑤习仲勋还总结了陕甘边根据地的五条历史经验：“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第二，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⑥

①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子长县西部、靖边县东部和横山县东南部。

②今属子长县。

③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

④一说谢子长。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3 页。

第四章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节 中共陕北特委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探索

一、中共陕北特委成立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创建的。鼎盛时期，根据地辖有赤源、清涧、神木、佳县、吴堡、绥德、赤光^①、秀延^②、延水^③九个苏维埃县治，形成神（木）府（谷）和绥（德）清（涧）两块苏区。神府苏区包括今神木和府谷县大部、佳县和榆林市榆阳区接合部的农村。绥清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县大部，靖边、安塞、米脂县东部和横山、子洲县南部的农村。

早在大革命时期，陕北地区就建立了党团组织。1925年2月，经共青团中央批准，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④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书记王懋廷，宣传委员田伯英，组织委员白明善。团陕北特支下辖绥德、榆林、瓦窑堡等地团组织，隶属共青团中央直接领导。

1925年10月，中共豫陕区委和共青团豫陕区委成立后，团绥德特支改由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但仍同共青团中央保持联系。同年年底，团绥德特支改为团绥德地委，书记马瑞昌。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仍设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初由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2月改由共青团北方区委领导。1927年2月后，改由共青团陕甘区委领导。

陕北地区最早的中共组织是李子洲等人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建立的中共绥德支部，田伯英任书记，李子洲曾代理书记。这一支部后来发展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

1926年6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田伯英，组织委员蔡南轩，宣传委员赵少西。在此之前，由刘景象任书记的中共榆林特别支部成立，先后隶属中共绥德特支、中共绥德地委领导。1927年5月，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

在榆林特支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书记马云程，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周家干。榆林地委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

中共延安特别支部，成立于1926年春，书记呼延震东。特支机关设在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先后辖安定、湫峪沟、蟠龙、延川、延长、宜川、甘泉七个支部。1927年4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撤销延安特支，设立中共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田伯英，宣传委员陈俞廷，组织委员易厚庵，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下辖7个特支，3个直属支部，110多名党员。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辖区内实行“清党”反共。素有“陕北王”之称的陕北军阀井岳秀步其后尘，也开始在陕北地区“清党”反共，通缉在榆林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共榆林地委书记马云程等党、团组织负责人被迫离开榆林中学，中共榆林地委停止活动。

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以后，根据中共五大决定，将中共绥德地委改为绥德县委，将中共延安地委改为肤施县委。共青团绥德地委、延安地委也分别改为共青团绥德县委和肤施县委。

同年8月4日，井岳秀下令查封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聚集的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大部分教师被遣送回乡，学生被迫离开学校，进步书籍被付之一炬。随后，井岳秀又强行解散了各地的农民协会。白色恐怖笼罩着陕北高原。

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1927年10月1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共产党人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清涧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却有力地推动了陕北地区土地革命的蓬勃兴起。

在中共组织领导发动清涧起义前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派遣冯文江、焦维炽等到陕北整顿恢复党、团组织。1927年10月，中共绥德县委、共青团绥德县委相继恢复，冯文江、焦维炽分别任书记。同月，中共佳县县委恢复，高光祖任书记。同年12月，中共米脂区委改为米脂县委，刘春园任书记，共青团米脂区委改为米脂县委，李馥花任书记。同月，中共府谷县委成立，严念祖任书记，柴培桂任副书记，同时，共青团府谷县委成立，柴培桂兼任书记。1928年3月，中共榆林县委成立，李文芳任书记，同时，共青团榆林县委成立，赵亚农任书记。

在陕北地区党、团组织相继恢复之际，共青团陕西省委于1927年11月28日做出决定，成立共青团陕北特委，焦维炽任书记。

1928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决定派杜衡赴陕北，筹建中共陕北特委。4月中旬，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县苗家坪南丰寨^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柴培桂、赵通儒、景仰山、师应三、苗仰实等十余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运动、青年运动以及《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任务》等决议案。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未到职），青年委员兼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特委机关设在米脂县城。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共陕北特委的成立，为陕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对陕北地区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前后，中共清涧区委于同年4月改建为中共清涧县委，师应三任书记。同时，共青团清涧区委也改为共青团清涧县委，王希勃任书记。中共清涧县委下辖四个区委。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在镇川^⑥组建了中共镇川区委，由刘绍让、刘述湘负责。镇川区

委直属陕北特委。同年5月，中共佳县县委改为佳县区委，由中共米脂县委领导。同年7月，共青团定边工作委员会成立，刘澜涛任书记。

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成立后，领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28年5月，山东“济南惨案”发生之后，米脂县三民二中、东校和女校的学生举行集体游行，声援“济南惨案”中受伤的爱国民众。6月下旬，绥德县四十里铺上千名农民，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引导下，砸毁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设在镇上的杂税局，清算了承包杂税的土豪勒索农民的账目。随后，绥德城区和近郊的3000多名农民包围县政府，要求减免赋税，救济灾民。绥德县政府被迫答应了农民的部分要求。同年夏季，以姜好光、贺达渊为负责人的米脂县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吃大户、要义仓粮的斗争。同年7月，府谷农民在“不减租粮，不再种地”的口号下开展“交农”运动，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陕北地区群众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9月下旬召开中共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等文件。9月28日，是农历的中秋节，会议尚未开始，前来米脂城内参加会议的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等人即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事件发生后，中共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被迫中止。贾拓夫、李文芳被捕后，被关押在米脂县城，半月后获释。杜衡、焦维炽被捕后，被押往榆林。同年12月开始获释。

杜衡被捕后，中共陕北特委委员杨国栋、冯文江、赵通儒等在绥德苗家坪小学召开临时特委会议。会议决定，由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贾拓夫代理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并决定将特委机关转移到清涧折家坪。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转移到清涧后，调白明善、霍世杰参加特委机关工作。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绥德西川张家岔^①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冯文江代表陕北特委向会议做特委工作报告。会议接受了中共六大会议决议，承认陕北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还不具备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会议认为，陕北特委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并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对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但仍决定由其继续代理特委书记。会议决定增补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委员、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往榆林。

张家岔会议以后，共青团陕北特委于同月在米脂县三民二中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健全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贾拓夫为书记，李文芳为组织委员，刘秉钧为宣传委员，常应黎（常黎夫）、赵颢龙为委员。会后，共青团陕北特委机关迁至榆林。

同年3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部分委员在清涧县高杰村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发动群众，以“五抗”^⑧为中心开展斗争。会议还决定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法，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同年4月，中共清涧、延长、延川、延安四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在清涧耙子山召开。会议进一步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传达了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陕北特委张家岔会议精神。会后，延长、延川、延安代表将“打倒蒋介石”“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等口号写成标语，沿途张贴，进行宣传。

同年夏初，在中共党员李景林领导下，以张宗贤、张建材为首的绥德三皇峁^⑨数百名盐工围困国民党地方当局设立的盐局，要求减轻盐税。

中共陕北特委的成立，统一了陕北各地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特委成立后，各委员即分赴陕北各县，进一步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中共陕北特委还将一些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党的培养对象派往各地农村，担任小学教员，利用合法身份做掩

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组织秘密革命据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陕北农村的特定环境，使党组织和农民保持着天然联系，更加接近农民运动。尤其是张家岔会议的召开，为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并进一步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 ①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延川县东部。
- ②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子长县东北部和米脂县西部。
- ③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延川县西部。
- ④又称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
- ⑤今属子洲县。
- ⑥今属榆林市榆阳区。
- ⑦今属子洲县。
- ⑧指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
- ⑨今属子洲县。

二、红石峡会议与“三色”革命理论的提出

张家岔会议后，特委机关迁往榆林。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来到榆林后，其政治上右倾，军事上不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生活上腐化的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于杨国栋的这些错误，特委成员曾多次提出批评，但效果不大。杨国栋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陕北特委各项工作的开展。

1929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城北的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马明方、刘澜涛、贾拓夫等30多人。红石峡是个石窟古寺，北靠沙漠，极为荒僻。会场在古寺的一个大岩洞内，岩洞的进口，在寺内的最低处，不易被人发觉。出口在古寺的顶部，易于向野外疏散，洞内可容纳三五十人。会议前一天，特委派人从井岳秀司令部附近到红石峡沿线，设了隐蔽岗哨，严密监视国民党军警的行动。特委要求出席会议的人员进行化装，分散进入红石峡。晚上8时多，出席会议的人员陆续进入会场。

红石峡会议决定撤销杨国栋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的职务，由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刘志丹在会议上发言提出，

可以通过三种形势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收编“山大王”，改造哥老会），可以有红色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刘志丹提出，在陕北当前形势下，武装斗争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与会人员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刘志丹提出的“三色”革命理论。

“三色”革命理论的提出，是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根据西北地区早期武装斗争的实际提出的重要革命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陕北地区乃至西北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是刘志丹等人对党的建军思想的杰出贡献。

红石峡会议结束后，兵运工作成为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的安排，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秀山、贺晋年、王世泰、焦维炽、张东蛟、高鹏飞、杨林等大批共产党员相继进入陕西、甘肃、宁夏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

三、中共陕北特委坚持土地革命的方针

1929年8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调整了临时省委成员，决定吉国桢为临时省委委员，并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会议决定刘志丹不再担任临时省委候补常委^①，去陕北开展兵运工作。

在此之前，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派苏士杰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派遣张文华担任团陕北特委书记。吉国桢、张文华、苏士杰到达榆林后，分别改组了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

在党、团陕北特委相继改组后，中共中央于1929年10月10日和10月17日给临时省委发出指示信，专门就陕北工作做出具体指示。中共中央在10月10日的指示信中指出：“整个陕西的工作，或

者以陕北比较好，但过〔去〕一直到现在和省委的关系不十分密切，所以陕北过去是经过顺直省委得到一些指导。省委应该与陕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将党的一切政策很快传达下去，同时应帮助他建立起健全的中心城市的指导机关，并规定一具体的工作计划。”^②中共中央在10月17日的指示信中指出：“据由陕来的同志报告，陕北在客观条件上有很多机会可以发动群众运动，扩大群众力量与党的力量。但是陕北党的指导不但不能发展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而且过去已有的群众组织亦日渐脱离党的关系，对党发生非常不好的影响。”^③指示信还明确指出了陕北特委应彻底纠正“不注意群众斗争”“党内教育工作不好”和特委原负责人生活腐化等错误。

1930年2月，担任榆林中学校长的共产党员马济川调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榆林中学任教的陕北特委负责人吉国桢、苏士杰也前往绥德四师任教，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也随之迁往绥德。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则以榆林私立职业中学学生的身份继续留在榆林工作。

红石峡会议前后，中共陕北特委和所属的党组织领导党员、团员和广大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1928年6月，中共佳县区委组织农民成立“农民之友会”，开展抗租抗税。吴堡岔镇群众清算了吴堡县财政局长兼岔镇区区长薛百年的经济账目。这些斗争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此之后，延川县马儿沟数百名农民前往县城，向县政府“交农”。安塞县的数千名农民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三抗”^④和“三要”^⑤的运动。延川和安塞农民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同年12月，由赵颢龙、贾鸿儒、苗乐山等人组成的中共三边区委成立。三边区委直属陕北特委，下辖定边、安边两个地方支部和国民党驻军内的两个军队支部。次年1月，陕北特委调中共榆林县委书记胡颖民任三边区委书记，石作奇接任榆林县委书记。

1930年4月1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致函中共陕北特委，要求贯彻中共中央2月26日发出的第七十号通告精神。函件指出：党在陕北的中心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伍，发动游击战争。4月16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发出第十号通告，要求各地通过5月的各种纪念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扩大党的影响，提高群众斗争的觉悟和勇气。在此前后，中共陕北特委部分成员和部分县委的负责人，于4月在绥德合龙山召开会议。杜衡代表临时省委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职工运动、士兵运动、妇女运动等12条意见的讲话，要求在榆林开展“红五月”运动。根据会议决定，中共榆林县委领导榆林女子师范师生和市民，中共吴堡支部委员会领导吴堡宋家川高等小学师生和市民，于5月30日分别举行了集会游行，纪念“五卅惨案”五周年。

同年5月2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给陕北特委发出的指示信指出：“陕北党的组织并没有经过白色恐怖的摧残，党所领导及影响的群众组织历年来亦没有被统治阶级给以很大的打击而至瓦解消灭。在党的影响之下的确是有相当的群众，尤其在学生群众中，党的基础更是加强，树立了相当的威信。党的主观力量在全省范围内陕北要算最强大的了。”^⑥指示信还指出了陕北党组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明确指出：“陕北党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坚决地发动群众并领导群众斗争，发展强固党的组织力量和群众组织的基础。这一工作是非常艰苦的。”^⑦指示信要求：“陕北党的工作的发展，应以榆林、绥德、延安为中心区域，特委应当集中人力财力建立中心区域内的中心工作。要特别注意这些区域工作的指导与建立。党与群众的组织力量必须积极的在斗争中加强发展，纠正和平发展与不动的倾向。”^⑧指示信还要求陕北特委加强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并发展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士兵中的群众组织。

同年7月1日至8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县巩村小学召开。会议决定改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省委书记杜衡，常委王林、吉国桢。7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重点讨论了陕北工作，决定省委候补委员赵伯平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张仰成为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⑨在赵伯平、张仰成未到职前，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由苏士杰、刘澜涛主持，共青团陕北特委工作由常应黎（常黎夫）主持。

会议通过了《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要求陕北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秋收斗争、灾民斗争，组织兵变，开展游击战争。

9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由杜衡起草的《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决定汇合各种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决议案草案要求在陕北、西安、渭南、华县、蓝田、陕南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党中央领导的夺取武汉的斗争，特别要以陕北为首先胜利之区，以促进全陕的革命高潮。

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绥德合龙山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新任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杨璞，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孔祥祯，以及苏士杰、刘澜涛、张德生、白明善、李文芳、常应黎等20余人。会议传达了6月9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合并中共陕北特委、共青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祯，行动委员会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

会议期间，国民党绥德县党部侦知了会议的讯息，与会人员迅即转移。刘澜涛、张德生在转移期间遭到逮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部分与会人员转移到绥德义合镇继续开会，决定印发张贴反抗国民党、进行暴动的标语，并决定在神木驻军高志清部手枪连发动起义。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绥德迁往榆林。

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在陕北地区达到了顶峰。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结束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调整了一些省市党、团组织的隶属关系。10月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向陕西省委发函通知，陕西省委归北方局领导。第二天，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陕北当前农民运动的中心策略是领导农民进行反捐抗债的斗争，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在此基础上组织地方暴动，巩固苏维埃阵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并且通知，陕北特委直属北方局领导，与中共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王林来到陕北，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北方局指示，宣布停止执行“立三路线”，撤销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党、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恢复活动。

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告，宣布中共中央北方局改为中共河北省委，陕北特委归河北省委领导。

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中共陕北特委坚定不移地领导着陕北各地的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坚持开展土地革命，多次排除“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国民党的破坏而不断取得胜利。这些胜利的取得，得益于特委多数同志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也得益于具有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不向任何敌人屈服的陕北劳苦大众的鼎力支持。

①1929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调整了省委领导成员，刘志丹任省委候补常委。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3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3页。

④指抗粮、抗捐、抗税。

⑤指要土地、要饭吃、要自由。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3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4页。

⑨后张仰成因病未到职。

四、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兵运工作

红石峡会议后，陕北特委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和兵运工作。一批共产党员相继进入陕北及周围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中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夏季，刘志丹来到延安，召集中共组织负责人秘密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高岗、李馥华、冯世光、高鹏飞、刘希向、吴鸿宾、杜守智等。刘志丹传达了中共陕北特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兵运工作的决定，并指定了延安各县党组织的负责人。汇报会后，刘志丹又召集在延安从事兵运工作的负责人汇报会。当时的延安，由井岳秀部高双成旅驻守。在该旅张彩勤团担任营长的李含芳、担任连长的王之环，都是共产党员。王之环的爱人王彩云是党组织的联络员，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曾参加了这次汇报会的冯世光在《回忆党在延安的早期兵运活动》一文中写道：刘志丹在听取了兵运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后，“指示要在延安高双成军中搞一次兵暴，兵暴胜利后，将队伍拉到保安二家（将）川地区打游击。由李含芳负责组织兵暴”^①。是年冬初，李含芳叛变告密，破坏了延安地区的兵运工作计划。王之环和他的爱人王彩云被捕，英勇就义。地下交通站被国民党军队查封，李馥华离开延安，高岗经西安转往甘肃，吴鸿宾前往西安做地下工作，杜守智叛变后离开延安。

1930年4月1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将“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作为陕北党组织的中心策略。临时省委在指示信中要求：“兵变，更应由主观力量去组织、去造成，不要因客观压迫而才进行兵变。这一策略

在陕北主客观上，都是最有可能，你们应毫不犹豫的努力推动这一工作^②

5月2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士兵中应（以）士兵联合会为组织的中心，党应发展加强士兵联合会的组织，以这个群众组织领导士兵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吸收广大的士兵群众，使成为有力的群众组织。”^③当年7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明确要求：“开始建立士兵工作。绥（德）、米（脂）、清（涧）三地，目前尚无士兵支部的组织，党必须动员同志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士兵群众中去，以建立党在士兵中的基础。”^④决议案指出：“党在陕北士兵群众中及中心部队中已有很强的基础。目前党只有加紧士兵斗争的领导，士兵群众中扩大土地政纲与红军的宣传鼓动，以联系到秋收斗争，组织兵变形成适当的配合。对士兵群众自发的兵变，党必须坚决领导其投入乡村中去，深入土地革命，成为农村斗争的武装力量，更有力的发动秋收斗争。”^⑤决议案要求：“在党的领导之下，由军官所发动的整个一部分的兵变（一营、一团、一旅），必须坚决的改编其部队，加强士兵群众中的政治宣传鼓动，加强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加强士兵中的政治教育，扩大土地革命与红军的宣传，驱逐各级动摇犹豫的军官，必须要以兵士暴动为中心策略，有计划有组织并且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起来举行消灭军阀的暴动。”^⑥

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及陕甘交界地区的兵运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的吉国桢在1931年4月20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在国民党地方武装中的共产党员，“榆林八九十；延安二三十（井^⑦的中心部队）；神府二三十（高志清部）；陕甘交界五六十（苏雨生部）”^⑧。

在陕北地区兵运工作迅速发展的形势下，1930年10月召开的陕北特委绥德合龙山扩大会议做出决定，在神木驻军高志清部手枪连发动兵变。

高志清原是骑兵师师长，归井岳秀指挥，部队驻神木。1929年上半年，井岳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削弱异己的力量，借口高志清的骑兵师人员不足，将该师缩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仍归井岳秀指挥。该旅下辖四个团和一个独立营。从1929年夏季起，中共陕北特委先后指派米脂、绥德、清涧等县的十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高志清的骑兵旅补充营当兵，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12月22日，中共军支负责人高学孔、常翔峰等在陕西警备骑兵旅高志清部手枪连领导发动了兵变。参加兵变的共产党员还有袁福祿和郭秉金。这次兵变一共拉出去四五十人，四五十匹马，枪支比较多。手枪连兵变后，由王自强任连长。部队行进到横山县纳泥河时，曾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陕北独立营”的旗帜。后因王自强反对，遂将这面旗帜收了起来。当兵变队伍途经安边时，被土匪张廷祥的部队打散。至此，神木手枪连兵变失败。

从1930年初起，中共陕北特委在井岳秀的直属部队中先后建立起一批中共军支，其中有在军官教育团中组建的支部（书记姜海龙）和在直属炮兵营中组建的支部（负责人张怀树）。同年秋，中共陕北特委又先后组建了直属工兵连支部（书记何格兰）和补充营支部（书记梁毓珍）。

1930年和1931年，在井岳秀直属部队中的中共军支曾两次筹划兵变，但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施。

1932年9月初，中共军支决定在榆林井岳秀直属部队中组织武装起义。据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的孙师策在《忆1932年榆林武装起义与东山惨案》一文中回忆，武装起义计划由孙师策、边临雍带三个排，于9月15日农历中秋节拂晓前集结在第八十六师师部附近，以一个排收特务连的手枪，以一个排突入井岳秀内院，以一个排解决东院机枪连。同时又制订出破坏通讯计划和回头协歼支援实力计划，并由魏志仁、赵经昌率领一个排先收缴公安局枪后再占领军械库。起义

的口号是“留兵不留官”，“打开仓库，分散给贫民”。起义由何格兰统一指挥。

起义前，由于叛徒出卖，何格兰等被捕。9月19日，何格兰、张怀树、杨德厚、赵经昌、魏志仁、边临雍等六名参与领导起义的共产党员在榆林城东山英勇就义，史称“东山惨案”。

在此前后，中共陕北特委还先后在吴堡、绥德、米脂、安定、横山等地组织发动了一些起义。这些起义规模较小，由于各种原因大都遭受失败。尽管如此，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兵运工作仍然为陕北革命武装的建立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和政治工作领导骨干。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88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8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0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9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70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75页。

⑦指井岳秀。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78页。

五、晋西游击队与红二十四军相继入陕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代表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共内部还出现了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后，罗章

龙等于 1 月 31 日擅自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非常委员会到处散发文件，四处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在此情势下，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出现了与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相呼应的“紧急会议筹备处”。同年 2 月，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指派杨璞，“紧急会议筹备处”指派白明善，分别前来陕北，向中共陕北特委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杨璞和白明善的陈述。在听取陈述后，陕北特委领导感到事态复杂，决定不允许他们再向下级组织进行宣传。

这次紧急会议后，白明善因叛徒告密，在清涧县城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随后被押往榆林关押。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派员宋志先和榆林县党部部长孙士英亲自审问白明善，并使用酷刑进行逼供。

但白明善坚贞不屈，被判处七年徒刑，并投入陕西省第三监狱。1932 年 1 月 21 日，白明善英勇就义。在 1945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白明善的名字被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

在中共河北省委和“紧急会议筹备处”都加紧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共陕北特委为了进一步辨别是非，以王林、赵伯平、常应黎组成陕北代表团，于 3 月 19 日前往北平，向中共河北临时省委请示汇报工作。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由孔祥祯主持。

同年 4 月，共青团陕北特委为开展纪念“红五月”活动，发动榆林中学学生到处张贴标语。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和大搜捕。中共榆林县委书记石作奇等 14 人被捕，榆林县党、团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在此情况下，孔祥祯等被迫离开榆林。

陕北代表团在完成请示汇报任务后，王林留河北临时省委另行分配工作，赵伯平、常应黎和接替孔祥祯职务的张资平，于同年 7 月分两路返回陕北。赵伯平等经过组织整顿，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将党、团陕北特委机关转入农村。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至米脂县的姜兴庄村。此后，中共陕北特委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迅速转入农村，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以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并要求尽量少开会，党的指示

采取办冬学等方式向党员传达。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佳县南圪村很快办起了冬书房。冬书房的开办，既保护了党员，也促进了革命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根据共青团陕北特委 1931 年 4 月 22 日《关于陕北政治经济情况及团务工作的报告》，陕北各地有共青团支部 45 个，团员 580 余人。1932 年 12 月 13 日，中共陕北特委报告，特委辖府谷县委、神木区委、米脂区委、佳县区委、吴堡区委、绥德南区委、绥德北区委、清涧区委、安定区委、横山特支、榆林特支、三边特支、三皇峁支部，共计 1 个县委，8 个区委，3 个特支，1 个支部，756 名党员。

中共陕北特委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同时，还开展了创建革命武装的斗争。

1931 年初，中共陕北特委根据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的指示，派遣阎红彦、白锡林等十余名共产党员东渡黄河，帮助中共山西特委建立红军游击队。5 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吕梁山区的孝义县境内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阎红彦兼第一中队中队长，白锡林任第二中队中队长，杨重远任总支书记。从 8 月初起，晋西游击队遭到 1 万多名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晋西游击队根据中共山西特委年初预定的应急方针，决定西渡黄河，前往陕北。9 月 2 日，晋西游击队 30 名指战员渡过黄河，进入陕北。

晋西游击进入陕北后，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先后改造了杨琪、师储杰领导的保运武装，队伍发展到 300 余人。10 月上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精神，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境内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委杨重远。

10 月 20 日，陕北游击支队到达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之后，红二十四军余部也于同年 9 月间，由山西河曲一带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府谷地区。

红二十四军是在中共山西特委领导下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

1930年秋，高桂滋部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退至山西平定，接受蒋介石改编，出任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师长。1931年6月下旬，在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的领导下，担任高桂滋部营长的共产党员赫光在平定率七个连举行起义。7月3日，起义部队宣布成立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政委谷雄一，副军长窦宗融，参谋长刘明德，政治部主任刘子祥，杨重远任中共军委书记，全军共1100余人。随后，起义部队转移至阜平县，成立了华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红二十四军的迅速发展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调集重兵，对红二十四军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红二十四军被打散。余部在继任军参谋长蒲子华率领下，于9月间由山西河曲强渡黄河，进入府谷县境内。红二十四军渡过黄河，在十里长滩与奉命堵截的段作山部展开激战，一举歼灭其两个连。同年10月，红二十四军余部在府谷县黄甫、清水、木瓜一带，与井岳秀部及傅作义部骑兵团激战后被打散。蒲子华被俘后，被押往榆林，英勇就义。

在红二十四军余部转战府谷期间，中共山西特委派来府谷与红二十四军进行联络的梁子修、刘清明不幸被捕。梁子修、刘清明获释后，帮助中共神木南乡区委组建了一支十余人的临时特务队，队长王宝珊。临时特务队在打击郭家塆土豪郭方成时，不幸失败。特务队三人被捕，其中一人被杀害。

关于红二十四军余部进入陕北后失败的原因，中共陕北特委在1932年3月15日给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的第一号报告中这样写道：

“二十四军自阜平失败后，即开始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到陕北后已形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灰色了政治面孔，与农民群众自觉的隔离起来。同时，山西特委新派梁、刘二同志及陕北所派的同志均没

有赶上，因此到榆林北部即为井岳秀缴械。但遣散的士兵有二分之一打入井系各部队中，我们现在设法找寻关系。”^①

晋西游击队与红二十四军余部在 1931 年 9 月间相继进入陕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的大事。但是，两支部队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与中共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委迅速取得联系，得到多方支持，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并进入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后来成为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的骨干力量。而红二十四军强渡黄河、进入府谷后，却不能及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加之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下，很快被打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红二十四军余部入陕后受挫，再次告诉我们：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融洽的群众关系，没有可以依赖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是难以发展壮大的。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94 页。

第二节 陕北革命武装的创建与发展

一、淮宁湾夺枪与红军西北先锋队的建立

（一）淮宁湾夺枪

1932 年 1 月，中共延川区委改为延川县委，书记曹必明，组织委员高明德，宣传委员呼世耀，交通委员罗成德，秘书梁乃斌。中共延川县委成立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积极进行组建革命武装的斗争。

早在 1931 年 1 月，共青团员、延川学生高朗亭就前往榆林城，与共青团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在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等人的支持下，高朗亭开始进行创建革命武装的尝试。赵伯平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陕北人民革命斗争概述》一文中回忆说：“1930 年 12 月 12 日后，延川县共青团员高朗亭到榆林向特委请示工作。高向常应黎汇报说，延川县折家坪有个反动民团，他想夺取民团的枪，建立革命武装。常

说要高朗亭等些日子，见到刘志丹、谢子长后再决定行动。常并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说应当找高朗亭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再做决定。常去找高时，谁知高竟负气走了，特委觉得这是件大事，立即召开常委会进行研究。后通过延川县委，派刘善忠帮助高计划此事。”^①高朗亭在《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见闻》一文中写道：“刘善忠接受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的指示，于1931年1月中旬，在延川县文安驿曹必明家与我会晤。原设想夺取郭驿沟地主民团的枪，因该民团调进延川县城集训而未成。于是共产党员刘善忠和我两人自己筹款买得两支手枪。我们又联合共产党员王保民、田汝霖和在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开过饭馆的杨秉权（非党的革命群众）等同志，就秘密带着这两支手枪来自卫，在横山、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子长、延安、米脂等县农村进行秘密联络。”^②

在中共延川区委的领导下，经过刘善忠、高朗亭等人的秘密活动，在横山、绥德、清涧、米脂、吴堡、安定、延川等县建立了18个秘密联络站、点和数十个秘密农民协会，在延川县上田家村设立联络总站，称为五号联络站，田得雨任总站站长。

1932年2月底，刘善忠和高朗亭等向中共延川县委汇报了一年来的准备工作情况。延川县委决定，可以伺机发动起义，组建红军游击队，并责成刘善忠、高朗亭负责。高朗亭回忆说：“我们即在安定县井尔湾联络站作准备。王保民执笔以北平某大学生名义给清涧县淮宁湾民团团总邱树楷写了一封信，我们到距淮宁湾五华里的沐沟峪联络站。在康自威的协同下，进一步了解到雷珠山寨的近况，知道邱树楷团总不在山寨，最后决定了行动时间，按行动方案作了演习。”^③

3月12日，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高文清以慰问团丁为名，进入清涧县淮宁湾雷珠山寨子^④，机智地缴获了邱树楷民团的六支步枪。淮宁湾夺枪胜利后，刘善忠、高朗亭等连夜返回延川。3月13日，在延川县上田家村，中共延川县委书记曹必明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中共延川县委抽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杨森茂、高中岳、刘益三、杨桐、高列熊、高文俊等

人和霍德胜、高向山、高明有、张红、师成录、呼老四、康作桂等青壮年群众，加入延川游击队。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26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70—471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71 页。

④今属子洲县。

（二）组建红军西北先锋队

延川游击队成立后，广泛活动于延川、延长、清涧、绥德、安定等县，打土豪，分粮食，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游击队在绥德留仙嘴，将大土豪白登高的契约账簿一举焚烧，并筹得银元 2400 多块。游击队利用其中部分款项，买到一支冲锋枪、一支步枪和子弹 1000 余发，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1932 年 4 月 18 日拂晓，延川游击队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突袭延川县永坪镇民团，俘获了永坪区长兼民团团总刘广汉，焚烧了永坪区公所的税捐档案，并缴获步枪 17 支。随后，中共延川县委和延川游击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刘善忠任司令员，高朗亭任政委，杨作栋任参谋长，刘益三任经理处长。西北先锋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杨秉权，第二中队中队长党克明，第三中队中队长康作桂。当时，西北先锋队共有 70 余人，有长短枪 30 余支。

红军西北先锋队成立后，利用永坪镇延川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的油印机刻印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告农民书》《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明军律》等各 200 多份，在永坪镇上广泛张贴。西北先锋队还在永坪镇张贴了宣布没收基督教会牧师吕仙笙和高利贷经营者刘光明财产的布告，并宣布永坪全区民众免交捐税。

当天傍晚，正当西北先锋队准备撤离永坪镇时，突然遭到来自安定县瓦窑堡镇驻军骑兵团两个连的袭击。西北先锋队猝不及防，队伍被冲散。随后，刘善忠、高朗亭等先后来到距永坪镇 15 华里的姐姐圪堆山，在山顶的真武庙里休息，并集合被打散的队伍。至 4 月 22 日下午，西北先锋队除一名受伤被俘的骨干队员杨桐（后牺牲）未外，其余队员全部集合于姐姐圪堆山，并增加了 3 名新战士。

4 月底起，刘善忠和高朗亭各带一部分指战员，分别向绥德、清涧和延安、延川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5 月 20 日晚，混进西北先锋队的哥老会骨干董凤清等在延川东北的华家峁暗杀了刘善忠，并随即逃跑投敌。第二天晚上，高朗亭被先锋队指战员公推为司令员兼政委。

6 月初，西北先锋队在延长县安沟镇一带与高岗、党益三带领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一部会合。西北先锋队和第五支队一部曾一度合编，准备前往陕甘边界地区投奔刘志丹。后因高朗亭伤势难以痊愈，无法远行，遂与高岗、党益三等分手。6 月下旬，西北先锋队回到延川、清涧、安定一带的游击根据地。此时，部队实力严重受损，仅有十几个人和十几支枪。

7 月中旬，在延安城南红寺村养伤痊愈的高朗亭回到延川，重新归队。7 月 26 日晚，在上田家川五号联络总站，高朗亭在站长田得雨、一中队中队长杨秉权和高文秀、田汝霖、高元亮、田沛霖等先锋队指战员的协助下，对一批阴谋叛变投敌的坏分子进行了处理，处决了为首谋叛的先锋队参谋长杨文栋和高文清，开除了几名胁从谋叛的动摇分子。

此后，西北先锋队一些失散的指战员陆续归队。经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西北先锋队迅速恢复了战斗力，部队内部也出现了团结稳定的新局面。9 月 25 日，高朗亭在米脂县镇子湾联络站见到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宣传委员马明方、秘书长崔逢运。高朗亭汇报

了延川游击队和西北先锋队组建以来的情况。经赵伯平和马明方批准，高朗亭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0月1日，中共陕北特委做出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九支队队长，艾龙飞为政委，张承忠、王保民为经济员。关于为什么命名为“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陕北代表团在1932年12月13日给中共陕西省委的第三号报告中解释说：“因我们知道陕甘共有八个支队。”^①陕北特委确定了九支队今后的具体工作：“甲、九支队目前的政治任务（解除豪绅地主的武装，武装工农劳苦群众，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并创造陕北新苏区……）；乙、发动群众的抗粮抗款抗租税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游击队，坚决克服离开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和代替群众斗争的倾向；丙、在未发动以前先做一短期的准备工作（军事技术上的准备，群众中的宣传鼓励和组织工作，特委给派军事上政治上强的干部）；丁、收缴某团绅枪械后，即打红旗公开行动；戊、与第八支队发生密切关系与配合，并给八支队负购子弹药品的任务。”^②九支队组建后，陕北特委将其活动范围划定在延川、安定、绥德、清涧、延安、延长等县，并指定延川县上田家川村的五号联络站为陕北特委与红九支队的联络点。陕北特委派共产党员马万里、贺吉祥、栾新春、高庆恩、杜修植等十余人参加红九支队，由马万里任红九支队委员会书记，高朗亭、艾龙飞、张承忠、景乐礼、王保民为委员。

1932年10月20日，中共陕北特委和延川县委在延川县高家圪塔召开群众大会。陕北特委巡视员毕维周代表特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正式成立，并颁发了队旗和关防。毕维周还代表特委，“命令红九支队积极筹款，寻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巩固扩大游击根据地，组织群众进行斗争”^③。

红九支队组建后，在延川、清涧、绥德、安定、延长广泛开展游击活动，宣传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打击土豪劣绅和收税、收款的官吏。同年12月9日，红九支队在清涧县高杰村抓获大地主白明杨，筹到银元3400块，羊毛衣100多套，蓝、黑布各15匹。次年1月，

红九支队将其中的 2000 块银元上缴陕北特委作为活动经费。此后，红九支队又相继缴获了地方反动民团和土匪武器 10 余件，进一步壮大了队伍。

1933 年 2 月 9 日，是农历元宵节。红九支队在获得安定县长刘述明将由安定县城^④前往瓦窑堡的情报后，在栾家坪秀延河桥东侧秘密设伏。当天上午 10 时左右，当刘述明带着两个护兵，骑马走上桥头后，被强世清击毙。两个护兵一个骑着县长的马逃跑了，一个被俘缴械。随后，强世清等将红九支队的布告张贴在大路旁和栾家坪村显眼的地方，迅速撤离。国民党安定县县长被红九支队击毙的消息传开后，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33 年 4 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红九支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强世清任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

刘善忠、高朗亭等在淮宁湾夺枪后先后组建的延川游击队和红军西北先锋队，是陕北地区最早建立的革命武装，在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12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12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76 页。

④今为子长县安定镇。

二、陕北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

（一）高起家峁会议的决策

陕北代表团于 1931 年 7 月返回陕北后，中共河北临时省委长期未与陕北特委联系。在此情况下，鉴于陕北党组织原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北特委隶属关系变更后，又与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这一特殊情况，陕北特委决定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1932 年 11 月，由

赵伯平、崔逢运、鲁学曾（鲁贲）组成陕北代表团，绕道山西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要求解决陕北党、团组织的归属问题。因中共陕西省委与陕北特委只发生横的关系，陕西省委帮助崔逢运、鲁学曾前往北平，与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恢复了组织关系。陕西省委还决定调赵伯平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孔原到达天津，主持党在北方地区的工作。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归孔原领导。同年5月下旬，崔逢运、鲁学曾、毕维周先后返回陕北，传达上级指示。

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狐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特委成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鲁学曾，交通崔逢运，游击队代表高朗亭，绥德代表崔田夫、崔田民、唐洪澄，府谷代表贾怀智，佳县代表张达志、高长久、张岗、高禄孝，其他方面代表王国昌、赵福祥等，共20多人。

会议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对陕北工作的指示精神。马明方代表特委做工作报告，总结了陕北特委一年来的工作，分析了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土地革命形势，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并决定加紧开辟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府（谷）三个游击区域，扩大和建立红军游击队。会议通过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会议选举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张达志、崔田民、常学恭、鲁学曾、崔逢运、高长久11人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毕维周，秘书长崔逢运，军委书记王兆卿，农委委员张达志。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由鲁学曾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①，马文瑞为组织委员，崔田民为宣传委员，赵福祥为团陕北特委委员。会议还决定，毕维周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工作，并担任一支队政治委员。

高起家狐会议在陕北党的历史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这次会议是陕北游击战争由组织准备转向

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高起家抓会议后，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领导的革命武装得到迅速发展。

高起家抓会议结束后，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和崔明道、高禄孝，因奸细董培义出卖，于7月31日在镇川堡^②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同时，国民党军队又在米脂县城逮捕了共产党员高庆恩（高寿）、王守支（王品肖）。国民党当局把王兆卿、毕维周等人关押在米脂县政府看守所，施以酷刑。但王兆卿，毕维周等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供出中共组织和党员的名单。

王兆卿、毕维周等被捕后，中共陕北特委和米脂县党组织曾多次想方设法组织营救。8月3日，国民党驻军以将王兆卿等六人解押绥德团部为名，将他们押至米脂城南十里铺官家湾，枪杀在无定河畔。

当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刽子手刀枪的阻拦，抢回了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的遗体。王兆卿、高禄孝、王守义的遗体被凶残的刽子手无情地抛入无定河中。这起事件被称为“无定河惨案”。

无定河惨案发生后，中共陕北特委于8月中旬在佳县寨子沟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认为，王兆卿、毕维周等人虽然被敌人残酷杀害，但陕北党、团组织未受破坏，各地党、团员仍在积极活动。会议决定，为更好地贯彻高起家抓会议精神，坚定信心，搞好工作，决定派特委委员常学恭前往平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工作。特委其他成员分别前往各地巡视，整顿组织，传达高起家抓会议精神。会议还决定加强保密工作，进一步改进斗争方式。

寨子沟紧急会议以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佳县乌龙铺镇迁往南峁村。

1933年10月20日，中共陕北特委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报送了书面报告，汇报了无定河惨案的经过及高起家抓会议的内容。陕北特委还在报告中汇报了陕北各地党组织的状况与工作。根据这份书面报告，陕北特委下辖的党组织分别为神木区委、佳县区委、府谷区委、吴堡

区委、绥德区委、清涧区委、榆林特支、横山支部、镇川支部、米脂支部、绥德西川^③支部等，共有支部 69 个，共产党员 1885 名。

①同年 8 月，马文瑞接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

②当时属米脂县，今属榆林市榆阳区。

③今属子洲县。

（二）南圪村会议和神堂沟会议

1933 年 12 月 11 日，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李华生在北平召开陕北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郭洪涛、崔逢运、鲁学曾、常学恭、李铁轮、安建平、尤香斋等人。李华生传达了北方代表孔原对陕北问题的意见，通过了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的决议，要求陕北党、团特委抓住有利形势，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的斗争，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会上，李华生代表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宣布，中共陕北特委到北平汇报工作的常学恭、崔逢运、鲁学曾不再返回陕北，另行分配工作；派郭洪涛、李铁轮到陕北特委工作。

在这次座谈会之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奉上海临时中央局指示，于 1933 年 11 月委派谢子长为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军事工作。

谢子长在 1932 年 12 月被中共陕西省常委、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杜衡排挤出红二十六军，与阎红彦一起到上海中央局“受训”。1933 年夏，谢子长被派往中共北方局工作。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谢子长被派往同盟军第十八师，协助担任师长的共产党员许权中指挥部队并做党的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又到平津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4 年 1 月，谢子长回到陕北清涧，在杨家沟与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中共陕北特委随即指派白雪山、崔正冉、王聚德护送谢子长回到家乡安定西区。

1月底，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坵村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郭洪涛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与会人员不同意北方代表关于陕北特委“右倾”、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对开展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的种种指责。会议同时决定：按照高起家坵会议精神，加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发展二、三支队，新建四、五支队，开辟新的根据地；党团组织分设，自成体系；广泛建立各种群众组织。

南坵村会议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往佳县王家畔和吴堡樊家圪坨一带。

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会议，再次抵制了中央驻北方代表所谓“陕北党犯了富农路线”等错误的指责。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在陕北创建一师红军，武装开辟村庄，使苏区连成一片；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为了贯彻神堂沟会议精神，中共陕北特委于5月初在佳县王家畔召开了游击区和游击队代表会议，检查了神堂沟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并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决议分为“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陕北游击运动中形成的经验教训”“为创造陕北新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而斗争”“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四个部分。决议指出：“陕北自去年扩大会议^①完成后，各地工作正由富农路线部分的转变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去。自去年在中央北方代表领导之下的陕北党团联席会议所通过陕北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以后，一般的陕北党已经和富农路线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脱离群众斗争的倾向做过极残酷的斗争，已经坚决地转变过去不正确的领导方式，坚决的执行中央路线，组织与发动和领导扩大的劳苦群众斗争，在群众中建立党的领导与威信。”^②决议第四部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中指出：“完成创造陕北新的红军与苏区的光荣的历史任务，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有决定的作用。巩固与严密的组织，开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大胆提拔工人、雇农干部到特委和县委的领导机关来。党彻底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③

王家畔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对陕北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这个决议的通过，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陕北特委已开始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接受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对陕北党组织的“左”的指责，并对陕北特委以后的工作产生了消极作用。

①指高起家城扩大会议。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69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74 页。

（三）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的受挫及恢复

1933 年 4 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随后，红一支队在强世清、李成荣率领下南下陕甘边。5 月 10 日，红一支队在中部上畛子一带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会合。红一支队将所带的马匹交给红二团，红二团为红一支队补充了枪械弹药。为了加强红一支队的领导，刘志丹派杨重远担任红一支队政委，马佩勋任副支队长，调李成荣去西安工作。

此后，红二团完成外线作战任务后，返回照金。红一支队则返回陕北。5 月 29 日，红一支队在安定谭家砭被国民党瓦窑堡驻军张建新营包围。杨重远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红一支队在强世清、马佩勋带领下，在安定西区、北区一带展开游击活动。到 6 月下旬，红一支队发展到 80 多人，下辖 5 个分队。

同年 9 月 21 日，红一支队除留下第一分队由队长白德胜、指导员任志贞带领，就地坚持斗争外，其余 70 多名指战员由强世清、马佩勋带领离开安定东沟，经保安县白沙川，南下陕甘边。9 月下旬，红一支队在合水县固城川与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会合。随后，红一支队参加了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的战斗。10 月 18 日，红一支

队与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攻克合水县城。红一支队在补充了一批武器弹药后，奉命返回陕北。魏武调任红一支队政委。副支队长马佩勋被派往吴堡县开展工作。

同年 11 月 7 日，红一支队回到安定。11 月 20 日，红一支队在枣树坪战斗中失利。随后，在安定温家坡战斗中，红一支队再次失利，政委魏武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强世清受伤后，在养伤期间被叛徒出卖，于 12 月 15 日被捕。1934 年 3 月 4 日，强世清在安定县城英勇就义，年仅 22 岁。

强世清负伤后，由一分队队长白德胜代理红一支队支队长。不久，红一支队再次被国民党军打散，白德胜被俘，其余队员埋枪分散隐蔽。白德胜的妻子任志贞奉命前往绥德田庄做地下工作，旋因叛徒出卖被捕。1934 年 2 月 13 日，白德胜、任志贞夫妇在瓦窑堡南门外英勇就义。

1934 年 1 月下旬，谢子长回到安定西区后，开始在国民党军队的“清剿”中恢复整顿红一支队。3 月 8 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安定刘家圪崂村恢复，李盛堂任支队长，刘志清任政委，谢绍安任副支队长。红一支队恢复时，仅有 20 多人。在谢子长的领导下，红一支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摧毁了地方反动保甲，消灭了一些小股民团。同年 6 月，红一支队与陕甘边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刘约三部联合作战，在窑子峁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部又一个排，给敌人以很大震动。至此，红一支队已发展到 50 余人枪。此时，谢绍安任支队长，贺晋年任政委。

1934 年 9 月 18 日，红一支队和红八支队在安定崖窑沟合编为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贺晋年任团长，马佩勋任政委，路文昌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新的红一支队和红八支队，红一支队支队长姬占庭，政委刘明山；红八支队支队长高志明，政委李盛堂。

（四）陕北游击队第二、三、四、五、六支队的建立

1933年7月召开的高起家狐会议，明确提出了扩大和建立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会后，陕北特委委员分赴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指导基层组建红军游击队。

高起家狐会议结束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和特委委员崔田民到绥德、清涧一带，准备创建红二支队，并选调高朗亭参加。当时，清涧县的共产党员王聚德和绥德县共产党崔正冉，已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来到陕北的罗永宽手中获得了三支驳壳枪。罗永宽也由王聚德、王有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情况下，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和中共绥德南区区委负责人决定，以现有的三支驳壳枪为基础，选调优秀党员和团员，建立第二支队。游击队员的选调由绥德南区区委负责，支队的组建工作由崔田民、高朗亭负责。7月29日，崔田民、高朗亭由绥德刘家湾村联络站来到清涧县王家山村，向王聚德和罗永宽传达了陕北特委组建红二支队的决定。王聚德、罗永宽表示坚决执行特委决定。随后，由绥德南区区委选调的游击队员陆续来到了王家山。

8月5日，崔田民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王家山村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成立，支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经济员王聚德。游击队员崔正冉、白光立、宜宝才、贺胜等，全支队共十余人。^①

红二支队成立不久，首先镇压了恶贯满盈的绥德南区区长薛运通，没收了他的财产，并出示布告历数他的罪恶。1934年1月21日，红二支队在红一支队部分指战员的配合下，袭击清涧县解家沟据点，当场处决了豪绅、地主和收款员十人，其中一人因连砍几刀而未死，故称之为“九个半”。解家沟除害获胜，大长了当地革命群众的志气。绥德和清涧边界地区也因此迅速掀起了革命斗争的高潮。

1934年11月4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红二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团。同时，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小马家山组建了新二支队。

高起家峁会议结束后，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派特委委员马文瑞前往神府地区巡视工作，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马文瑞到神府后，找到区委负责人贾怀光、乔钟灵以及马万里、王兆相等人，确定成立游击队，由王兆相任队长，并立即行动起来。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8月，在20个月的时间内，中共神木区委先后十次组织夺枪、买枪，以牺牲九人的血的代价，换来了一支长枪和三支短枪。这四支枪，成为神木地区创建正式红军的重要条件。

1933年10月18日，神木特务队在神木尚家崬正式宣布成立，李成兰任队长，王兆相任政委，全队共七人，四支枪。11月7日，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神木特务队在松树峰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王兆相任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全队共20余人。此后，高朗亭曾接任支队长，张毅忱、贾怀光、杨文谟先后接任政委。

红三支队成立后，在沙坡西沟、呼家庄、红交寺等地镇压土豪、收款员，声震神木、府谷、佳县。1934年9月，红三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团。

1933年12月30日，中共陕北特委派张达志、马佩勋等人在吴堡县樊家圪坨村组建了吴堡抗日义勇队，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1934年2月6日，薛俊山、马佩勋等率领义勇队突袭佳县木头峪民团，处决了团总张东皎。2月15日，吴堡抗日义勇队在樊家圪坨正式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当时全队共20余人，8支枪，分为2个分队，后发展到60余人。红四支队成立后，活动于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一带。红四支队曾再次攻打佳县木头峪获胜。1934年3月21日，红四支队和红二支队夜袭清涧县店则沟李成善民团，获得胜利，缴枪10余支。

红四支队成立后，薛俊山、郭育仁、宋平生先后任支队长，马佩勋、高长久、主国昌、崔世俊、慕生忠先后任政委。

1935年3月，红四支队与陕北红军第五团合编，组成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三团。

1934年4月下旬，中共绥德县委报请陕北特委批准，在绥德南区王家沟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崔正冉任支队长，政委马万里，副支队长王海山。

红五支队成立后，配合红二支队开辟绥德、清涧和延川东区游击根据地，该支队主要活动在绥德县境内，使绥德南区成为绥德的中心苏区。红五支队人数最多时曾发展到近80人，分设3个中队。1935年3月，红五支队主力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其余30余名队员继续以红五支队名义开展斗争。

1934年5月，由中共佳县县委领导的佳县特务队成立，郭立人任队长，樊文德任政委。同年6月，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佳县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支队长先后为郭立人、王世杰，政委樊文德，副支队长王士文。全队共20余人。红六支队主要活动在佳县南部和吴堡、米脂边界地区。同年冬，国民党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一个排起义，将13支步枪和1挺轻机枪交给红六支队。红六支队士气大振，部队迅速发展将近60人。

1935年2月，红六支队与红十五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五团。此后，中共陕北特委重新组建了六支队。

随着红一支队的恢复和红二、三、四、五、六支队的相继建立，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各地党组织，不断扩大根据地。陕北各地党组织公开组织贫农会185个，建立赤卫队50多个，安定东区、西区及其他县共有120多个村庄成为公开的苏区。在这些地区普遍建立了妇女会、赤少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由贫农会行使地方行政权力。陕北根据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①红二支队成立之后，王聚德、白雪山先后接任支队长，崔正冉、王浩、张毅沈、马万里先后接任政委。

第三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一、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建立

（一）组建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4年5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王家畔召开游击区和各游击队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陕北各支队现没有总指挥部的组织，联合共同建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组织，以便指挥各支队的行动。”^①

根据决议精神，以及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以便集中力量，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保卫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崾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下辖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共300余人。

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以一、二、五支队为主力，在薛兰斌率领的安定赤卫军大队的配合下，于7月17日打开了安定县城。此次战斗，共歼灭民团数十人，缴获大批物资，并营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多名。这是陕北红军首次攻打县城。这一战斗的胜利，威震陕北，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安定城战斗胜利后，谢子长于7月18日率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及赤卫军挥师南下，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会合。

7月25日，中共陕北特委、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与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谢子长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会议决定，由谢子长接替高岗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陕北，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会议并决定由贺晋年接替谢子长担任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

8月初，谢子长率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部队由南梁地区出发，返回陕北。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行。随后，谢子长先后指挥部队取得了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镇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71页。

（二）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七、八、九、十等支队的建立

在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组建了一批游击队支队。

1934年9月上旬，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在府谷县木瓜村成立，韩峰任支队长兼政委。红七支队主要活动在府谷县境内。红七支队创建时共有20名队员，有枪械20余支。1935年2月，已发展到60多人的红七支队被改编为红三团的骑兵连。随后，府谷地区又组建了新的七支队，队长张国继，政委王浩。

在红七支队成立之前，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于7月下旬在安定李家川成立。红八支队是以共产党员栾新春、贺吉祥在7月中旬组织的石窑湾民团哗变人员为基础组建的。贺吉祥在《忆红八支队》一文中写道：哗变时，“我们五人提了六支步枪、四挺机枪和全部子弹。提枪时，民团队长李维俊阻挡抵抗，被打伤逃跑”^①。7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正式成立，支队长栾新春，政委刘明山，副支队长贺吉祥，隶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红八支队成立时，仅有十多人，主要活动在安定县城区、北区、西区、东区和米脂县西区、清涧县北区一带。

同年9月，红八支队被编入陕北红一团。随后，在安定梨树台组建了新八支队。支队长先后为高志明、王正川、陈树海（代理），李盛堂、惠艾申、贺树槐先后任政委。新八支队成立时，有队员50多

人和 20 多支枪。新八支队主要活动在横山县石湾、靖边县青阳岔和安定县北区一带。1935 年 3 月，新八支队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

1934 年 8 月 28 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成立，高朗亭任支队长，王文良任政委，王保民任副支队长。红九支队主要负责巩固扩大延安县东北地区、延川县西部及北部地区、清涧县西南地区和安定县东南地区的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于 1934 年 10 月中旬在安定县杨滴哨村成立，支队长高步仁，政委拓嘉祯。红十支队成立时，仅有十三四名队员，五六支枪。红十支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安定县的李家岔、槐树岔、涧峪岔地区和米脂县西区一带。1935 年 3 月，红十支队被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的前身是陕北游击队临时五支队。临时五支队于 1934 年 8 月 25 日在神木县高家堡点军崖村成立，高永明任支队长，李万栋任政委。同年 10 月，临时五支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刘德任支队长，贾如胜任政委，主要活动在以新寨子为中心的神木、佳县、榆林交界处一带。1935 年 11 月，刘德等叛变投敌，红十一支队番号撤销。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成立于 1934 年 9 月，是以绥德县梁家甲村赤卫队为基础组建的。支队长先后为霍维德、梁凤鸣，政委马龙飞，副支队长马景林。十二支队主要活动在绥德县北部的梁家甲、深沟、前后坪、孙家坩、郭家坪一带。1935 年 1 月 1 日晚，梁凤鸣等叛变投敌，红十二支队解散。

1934 年 7 月下旬成立的安塞第十二支队，也曾使用过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番号，后被称为安塞第十二支队。安塞第十二支队由李治国任支队长，刘志清任政治指导员，主要活动在安塞、安定和靖边交界地区。安塞第十二支队成立时，有队员 30 余人，步枪 17 支。

1934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三支队在靖边县青阳岔龙腰镇过峁村成立，王锦秀任支队长，贺树槐任政委，张四任副支队长。红十三支队创建时，有30多名队员，10多支枪，主要活动在横山、靖边交界地区。1935年3月，红十三支队被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

1934年8月底，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四支队在绥德县土地岔村成立，吴创业任支队长，刘九宫任政委。红十四支队成立时仅有十多名队员，五支枪。到1935年1月，红十四支队已发展到30多人。1935年2月1日，红十四支队和红二、四、五支队一起，打垮了驻防安定县南沟岔的高桂滋部一个连。2月6日，红十四支队又与其他支队一起，在清涧县高杰村打垮高桂滋部一个连。1935年3月，红十四支队被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

1935年1月23日，由中共吴堡县委组织领导的吴堡县保安团部分人员兵变成功。这次兵变，共拉出28人。1月25日，以兵变人员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红十五支队成立后，薛英桂、李启贤先后任支队长，慕生忠任政委，主要活动在吴堡县境内。随后，高桂滋部一个班携带一挺轻机枪举行起义，参加了红十五支队。在20多天的时间内，红十五支队连续取得了火烧山村等几次战斗的胜利，部队迅速扩大到100多人，有枪80多支。1935年2月15日，红十五支队与红六支队合编为红五团。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六支队于1935年2月15日在安定县田家坬宣布成立，支队长先后为王生贵、常在贵，指导员刘明金。红十六支队下辖两个班，共十三四人，主要活动在安定县与安塞县交界地带。1935年12月，红十六支队编入红二十八军第四团。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七支队在延川成立，支队长杨兴元，政委高志安，主要活动在延川县境内。

在此之前，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于1934年8月在横山县清河沟成立。红二十二支队是以曹动之领导的骑兵赤卫

队为基础组建的，吴亚雄任支队长，曹动之任政委，主要活动在横山、靖边、安定、定边和内蒙古鄂托克旗城川、乌审旗一带。1935年12月，红二十二支队被编为蒙汉骑兵游击队。

此外，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还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八支队（活动于延安境内）、第十九支队（活动于延长县境内）、第二十支队（活动于安定县境内）、第二十一支队（活动于佳县、吴堡一带）和第二十三支队（活动于米脂县西部地区）。到1935年2月，陕北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25个支队。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迅猛发展和壮大，使陕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为建设一支执行野战任务的正规红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49页。

二、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一）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1934年5月，在陕北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陕北游击队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井岳秀指挥其所属第八十六师，在各县民团的配合下，以15000余人的兵力，开始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井岳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部署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以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明部“围剿”神府苏区，主要兵力部署在神木东南的沙峁、盘塘、万镇一线，以隔断神府地区与佳（县）米（脂）地区之间的联系。南线的安定和绥（德）清（涧）地区是“围剿”部队的主攻方向。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高双成部和第二五八旅各一部，随附大量地方民团，沿无定河及大理河，在青阳岔、石湾、双湖峪、绥德、薛家峁、清涧一线，对安（定）绥（德）清（涧）红色区域构成一个马蹄形包围圈。在战术上采取分散配置，以连排为单位，多股分途，修筑寨堡，组织保甲，逐村蚕食，逐地推进，做向心压缩。在

兵力使用上，进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分为驻剿和追剿两个梯次，驻剿部队在清涧高杰村、河口镇、店则沟等地驻扎重兵，企图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两种手段，摧毁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的群众基础。追剿部队则在于捕捉红军游击队主力和地方赤卫军、少先队。敌军进剿安定红色区域的突击方向分别是东区和西区：东区由绥德沿淮宁河川道经田庄西进安定东区；西区则由横山石湾沿大理河支流川道，向安定西区进犯。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实施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使根据地和游击区受到极大破坏。一些地方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中共清涧城区区委负责人周继丰、惠金瑞，高杰村区委成员白志强、白振纪，共产党员惠志儒、白家荣，共青团员惠生荣等先后被杀害。1934年8月6日，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被捕。8月8日，崔文运英勇就义。

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面前，中共陕北特委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集中力量，击退敌人进攻。7月8日，以谢子长为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指挥部在安定杨道崙成立。随后，谢子长指挥红一支队、红二支队、红五支队和安定赤卫军，于7月17日攻入安定县城。安定城战斗胜利后，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主力南下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合。红一、二、五支队南下后，中共陕北特委为了保护国民党军队重点“进剿”区域的麦收，将红四支队从佳县、吴堡地区调到绥德、清涧一带，在各个山头上设置岗哨，监视国民党军的行动。红四支队和地方赤卫军白天保护群众收麦，夜晚袭扰国民党军，使得“进剿”根据地之敌十分疲惫与恐慌，从而胜利完成了保护根据地麦收的任务。

（二）景武家塌大捷

1934年8月15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返回陕北根据地的安定西区。在分析了敌情

后，谢子长决定集中兵力，以确保具体战斗中红军的绝对优势，消灭以连为单位的“进剿”之敌。

景武家塌位于安定西区，是一个位于半坡上的山村，村后有一座高山。这里北距横山石湾约 10 公里。

8 月 17 日，驻扎在石湾的第八十六师五一五团姜民生部一个连向安定苏区进犯，窜入景武家塌。谢子长得到情报后，决定抓住这一战机，歼灭这股孤立之敌。8 月 18 日拂晓，由王世泰、黄罗斌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从景武家塌村后的高山上向下发起进攻。陕北红一、二、五支队则抢占村子对面山和沟底，向敌军进攻并截断敌人退路。王世泰回忆说：“我军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一阵猛冲猛打，把敌人压到村子里。这一连敌人，虽然只有 100 多人，但是武器精良，作战顽强，钻进村凭借院墙和窑洞，拼命抗击。经过激烈战斗，大部分被歼，一小部分被我军压到沟底下，被游击队消灭了。”^①

景武家塌战斗，红三团和陕北红一、二、五支队紧密配合，共毙敌 30 多名，俘敌 80 多名，缴获长短枪 100 多支。

景武家塌大捷，全歼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一个连。这一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安定苏区的形势大为好转。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75 页。

（三）张家圪台战斗

谢子长率领陕北红一、二、五支队和红三团取得景武家塌战斗的胜利后，在安定玉家湾稍事休整，即挥师东进，经南沟岔和老君殿等地，向绥德方向前进。马佩勋回忆说：当部队“路过安定北区强世清被俘的地方时，子长立即命令部队停下，下马肃立，静默三分钟，向英勇牺牲的强世清、强龙光、强世光、白德胜、任志贞同志致哀。谢子长在队前讲了话，他说：‘强龙光、强世清、强世光，他们弟兄三

人，还有白德胜、任志贞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们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后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子长对牺牲了的革命同志念念不忘，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①。

8月22日，谢子长率部队到达绥德南区的张家圪台。驻店则沟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五一五团姜民生部一个排向红军扑来。谢子长指挥部队迅速还击，并将这一排敌人全部歼灭。驻守薛家峁的五一五团一个连前来增援，也被红军击溃。

张家圪台战斗，共歼敌两个排，缴枪六七十支。这一战斗的胜利，使井岳秀部“进剿”陕北根据地的指挥中枢绥德县城受到威胁。井岳秀被迫将西进安定东区的“进剿”部队调出，回防绥德、田庄和薛家峁等地。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92—493页。

（四）河口镇战斗

张家圪台战斗胜利后，谢子长率部队乘胜南下，经下武林、白家川等地，直取清涧县的河口镇。

河口镇地处黄河与无定河的交汇处，是晋陕黄河段的一个重要渡口。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的一个连和一些地方民团驻守河口镇，与驻清涧、延川的国民党军形成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是安（定）绥（德）清（涧）苏区东南部的一大祸患。

8月26日深夜，谢子长率部队从袁家沟冒雨出发，抵达河口镇。27日拂晓，进攻河口镇的战斗打响。红三团担任主攻任务，从山顶直扑敌军阵地。陕北红一、二、五支队控制黄河渡口，截断敌军东逃路径，从东西两面发动攻击。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敌军退至几个碉堡及村边的工事里，恃坚固守。谢子长在指挥部队几次强攻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亲自前往前沿阵地查看地形，组织进攻，被敌军子弹击中胸部。王世泰回忆说：“部队整整打了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不

堪，给部队行动带来许多困难。子长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短时间很难打下这个据点，命令部队撤出战斗。”^①

红军撤出战斗后，驻河口镇的国民党军担心红军再次进攻，随后东渡黄河，绕道山西逃回清涧县城。河口镇遂宣告解放。

河口镇战斗后，陕北红一、二、五支队北上横山，在董家寺击溃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一个营。

经过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镇和董家寺战斗，陕北红一、二、五支队与红三团并肩作战，取得了拔除敌军 3 个据点，毙敌 200 多名，俘敌 100 多名，缴枪 160 多支的胜利。与此同时，在神府和佳县、吴堡地区活动的陕北游击队第三、四、六支队也积极捕捉战机，打击敌军，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不断发生哗变，力量减弱，至 8 月底，国民党军队向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已被粉碎。

红三团在完成北上陕北、协同陕北红军游击队作战的任务后，于 9 月上旬奉命返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76 页。

第四节 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

一、组建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

在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粉碎的大好形势下，中共陕北特委于 1934 年 8 月 28 日在清涧县寺里召开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部署第二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张达志、郭洪涛、李铁轮等。马明方在会上做了关于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经验教训的报告。会议决定正式建立各级工农政权，开展分配土地工作；进一步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撤销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将

第一、二、三支队分别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前往天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要求派得力干部加强陕北的工作，并给红军番号，以统一陕北的红军组织和领导。崔田夫在《回忆陕北党的活动情况》一文中写道：“我到天津后，给北方代表汇报了陕北情况，先后停留了一个多月。北方代表答复是：一、以后给陕北派20名做文化工作的干部；二、五人成立省委；三、陕北红军番号是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四、要求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活动。”^①

1934年9月11日，中共陕北特委发出《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明确指出：“（执行）坚决地扩大游击队的政策，反对借口武装太少而不扩大游击队的不正确观念。号召广大的劳苦群众参加游击队，使游击战争普遍的开展。责成二、三支队于最短期间，立即各完成一团红军的任务。安定红军^②立即充实起来，帮助佳县、横山游击队，扩大佳横游击战争。”^③

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1934年9月18日，红一支队与红八支队在安定县崖窑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下设第一、二、三连和骑兵连，共计200余人。

同一天，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县王家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全团下设第一、二连和先锋连，共200余人。

11月4日，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东区小马家山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二团，团长郭育仁，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马三），下辖第一、二、三连和学生连，共300余人。

至此，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组建了三个红军正规团。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虽然称之为陕北独立师，但是未建立师部及任命师级军政主官，各团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执行战斗任务。

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二、三团的相继成立，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76 页。

②指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05 页。

二、红二十七军的建立

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在 1934 年 9 月 15 日给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猛烈的武装群众，用一切武器（就是旧式原始武器也是重要的）实际武装起来。这是解决历史上最大的冲突，保障陕北革命胜利最主要的工具，丝毫的迟缓与观望都必须受到严重的打击。”^①指示信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完成‘创造红军’的任务，把游击队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成分最好的部分编成正规的红军。首先完成你们所提出的红军的独立师，在斗争中去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真正的按照红军的编制组织起来，保障其中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的骨干。”^②

10 月 15 日，中共陕北特委在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报告中汇报说：“陕北党正在为打通几个苏区与完成一师铁的红军而斗争。”^③希望中央“派红军中的高级军事政治干部各一人以上，担任红军中的领导干部”^④，并希望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送来。

12 月 8 日，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陕北最近的工作情况，并向中央提出建议：“（1）迅速给陕北派来政治、军事、妇女、文字工作的人材；（2）建立西北领导机关；（3）派人巡视陕北；（4）多给陕北发文件与指示。”^⑤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相继成立后，主动出击，多次获胜。1934 年 10 月 13 日，红一团在安定玉家湾伏击了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炮兵营。10 月 15 日，红一团一部分与新一支

队和第十三支队袭入安定县城，打死了安定县民团团总李丕成，缴枪十余支，子弹千余发及一部分物资。1935年1月19日，红一团与第九支队会合，在延川县青坪川歼灭了延川县民团，活捉民团总指挥高善亭，击毙了团总刘广汉。这一仗，共俘敌200余名，缴枪200余支和几千发子弹。红二团则策动清涧东区地主武装、大刀队等哗变成功，扩大战斗人员200余名。红三团也先后袭击了府谷重镇哈拉寨，参加了牛面梁战斗，威震神府地区。

在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屡屡获胜、迅速扩展的形势下，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5年1月30日，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村^⑥正式成立。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对红二十七军的组建十分重视，多次过问和指导部队编制及领导配备工作。

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由杨琪任师长，政治委员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经理处长崔世俊，下辖第一、二、三团。

1月31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首战南沟岔获胜，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第四九九团一个前哨加强连，缴获机枪3挺和步枪100多支。

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后，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红六支队和红十五支队于2月15日召开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将这两个支队合编为红五团，王士杰团长，慕生忠任政委，李启贤任副团长，樊文德任参谋长，全团共180余人。

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建后，由于第三团在神府地区活动，不能与师的主力会合，遂将该团改为神府独立团，坚持神府地区的武装斗争。中共陕北特委将红五团改为第三团，纳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建制。

至此，陕北革命根据地共有两个师的主力红军，一个正规独立团，几十支游击队和两万多人赤卫军，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相互支援的局面。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08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09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18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21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42 页。

⑥今属子长县。

第五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经济、文化建设

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一）群众组织的建立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县级工农民主政权建立之前，由群众组织负责乡、村事务的管理工作，实际履行了基层政权的职责。群众组织主要包括贫农会、雇农工会、妇女会等。

早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陕北地区的群众组织就已经开始建立。1928 年夏，在中共米脂县委的领导下，米脂县农民协会成立，姜好兴、贺达渊为负责人，领导农民进行吃大户、要义仓粮的斗争。1929 年 6 月，在中共佳县区委的领导下，佳县成立了“农民之友会”，组织农民与地主豪绅开展斗争。1933 年 8 月，在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张达志的领导下，贺生荣、尤良等组织动员了清涧数千名农民将县城包围，迫使清涧县政府答应了围城农民提出的部分抗粮条件。随着这一斗争的胜利，由白施彩担任会长的清涧县贫农会成立。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在根据地各县的乡、村普遍建立了贫农会组织。贫农会既管理地方民事，又负责游击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

由于陕北地区经济落后，只有数量有限的小煤窑、小盐场和毛织、酿酒等手工作坊，产业工人数量很少，因此，工会组织主要是以破产雇农为主组织的雇农工会。1929 夏初，在共产党员李景林的领导下，以张宗贤、张建材为首的绥德县三皇峁数百名盐工，围困地方当局设立的盐局，要求减轻盐税。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1934 年 6 月中旬，中共府谷县委和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指派贺伟等，在清水乡青春峁煤窑组建了一支以煤矿工人为主的武装游击队，韩峰为负责人。这支武装游击队在当地的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陕北根据地组织的乡村雇农工会，由于人员普遍较少，基本是集体参加当地贫农会的形式，并在贫农会中发挥领导骨干作用。陕北根据地建立的县级工会，主要是以贺开全任主席的清涧县总工会。

陕北根据地的妇女会组织，主要设在乡、村。妇女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土地革命斗争，为红军游击队缝补衣服，做鞋袜，护理伤病员。有的妇女还承担了送信、放哨、侦探敌情的任务。妇女会在根据地的“扩红”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妇女会的广泛宣传教育下，根据地出现了很多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感人事例。1934 年 6 月，清涧县高杰村白振纪烈士的遗属刘景如，带领本村的白云凡、白茜、白凤梧、白烈飞、白健、白凌云、白国英、白怀英、白守春九名姑娘（人称“十姐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中共陕北特委和清涧县委的领导下，“十姐妹”毅然走出家门，大胆开展妇女工作。她们走乡串户，宣传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帮助妇女剪短发、放足，组织妇女给红军游击队缝衣服、做军鞋，护理伤病员。“十姐妹”的事迹在陕北根据地广泛流传。

在妇女运动深入开展的形势下，绥德县妇女联合会于 1934 年 8 月成立，王静任主任。这是陕北根据地第一个县级妇女会组织。

陕北根据地群众组织的普遍建立，团结了广大劳苦群众，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县级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

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共陕北特委多次提出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1933年7月召开的高起家狐会议，提出了在条件比较成熟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任务。1934年4月召开的神堂沟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武装开辟村庄，使苏区连成一片；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34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明确要求：“在陕北很快地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府，统一军事行动。”

①

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建立各地工农民主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4年8月25日，安定县革命委员会在涧峪岔景家河村成立，刘光显任主席。这是陕北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革命委员会内设土地、劳动、粮食、财政、教育、军事等办事机构，下辖西区、北区等四个区苏维埃政府。同年11月下旬，安定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李家岔区龙嘴河村召开，决定将安定县改名赤源县，并选举成立了赤源县苏维埃政府，薛兰斌当选为主席，康润民当选为副主席。赤源县辖安定县西区、北区，横山县石湾一区，靖边县东区和安塞县东北部分地区，下设十个区苏维埃政府。

9月12日，清涧县革命委员会在鹿儿原村成立，主席白世杰，副主席王文随，军事委员白炳忻（马义），肃反委员黄石山，土地委员王占山，文化委员惠子明，经济委员张子良，粮食委员吴台亮，劳动委员王光山，秘书刘呈云。清涧县革命委员会下设东一区、东二区、中一区、中二区、北区、南区和城区。

在清涧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陕北特委以清涧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县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条例，要求各县参照清涧县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把临时政权建立起来。一般是在各县县委领导

下成立筹备委员会，由筹备委员会确定党、团、游击队、群众组织代表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中的人数，由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在此之后，神木县革命委员会于9月18日在王家庄成立，呼子威（后叛变）任主席。同年11月7日，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改为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仍由呼子威任主席，王恩惠任副主席，下设五个区。

9月下旬，中共佳县县委报请陕北特委批准，在马连塔村召开了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马明方、张达志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主席王好明（后叛变），副主席高述先，财政委员会主任任自新，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飘萍，土地委员会主任张成功，粮食委员会主任乔兴和、副主任曹俊凯，民政委员会主任郭文华、副主任张文直，保卫委员会主任曹华山、副主任高录忠，军事委员会主任贺大增、副主任马增前。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下设五个区，即南区、北区、中区、沿河区，并在米脂县东部设立了米东区。同年10月，在背沟村召开了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佳县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主席高长直，副主席高述先，财经委员会主任任志钊，粮食委员会主任乔兴和，肃反委员会主任高录忠，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飘萍，军事委员会主任贺大增、副主任马增前，土地委员会主任张成功，民政委员会主任曹俊凯，保卫队长曹华山。

11月3日，吴堡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后冯家畔村召开。出席会议的近400名代表用差额选举的方式，在7名候选人中选举5人组成吴堡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庆玉（老杜），副主席丁茂义，委员薛克明、高飞、霍云林。县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后，任命霍云林为财政委员会主任，王德华为粮食委员会主任，李选益为代表委员会主任，薛克明为保卫委员会主任。吴堡县革命委员会下辖三个区。1935年1月20日，吴堡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李常家山举行，出席会议的56名代表在9名候选人中选出7名吴堡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丁茂义为主席，李保邦、冯治国、秦茂芳为副主席。

绥德县革命委员会于1935年1月在南区花石畔村成立，主席王学善，副主席郝明芳（女）、马生元。绥德县革命委员会下辖六个区。

同年1月，赤光县革命委员在张家屯村成立。曹增荣（刘炳仁）任主席，孔儒臣（刘步岳）任副主席。赤光县革命委员会下辖五个区。同年2月，赤光县改名为延川县。6月，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改为延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曹增荣，副主席孔儒臣。县苏维埃政府内设土地部、国民经济部、工农检查部、军事部、粮食部、内务部、教育部、裁判部、劳动部、政治保卫部十个工作机构，下辖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中区五个区苏维埃政府。

1935年2月初，延水县革命委员会在刘家畔村成立。惠志明任延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惠思贤、王文随任副主席。同年6月，延水县革命委员会改为延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惠志明，副主席王文随。延水县苏维埃政府内设土地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内务部、粮食部、裁判部、军事部和政治保卫部，下辖东区、南区、北区、西区、中区五个区苏维埃政府。

秀延县苏维埃政府于1935年2月初在赤源县玉家湾区柳树沟村成立。秀延县位于今子长县东北部地区，下辖杨家园则区、北区、西区。薛兰斌任主席，康润民、强晓初任副主席。

陕北革命根据地县级工农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拥护，也为陕北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72页。

（三）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发展，以及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建立根据地统一政权的条件日益成熟。1935年1月25日，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村主持召开了陕北苏区第一次

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150 多名，会期三天。大会通过了《陕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法令。会议选举产生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曹志明任秘书长兼国民经济部长，辛兰亭任土地部长，粮食部长高旭光，劳动部长祈明珍，裁判部长薛兰斌，财政部长艾楚南，教育部长陈蓬飞，保卫局长刘子义，贸易局负责人白树标，巡视员强晓初、白栋材。

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先后下辖赤源、秀延、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赤光、延水、延长、延安、米（脂）西、靖边（东靖边）、瓦窑堡等县（市）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先后驻白庙岔、永坪镇和瓦窑堡。

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

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分配工作。

陕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起步于清涧县。1934 年春，清涧县的部分区、乡开始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工作。由于不掌握分配土地政策，加之正值春耕，有的区、乡便以村为单位，依靠贫农会集体耕种。在白家川等少数村庄甚至出现了集体吃饭的现象，影响了群众的利益和积极性。当时担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的李景林回忆说，1934 年春，为了应付敌人小股的便衣队，赤卫队以排为单位上山集体种地。夏收以后，又集体收藏，但因没有进行分配，群众吃不到粮食，因此有些村子也就办起集体食堂来了。有些村子集体收藏的粮食被敌人抢走，弄得整个村子没有吃的。从而，在群众中一度产生了混乱，群众很有意见。”^①

1934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在《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中明确提出：“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应该〇〇^②县或〇〇^③几县为根据地，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依照劳动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红军战士有分得土地的优先权。城市工人的家（属）同样有分得土地的权利。地主不能在任何名义之下分得土地。”^④同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塬里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建立革命委员会和分配土地的问题。中共陕北特委9月11日发布的《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指出：“西北劳苦群众开展了空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已由分粮、吃大户斗争进行到分配土地的斗争，抗捐抗税的斗争进行到推翻豪绅地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政权的斗争。”^⑤要求“土地委员会立即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分配土地，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地主不能在任何名义之下分得土地”^⑥。

此后，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马明方、郭洪涛等分别在赤源县玉家湾和清涧县的圪垯坬村领导了土地分配的试点工作，并取得了经验。

清涧县的试点工作由郭洪涛领导，中共清涧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立春、唐洪澄、白世杰等参加。试点原拟在袁家沟村进行。但因袁家沟村的群众大都离开了本村，加之工作组内部对有关分配土地的政策有分歧，袁家沟的试点工作未能进行，试点工作遂改在袁家沟附近的圪垯坬进行。圪垯坬村共有31户，120多人，耕地面积2058亩，大部分土地被白林碧占有。工作组在几经反复后，划定了该村村民的阶级成分：富农1户，中农10户，贫农17户，雇农3户。在此基础上，工作组组织群众进行了土地分配。

通过赤源县玉家湾村和清涧县圪垯坬村的试点工作，中共陕北特委总结出了土地分配的政策和基本原则：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中农土地不动；红军家属、贫农、雇农分好地；参加革命的富农子弟和拥护红色政权的富农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女和拥护红色政权的地主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考虑到一些单身男子以后将娶妻成家，分给双份地。随后，中共陕北特

委分别举办了分配土地训练班，培训骨干，以推动整个陕北根据地土地分配工作的开展。如中共清涧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在榆山上村举办的训练班，每期 20 天，培训区、乡搞土地分配工作的干部 10 至 30 人，共举办两期。随着培训工作的进行，清涧县以区、乡为单位，先大村，后小村，逐步推开，完成了清涧县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1935 年 1 月，中共绥德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在山榆狐村举办了为时一个月的土地分配学习班，重点培训区、乡干部划定阶级成分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及方法。学习班结束以后，绥德县苏区普遍开展了土地分配运动，具体步骤是先定成分，后分土地。

1934 年 11 月 14 日，中共陕北特委在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报告中写道：“最近陕北苏维埃区域的日益扩大，各县都进行着分配土地的工作，计划明年春耕时将土地分配停当。”^⑦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工作从 1934 年秋开始，到 1935 年春季基本完成。在当时的形势下，土地分配工作虽然提出了“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左”的口号，但在实际执行中，除逃亡、反动的地主豪绅不分和少分土地外，其余多数地主、富农，也大多按照人口数量分配了土地。土地分配受到了广大贫苦群众的普遍欢迎，调动了人民群众直接投身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40 页。

②指安定县。

③指绥清、佳吴、神府等。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72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03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04 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32 页。

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状态的战时经济。由于陕北地域偏僻闭塞，交通不便，造成了经济的严重落后。尤其是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地方反动民团的长期骚扰和频繁进剿，更造成了根据地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游击队的供给困难。根据地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没收土豪劣绅和反动地主的粮食、财物，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开明绅士、地主、富商捐献。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各地还组织了“互济会”，筹集一些自用经费，或给红军、游击队补充军需，或用于救济受灾群众和红军家属。

在实行土地分配后，根据地内大多数村庄都留有红军公田，由贫农会组织耕种、收获。所收的粮食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烈属，一部分供给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食用。为了解决根据地内布匹、火柴、食盐等生活日用品严重短缺的局面，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除组织群众“赶牲灵”，搞长途贩运外，还支持一些开明地主和商贩到周边的山西、绥远、宁夏等地进行商贸活动，以采购根据地极为紧缺的日用品和药品等。

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根据地人民竭尽所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动员广大群众投身土地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建立之前，各级中共组织和共青团组织，深入广大农村，普遍利用兴办小学、冬书房和农民夜校等形式，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宣传工作，使一大批青壮年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随着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各地的列宁小学和识字班也纷纷建立，使投身革命的工农干部在短时期内脱盲，掌握了初步的文化知识。各地的赤少队和儿童团也积极组织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知识，教唱革命歌曲，为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动陕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中共陕北特委在1934年10月15日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报告中特别提出：“派来

文化工作同志数人，西北文化特别落后，要发展西北普罗^①文化，要求你们多给我们介绍文化人材。”^②随着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中共陕北特委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和巩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①普罗是普罗列塔利亚简称，无产阶级的音译。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22 页。

第六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神府苏区的开辟

一、中共神府地区组织的建立

神府苏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今神木县和府谷县大部、佳县和榆林市榆阳区接合部的农村。神府苏区孤悬于陕西北部，由于敌人的分割，没有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接起来。由于神府苏区从侧背方向直接威胁着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统治中心榆林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西北河防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支点。到 1935 年初，神府苏区已拥有 4000 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根据地人口总数达 14 万人。

神府苏区的创建历程，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也充满了辉煌与悲壮。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在神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基层组织。1926 年 8 月，中共府谷第一高级小学特别支部成立。这是神府地区最早成立的中共基层组织。1927 年 3 月，中共神木第一高级小学支部委员会在神木成立，王季明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王兆卿、赵通儒于 1927 年 9 月分别在神木南乡的贾家沟和高家堡建立了党支部，贾怀光、刘文蔚分别担任

这两个支部的书记。在此前后，神木县的沙峁村和永兴村也成立了中共小组。同年 12 月，中共绥德县委指派李维勤来到府谷，与柴培桂、严念祖、李来宾、苏建勋等在南门第一高级小学建立了中共府谷县委和共青团府谷县委。中共府谷县委书记严念祖，副书记柴培桂，组织部长郭天锡，宣传部长刘子安。中共府谷县委下辖一、二、三、四、五区区委。共青团府谷县委书记由柴培桂兼任。

1928 年 3 月，中共神木城关区委成立，杨林（杨和春）任书记。

同年 4 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中共府谷县委和中共神木城关区委隶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7 月，中共府谷县委发动农民提出“不减租税，不再种地”的口号，开展“交农”运动，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并取得胜利。

中共神木城关区委成立后，由于国民党神木县党部和神木县地方当局的搜捕和镇压，区委主要成员及部分党员被迫先后离开神木，城关区委的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神木南乡的中共组织由于以学校为阵地，知识分子党员深入农民群众中秘密串联，个别发动，加之地处偏僻，地方当局统治力量薄弱，因而党的组织发展较快，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日益活跃。

1928 年 9 月 28 日，从榆林职业中学毕业返回神木南乡的共产党员乔钟灵，经中共神木城关区委介绍，参加了南乡贾家沟党支部的会议。会议对贾家沟党支部组织成员进行了调整，贾怀光仍任书记，组织委员贾令德，宣传委员乔钟灵，委员刘北垣。会议决定支部成员利用教书和当雇工的机会，秘密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展。随后，贾家沟党支部先后在刘家坡、贺家川、王家圪等十多个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到 1929 年底，神木南乡已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200 多人。

1929 年夏季，中共陕北特委指派特委候补委员白明善到府谷工作。白明善和中共府谷县委书记严念祖组织学校师生发起了反对征收捐税的斗争。国民党地方当局下令逮捕白明善、严念祖。在这次搜

捕中，白明善脱险前往榆林，严念祖被捕。1930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景仰山接任府谷县委书记。府谷县委在巩固、发展农村党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同年12月，景仰山被捕（后叛变），中共府谷县委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1931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派鲁学曾到达府谷，恢复了中共府谷县委和共青团府谷县委。鲁学曾任中共府谷县委书记，组织部长赵希贤，宣传部长柴培桂。吴乃先任共青团府谷县委书记。同年8月，由于府谷中共组织内部出现叛徒，中共府谷县委再次遭到破坏，府谷的中共组织也再次瘫痪。

1932年10月，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和府谷县委委员韩峰等对府谷县各级组织进行了整顿。10月下旬，中共府谷县委和下属的七个区委相继恢复。赵希贤任府谷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王巨武，宣传部长杨岐山。全县共有140多名党员。

与府谷县中共组织屡遭破坏的情况相类似，神木县中共组织的发展也历尽坎坷。1930年夏，中共神林南乡区委在沙峁第三高级小学正式成立，书记贾怀智。1932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往神府的交通员被捕，泄露了中共神木南乡区委书记贾怀智的身份。贾怀智及部分区委成员被迫出走，党的工作一度停滞。同年7月，贾怀光、乔钟灵等在贾家沟恢复了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书记贾怀光。

1933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张达志来神木整顿党的组织，指导帮助开展武装斗争。张达志先后整顿了贾家沟、贺家川、采林等十多个村庄的党组织。此后，中共陕北特委又陆续指派毕维舟、崔田民、王兆卿、马万里、张毅忱等前来神木，帮助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到当年年底，神木南乡已建立党支部20多个，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别达到200多名。

陕北代表团1932年12月13日给中共陕西省委写出第二号报告，其中关于府谷、神木的党组织状况分别是：“府谷县委：有区委3（木瓜、青椿峁^①、孤山），特支2（青洋塬、县川），共支部13，同志140

人，成份农民占 110。”“神木（南乡）区委：负责 3 人，均贫农。支部 10，同志 125，（其中）农民 90，雇工约 20，其余知识分子。”^②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神木、府谷地区的基层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神府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即青春岭。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08 页。

二、神府地区的早期武装斗争与红军游击队的建立

中共神府地区组织建立以后，即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和尝试。

1931 年 9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余部西渡黄河，进入府谷县境内，在井岳秀部和傅作义部的联合进攻下，遭到失败。

红二十四军进入陕北后，中共山西特委指派梁子修、刘清明前来神府地区，与红二十四军进行联络。梁子修和刘清明不幸被捕。获释后，他们与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取得联系。在梁子修和刘清明的提议下，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组织了一支由十余人组成的临时特务队，但组建不久即失败。

1932 年 7 月，贾怀光、乔钟灵等在贾家沟村主持恢复南乡区委的会议上，要求所属各支部筹集枪支，物色武装斗争人员，准备建立革命武装。同年秋，根据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人马明方的建议，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派出王兆相、温治恭、杨文谟等前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学习军事斗争经验，以便在神府地区组建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从 1932 年冬到 1933 年秋，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领导各党支部，先后武装袭击了一些收款委员，打击了土豪劣绅。由于经验不足，这些斗争大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1933年7月，温治恭从红二十六军返回神木。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随后成立了以温治恭和马万里为首的临时特务队。随后，临时特务队前往杨家沟打击土豪杨继杰，获得大烟土数百两和十个银元宝。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遂派人前往山西太原，用这批钱财购买枪支，但枪未买到，购枪的特务队员温三小、王维章被敌人逮捕，壮烈牺牲。

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仍然想方设法，采取了发动党员捐款买枪、派人去国民党军队当兵往出带枪等办法，得到了一支长枪和三支短枪。这四支枪成为神木地区创建正式红军的重要基础。

同年9月间，曾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特务队队长的王兆相回到神木南乡。王兆相在《战斗在窟野河两岸——神府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一文中写道：“1933年8月，我和高照（佳县人）、牛岗（米脂人）共同要求回陕北工作。习仲勋和张秀山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并写信把我们介绍给陕北特委。我们三人经甘肃庆阳进入三边，回到神木南区。在温家川小学见到区委负责人乔钟灵，他看了介绍信后，向我介绍了当时党的活动情况，并告诉我：‘特委委员马文瑞在咱这儿，过几天他会来找你谈的。’”^①到神府地区传达高起家圪扩大会议精神的马文瑞和神木南乡区委负责人对创建红军游击队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和部署。

1933年10月18日，在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书记贾怀光的主持下，神木特务队在温家川山上的尚家岂正式成立。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队员贾兰枝、李成荣、高加德、乔六十和刘增杰，共七人，四支枪。

神木特务队成立后，在贾家沟镇压了多次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告密并带领敌人搜捕共产党员的贾凤隆和贾正官。同时，神木特务队正式贴出红军游击队的布告，公开宣告了红军游击队在神府地区的诞生。

同年11月7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以神木特务队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松树峰村成立，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队员20多人，有七八支枪。红三支队成立后，

在佳县的沙坡西沟^②和神木的尚家峁、红教寺、呼家庄等地，相继捕杀了六名罪大恶极、催逼税款的官府爪牙。消息传开后，神木、府谷、佳县一带的群众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当地的一些地主、豪绅纷纷逃往县城和集镇，催逼税款的官府爪牙几乎绝迹。

红三支队的活动，引起了神木县地方当局和井岳秀部第八十六师驻军的极大恐慌。1933年至1934年春，神木县县长李少儒和第八十六师五一四团团团长罗德新率部进驻神木南乡贾家阳崖村，并联合第八十六师驻府谷、佳县部队和地方民团，联合“清剿”红三支队。红三支队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灵活机动，活跃在神木南乡，使“清剿”的国民党军四面出击却一无所获。

1934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调马万里、王兆相去陕北特委工作，高朗亭任红三支队代理支队长，张毅忱（刘晓春）任政委。此后，马万里返回陕北特委，王兆相则留在神木工作。

同年3月16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在陕北特委委员高长久的主持下，中共神木县委在崔白家沟成立，贾怀光任书记，组织部长贾令德，宣传部长乔钟灵，下辖东区和西区（以窟野河为界）两个区委。不久，发展为沙峁、马镇、贺家川、太和寨四个区委。

同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指派张晨钟（张承忠）担任神木县委书记。贾怀光调任红三支队政委，王兆相重新担任红三支队支队长。高朗亭、张毅忱调回陕北特委工作。

同年6月，中共陕北特委指派王达成为特派员，指导神府地区的工作。

在此期间，红三支队于6月9日在九圪村袭击了贾怀德民团，毙敌一人，缴枪五支和一些子弹。随后，红三支队又于6月30日袭击了太和寨村的王进成民团，俘敌20多人，缴枪20多支。九圪村和太和寨两次战斗的胜利，使红三支队威名大震。8月8日，红三支队在上千名赤卫队员的协助下，在菜园沟同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盘塘驻军鲁仰尼连的两个排展开激战。战斗中，担任该连二排长的地下党员刘

鸿飞（刘镇西）率部起义。该连一排长张崇俊等 20 余人投城。刘鸿飞率部起义后，被任命为红三支队参谋长。

在神木的武装斗争迅速发展的同时，府谷的武装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4 年 6 月，中共神木县委派遣贺伟等四人带了四支枪，与中共府谷县委委员韩峰一起，在府谷开展游击战争。随后，由韩峰、赵展山等人组成的游击队在府谷县清水乡青春峁煤窑成立，韩峰任队长。游击队成立后，多次主动出击，先后在白草塬路上截击国民党提款委员，在屹针塌诛杀恶霸，在青春峁除税官，在三清水村打土豪地主，这些行动在府谷产生了很大影响，游击队也迅速发展壮大。此后，韩峰率领的游击队在素乌包的老爷庙附近与井岳秀部的一个加强连相遇。韩峰在《转战在府谷地区的红七支队》一文中写道：“敌人发现我们后紧追不舍，我们很快占领了地势较高的素乌包老爷庙，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到黄昏，敌人停止了进攻，我们趁机撤退。撤退中，又拉了敌人的三匹马，收了敌尸的几支枪。”^③

1934 年 9 月上旬，由韩峰率领的这支游击队在府谷县木瓜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韩峰任支队长兼政委。红七支队共有 20 名队员，20 余支枪。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44 页。

②今属神木县。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339—340 页。

三、神府苏区的形成与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七支队的相继组建，神府地区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神府地区的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到 1934 年秋，神府地区已形成南到秃尾河下游，东北则延伸至府谷县城附近和孤山以南一带，西北逼近高家堡周围和神木城南一带，长

100多公里，宽约50多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基层党、团组织和革命政权，有党支部52个，党员700多人。

与此同时，红三支队已发展到200多人，有100多支枪；红七支队有20多人，20多支枪。此外，在佳芦河西南地区成立了由王子杰任队长的红二十一支队；在花石崖、万镇一带成立了由高振延任队长的六支队；高家堡附近成立了十一支队^①，队长高永明。各区还相继成立了特务队。

在神府地区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强大、神府苏区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成立神木县革命委员会，并将红三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

1934年9月18日，红三支队在神木县王家庄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全团下辖3个连，共200余人。

同一天，神木县革命委员会也在王家庄宣布成立，主席呼子威，在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神木县一区、二区、三区、四区陆续召开了苏维埃代表会议，分别建立这四个区的苏维埃政府。11月7日，神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呼家庄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呼子威，副主席王恩惠，土地委员呼子长（后叛变），教育委员阎好仁（后叛变），财政委员杨维元，粮食委员王道三，军械委员乔殿栋。

神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该县的五区、六区苏维埃政府也相继建立。神木县六个区所属的乡、村基层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

与此同时，神木县赤卫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张世轩（张廷杰）任总指挥。神木县六个区也分别成立了赤卫队指挥部，下设大队、中队和小队。

神府苏区党、政、军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健全，标志着神府苏区的斗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①十一支队由 1934 年春建立的红五支队改编而成。

第七节 神府苏区的巩固与发展

一、神府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神府地区红军游击队的不断发展和红色区域的日益扩大，引起了陕北军阀井岳秀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与不安。从 1934 年 9 月至 11 月，井岳秀调动所属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对神府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第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以两个团的兵力，部署在神府苏区的边缘石窑上、瓦罗、沙峁镇、新寨子、万户峪等地进行“围剿”，而以高锡庚、杨相枝两个营的兵力，进入苏区腹地进行“追剿”。

中共神木县委和刚刚成立的神木县革命委员会一面号召苏区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一面调动红三团甩开敌人，北上府谷境内，实行外线作战。

10 月初，红三团突破国民党军两个营的包围圈，直插府谷北区，与红七支队会合。这时，红七支队已开辟了南到府谷孤山，北至麻镇、庙沟门，西到新民镇，东临府谷县城的一块苏区。红三团与红七支队会合后，决定直捣府谷北区的重要集镇哈拉寨，以解决部队越冬的军需问题。哈拉寨地处内蒙古与陕西交界处，商业发达，店铺很多，有数百户人家。红三团和红七支队进攻哈拉寨的战斗获得完全胜利。王兆相回忆说：“在哈拉寨，我们消灭了一个反动民团，捣毁了区公所，镇压了一个国民党区长^①，还把几户大地主、大豪绅的粮食、衣物等浮财分给贫苦群众，同时给红三团筹集了一批过冬衣物和白洋。”^②

红三团和红七支队联合进攻打开哈拉寨后，刘润民急忙调动高锡庚营和杨相枝营北上府谷北区，企图堵击红军。红三团团长王兆相和政委杨文谟等当机决定，留下红七支队在当地坚持斗争，红三团则南返神木。红三团迂回穿插，巧妙地在两个营之间插回神木南区，直奔佳县北部地区。

11月下旬，红三团接到万户峪地下党组织送来的密信，说打入驻万户峪国民党军张孝先连担任文书的地下党员张德超，联络了十几个人准备起义，要红三团前去接应。在红三团的策应下，张德超带着吴子明、薛荣祥、姜安雄、高育才等13人发动起义，脱离了张孝先连，加入红三团。红三团随后在陈家坪为张德超等起义战士举行了欢迎大会。

张德超等宣布起义，引起国民党军的极大震撼。加之参加“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被红三团拖得筋疲力尽，军心不稳，遂不得不在11月底结束了“围剿”。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三团和红七支队密切配合，主动出击，攻开了哈拉寨。在中共神木县委的领导下，红三团利用熟悉地形，又有苏区广大群众大力支持的有利条件，同“围剿”之敌巧妙周旋，并不断给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土豪劣绅以严厉打击，最终取得了神府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随着神府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11月7日正式成立。到1935年初，神府苏区已扩展到府谷县城以北、大岔黄甫以南，南面延伸到佳县通镇以北，西面发展到今榆林市榆阳区的建安堡以东，东面隔黄河与山西兴县的3个中共秘密区委连接的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苏区的人口总数达到14万人。其中神木县的13个区，有6个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余7个区为游击区，并建立有中共秘密区委。府谷县在七个区建立了中共区委和苏维埃政权。中共神木县委还在黄河东岸的山西兴县西部地区组建了三个秘密区委。关于这三个秘密区委的组建，王道三在《神府在山西兴县建立的区委》一文中回忆说：“1935年上半年，神府党组织派了部分党员在山西兴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三个秘密区委。这三个秘密区委分别以赵家坪、紫金山、康宁镇为活动中心。赵家坪区委的负责人是贺开山和贺七十；康宁镇区委的负责人是贺万胜；紫金山区委的负责人记不清是谁。三个区委都是以秘密的方式开展工作，没有建立起政权机构。”^③

到 1935 年春，神府苏区共有共产党员 2000 多名，共青团员 1000 多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的红三团已发展到 300 多人，200 多支枪。红七支队、红十一支队和新组建的三支队也发展到 100 多人。

在中共陕北特委和神府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神府苏区军民顽强不息，始终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使神府苏区不断巩固和发展。

①应为联保主任赵智。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58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335 页。

二、神府苏区的土地分配

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神府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

为了保证土地分配运动的开展，中共神木县委和神木县苏维埃政府先后举办了土地分配人员培训班，学习土地法令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有关政策规定。参加领导了神府苏区创建工作的乔钟灵在《回忆神府革命根据地》一文中写道：“当时，陕北特委的文件指示，分配土地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富农，消灭地主。即没收地主和富农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分给贫、雇农；中农的土地基本上不动，土地不足的，分给他们不足的部分；富农只分给他们远地和坏地；地主连远地坏地也不予分配。后来党组织反复研究，认为不给地主分配土地是不恰当的，但只给地主分配了远地和坏地。”

①

神府苏区的土地分配按照先划定阶级成分后分配土地的步骤，从中心苏区开始逐步向边缘地区推开，主要以乡或村为单位，依照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进行分配。在土地分配运动中，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存在着划分阶级成分时偏高偏严的倾向，甚至提出了诸如“地

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要求一些中农“献出多余土地”等“左”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乡村的土地分配走了弯路。但是随着土地分配运动的深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除逃亡地主不给分配土地外，给一般地主和被镇压的地主家属还是分配了一些次地或坏地。富农除留下按人口平均数量的土地外，多余部分的土地予以重新分配。中农的土地则基本上没有分配。在土地分配中，对红军游击队战士和家属给予优待，一般分配给好地、近地和水地。当时还特别规定，土地分配后不准雇工。

神府苏区进行土地分配的区域，主要在神木县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区，府谷县南面的三个区。其他区只有个别乡和自然村进行了土地分配。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带，群众对分配土地要求强烈的也进行了土地分配，群众有顾虑的则只分配了地主的衣物、粮食等浮财。

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紧紧依靠各村的贫农会（团），由贫农会（团）具体实施阶级成分的评定、地主富农土地财产的清查、土地的丈量、土地等级的评定以及分配到户等实际工作。

到 1935 年春耕前，神府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基本结束。土地分配运动的开展，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基本要求，调动了贫苦农民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性。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02—103 页。

三、神府苏区的经济建设与教育文化建设

在开展土地分配运动的同时，神府苏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得到了了一定的发展。

神府苏区形成后，陕北军阀井岳秀不仅在军事上多次“清剿”，在经济上也予以严密封锁，使本身十分落后的苏区经济更趋紧缺。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共神木县委和神木县苏维埃政府除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动员开明士绅捐献粮款外，还在严酷战争环境下，发动群众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各级红色政权通过各种关系去山西兴县罗峪口和神木县城、府谷县哈拉寨购买货物，以弥补军需民用，并鼓励小商贩摆摊设铺，走村串乡，进行贩卖。这些措施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苏区人民的日常所需。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和红军游击队，各级苏维埃政府还组织贫农会（团）、赤卫军，为缺乏劳动力的红军游击队家属和干部家属实行义务代耕制度，解除了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干部的后顾之忧。对农村中的鳏寡孤独者，则在分配地主豪绅的财产时予以适当照顾。

尽管神府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刘长亮、许发善、王道三、焦宝山在《神木党组织走过的历史道路》一文中回忆说：“由于红军游击队和党政群各级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各项开支就越来越大，供给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定供给原则是：先军队后地方。鞋、袜、棉单衣等，凡破烂不能穿的，补发新的或发一块布补补窟窿。少数县区级地方干部过冬还能发一件短腰羊皮袄。军队的衣服来源，主要靠打胜仗的缴获或打土豪获得的财物。部队是有什么穿什么，长短不一，颜色各样，行起军来好象是秧歌队。当时，没有造被服的工厂，主要是靠妇联会把布匹分配给各缝洗队，做成衣服鞋袜。”^①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神府苏区在经济建设中也走过弯路。刘长亮等回忆说：神府苏区的经济工作“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违反工商业政策，对地富的工商业不加区别地一律没收分配；对商业者，也给予了错误打击，使白区群众不敢进苏区串亲戚，做生意。1934年冬季，突然传说，在苏区流动的小商贩是阎锡山的侦探，特派员不作调查分析，一句话就叫格杀勿论。于是很多人被杀，货物全被没收，造成苏区商业停滞，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②

神府苏区的经济建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不断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的情况下，探索前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苏区军民的需要，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神府苏区的教育文化建设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神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颁布了实行婚姻自由，提倡男女平等、妇女剪发放足，禁止赌博、吸食鸦片、嫖娼及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在清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新风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神府苏区还广泛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小学、冬学、夜校和识字班，大村一村一校，小村两三村开办一所学校。仅神木县三区即开办了35所夜校。刘长健在1985年10月所写的《神府的革命教育事业》一文中回忆说：“神府苏区的党和政府采取各种形式的勤俭办学方针，克服种种困难，在苏区内的大部分村庄里办起了列宁小学、冬学、夜校、识字班等各种学校。吸收劳苦群众的子女上列宁小学和冬学，中青年男女进夜校或识字班。办学中碰到师资不足就聘请一些老秀才（如李含恩等）作教师。纸张缺乏，就通过各种渠道，从神木城附近的单家滩等纸厂购买。课本没有就自己动手去编。当时苏维埃政府编了两本书，内容大致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封建剥削’等唤醒群众起来革命的语言文字。除了这两本书外，学校还选择使用《百家姓》、《紧要》、《千字文》等一些旧课本的内容。教育经费的来源，以群众捐献为主，教师的吃粮由群众凑集。”^③

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管理和督导，神木县苏维埃政府还派出视学员，前往各区乡村检查指导，督促教育工作的发

展。神府苏区的文化工作也十分活跃，各级政府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结合革命形势，采用旧曲填新词的方式，编写了一些革命民歌，进行宣传鼓动。在重要村镇，则广泛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革命文化工作的普遍开

展，不仅活跃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也坚定了他们团结对敌的信心和勇气。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246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246—247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388 页。

第五章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一、周家硷会议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相继被粉碎，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块根据地之间仅隔着安塞、肤施、甘泉三个县。而且这三个县还分别活动着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的安塞第四支队、甘泉第十五支队、延安第六支队和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安塞第六支队、延安第十八支队等红军游击队。这些红军游击队机动灵活，对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地方民团和地方政权不断袭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统一两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统一对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的指挥已势在必行。

1935年1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和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和二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五、第六支队离开南梁，前往陕北根据地。刘志丹到达陕北根据地后，立即前往赤源县水晶沟，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位出生入死、长期并肩作战的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决定将分别隶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刘志丹和谢子长还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致意见。

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崔田夫、刘志丹、郭洪涛、马明方、高岗、惠子俊等。谢子长因伤重没有出席。会议由刘志丹主持，白坚担任会议记录。郭洪涛回忆说：“会上，先研究了军事问题。大家认为，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需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游击队。在决定成立西北军委后，又产生了西北军委归谁领导的问题，于是又一致同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西北工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所领导的各县委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所属各县仍由陕甘边特委领导。”^①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

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等组成。惠子俊任书记（在惠子俊回陕甘边区传达联席会议精神期间由崔田夫代理书记），郭洪涛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宣传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长。

中共西北工委隶属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

周家硷会议还讨论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问题和打通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及与神府苏区的联系问题等。会议一致认为，集中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力，打击深入安定、绥德、清涧、延川、延长之敌是安全正确的。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北特委，但仍保留共青团陕北特委，由慕纯农任书记，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周家硷会议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做出的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也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46 页。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组织的统一与发展

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驻原中共陕北特委所在地赤源县白庙岔。1935年4月，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返回陕北后，主持工委工作。崔田夫改任组织部长，郭洪涛任秘书长。在此前后，张秀山接替高岗担任宣传部长。

中共西北工委接收了中共陕北特委党校^①，改为中共西北工委党校。中共西北工委党校校长先后为王士英、高长直。学校先后驻安定县的向沟岔、柳渠、高家砭，延川永坪和子长县瓦窑堡等地。1935年11月，西北工委党校并入中共中央党校。中共西北工委党校共招收了3期学员，每期100余人。学习内容是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游击战争、赤卫队工作和土地、婚姻、财政、粮食方面的政策和法令，以及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工作的知识和经验。西北工委党校的教师大多由西北工委负责人兼任。杨和亭、李景波、蔡子伟等担负过党校的授课任务。党校学员学习期满后，大部分回原单位工作，少数学员被派往新区。

中共西北工委还接办了中共陕北特委的机关刊物《西北斗争》，作为西北工委的机关刊物。

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不久，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的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在赤源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

谢子长逝世后，为了防止国民党军乘危袭击，中共西北工委决定：不举行丧礼和追悼会。考虑到谢子长在西北根据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了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西北工委决定对谢子长逝世的消息严密封锁，对下级机关和老百姓绝对保密。谢子长的遗体由身边的战友和亲属秘密埋葬。

此后，为了纪念谢子长，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改安定县为子长县。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中共西北工委于1935年4月初向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党团发出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我们要具有充分的布尔什维克的警觉性，彻底的检

查我们以往的一切缺点，百分之百的保证党的政策计划的执行，才能决定我们最后的胜利。”^②中共西北工委要求各级党部及各级政府党团要广泛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开展抗日示威运动，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要组织突击队及游击小组向外发展，扩大苏区；普遍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巩固苏区；发展对外贸易，增加苏区收入；发动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扩大红军游击队。

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到1935年7月初，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使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

1935年7月3日，中共西北工委迁驻延川县永坪镇。7月5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巡视西北根据地工作的朱理治来到永坪镇。7月21日，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在永坪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成立中共陕甘省委，并提出实现以下四项任务“来迎接新省委的正式成立”：“一、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使陕甘党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二、要实际完成实足铁的两军红军（9000人数）。三、争取到数县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四、创造几个模范支部。”^③决议案还提出：“巩固与扩大现有苏区与游击区域，彻底实行苏维埃民主制度，建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④由于种种原因，中共西北工委提出的建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未能落实。

会议还做出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永坪会议之后，“左”的错误倾向对西北根据地的干扰和影响开始显现。朱理治在1945年7月10日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我到陕北后，首先开了一个永坪会议，我传达了中（央）代（表）几万字的指示，内容是夸夸其谈。那时正是三次‘围剿’，做了一个反三次‘围剿’的决议案。以后我在文安驿会议上也报告过，讲了两三天。

这些报告内容，是把中央代表的指示具体化了，并且有个别的发展。”

⑤

从 1935 年 2 月到 9 月上旬，中共西北工委新组建了延长、红（甘）泉、宜川、延安、肤（施）甘（泉）、肤施、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米（脂）西、子长、新正（宁）、靖边、淳耀等 14 个县委和安塞工委。西北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此期间，陕甘边区东区革命委员会于 1935 年 4 月成立，主席马文瑞，土地部长呼志禄，粮食部长奚玉山，财政部长许克昌，肃反委员会主任张彦福。陕甘边区东区革命委员会下辖红泉县和宜川县革命委员会。

在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的共青团、工会、妇女会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根据中共西北工委的决定，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指导团陕甘边特委。到 1935 年 9 月，共青团陕北特委辖团陕甘边特委和 18 个团县委（工委）。

陕西省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于 1935 年 7 月，高长久任主任。到同年 9 月，陕西省工会筹委会下辖延水、清涧、延安、安塞、延川、靖边六个县工会。

在中共西北工委妇女部的领导下，清涧、赤源、秀延、子长、延安、红泉等县建立了妇女会。绥德县妇女会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①中共陕北特委党校的前身是 1934 年秋在清涧二郎山开办的中共陕北特委干部训练班，王士英任班主任。训练班每期轮训学员 20 余人，学习时间 10 天左右。主要学习上级党组织关于政权建设、土地分配的指示和法令、游击战争的基本知识等。干部训练班共开办了 4 期，培训干部 80 余人。1935 年 1 月，中共陕北特委干部训练班改为中共陕北特委党校，王士英任校长。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5—26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55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53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31 页。

三、白庙岔会师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成立

周家硷会议结束之后，刘志丹于 1935 年 2 月 7 日在赤源县的冯家梢塬村，宣布了西北军委的组成机构和领导人员名单。西北军委除设立参谋部、政治部外，还成立了作战训练科，科长雷恩俊；情报侦察科，科长高朗亭；总务处，处长刘汉武；经理部，部长张成武，总会计王彩文；医疗卫生科，科长由高朗亭兼任。

2 月 18 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动员令，号召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命令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大部组成主力兵团，重点打击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地带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

在此之前，刚刚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继首战安定南沟岔获胜，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一个加强连后，又挥师东进，进入清涧县境内。2 月 13 日，红八十四师在清涧县川口镇阎王砭歼敌两个排，击毙敌连长陈广春。在这次战斗中，配合红八十四师作战的陕北红军游击队新二支队支队长惠世良不幸牺牲。3 月初，红八十四师在延川县贺家湾全歼向延川守敌护送军饷的一个连和部分地方民团共 13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 2000 多块银洋。在三战三捷之后，红八十四师回师赤源县白庙岔待命。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军事“围剿”，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于 1935 年 2 月成立，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邦英，下辖富县游击队、中宜游击队、淳耀第六支队、淳耀第七支队、赤水第十二支队、正宁回民支队、正宁五支队、正宁八支队、新正特务队、宁县一支队、宁县三支队、新正独立二营等。

在此之后，陕北红军游击队为了整合力量，也于3月分编纵队。第一、第十支队合编为第一纵队，高步仁任纵队长，刘明山任政委；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支队合编为第二纵队，由红八十四师第二团团长郭育仁兼任纵队长，第二团政委马万里兼任政委（后王再兴继任政委）；第八、第十三支队合编为第三纵队，陈世恩、牛刚、王子长先后任纵队长，惠艾深、黄振邦先后任政委。

同年3月初，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在保安县白豹镇^①歼灭国民党军骑兵一部，毙、俘、伤敌各数十名。

4月下旬，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从陕甘边区北上陕北。北上途中，在横山县寺儿沟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

同年4月，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刘金声任总指挥，王继之任副总指挥，下设三个赤卫军大队。

5月1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西北地区两大红军主力部队的会师，极大地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当时担任红八十四师第一团团长的贺晋年回忆说：“当日举行了万人联欢大会，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都赶来参加，真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他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点打击对象和作战方法。刘志丹特别强调两支红军会合后，一定要互相配合，搞好团结，互相学习，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局面。两支红军的代表也在会上表示了决心。”^②

白庙岔会师后，刘志丹率两支红军组成的主力兵团隐蔽转移到安定县城和瓦窑堡之间的栾家坪一带，准备诱瓦窑堡之敌向安定县城开进，进而聚歼之，但未能成功。随后，刘志丹又率主力兵团转移到秀延县玉家湾一带集结。5月4日，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玉家湾成立，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范子文任秘书长。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的会师及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成立，使数量有限的西北红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拳头，加上红军有巩固的根据地，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和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今属吴起县。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82 页。

第二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一、国民党当局第二次军事“围剿”的部署

在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相继被粉碎后，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以及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1934 年 10 月，蒋介石在侍从室主任杨永泰、豫鄂皖“剿总”副司令张学良等陪同下，先后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进行了巡视。这是蒋介石的第一次西北之行。就在这次巡视中，蒋介石决定将驻防河南洛阳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调往陕北，以加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力量。同年 12 月下旬，高桂滋部全部调往陕北，师部驻绥德。

1935 年 3 月，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政训处处长张德容在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报告中写道：“本师奉命开赴陕北迄今已历两月，对于民众之联络，匪情之侦察，以稍具端倪，感觉匪化之深刻，民众之懈怠，足使陕北危机日益严重。”^①报告最后写道：“陕北匪情之严重，诚非少数时日而偶然形者。近周以来，陕北赤匪以我师之将移防，及川陕边境之紧张，更形活跃，互为呼应，扩大匪区，建立赤匪南北之根据地，以达打通国际路线企图。故陕北之情势实须增加中央有力之部队，分别推进，协同围剿，能在最短期间使匪区缩小，助民春耕。否则，养痍成患，良足深忧。”^②

在此之前，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于 1934 年 12 月进入陕西洛南县境，红四方面军也于 1935 年 2 月发起陕南战役，对此，蒋介石惊恐万分，在 1935 年 2 月 23 日发布命令，委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为“剿匪”第三路总司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为第三路副司令并兼第一纵队司令官，总司令不在前敌时由副司令代行其职权。

国民党当局调集了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高桂滋第八十四师、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杨步飞第六十一师、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共 5 个师 26 个团 4 万余人，以分区“清剿”、逐区蚕食的方式，妄图摧毁西北根据地。其具体部署如下：

以第三十五师附陇警备二旅第六团共七个团，分别进占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战线，向陕甘边区根据地中心腹地推进。

以第六十一师六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一带，插入南梁、照金地区之间待机。

以第四十二师四个团，分别驻守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等地，守备咸（阳）延（安）大道，作为战略警戒线。

以第八十六师的五一二团、五一三团、五一四团进攻神府苏区；该师五一五团、五一六团，由横山、靖边一线，前出大理河沿岸，构成第八十四师的右翼战线，战斗正面是陕北根据地的安（定）绥（德）清（涧）地区，师本部驻榆林城。

以第八十四师四个团，沿无定河展开于绥德、清涧一线，并进驻延川、延长、延安等县城。以一个团进驻瓦窑堡，并分兵一部，控制吴堡至绥德大道。师本部驻绥德城。

此外，以晋军第七十一师杨耀芳部陈兵于黄河东岸待机。其中一个旅于 4 月下旬西渡黄河，进驻吴堡县城宋家川。

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共布置了神府区、米佳吴区、安绥清区、南梁区和照金区五个“围剿”区域，其战略重心则是安绥清区。

到1935年2月初，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的军事部署已基本完成。

1935年3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驻陕北的参谋团共70余人，在团长毛侃率领下抵达绥德，对“围剿”西北根据地的各部队予以统一协调。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65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71页。

二、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二次“围剿”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领导与指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

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首先在南梁地区展开。1935年2月，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进占老爷岭、元城子、六寸原一线，红四十二师在游击队、赤卫军的配合下，奋勇抗击，先后进行了悦乐田岷岷、六寸原战斗，不断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指挥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赤卫军也四处出击，不断袭扰敌军。

六寸原战斗后，根据西北军委的命令，张秀山带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开赴陕北。4月上旬，习仲勋召集会议，分析了南梁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形势，认为国民党军将对南梁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为避免遭受损失，在与敌军周旋数日后，习仲勋带领党政机关和保卫队100余人前往甘泉县洛河川一带。4月14

日，马鸿宾部占领南梁地区的二将川、梨园堡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反“围剿”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与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先后取得了保安县白豹镇战斗和横山县寺儿沟战斗的胜利，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取得了清涧县阎王砭战斗和延川县贺家湾战斗的胜利，给“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5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主力在白庙岔会师，组成主力兵团。5月4日，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后，统一指挥两军作战。

5月7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首战安定县吴家寨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李少堂团的一个营，击毙营长郭子丰，俘敌45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战斗结束后，为了瓦解敌人，对被俘官兵进行了宣传教育，对有技术的机枪射手和医生，也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争取留下使用。随后，各部队进至玉家湾一带休整，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西北工委委员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郭洪涛前来参加，刘志丹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5月9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清涧县城与安定县瓦窑堡之间的马家坪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第五〇〇团三营及团直属机炮连，击毙营长左象亨、连长王兆凤，俘敌副营长以下45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余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2挺、迫击炮2门以及单军服2000多套、医药和医疗器械8大驮及其他辎重一部。

吴家寨子和马家坪两战两捷，使高桂滋部受到沉重打击。高桂滋命令驻守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的部队集中到瓦窑堡。5月10日，西北红军占领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

5月20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从安定县城出发。5月25日，在绥德与清涧县交界处的张家圪台村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第四九九团一个连，击毙连长孔庆山，俘敌150余人，缴枪100余支。随后，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又在绥德西川三皇峁歼灭第八十四师一个连，击毙连长翟文启。

在取得张家圪台、三皇峁两次战斗的胜利后，刘志丹一面派部队佯攻绥德、米脂城，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到北线集结，一面迅速派主力部队隐蔽南下，到达延长县大连沟集结，准备进攻延长县城。

5月30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延长县城，俘国民党延长县长董公绥、第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连长汪进河以下500余名，击毙延长县民团总指挥李明五，缴获各种枪500余支、战马170余匹、无线电台一部及大批军用物资。

延长城被攻克后，延川县城守敌第八十四师一个连如惊弓之鸟，于5月31日连夜逃往清涧县城。6月1日，西北红军主力部队一弹未发，占领了延川县城。

6月15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延安县高桥镇^①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率部增援高桥的国民党延安县民团总指挥李汉华被击毙。高桥战斗，共俘敌20余名，缴枪20多支。

6月19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攻国民党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②。兴隆寨位于延河支流杏子河西岸，一面依山，三面环沟，地势险要，驻有民团200余人。贺晋年回忆说：“前总决定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主攻，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打延安援敌。那时，西北红军还没有炮兵，红三团就将地道挖到敌人碉堡底下，用一棺材炸药，准备让敌人坐‘土飞机’。正准备爆破，敌人在夜间悄悄地逃跑了。”^③6月20日，红军进入兴隆寨，活捉了正在办理交接手续的卸任县长杨任之和新任县长蔺某以下官吏数十名，并缴获了安塞县政府的公文档案和大批物资。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攻打兴隆寨的同时，于6月17日包围了李家塌寨子。贺晋年回忆说：“李家塌是个耸立在山包上的寨子，东、西、南三面都被天然的大沟环绕，沟壁陡峭，很难攀登，南面是天然的断崖，人兽绝迹，东面坡度稍缓，敌人已把它削成了峭壁。东北面

连山，敌人又挖了人工壕，与外界隔绝。东北角是全寨的制高点，它既可以控制全寨，又可以俯瞰寨外。这个北高南低的寨子，只有一个东门，开在陡峭的崖畔上，四面寨墙上布满了滚木礮石，地形十分险要。它是安塞县境内敌人最后一个据点，但却控制着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互相往来的必经之路。寨子里麇集着全县的恶霸地主及其家属，守敌有 200 多名反动民团，寨内住有 2000 余人。他们经常外出抢劫群众财物，捕杀革命人员，破坏陕甘边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危害很大，群众恨之入骨。前总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由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担任主攻，红二十六军第三团阻击保安援敌，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二团在南山用火支持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红二十七军第三团为预备队。”^④

由于李家塌守敌恃险固守，红军多次进攻未能奏效。红军采用坑道作业，准备炸掉寨墙，但很快就被守敌发现。敌人在夜间加深了外壕，红军挖的坑道被外壕切断。敌人还不断向外壕扔手榴弹，将地道炸塌。贺晋年回忆说：“五天过去了，寨子还没有打下来。我们都有些着急，但又苦无良策。这时，刘志丹派通讯员把我叫去。志丹在寨子南面的山畔上用望远镜细心观察着，见我过来，把望远镜递给我，叫我顺他手指的方向看。他说：‘老贺，你看，对面的石崖上有个裂缝，能不能从这里扒上去？’我趴在志丹身边，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石崖及其周围的地形，略加思索后说：‘可以扒上去’。志丹指着寨子的南端说：‘这个方向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扒上去后，出其不意，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发展，使主力从东门进寨。打响后，义勇军和红二团可以用火力支持你们，封锁敌人将主力南调，等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再调整部署，他就来不及了。’我兴奋地向志丹表示：‘老刘，你放心，这个敌人我包了。’志丹还建议从义勇军、红二团抽些人给我。我说：‘不用，这个任务红一团包了，保证今天拿下来。’”^⑤随后，贺晋年亲自带领 30 多人的突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滚木礮石，攀登上寨墙，并占领了寨子东门。贺吉祥、栾新春、李赤然率两个连的战士，迅速冲进东门，并占领了寨内的制高点。这一天，是 6 月 22 日。当天傍晚，攻克李家塌寨子的战斗结束。这次战斗，共毙、

伤、俘敌数百人，缴枪 200 余支。第二天，被俘的国民党民团团总唐海鳌等被处决。至此，安塞县全境获得解放，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6 月 26 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靖边县城，击毙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第二五六旅第二营营长屈志鹏，靖边县县长张志立在战斗中失踪。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 500 余名，缴获各种枪 500 余支、迫击炮 6 门。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靖边县城后，保安县守敌惊恐万分，弃城逃往安边。6 月 30 日，西北红军占领了保安县城。

7 月 3 日，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迁驻延川县永坪镇。7 月初，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绥德西川三皇峁，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一个工兵连，共 100 多人。7 月 17 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又在老君殿高家塌^⑥全歼高桂滋部一个营，击溃两个营，打伤团长艾捷三。

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其余部队也在西线、南线频繁出击，连续获胜。4 月下旬，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在杨青川伏击国民党军骑兵连，取得胜利。5 月中旬，第二团又先后歼灭了宁塞川五谷城镇民团，摧毁了张廷芝设在韩家瓜的修械所，击溃了吴起镇民团。红四十二师骑兵团于 5 月中旬在屯石岷岷歼灭宜川县民团后，参加了攻占延长县城的战斗。随后，骑兵团挥师南下，歼灭了合阳县甘井民团，并在韩城县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万余元。之后，骑兵团回师洛河川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寺湾。7 月上旬，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和骑兵团在富县羊泉会合后，南下中部县隆坊塬，消灭了杨相之民团，随后，在富县、洛川、宜君、中部一带，开辟游击区，并一度截断咸榆公路宜君至洛川一线，给敌人运输补给造成极大困难。7 月中旬，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和骑兵团再次南下白水、澄城、韩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给敌人以重创，并筹集

了一部分军需款项和财物。之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红一团返回照金。

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 2300 余人，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 3000 余人，缴获长短枪支 5000 余支、轻重机枪 200 余挺，并陆续攻占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国民党当局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在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期间，新建立府谷、西靖边、定边、延安、延长、子长、肤（施）甘（泉）、红泉、赤川等工农民主政权。西北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 3000 多人。地方武装有新的发展，原陕北根据地区域新建了 8 个游击支队。原陕甘边根据地区域于 6 月成立了新编抗日义勇军，下辖宜川赤卫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十支队，黑志德任司令员，赵正化任政委，杨开德任副司令员。同年 7 月，新编抗日义勇军改称宜川第十支队。随后，以宜川第十、第十一、第十三支队，延长第十八支队，延安第四支队，甘泉第六支队合编为陕甘边区红军第二路游击师，邵凤麟任司令员，杨凤岐任政委。第二路游击师后改称第四路游击师。至此，西北根据地共有 40 多支游击队，总兵力约 3000 多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与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的迅速壮大，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今属安塞县。

②今安塞县沿河湾镇。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88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88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88—289 页。

⑥今属子洲县。

三、神府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神府苏区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中，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以五一二团、五一三团、五一四团进攻神府苏区。其具体部署是：五一二团由府谷南进，五一三团由神木沿窟野河斜向东南，五一四团在万镇至通秦镇分别构成南北向两个对外正面，北向神木、府谷，南向米脂、佳县。井岳秀在神木设立了“剿共”司令部，由该师第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担任总司令。井岳秀与阎锡山取得联系，由晋军在黄河东岸保德至临县一线布防封锁，形成合围之势。井岳秀在“围剿”神府苏区时，采取修堡筑点，合并村庄，编设保甲，胁迫自首的战术，企图逐村蚕食，最终消灭红军游击队，全部占领神府苏区。

在神府苏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左”倾错误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当地的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王恩惠在1983年9月所写的《艰辛的革命历程》一文中指出：“在肃反政策上，错杀了许多好人。王兆相、张秀山的父亲被杀害，引起了红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及其家属的极大义愤。把从山西过来做生意的小商人当作阎锡山的侦探杀掉。对已经缴械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排长也杀了。陈家坪把一家地主杀光。”^①王恩惠写道：“在干部政策上唯成分论。呼子威本来是个中农，又不识字，就因为会箍担水桶，便认为是工人，就当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对上过高小、初中的同志都当作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加以排斥。”^②王兆相回忆说：“有一阵子，连赤卫队，开辟村庄的工作队、小游击队，党支部都有捕人杀人的权利。往往因为说了一句错话，或者顶撞了哪位领导干部，就有可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杀掉，因而错杀了一些无辜的人。”^③

在“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下，神府苏区军民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5年3月22日至23日，中共神木县委在园条塔召开会议。会上，大多数人提出了袭击战斗力较弱的花石崖国民党军骑兵的方案。但是，这一方案却遭到主要负责人的否定，而坚持要集中全部红军，调动大批赤卫队，攻守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新寨子。根据会议的决定，

3月26日，在九五会村集结了红三团及游击队400多人，党政干部200多人和赤卫队员近2000人待命。由于攻打新寨子的消息被泄露，新寨子守敌加固了防守工事，并秘密增加了一个连的兵力。红军在对变化了的敌情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于3月29日拂晓向新寨子发起强攻。担任这次战斗总指挥的王兆相回忆说：“战斗打响之后，发现敌人早有准备，不仅增加了兵力，而且构筑了很多工事。敌人凭借工事顽抗，我方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刘鸿飞刚冲到村里就中弹阵亡了。整个部队由于红军和赤卫队混编在一起，指挥不灵乱作一团，显然很难取胜。我又转念一想，如果敌人骑兵闻讯赶来增援那我们就更危险了。于是急忙同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很快撤出战斗。果不其然，部队刚刚撤出几里地，敌骑兵就到了新寨子。”^④

新寨子战斗失利，红三团参谋长刘鸿飞英勇牺牲，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伤亡百余人，使干部群众的情绪大受挫伤。

新寨子战斗后，“围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进犯到栏杆堡、瓦罗、马镇、合河、盘塘、沙峁镇一线，并沿这一线设立了40多个据点。以刘润民为总司令的“剿共”总司令部也由神木县城移驻沙峁镇。

4月20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骑兵营邬青云部突袭神木贾家沟。共产党员、神木二区22岁的女巡视员黄云爱和两位弟媳刘金珍（18岁）、贺博芳（16岁）在帮助群众全部撤离村子后，才向山里奔跑，被国民党骑兵发现、追赶。黄云爱等将国民党军引向与群众隐蔽处相反的方向。当她们跑上山顶时，才发现前面是20多米悬崖峭壁的西沟辿。在疯狂追捕的国民党军即将逼近身边时，黄云爱、刘金珍、贺博芳三妯娌毅然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在神府苏区反“围剿”形势空前严峻的紧急关头，中共神木县委扩大会议于5月初在呼家庄召开。根据陕北特委特派员王达成的提议，会议决定取消特派员包揽一切的制度，决定成立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会议推选王达成任神府工委书记，组织部长贾令德，宣传部长张晨钟。为便于领导神府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将神木县

委分为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三个县委。东县委书记王恩惠，西县委书记乔钟灵，北县委书记刘北垣。会议还决定派遣呼子文任府谷县委书记，带一批干部去府谷坚持工作。

这次会议还决定改编原流窜于甘肃、内蒙古一带，后进入神府地区，要求与红军“合作”的史文华部队为中国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任命史文华为师长，王兆相为政委。该师下辖两个团，贾怀光、刘世英分别任政委。会议还决定另外抽调 16 名红军干部担任该师各连政治指导员等职务。王兆相回忆说：“史部改编后，我们与史文华共同研究，对该部制定了四条纪律：（1）不能反对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2）遵守苏区纪律；（3）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更不准调戏妇女，违者死罪；（4）没收地主财物，100 元以上归公，贪污者一律严惩。”^⑤

史文华部接受改编不久，在转入外线作战时，史文华异心又起，将王兆相等 19 人送回苏区，带着这支武装投靠了国民党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

5 月中旬，中共神府工委在白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趁刚刚进驻太和寨的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营立足未稳之机进攻太和寨。5 月 29 日，红三团在逼近太和寨阵地时，发现守敌早有戒备，遂转而突袭驻毛家圪的国民党军骑兵连，歼敌四五十人。毛家圪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神府苏区军民的斗志，但反“围剿”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6 月 19 日，红三团在赤卫队配合下，向窟野河东岸国民党军腹地据点瓦窑渠发起进攻。由于守敌工事坚固，防守严密，进攻失利。红三团在撤出战斗途中，又遭到分别来自瓦罗、沙峁、石窑的三路敌军夹击，部队伤亡惨重。在瓦窑渠战斗中，红三团三连连长刘增荣和一连连指导员马尚前英勇牺牲。

瓦窑渠战斗失利后的第二天晚上，红三团骑兵连指导员柴瑞率该连大部分战士叛变，红三团参谋长赵希贤也被裹胁在内。王兆相回忆说：“团领导和工委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暂且不管，待突围后再说。

于是部队继续向西撤退，避开太和寨、陈家坪之敌，天亮时撤到敌人尚未占领的何家沟村。部队刚刚驻下，就接到赵希贤派人送来的信，说准备叛逃的骑兵连正在高念文村，要我们快去截击。于是，杨文谟政委亲自率领两个连快速赶到高念文，把骑兵连包围起来。骑兵连的战士多数是受蒙蔽的，真相一白，立刻倒戈。叛徒柴瑞当场被打死，其他人大部分回了红三团。”^⑥

瓦窑渠战斗的失利和骑兵连叛逃事件的发生，使神府苏区反“围剿”斗争形势急转直下，苏区三分之二的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十分之九的村庄被编了保甲。

6月下旬，中共神府工委在何家沟、任家山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红军和地方干部缩编为200人左右，分为9个小分队，到各区自行游击；不带枪的红军战士全部遣散回家；红十一支队过黄河，在山西兴县一带活动。会后，王达成离开神府，经山西去找陕北特委汇报工作。这时的神府苏区除佳芦一带小部分地区尚能坚持斗争外，大部分地区已无法公开活动，被迫转入隐蔽斗争。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使神府苏区原有的23个区被国民党军占领了18个，各级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大多遭到破坏。3800多名党、团员只剩下400多名，500多名地方干部只剩下100多名。许多共产党员、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

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王达成在1985年6月所写《我在神府地区工作的片断回忆》中说：“敌人的‘围剿’、封锁，割断了神府苏区与（陕北）特委的联系。我们当时根本得不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示精神，对全国以及陕北的形势都不甚了解，一度甚至连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情况也不能及时得到，只能间接看到或听到一些零星情况。当时，有些上级‘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文件和指示精神，在我们的思想上是有影响的。我们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斗接连失利，使革命遭受挫折，教训是沉痛的。”^⑦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18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18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60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63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65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69 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232—233 页。

第三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一、反击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围剿”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再次调兵遣将，从 1935 年 7 月中旬起，发动了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1935 年 6 月中旬，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率部由河北保定开进陕西潼关，后又开往甘肃天水，就任川陕甘边区“剿匪”司令。

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开进潼关后，担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于 7 月 22 日飞抵西安，视察陕西和西北“剿匪”战况。7 月 27 日，张学良在西安召开了“剿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孙楚，

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第三十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北平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等。第八十六师副师长李藩侯代表该师师长井岳秀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实行碉堡政策和“稳扎稳攻”的办法进行“围剿”。7月31日，张学良由西安飞返武昌。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1935年7月21日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虽然帝国主义、国民党准备进行更残酷与毒辣的对陕甘苏区与红军的三次‘围剿’，然而在广大群众的斗争，在全国红军游击队行动的呼应配合之下，却是我们一定能够争取战争胜利的最大保证。”^①决议要求：“紧急的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召集群众的代表会议、群众大会、各群众团体的会议，讨论三次‘围剿’的意义及冲破的办法，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三次‘围剿’，‘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武装保卫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边区一寸土地’。在这些口号之下动员群众，发扬他们的积极性，领导赤少队配合红军游击战争，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交通队、侦探队，动员妇女组织洗衣队、缝衣队、慰劳队，动员妇女老汉儿童放哨、送信，全苏区人民战斗的动员起来，为着革命战争前线上的胜利而斗争。”^②决议还要求：“红军游击队在统一的军事计划及军委会的领导之下进行战争，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的敌人支撑点，及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阵线，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的进攻敌人，在敌人新的‘围剿’来布置之前，先行打碎。”^③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决定首先打击东线孤立之敌，再打北线之敌，然后寻歼南线之敌。

8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晋军第二〇六旅一个连驻守的吴堡县慕家塬寨子，全歼守敌；第二天，又击溃晋军增援慕家塬部队的四个连。晋军在“围剿”西北根据地时屡遭重创，阎锡山派出飞

机助战。8月16日，北平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从绥德密电杨虎城、邵力子，报告称：陕北红军游击队在吴堡县定仙塬南约20公里的洗马湾击落军用飞机一架，两名驾驶员被俘。

慕家塬战斗胜利后，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8月20日进到吴堡县定仙塬一带，并命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包围定仙塬，其余部队则隐蔽待命，准备打击增援之敌。

8月21日上午，增援定仙塬守军的晋军正太路护路军第三旅旅长马延寿亲自率领第三旅第六团向定仙塬逼近，企图与驻守定仙塬的该旅第五团的史泽波营会合。当敌人逼近红军预设的伏击圈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第二团发起攻击。经过三个小时激战，共击毙敌副团长齐汝瑛以下200余人，俘敌18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00余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两门和骡马数十匹。

定仙塬战斗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首开西北红军一战歼敌一个整团、一个旅直属队又一个营的作战记录，是西北红军作战史上的一个辉煌战例。

此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又于9月11日奔袭横山县城，迫使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收缩兵力，从而减轻了国民党军对神府苏区的压力。

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军事“围剿”斗争第一阶段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根据地的行动。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9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0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0页。

二、神府苏区的艰难复兴

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使神府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低潮时期。在中共神府工委书记王达成走后，神府工委同陕北特委已完全中断联系。在此情况下，神府工委其他领导成员于1935年8月初在神木谢家沟召开前后方干部联席会议。会议认为神府苏区遭敌破坏严重，不易恢复，决定暂时取消神府工委和红三团的名义，解散府谷第七支队。会议决定派神府工委宣传部部长张晨钟去陕北特委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并决定派王兆相率红三团团部、张德超带红十一支队，同神府工委组织部长贾令德一起前往山西，开辟新的苏区。

会后，王兆相及红三团团部因故没有前往山西。而红十一支队在进入山西的一个多月时间中，因遭晋军重兵“追剿”，无法立足，只得返回神木。前往陕北特委汇报工作的张晨钟因国民党军封锁严密，也被迫返回神木。

在神府苏区面临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坚持在神府地区开展斗争的神府党政军负责人于9月7日在神木十区郑家圪召开了前后方干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神府苏区近三个月以来的工作，总结了神府苏区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依靠苏区军民，才能战胜敌人新的军事“围剿”，恢复和巩固神府苏区。会议决定恢复中共神府工委和红三团。

9月12日，中共神府工委在王寿梁村正式恢复，书记张晨钟，组织部长毛凤翔，宣传部长乔钟灵，青年部长刘长亮。与此同时，红三团也恢复重建，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下辖三个连，共有一百二三十人。

当天晚上，驻太和寨国民党军中的地下党员李治洲等三人起义，加入红三团。此后不久，李治洲被任命为红三团参谋长。

中共神府工委和红三团恢复之际，西北军委的秘密指示信经山西辗转送到神府苏区。西北军委是在听取了王达成的汇报后，给神府苏区发出指示信的。王达成回忆说：“我于任家山会议后，6月初即离开神木，途经山西，两次找偷渡地点，路上行程约20多天，到达延

川县永坪镇。”“我除了在（惠）子俊主持的工委会上汇报神府工作，并要求迅速支援神府外，还向刘志丹单独汇报过工作，并要求支援。”^①8月初，由刘志丹起草了给神府的秘密指示信。西北军委在指示信中传达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不断胜利和一定北上支援神府苏区的喜讯；同时，指示神府红军向佳县、米脂方向移动。这封指示信给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斗争的神府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王兆相回忆说：“（王寿梁）会议期间接到西北军委前委鼓励神府军民坚持斗争、迎接胜利的来信。在与陕北特委失掉联系一年多之后，第一次接到上级的指示，同志们异常兴奋，把指示信连读了几遍。”^②

中共神府工委恢复后，实行集体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全力开展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

9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奔袭横山县城，迫使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民部西调增防，傅作义部孙胜骑兵旅进驻神木沙峁镇一带，参加“围剿”神府苏区的第八十六师其余部队大多集中在佳芦区。为了策应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中共神府工委指示红三团进入佳芦区并逐步向南移动。此时，杨文谟前往延川、安定一带向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汇报工作，中共神府工委任命毛凤翔接任红三团政委。9月下旬，红三团在申家里村击溃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邬青云骑兵营一个连。此后，红三团又连续重创邬青云骑兵营，使他们不敢再向根据地窜犯。

在指挥红三团转向外线作战的同时，中共神府工委还派出干部，到各地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坚决打击敌人利用劣绅和叛徒组成的“肃反会”。这些干部对同党组织和红军失去联系而情绪低落的人员，鼓励其坚定信心，继续斗争；对被迫向敌人自首而没有干坏事者则不予追究，愿意继续革命的则欢迎他们将功补过；已死心塌地为敌人“肃反会”效劳、捕杀革命人员和家属的叛徒则坚决予以镇压。

中共神府工委还指派刘长彦等人前往山西兴县、苛岚县、岚县之间的界河口地区开辟新区，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党员四五十名。

经过中共神府工委艰苦卓绝的努力，到 1935 年底，神府地区各地党的组织基本恢复，对敌斗争普遍开展，为粉碎国民党地方当局对神府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奠定了基础。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238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75 页。

第四节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

一、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

1934 年 12 月 8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三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境内。在 12 月 10 日进行的庾家河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歼敌 800 余名。当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先后攻克宁陕、佛坪、镇安、洛南四座县城。到 1935 年 5 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 3700 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 2000 多人，初步建成了包括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 10 个区、40 个乡、314 个村苏维埃政权，拥有近 50 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7 月 2 日，红二十五军取得了袁家沟口大捷，将陕西警备第一旅大部歼灭。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获悉中央红军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并准备继续北上的消息后，遂于 7 月 15 日晚上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还决定中共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及其领导的各地游击武装力量，继续坚持在鄂豫陕根据地。

7 月 16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沿秦岭西麓北行，继续长征。之后，红二十五军南越秦岭，佯攻汉中，又掉头向

西北方向前进，进入甘肃境内，在天水一带北渡渭河，占领秦安，威逼静宁县城。8月17日，红二十五军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攻克隆德县城。接着又翻越六盘山，直抵平凉城下。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由泾川县城以西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汭河时，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一部1000余人的突然袭击。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9月7日，红二十五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陕甘交界地区的豹子川^①。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举行会议，决定由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改任军政委，副军长徐海东任军长。随后，部队继续向东前进，于9月9日来到保安县的永宁山。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前来永宁山，热情欢迎红二十五军，并迅速报告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

9月11日（或12日），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为欢迎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根据地，向各级党部负责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抓住这千载一刻的机会，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与庆祝会”，并借此机会，“猛烈的扩大红军，以冲破摆在我们面前的三次‘围剿’”^②

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抵达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

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先期到达西北根据地的朱理治、聂洪钧与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程子华组成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

9月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有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惠子俊、刘志丹、高岗、郭洪涛、

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等西北工委负责人和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等鄂豫陕省委方面的负责人，共 30 余人。

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共陕甘晋省委由马明方、王达成、白茜、朱理治、刘志丹、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郭洪涛、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戴季英等组成，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秘书长李景波，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白区工作部长慕生忠，妇女部长白茜。

会议决定改组西北军委。改组后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主席，范子文为秘书长，戴季英为参谋长，白如冰为供给部长。会议还决定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军团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而成；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而成；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而成。全军团总兵力 7000 余人。

9 月 22 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省委各部、各党团、各级党部认真贯彻执行《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并结合实际制订自己的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报告省委。《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提出的目前战略任务是：迎头打击敌人的新进攻，冲破敌人的“围剿”，迎接将在次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陕甘晋省苏维埃代表大会；^⑤在领导群众秋收运动与查田分地斗争的基础上，完成或超额完成扩红冲锋月运动的各项任务。

中共陕甘晋省委还成立了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确定于 1936 年 1 月 28 日召开陕甘晋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10 月 15 日，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苏维埃选举法与苏维埃组织条例的决定》，统一西北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办法和组织机构的设置。其中规定：“省苏维埃各部委员会，因需要可以随时增加。就目前需要，现在应有的各部为：劳动部；土地部；教育部；粮食部；国民经济部；工农检查部；财政

部；军事部；内务部；裁判部。”^④并规定：“为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设立政治保卫局，在各县设保卫分局。”^⑤

中共陕甘晋省委隶属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陕北一分区委员会（1935年9月成立），并直接领导赤源、秀延、子长、靖边、米西、延川、延长、延安等县委。1935年10月2日晚，驻守瓦窑堡的国民党第八十四师一部在赤卫军等地方游击队的重重包围之下，被迫弃城逃跑。随后，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瓦窑堡市，辖五个区，并成立由崔田夫任书记的中共瓦窑堡市委和由崔田夫兼任主席的瓦窑堡市苏维埃政府。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也于10月5日由延川县永坪镇迁驻瓦窑堡市。中共瓦窑堡市委直属陕甘晋省委领导。

①今属甘肃省华池县。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86—87页。

③陕甘晋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因故未能召开。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18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19页。

二、红十五军团成立

1935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在永坪镇隆重举行。刘华清回忆说：“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会场上横挂‘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刘志丹同志和徐海东同志先后讲话，号召两军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而战。”^①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军团下辖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和八十一师。七十五

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参谋长毕士悌，政治部主任周碧泉。下辖第二二三团，团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第二二四团^②，团长韩先楚，政委王集成；第二二五团，团长郎献民，政委刘震。七十八师师长先后由杨森、田守尧担任，政委先后由张明先、张达志担任。下辖第二三二团，团长兼政委黄罗斌，副团长王富贵；第二三四团，团长郭宝珊，政委马佩勋；骑兵团，团长康健民，政委高锦纯。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先后由张达志、崔田民担任，参谋长任浪花，政治部主任李赤然（李宗贵）。下辖第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李赤然兼任；第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委王国昌。

红十五军团的成立，使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主力兵团，为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和巩固、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60 页。

②榆林桥战役后，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以该师第二二三团、第二二五团的两个特务连和陕北一个新兵营为基础，组建了该师第二二四团。

三、劳山战役与榆林桥战役

（一）劳山战役

随着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西北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地区，蒋介石决定将东北军主力调入陕甘地区，进行军事“围剿”。9月13日，张学良由武昌乘飞机来到西安。在此前后，东北军除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主力留驻北平和河北外，其余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及独立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独立第一一五师（师长熊正平）先后开进西北地区，与早先进入陕甘地区的第五十一军会合，全力“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蒋中正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兼副司令。”^①第二天出版的上海《中华日报》以《彻底肃清“匪患”，将在西安设立“剿匪”总司令部，俟组

织就绪，蒋委员长亲往巡视，将来由张学良常驻指挥一切》为题，刊登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的消息。同年11月1日，西北“剿总”在西安城内南院门正式成立。

在红二十五军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之前，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进入陕北。该军军部驻洛川。9月13日，该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进驻延安。该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除留一个营驻守甘泉外，余部于9月14日开进延安。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军部特务营于9月15日也抵达延安。王以哲在延安完成部署后，即率军部特务营返回洛川。第六十七军的一〇七师驻洛川、富县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的一〇〇师、一〇六师、一〇九师、一一七师由甘肃合水一带向西北根据地进犯。驻守陕北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也蠢蠢欲动，企图与东北军夹击西北根据地和红军主力部队。

面对严峻的“围剿”形势，红十五军团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确定了战略行动方向。徐海东回忆说：“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就商讨反‘围剿’的作战计划。”“我们在讨论作战对象的时候，有的同志提议先打驻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或者高桂滋师，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吃掉这两个部队，把握大一些。可是目前大兵压境，消灭这两个部队，对敌人的打击不重。还是先打东北军好，因为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②徐海东回忆说，在经过分析敌情后，“我们决定：围攻甘泉，调动延安的敌人，拦路打它的埋伏”^③。

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主力部队经过三天的急行军，由永坪前进到甘泉城西王家坪一带。徐海东和刘志丹前往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劳山、小劳山一带察看地形，确定在此设伏。9月28日，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突然包围了甘泉城。其他部队则按原定作战计划进入劳山一带，沿咸（阳）宋（家川）公路两侧山上设伏。

10月1日上午，东北军六十七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部由延安南下，增援甘泉。下午2时许，其先头部队进至劳山以南的白土坡。在两侧山坡地带预伏的红十五军团主力部队立即发起攻击。激战至晚上8时左右，战斗结束。

劳山战役全歼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师直全部、第六二八团全部和第六二九团一个营，共毙伤第一一〇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山炮、迫击炮共28门，轻重机枪20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及无线电台4部和大量军用物资。何立中身受重伤，逃进甘泉城，后因伤重于10月7日毙命。

劳山战役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劳山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西北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斗志。

在取得劳山战役的胜利后，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率部前往富县城西的羊泉一带侦察敌情时，又歼灭了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的一个营。

①陈元方、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68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51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51页。

（二）榆林桥战役

劳山之战的失利，使东北军损兵折将。为此，身兼西北“剿总”总司令之职的蒋介石于10月8日由四川成都飞抵西安，部署陕北“剿共”事宜。第二天，蒋介石与张学良联名发出“围剿”西北红军的电令，严令：“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鄜县^①、羊泉^②一带地区筑碉，肃清附近股匪，置重点于鄜县，维持肤施、鄜县间交通。”^③电令还要求杨虎城所部“以主力在宜川、洛川之线筑碉，置重点于洛川，防匪南窜”^④。并要求杨虎城部“及井（岳秀）、高（桂滋）各师，速肃清

附近股匪，俟主力军向东迂回时，即协同各友军，将刘（志丹）、徐（海东）各股匪聚而歼之”^⑤。

10月11日，蒋介石由西安飞往河南洛阳。13日，蒋介石又飞往山西太原，并将在陕北前线参加“剿共”的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召至太原，与阎锡山一起，共同策划加强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

10月20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率部由富县县城进驻富县以北约12公里处的榆林桥，以执行“维持肤施、郿县间交通”的任务。同时进入榆林桥的还有第一〇七师六二〇团的一个营。

榆林桥地处甘泉和富县之间的洛河东岸，咸（阳）宋（家川）公路由村中穿过。村子内建有堡寨，依山傍水，易守难攻。

榆林桥战役进行的较为顺利。刘华清回忆说：“10月24日晚，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同志指挥下开始行动，以红七十五师由东向西担任主攻，并派一个营警戒由榆林桥通往洛川的公路；以红七十八师由西向东，先歼河西敌一个营，再会攻榆林桥；以红八十一师由北向南进攻，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并派出两支部队分别占领了洛河南面的小山和北面高原的碉堡。次日拂晓开始强袭，敌人被压缩到街内后，利用窑洞进行顽抗，我军伤亡较大。后来由于战士的发现和创造，从房上的烟筒向里投掷爆炸物，才迅速地歼灭了敌人。”^⑥

至10月25日下午，榆林桥守敌四个营全部被歼，第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被俘。

榆林桥战役是红十五军团在缺乏攻坚器材和经验的条件下取得的对敌设防据点攻坚战的胜利，对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驻守洛川、甘泉、延安之间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各部陷入了首尾不能相顾的狼狈状态。这一战役的胜利，也极大地振奋了西北根据地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

①今富县。

②今属富县。

③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页。

④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页。

⑤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62—363页。

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积极反击国民党当局第三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却在根据地内部实行错误的肃反，造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在1934年7月25日召开的南梁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曾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郭洪涛回忆说：“信中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例如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这两封信宣读后，进行了讨论。会后，由四十二师龚逢春整理了记录，送给了中央驻北方代表。”^①郭洪涛说：“我在会后，曾根据指示信的精神和整理的记录，写过一篇《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刊登在陕北特委机关刊物《西北斗争》上）。在这篇文章中，我错误地引用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对红二十六军的批评。”^②

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为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留下了隐患。

1935年7月5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巡视西北根据地工作的朱理治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朱理治在1945年7月回忆说，他临行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示说，“陕甘边二十六军的右倾很严重，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他要我到陕北后首

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同时给我看了一本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字叫《肃反》，里边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写的一篇序，说鄂豫皖‘肃反’是伟大的胜利。今天看来，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③朱理治说：“我到陕北后，首先开了一个永坪会议，我传达了中（央）代（表）几万字的指示，内容是夸夸其谈。那时正是三次‘围剿’，做了一个反三次‘围剿’的决议案。以后我在文安驿会议上也报告过，讲了两三天。这些报告内容，是把中央代表的指示信具体化了，并且有个别的发展。”^④

1935年7月21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议案指出：“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实行中（央）代（表）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暗藏在党内以蔡志伟^⑤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张是实际对党的路线的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革命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⑥决议案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所以陕甘党站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正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取消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陕甘党才能顺利的完成一切光荣的任务。”^⑦

永坪会议后，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等先后被逮捕或软禁。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开始逐步推开。

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前，曾于1935年4月9日在蓝田九间房^⑧与陕西警备第三旅发生激战。警三旅第七、第九两个团被击溃，担任该旅旅长的中共秘密党员张汉民被俘。和张汉民一起被俘的还有在警三旅工作的20多名共产党员。在审讯中，尽管张汉民等一再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由于双方互不了解，缺乏信任，张汉民等被俘的共产党员仍然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错误杀害。与此

同时，奉上海中央局委派返回陕南，与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及红二十五军联系工作的汪锋也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拘禁。同年9月，汪锋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被错误关押。

关于张汉民等共产党员被错误杀害一事，郭述申回忆说：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作战时消灭了杨虎城的警备二旅^⑨活捉了旅长张汉民。张是我党的秘密党员，陕西省委曾通知二十五军，张也派人给二十五军送过情报。但是，二十五军认为张是反动法西斯，他送情报是个阴谋，就把张杀了。俘虏的张部士兵中，还有一批党员，让他们站出来报告，结果也都杀掉了。汪锋同志去联系，也当反革命给抓起来了”^⑩。

张汉民被错误杀害，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一个重要因素。郭述申说：“（红二十五军）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⑪

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相继成立后，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加快了实施的步伐。中共陕甘晋省委9月22日发出的《关于印发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⑫

当时担任西北军委主席的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回忆说：“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以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随即和徐海东、郭述申商量，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文电

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州，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⑬

当时担任红十五军团政委的程子华回忆说：“我从永坪去前方时，朱理治告我，调刘志丹到后方，指挥北线作战；高岗逮捕送后方。我到前方传达作战方针后，这样办了。在我到达前，前方部队已经开始‘肃反’，抓了一些人，干部战士很有意见。我感到情况严重，即令执行‘肃反’任务的朱仰新（原红二十五军侦察科长）停止捕人，并写信给朱理治，说明部队情况，要他们迅速派干部来前方。不久，郭洪涛、崔田民到前方，崔到部队工作。”^⑭

10月9日（或10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回到瓦窑堡后即遭到逮捕。在此前后，原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一些负责人也遭到逮捕。当时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⑮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民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在此前后，曾担任过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中共赤淳工委书记的金理科被错杀于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曾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张景文在甘泉县下寺湾被错杀。据赵启民回忆，在此期间“还杀害了 200 多干部”^⑯。

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泛滥。朱理治回忆说：“肃反整个的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①

“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实施的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党内、军内、根据地内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至发生“反水”叛乱事件。而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则日甚一日。习仲勋回忆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②

在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加紧进行的紧急关头，根据地内部的错误“肃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忧外患，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81—682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82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1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1页。

⑤即蔡子伟。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4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4页。

⑧今属柞水县。

⑨应为警备三旅。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50页。

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50页。

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0页。

⑬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5—436页。

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57 页。

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15—416 页。

⑯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23 页。

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33 页。

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16 页。

第六章 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第一节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

一、哈达铺会议与榜罗镇会议的决策

193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①。在哈达铺，中共中央领导人从缴获的1935年7月29日和8月1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上获悉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

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哈达铺召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组织部工作和干部问题，决定按照9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②的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

当天，毛泽东出席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做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③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9月28日，陕甘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共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

扩充新战士。毛泽东在报告中号召全军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会合。^④

10月16日，毛泽东在甘肃环县木瓜城就陕甘支队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⑤、金汤镇^⑥集结休息二三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料，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联络。”^⑦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铁边城^⑧以东的张湾子村召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秦邦宪）以及王稼祥、林彪、聂荣臻、杨尚昆。会议讨论了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要求：由司令部、政治部发一训令下去：第一，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第二，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第三，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⑨

①今属甘肃省宕昌县。

②即俄界会议。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7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77页。

⑤今吴起县城。

⑥今属志丹县。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80页。

⑧今属吴起县。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二、中央红军长征到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西北苏区的西靖边县吴起镇，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

当天，毛泽东致电随陕甘支队第二、第三纵队行动的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①电报要彭德怀第二天到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一、第二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②10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吴起镇研究了敌情。毛泽东指示：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③

10月21日，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在吴起镇以西的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一线设伏，击溃了尾追红军的东北军骑兵军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各一部共2000余人，取得了“切尾巴”战斗的胜利。“切尾巴”战斗共打死国民党军骑兵数百人，俘获200余人，缴获战马200余匹和一部分轻重机枪、迫击炮等。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吴起镇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和陕甘支队各纵队负责人。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④毛泽东在做结论时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⑤

吴起镇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担任陕甘支队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主力部队及其负责人，李维汉同行。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会见了红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感谢在陕北坚持战斗的红十五军团的同志，并向全军团同志表示慰问。^⑥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治委员龚逢春和指挥员马福记。龚逢春向毛泽东汇报了西北根据地和红

军的情况。龚逢春回忆说：“我汇报以后，毛主席指示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要赤化西北。要我们做好赤化工作，要我们好好的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此外，我还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陕北‘肃反’的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逮捕，我说我的看法，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关怀陕北的‘肃反’问题，毛主席亲切地向我说，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⑦

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以及王稼祥、彭德怀、李富春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部队工作、行动方针及常委分工问题。会议确定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⑧会议还决定了其他一些干部的任命：李维汉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无适当人选，先由吴亮平做工作^⑨，王稼祥任红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负责工会，凯丰（何克全）任少共书记，保卫局负责人由常委同志兼，王首道为副^⑩。

10月30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沿洛河川南下，经金鼎、石畔（均属今志丹县）等地，于11月2日到达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④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8月第1版，第27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82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82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第395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3 页。

⑨后由张闻天兼任宣传部长。

⑩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271 页。

三、下寺湾会议

1935 年 11 月 3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和红军的历史及现状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林伯渠、彭德怀、李维汉和李德。会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了当地群众举行的欢迎大会。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下寺湾召开，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军委其他委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①

当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

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出《关于成立西北办事处的布告》。布告指出：“为着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使中国西北各省的苏维埃运动在更巩固的基础上更猛烈的发展起来，兹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下列同志组织之：博古，主席；林伯渠，财政部长；邓发，粮食部长；王观澜，土地部

长；崔田民，国民经济部长；徐特立，教育部长；蔡树藩，司法内务部长；罗梓铭，工农检查局长；邓振询，劳动部长。”^②次年7月，西北办事处增设外交部，负责对外联络、宣传、外交等事宜，由博古兼任外交部长。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南下与第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围剿”；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王稼祥、凯丰率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

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

11月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任命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此后，军委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动员武装部和军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局相继成立。军委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北，副部长白如冰。军委卫生部部长先后由黄克诚、姬鹏飞担任，政委先后由吕振球、刘惠农担任。军委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戴季英。新兵训练处处长周士第，政委黎林。军委第一局局长由张云逸兼任。军委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军委第三局局长王净。军委第四局长宋裕和。

同一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决定成立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任主任，副主任聂洪钧。

1935年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正式成立。

下寺湾会议后，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对西北革命根据地所辖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分设了陕西省、陕甘省和三边、神府、关中特区。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仍由马明方担任，副主席霍维德。陕西省先后下辖神府特区、东地区办事处和关中特区，直辖吴堡、米（脂）西、绥德、清涧、靖边、定边、新城、赤

源、横山、安定、秀延、子长、延川、延长、延水、安塞、赤安（志丹）、延安、甘洛、肤施、宜川（红宜）、富县及瓦窑堡市。省的治所设在瓦窑堡市。

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先后由王生玉、李生华、朱开铨担任，副主席朱开铨。陕甘省下辖关中特区及甘（泉）洛（川）、肤施、红泉、宜川、富县、中宜等县。省的治所先后设在甘泉下寺湾和富县北道德。1936年5月，陕甘省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入陕西省和陕甘宁省。

三边特区以定边、安边、靖边三县的苏区为辖区。谢唯俊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慕生桂任副书记。1935年11月27日，三边特区所属的西靖边县警卫一连连长宗文耀等发动叛乱，三边特委书记谢唯俊等遇害，三边特区的组建工作中断。

神府特区以神木、府谷、佳县、榆林的苏区为辖区。1936年1月，中共神府特委成立，杨和亭、张秀山先后任书记。同年4月，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又改称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乔钟灵任主席，王聚英、刘兰亭、强晓初、王明月任副主席。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神木、府谷、佳芦、榆林、佳北等县苏维埃政府。

关中特区以陕甘边南区的苏区为辖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县。中共关中特委成立于1936年1月，贾拓夫、汪锋、习仲勋先后任书记。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习仲勋、张邦英。1936年3月，关中特区改由陕甘省领导。同年5月陕甘省撤销后，关中特区划归陕西省领导。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使西北革命地踏上了迅速发展壮大的新的历史阶段。

①1936年4月10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28页。

四、纠正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得知了陕北“肃反”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①

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寺湾会议决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回忆说：“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②

主持纠正错误“肃反”的博古做了大量工作。朱理治回忆说：“中央到了下寺湾以后，我就赶到那里，在一个会上谈了‘肃反’的错误，并和博古谈了一小时。他征求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我说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这样讲话使得后来中央对这问题没有很快搞好，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③

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于11月7日抵达瓦窑堡后，即着力解决纠正错误“肃反”问题。王首道回忆说：“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④王首道写道：“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

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⑤王首道回忆说：“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⑥

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也十分关注纠正错误“肃反”问题。11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在富县张村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⑦

11月26日，中共中央以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做出关于《检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⑧。但是，这一《决定》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如说“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⑨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曾一度统治全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二是由于在审查和纠正错误“肃反”时，主要着眼于尽快分清革命还是反革命，迅速释放刘志丹等一大批被捕的干部，对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政治路线问题未做调查研究。正因为如此，在错误“肃反”被纠正后，对原陕甘边党、政、军一些干部工作的分配仍存在着不公平和不适当的问题。

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平反。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邓发、张浩（林育英）、朱

理治、聂洪钧和党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等。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等被释放的干部也出席了会议。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⑩李维汉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他们以后也作了检讨”^⑪。

李维汉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西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⑫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于11月27日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前线，12月8日回到瓦窑堡。同一天，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去，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12月13日，毛泽东回到瓦窑堡。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毛泽东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听了，喜悦万分。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

刘志丹获释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虽然得到了纠正，但仍遗留着一些问题。七年之后，中共中央于1942年12月12日做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正确分析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人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朱理治等人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决定》还指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处分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⑬

此后的40多年间，关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问题，尤其是“肃反”的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为此，中共中央于1983年4月指定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根据地方面的代表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和陕甘边根据地方面的代表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经过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此后，中共中央发出〔1983〕28号文件，向全党印发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共中央指出：“对于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发生的错误肃反问题，我们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其错误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看到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犯错误的同志也接受了教训，几十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集中弄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旨在最终结束这种争论，中央认为这是很对的。中央希望30年代在陕北、陕甘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应根据‘十二大’的精神，以‘三大作风’为武器，重新学习和认识以往的史实，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为标准来统一认识，最终结束争论，更加团结一致。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这个文件为准。”^⑭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4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04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33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04—405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06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06 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8 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9 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9 页。

⑩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283—284 页。

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97 页。

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97 页。

⑬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9 页。

⑭张宏志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28 页。

第二节 彻底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围剿”

一、直罗镇战役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引起了蒋介石的惊恐。国民党当局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新的进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的第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〇六师和一〇八师由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富县推进，以构成沿葫芦河形成的东西封锁线；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的第一一七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接应第五十七军东进，并救援甘泉、延安一线驻军，妄图打通洛川、富县与甘泉、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河及其支流劳

山河而形成的南北封锁线，进而以这两道封锁线为基点，将红军主力部队聚歼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1935年10月28日，董英斌所部开始向东推进。11月1日占领了陕甘交界处的要隘太白镇，并在此构筑工事。第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于11月6日进驻富县县城后，按兵不动。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11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向南作战”与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11月4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一军团离开甘泉下寺湾，并于第二天到达象鼻子湾村。在象鼻子湾村，毛泽东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毛泽东指出：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①

11月7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前往甘泉道镇红十五军团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共同商定直罗镇战役计划，确定先行攻打张村驿。至此，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8日，红十五军团歼灭了张村驿一带的民团武装。此后，红十五军团又陆续歼灭了盘踞在富县北道德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为直罗镇战役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障碍。

11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出席了在张村驿召开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至肤施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攻占甘泉、肤施。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②

1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张村驿以西的川口子村。发起直罗镇战役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

怀还带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前往直罗镇地区，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直罗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北临葫芦河，并接柏山；南为高山，并有川子河川道，可通槐树庄和上畛子。全镇不足 100 户人家。镇子以东有一处古寨子，寨墙基本完好，易于固守。

在此之前的 11 月 18 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以第一〇八师守备合水至太白镇一线，其余部队全力东进。当天下午，其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的率领下，前进至直罗镇以西的黑水寺安家川一带。第五十七军军部及另外两个师则前进至黑水寺以西的张家湾一带。

11 月 20 日，牛元峰率第一〇九师进占直罗镇。当天晚上，红一方面军将直罗镇包围。11 月 21 日拂晓，红一方面军向直罗镇发起猛攻。激战至下午 2 时，第一〇九师大部被歼。牛元峰率残部退入直罗镇以东的寨子山固守。

董英斌和王以哲得到第一〇九师被围困于直罗镇的消息后。急令第五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一〇六师向东推进，令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向西推进，企图东西对进，解救第一〇九师。

面对敌情的变化，红一方面军迅速调整作战部署。11 月 23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红一方面军遂以少部兵力围困寨子山守敌，并阻击由富县县城向西推进的第一一七师，主力部队则沿葫芦河川道西进，迎击第五十七军的两个师。董英斌惧怕被歼，遂向太白镇方向退却。红军乘势追击，在张家湾歼灭了第一〇六师的第六一七团。

11 月 23 日，困守寨子山的牛元峰待援无望，遂于当晚突围，沿葫芦河支流川子河向南逃窜。红十五军团乘胜追击。牛元峰在逃跑途中被其副官击毙。至 24 日晨，第一〇九师残部全部被歼。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九师全部及第一〇六师第六一七团，俘敌 5300 余名，毙敌 1000 余名，缴获步枪 3500 多支，缴获轻重机枪 179 挺和迫击炮 8 门，并缴获子弹 22 万余发和大量军用物资。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迫使东北军第五十七军退回陇东，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回防洛川。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对直罗镇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③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5 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8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50 页。

二、神府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中共中央机关于 1935 年 11 月 7 日进驻瓦窑堡后，即着手组建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神府特委。11 月 25 日，杨和亭被任命为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张绍全任神府特委宣传部长，张汉武任少共神府特委书记，谢绍安任神府红三团团团长。

瓦窑堡会议后，杨和亭和谢绍安等启程前往神府苏区。途中，谢绍安不幸牺牲。1936 年 1 月初，杨和亭等到达神府苏区后，即在神木罗家塬召开神府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共神府特委的决定及有关指示精神，并通报了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军事“围剿”的喜讯，使大家情绪振奋，备受鼓舞。会议决定：军事上主动找敌人弱点打，优待俘虏；解散合并了的村庄，

把赤卫军等群众组织迅速恢复起来；加强对国民党军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清查反革命，搞好肃反工作。

中共神府特委成立后，领导神府苏区的广大军民，迅速投入到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军事“围剿”的斗争中。

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开始于1935年11月下旬，主要兵力是孙长胜部晋绥军骑兵旅，“围剿”的重点是神木南部和佳芦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神府红三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主动寻机歼灭敌人。1936年1月，红三团在乔家迪击溃驻陈家坪的国民党军一个连，俘敌三四十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马匹。同年2月间，红三团又袭击了榆林县响水梁民团，歼敌30多人。随后，在佳芦县刘国忠村^①附近，歼灭万镇民团20多人。

此后，中共神府特委接受了王兆相离队受训的申请，任命贺伟为红三团团长，毛凤翔仍任政委，贾如胜任参谋长。

1936年2月下旬，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张秀山、邓万祥、刘明山、黄正明、白兴元、陈景堂等在米西游击队的护送下来到神府苏区。张秀山到达神府后，出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张秀山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将神府特委划归陕西省委领导的决定。中共神府特委还对红三团的领导进行了调整：刘明山任团长，毛凤翔任政委，贺伟任参谋长。随后，红三团于3月中旬在九圪村击溃驻沙峁的国民党军骑兵连，在毛谷川截获“反共义勇队”运送的一批军衣、弹药等。“进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屡屡遭受袭扰，只得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

3月20日，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北上，进入神木县境后，在桃柳沟歼敌一个排，并缴获一批物资。3月21日，红二十八军在红三团的配合下，又在杨实塆村歼灭了正在该村抢夺粮食的国民党军两个连，俘敌100多人。在红二十八军进军神府途中，第三团团

长杨琪在 3 月 9 日的绥德岱王庙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 41 岁。

红二十八军进入神府地区后，接连获得两次战斗的胜利，使“进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闻风丧胆。驻防花石崖、太和寨、汉路子沟、龙尾岭、乔岔滩、安崖等据点的国民党军纷纷撤回高家堡和神木县城。3 月 24 日，红二十八军包围了驻沙峁镇的晋绥军骑兵旅孙长胜部的三个连，准备聚而歼之。3 月 25 日，驻守沙峁的国民党军乘隙而逃，沙峁镇获得解放。驻瓦罗、栏杆堡、石窑的国民党军闻讯后，也纷纷龟缩回府谷县城。至此，神府苏区基本得到恢复。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①今属神木县万镇乡。

第三节 巩固与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

一、东征战役

1935 年 11 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从苏联莫斯科回国，他取道蒙古，穿越沙漠草原，风餐露宿，徒步跋涉，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张浩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还带来了经反复背诵、默记在心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

在此之后，西北革命根据地早期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人阎红彦也于同年 12 月回到瓦窑堡。

阎红彦在上海中央局参加培训后，于 1933 年 5 月被上海中央局派到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阎红彦根据中共组织的安排，前往绥远、宁夏，在孙殿英部做兵运工作。1934 年 6 月，阎红彦奉命前往天津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同年 7 月，被选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前往苏联莫斯科，后进入国际马列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政治和军事。1935 年 4 月，阎红彦未及参加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奉共产国际之命，送密电码回国。阎红彦回到陕北，中共中央因长征而中断的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得到恢复。1936年初，阎红彦出任陕北黄河游击师（沿河游击队）司令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关于战略方针；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三、关于行动方针。毛泽东在谈到行动方针问题时指出：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①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指出：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如东村时所定。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以打击，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5000人扩红计划，并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②

瓦窑堡会议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开始进行东征的准备工作。1935年12月30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陕北独立第一、第二、第四团为基础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下辖第二五〇团，团长黄光明，政委王

再兴；第二五一团，团长于占彪，政委王学清；第二五二团，团长陈方仁，政委朱远清。全军共 1200 余人。

红二十九军组建于 1936 年 1 月，以陕甘红军第一团及中宜、宜川独立营和华池游击队为基础编成。萧劲光任军长，朱理治任政委，谢嵩任副军长兼参谋长，甘渭汉任政治部主任，周玉成任供给部主任。红二十九军成立时，辖两个团共 8 个连，兵力约 850 人。1936 年 5 月后，谢嵩、萧劲光先后任军长，甘渭汉、朱理治先后任政委，刘幼安任政治部主任，姚军吾任供给部部长。当时，全军下辖第二五五团，团长叶英明，政委刘永源；第二五六团，团长徐国珍，政委李长伟；第二五七团，乔凤鸣、张韦祥先后任团长，刘昌、段达明先后任政委。到同年 10 月，红二十九军全军总兵力已达 1500 余人。

1936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东征的方针和准备工作。

1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政治局随军行动，陕北组织中央局。^③会议决定：彭德怀、张浩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④

1 月 19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 2 月 12 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才予以公布。

1 月 26 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此后，经延川冯家坪、文安驿和延长后段家河，于 1 月 29 日到达延长县城。

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城主持召开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反复说明：东征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指出：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毛泽东在补充发言中说：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⑤

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宣布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敌军工作部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令三。

2月4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离开延长县城，经延川县境，前往清涧县袁家沟村。在此前后，张闻天由瓦窑堡启程，赶到清涧，与毛泽东等会合。

毛泽东在袁家沟视察渡口情况，督促渡河准备工作期间，适逢大雪。毛泽东诗兴勃发，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

从2月20日20时起，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从绥德县沟口至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一举突破了阎锡山部队的防线。

2月21日，毛泽东从清涧河口东渡黄河。

东征红军突破了阎锡山部队的防线后，势如破竹。至2月23日，

东征红军全部控制了从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黄河东岸各渡口，并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在内的横宽50多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

东征战役开始后，阎红彦率陕北黄河游击师600多人，随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参加东征，主要负责掌控黄河东岸各渡口。

3月1日，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指出：“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

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布告还指出：“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⑥

3月10日，东征红军向兑九峪（今兑镇）晋绥军发起攻击，将其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击溃。至此，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晋绥军的顽强抵抗。3月24日，蒋介石委任陈诚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调集中央军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部队。蒋介石还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西北革命根据地。3月26日，陈诚所部进至三交、留誉、石楼等城镇。

3月8日到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山西西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会议^⑦，讨论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3月31日拂晓，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强渡黄河，并一举攻克山西兴县罗峪口镇，歼敌一个营。次日，又攻克黑峪口镇，并扫除了罗峪口至黑峪口的黄河东岸封锁线。随后，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4月上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东征的陕北黄河游击师600多人为基础组建了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随后，红三十军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中路军，担负对北线晋绥军的牵制等任务。

4月13日傍晚，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命令，红二十八军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

4月14日，刘志丹在指挥攻打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

4月23日，刘志丹的遗体被运回瓦窑堡，周恩来等亲视入殓。

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南门外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博古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分别致悼词。之后，刘志丹被安葬在瓦窑堡南门外刘家渠的山坡上。

为了纪念这位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决定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毛泽东还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的英勇牺牲，是西北革命根据地乃至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刘志丹牺牲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加强了对东征红军的堵击和进攻。1936年4月底，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进入陕北“围剿”西北根据地。第四师王万龄部守护宋家川至绥德公路交通，第八十九师王仲廉部集结在绥德城关附近。与此同时，阎锡山所部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协同陕北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采取堡垒政策，向西北根据地的东北部进攻。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也分别向西北根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进攻。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各一部则陈兵陕甘边界地区，防堵红军西进。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于1936年4月28日致电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电报指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⑧

从5月2日起，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到5月5日，东征红军全部西渡，在延长、延川一带休整。在东征红军回师西渡时，红三十军参谋长杨森率两个连担任后卫。在完成掩护主力

部队渡河的任务后，杨森在三交镇遭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战斗中，杨森壮烈牺牲在黄河岸边，年仅 28 岁。

5 月 2 日晚，毛泽东从清水关西渡黄河，于 5 月 4 日到达杨家屹台村。5 月 5 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起草了向全国各界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在红军东征期间，神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 4 月 15 日在神木杨家沟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乔钟灵，副主席王聚英、刘兰亭，秘书长刘长健。革委会下设内务部，部长刘秉章；土地部，部长王昌岐；财政部，部长高振业；粮食部，部长王刚；教育部，部长由刘长健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杨士敬；裁判部，部长李秉章；保卫局，局长黄正明；工农检查局，局长党世元。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还成立了银行，由高振业兼任经理，王玉亭任副经理。银行先后发行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货币，先后采用白布及纸张印刷。

在此期间，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 4 月中旬成立，郭宝珊任总指挥，刘明山任副总指挥，毛凤翔任政委。

1936 年 5 月初，随红二十八军东征返回神府苏区的新三支队在神木阎家堡改编为红四团，团长王兆相，政委贺伟，下辖两个连共 160 余人。

6 月，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进行调整，王兆相任总指挥，刘明山任副总指挥，张秀山任政委。

红军东征期间，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在甘肃环县曲子镇成立。姚喆任师长，李志民、黎林先后任政委，参谋长尹国赤，政治部主任周志刚，下辖四个团：第一团团长先后为汪租米、杨瑞森，政委张明科，副政委刘禄昌；第二团团长朱日亮，政委先后由吴某某（名字待考）、刘英、朱书田担任；第三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刘永培；第四团团长先后由黄克秀、罗德胜担任，政委刘培清。

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东征战役历时 75 天，共消灭国民党军队 7 个团，俘敌 4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支 4000 余支、炮 20 多门。东征期间，红军扩充新兵 8000 余人，并筹款 30 余万元。红军还在山西省的 10 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98 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99 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06 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06 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08—509 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18 页。

⑦史称晋西会议。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38 页。

二、西征战役

1936 年 5 月 8 日至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川县杨家圪台村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全体成员和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领导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做《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①

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和创办红军大学问题。

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之际，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蒋介石拒不接受毛泽东、朱德于 5 月 5 日发出的《停战议和

一致抗日通电》，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指挥中央军、晋绥军和第八十六师、第八十四师向根据地腹部进逼。西北“剿总”所属的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也分别在南部和西南部进逼根据地。

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形势，红军若采取单纯防御政策，势必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在5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选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②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陕北、宁夏、陕南等行动方向进行分析之后指出：“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③

张闻天在做会议总结时指出：东征特别在政治方面得到大的胜利，现在则要以西北国防政府为主要一环。党的基本口号仍是“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苏维埃红军要做抗日的火车头。”红军行动方向“要移向甘肃”，“将来还是要向东”。^④

5月13日至15日，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会议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征。毛泽东在5月13日所做的报告中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⑤

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太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等和陕北地方部队牵制蒋介石、阎锡山的西渡部队以及陕北、渭北敌人；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与陈先

瑞等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⑥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陆续离开太相寺及附近地区，开始西征。

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刘晓。司令部下设：作战科（一科），科长聂鹤亭兼任；侦察科（二科），科长张经武；通信科（三科），科长海凤阁；管理科（四科），科长朱早观；机要科，科长黄有凤。政治部下设：秘书处，秘书长周桓；组织部，部长黄克城；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地方工作部，部长由刘晓兼任；统一战线部，部长李涛。

6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杨至诚并告萧劲光、左权、徐海东等：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定组成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⑦后勤部政委李文楷，特派员曾仁文。后勤部下设：供给部，部长赵尔陆；卫生部，部长姜齐贤，政委刘惠农；兵站部，部长由杨至诚兼任，政委由李文楷兼任。

西征部队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以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6月10日，西方野战军决定，由红二十八军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负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巩固西北根据地西部的任务。西征部队三路大军紧密配合，互相支援，到7月底，先后占领了曲子、环县、宁条梁、定边、盐池、同心城、七营、豫旺等重要城镇，在陕甘宁边境地区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征战役俘获人枪各2000余，缴获战马500余匹，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部队都得到很大发展。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开辟的根据地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成果，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

西征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刘景范先后任书记；左觉农、赵一民先后任秘书长；罗梓铭、蔡畅、陈时夫、李景膺先后任组织部长；李一氓、李富春（兼）、李华生先后任宣传部长；萧劲光、赖传珠、王世泰先后任军事部长；蔡畅任白区工作部长；秦力生任统战部长；李学蓉、白国英先后任妇女部长。

与此同时，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也宣布成立，马锡五任主席，副主席朱开铨；秘书长杨培源；国民经济部长先后由张慕尧、赵耀先担任；土地部长由朱开铨兼任；裁判部长也由朱开铨兼任，副部长王光力；财政部长先后为杨玉亭、张慕尧；内务部长王子宜；粮食部长杨玉亭，副部长袁进贤；教育部长先后由王之匀、刘国声、廉洁担任；保卫局长先后为郑自兴、李握如。

陕甘宁省成立后，陕甘省撤销。原属陕甘省所辖的关中特区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等县划归陕西省，华池等县划归陕甘宁省。

西征战役开始后，关中红军司令部于5月下旬成立，司令员江华，政委贾拓夫，政治部主任张邦英，下辖两个团。同年6月底，关中红军司令部建制撤销。

1936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东地区特委，戴季英、白炳圻先后任书记。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东地区办事处同时成立，王海山任主任。陕西省东地区特委和办事处领导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宜川、红泉等县苏维埃政府，并领导中共佳县县委及绥清、吴堡中心县委。与此同时，陕西省东地区游击司令部也正式成立，司令员先后为黄罗斌、慕生忠、赵启民。

①金冲及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5页。

②金冲及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5页。

③金冲及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5页。

④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20页。

⑤金冲及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41 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41 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47 页。

三、神府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在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军事“围剿”之后，神府苏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936 年 8 月 1 日，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在神木花石崖正式成立，师长王兆相，张秀山、王宝珊先后任政委，李治洲、杨文谟先后任参谋长，秘书长王恩惠，政治部主任先后由王国昌、王恩惠担任或兼任，供给部长王海山。独立第一师成立时，下辖两个团和三个直属连，后发展到四个团；第一团，刘明山、贺伟先后任团长，邓万祥、陈景堂、许培仁先后任政委；第二团，团长贾兰枝，贺伟、白兴元先后任政委；第三团，团长刘明山，政委王佑；骑兵团，团长刘崇德，政委许发善。在独立第一师正式成立的同时，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撤销。

独立第一师组建后，主动出击，袭击了驻守孤山、吕岩家、建安等地的国民党军，并在栏杆堡附近击溃国民党军两个连。9 月 1 日，独立一师在神木独立第三营配合下，穿插越过孤山一带，北上府谷哈拉寨，沿途消灭了木瓜、清水、哈拉寨三个民团，并在哈拉寨没收了一些劣绅的粮食棉布，一部分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其余补充了军需。同时，独立第一师还释放了因骚扰红军被抓获的内蒙古准格尔旗骑兵团的一些士兵，通过这些士兵，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9 月 5 日，独立第一师与神木独立第三营返回神府苏区。

从 9 月中旬起，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围剿”部队以晋军第七十二师陈长捷部的四个团为主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的两个团、一个骑兵团及一些地方民团等配合，另调第八

十六师的一个团到府谷，共计一万多兵力，以团为单位，密集推进，企图南北夹击，摧毁神府苏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军事“围剿”，10月1日，中共神府特委在阎家山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斗争。会议确定了“向南作战，先打晋军”的方针，并确定：独立一师打击外线敌人；独立营和游击队在内线各自为战，伺机袭击小股敌人及破坏敌人交通；动员苏区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围困敌人。

10月中旬，晋军陈长捷部进犯到万镇、花石崖、乔岔滩一带。独立第一师乘敌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乘隙进入敌后。10月19日，独立第一师首战泥河沟，歼灭晋军一个排。10月20日，独立第一师又在苏泥家设伏，歼灭晋军两个连。随后，独立第一师第一团在王寿梁连续破坏敌人交通，歼敌100多人，迫使晋军放弃了高新庄、衙院沟、任念功等据点。独立第一师第二团在万镇山上截击了国民党军一个运输队，缴获驮骡30多头和一批粮食。在内线作战的独立营和游击队在袭扰国民党军的同时，也伺机绕到敌后破坏交通，使进犯苏区之敌防不胜防。

11月初，晋军第二〇九旅段树华部进驻佳县通镇一带：府谷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一个团因佳县封锁线被突破，也被迫退出神府苏区。独立第一师乘晋军陈长捷部退回山西之际，先后攻占了佳县以南的金明寺、井道沟、清泉寺等寨子，释放了一大批被监禁的群众。11月底，独立第一师在乔岔滩围点打援，消灭了乔岔滩民团和前来增援的高家堡国民党军。至此，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苏区发起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以失败告终。

神府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有力地策应了西方野战军的西征战役，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节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1936年6月21日，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离开瓦窑堡，向保安县方向前进。7月1日，博古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机关到达保安城。

7月5日至7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会议，研究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及中央关于两广事变的策略等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先后回到保安。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在保安召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会议确定，以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作为今后谈判的对手，并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8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电报指出：“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及西固附近，西岷大道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①电报要求广泛宣传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

8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红一方面军8月至9月中旬仍以训练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②电报指出：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之会合于固原海原地区。^③

为了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方野战军主力部队于8月31日由豫旺堡南北之线向西运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占领清水河两岸之线。随后，红一军团以第一师（欠第十三团）附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在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经硝河城向南挺进，于9月14日占领将台堡。红十五军团以步兵、骑兵各一个团组成特别支队，向靖远挺进，也于9月14日占领打拉池。

为了接应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30日，红一方面军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主力为左纵队，经硝河城南进，同先期占领界石

堡等地的特别支队靠拢；红十五军团则以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先头部队独立支队于10月2日进占会宁城。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抵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一部会师。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左权、聂荣臻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平锋镇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的第二、第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为了庆祝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于10月10日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指出：“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这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④

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周恩来于11月15日离开保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河连湾迎接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18日，周恩来到达河连湾，见到了朱德、张国焘。19日，周恩来在洪德城与贺龙、关向应会面。随后，周恩来与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等精心部署红军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山城堡附近地区。

11月20日，胡宗南所部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侵占山城堡。11月21日，七十八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彭德怀指挥红军各部发起猛烈进攻。经一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全部又两个团。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使得胡宗南所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停止了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西部地区的进攻。山城堡战役被称为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山城堡战役结束后，周恩来用大量的时间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党中央的政策。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张国焘于 11 月 24 日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及红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信中写道：“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⑤

11 月 30 日，周恩来和朱德、张国焘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2 月 6 日，保安城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发表了演讲。

12 月 7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刘伯承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扩大，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内部的团结，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光荣使命奠定了基础。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宁省委于 1936 年 10 月决定重建中共三边特委。张德生、贾拓夫、李维汉、罗梓铭先后任书记，下辖安边、定边和宁夏盐池县委以及绥远省的鄂托克^⑥工委。^⑦

1936 年 12 月 27 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八十一师为基础，加上陕北苏区地方部队一部 400 余人，重新组建红二十

七军，编入红一方面军，贺晋年任军长，王平任政治委员，李寿轩任参谋长，李志民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下辖第二四一团、第二四二团、第二四三团，全军共 1100 余人。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68 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69 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69—570 页。

④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375 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337 页。

⑥今属内蒙古自治区。

⑦1937 年 5 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撤销三边特委，成立中共定边中心县委。

第七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一、瓦窑堡会议

从1935年5月起，日本侵略者在华北连续制造了河北事件、张北事件，迫使国民政府先后与之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南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①

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张浩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张浩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的精神，还带来了1935年8月1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主要精神。

11月20日，张闻天从瓦窑堡致函正在根据地南线部署反“围剿”战役的毛泽东，通报了张浩来到瓦窑堡的情况，以及他带来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4日，张闻天和博古致电毛泽东，电报指出：估计敌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②

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③宣言还提出了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发表的两个宣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这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在瓦窑堡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和陕西省委负责人李维汉、吴亮平、张浩、邓颖超和郭洪涛等。担任会议记录的是欧阳钦。

瓦窑堡会议就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做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做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12月23日，毛泽东向会议做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5日，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共分为六个部分：（一）目前形势的特

点；（二）党的略策路线；（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四）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五）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决议指出：当前国内形势最基本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④。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⑤

12月27日，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⑥毛泽东指出：“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⑦毛泽东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⑧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了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

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88 页。

②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281 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91 页。

④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288 页。

⑤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289 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42 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51 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55 页。

二、改变阶级政策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前后，中共中央根据民族革命新高潮到来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地调整了阶级政策。

1935 年 11 月 25 日，张闻天致函毛泽东，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红军行动方针、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等重大问题，征求毛泽东和前方领导人的意见。随函附送了张闻天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草稿等文件。^①

12 月 1 日，毛泽东在富县东村复电张闻天。就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上应指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

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②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同一天，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甚至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③。

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宣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以扩大全国抗日讨蒋的革命路线。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出租应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高利贷出借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惩罚及特殊税捐；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命令同时还规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④

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公开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个重大步骤。

1936年4月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出《关于执行改变富农策略给各级党部与苏维埃政府的指示》，指出：“党与苏维埃的富农策略的改变，是为了适应目前的新的政治形势，为着更便利于集中力量对付目前的主要敌人，为着抗日讨卖国贼，为着消灭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孤立地主阶级，为着更巩固的联合中农，为着发展农村生产。”^⑤指示要求：“正确的彻底的纠正过去决定错误的成份，还是目前许多地方的重要的工作。在改正后，土

地、牲畜等，可由普通公地或没收来而未给分配的土地、牲畜，按其成份，尽量补偿，但不得再从群众手中抽去。”^⑥指示明确规定：“纠正成份，一定要经过支部会、乡苏主席团或代表会、贫农团等会议讨论，本村群众会通过，经区苏土地科批准后，才作有效。”^⑦指示指出：“正确纠正所发生的偏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各地党与苏维埃应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去辨别事实，不使一个贫苦工农错定为地主富农，也不使一个地主富农假称贫苦工农。”^⑧

在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后，中共中央也调整了对地主的政策。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保安召开。会议讨论了新形势下的土地政策，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共有十条规定。指示指出：“自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⑨后，苏维埃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如富农政策，小地主政策，分析阶级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决定等等），这种改变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苏区里面已经收得实际的成效。但是，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的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的审查现施土地政策时，并给以必要的改变。”^⑩指示规定：“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地主耕种份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的意见决定之。”对“生活情况很坏的小地主”的土地，“不应没收”^⑪。指示还规定：“商人兼大地主时，其土地部分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得侵犯他的商业部分。”^⑫指示规定：“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但无论何种出租土地的业主，均须废除旧时残酷的和奴役的出租办法，一律遵守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土地出租条例无有例外。”^⑬

中共中央调整对地主的政策，改变了过去没收地主经营的商业部分，以及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以后，不给予分配耕种份地和生活资料等“左”的做法。

^①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8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93—494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8 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96—497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1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2 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2 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2—153 页。

⑨即瓦窑堡会议。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60 页。

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60 页。

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61 页。

⑬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61 页。

三、调整经济政策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共中央还适时调整了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工商业政策、劳动互助政策等。

1935 年 11 月 2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并在同年 12 月 1 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予以刊发。布告宣布：“第一、把一切工商业的捐税都完全取消，甚至于连‘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第二、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的到苏区来营业’。第三、除了粮食及军用品外，苏区的出产品均可自由输出。第四、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①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工商业政策也提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出：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

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②。1936年7月3日，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签署发布了《关于发展志丹市镇贸易的布告》，布告规定：“在志丹市（即保安县所在地）恢复从前逢五逢十的集市，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与志丹市机关消费合作社，经常出卖食盐、布匹等群众日用必需品，规定每天都有出卖，就是不限定市集一次。”^③布告要求：“各区责成各区苏政府，立即帮助群众设立区消费合作社，分销食盐、布匹等，大批供给群众。”“责成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批发食盐、布匹等大宗货物，以供给各个合作社”，“责成粮食部，组（织）设立调剂局农业品收买处，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生产品，如粮食、豆、羊毛、羊皮等，都可随时拿到市面上来出卖，如卖不出去的，都由收买处一齐收买”。^④布告宣布：“自布告出示这一天起，一切买卖都只准使用苏票，严禁白票^⑤在市面流通。大家公买公卖，也不得故意抬高市价。”^⑥

中共中央在调整工商业政策的同时，对劳动互助政策也进行了调整。

1936年3月28日，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王观澜签署发布了《关于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纲要规定：“劳动互助社是广大农民群众一种自愿实行互相帮助耕种收获的群众组织。”“凡是农民（富农在内）只要自己愿意加入互助社，不论男女老少，都可加入为劳动互助社的社员。凡是社员，都有享受互助社新规定的特殊的权利”^⑦。“劳动互助社以乡为单位组织之，一村或二三个小村的社员则组织小组”^⑧。纲要规定：“互助社决定每天工资的标准，不应比普通的工资高，并要按照各地实际情形及分别农忙与平时来决定。”“决定工资要开社员大会，每工工资多少，由大多数社员意见决定。对于不能做农事主要劳动的妇女、儿童等社员工资如何，社员大会可单独决定（一般可较低些）”。“互助社还应调剂耕牛、农具。牛工可以抵人工，每个

牛工抵二个或三个人工，由牛好坏和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工资可以每一月结束一次，或农忙将到时或过后结束一次”^⑨。纲要还特别规定：“互助社对于社内的红属，应实行优待，并须特别欢迎红军家属参加互助社。凡普通社员（非红属）帮红属社员做工时，不计工数，不计工资。凡红属的社员帮普通社员做工时，要计工数，计工资。凡红属的社员帮红属的社员做工时，大家都不计工数，不计工资，或大家都计工数工资。”^⑩

调整劳动互助政策，纠正了过去存在的强迫组织劳动互助社，以及不执行互利原则的错误做法。同时，又对优待红军家属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工商业政策、劳动互助政策等经济政策的调整，促进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31 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 1 版，第 612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8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8 页。

⑤即法币。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9 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9 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9 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9 页。

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9 页。

四、调整社会政策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改变了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对一些社会政策进行了及时的调整。

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北办事处于 1936 年 1 月 15 日公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这一选举法同 1933 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公布的选举法和 1935 年 10 月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委会公布的选举法相比较，有以下重大的改变：第一，一切脑力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第二，雇佣工人在 10 人以下，资本在 5000 元以下之工商主也有选举权；第三，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选举法的修改，扩大了人民阵线的成分。

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在广大乡村普遍建立的贫农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一度具有政权组织的性质，承担过政权组织的任务。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对贫农团的性质和任务进行必要的调整，已是大势所趋。

1936 年 2 月 8 日，西北办事处发布了《关于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大纲开宗明义地指出：“贫农团是广大贫农群众的组织，是土地革命的坚决实行者与拥护者，是扫荡农村中封建半封建势力，打击汉奸卖国贼的强大力量，同时也是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无产阶级的可靠的朋友，是苏维埃的支柱。”^①大纲回顾与总结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贫农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历史经验，并指出：“根据苏维埃运动中对于领导贫农团的工作经验，依照陕甘苏区的实际情形，特颁布这一《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②大纲指出：“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而是在革命政府（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等）管辖区域内广大贫苦群众的组织。同时，农村工人必须参加贫农团，组织工人小组，在里面起积极领导作用，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成为革命政权最可靠的柱石。”^③关于贫农团的组织形式，大纲要求：“加入贫农团以自愿为原则，那种按户派人的方式，是错误的。为了严厉防止地主、富农的混入，新会员应该按照分析阶级的标

准，加以考查。”^④大纲规定：“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分小组，不设村分会。小组可以一个村庄或附近的几个小村庄为单位，每个小组会员不得超过二十个以上，五个以下。”^⑤关于贫农团的作用，大纲指出：“贫农团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本身利益而斗争，另一方面是赞助政府，实现政府一切法令命令，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⑥大纲指出：“贫农团要注意中农的利益与权利，使中农环绕在贫农团的周围。”“在土地问题解决后，贫农团的注意重心就应移到怎样去增加土地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畜牧业，改善自己的生活，充实革命战争物质供应而斗争。”^⑦大纲要求：“贫农团除夺取地主阶级的土地，发展农村经济，改善自己生活外，还要进行扩大与巩固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力量，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为自己的最后解放，为整个革命民众的利益而斗争。”^⑧大纲要求贫农团“帮助与强固自己的革命政府，坚决拥护与执行革命政府的主张、法令、命令，具体实现。排斥与反对反革命分子破坏革命政府的意见与行动”^⑨。

随着西征战役的开展和胜利，西北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拓展，民族与宗教问题也被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⑩

6月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正在西征前线的彭德怀等，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⑪电报还提出了对回民工作的主要政策。

同年8月，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和回族青年干部等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备成立豫海

县回民自治政府。10月20日，豫海回民自治县政府成立，回族雇农马和福当选为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回族自治县政权。

在重视回族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了对蒙古族的工作。1936年5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等：“你们取得宁条梁后，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⑫同年5月，毛泽东致信盟克耳纪，提出：“蒙族内部事务，应由蒙族自己解决，国民党绥远政府不得借此挑拨离间；愿与蒙族人民团结一致，以实力援助其解放；蒙人自己组织政府，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内蒙及国民党官员的欺凌压迫；将长城沿边各地如宁条梁等地划为通商地区，增进汉蒙商业的发展；愿与蒙族联合一起，缓急相助，共同打倒公敌。”^⑬

靖边县宁条梁一带是天主教在陕北的重要传教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1936年5月28日致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除对蒙族工作提出基本政策外，还特别指出：当占领教堂区域时，如俘得神父，应特别优待，不应侮辱。^⑭

6月9日，张闻天就西征中关于教堂区域工作方针问题致电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指出：“我们应需要教堂在原则上承认苏维埃政府的主权与苏维埃一切法律，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目前不应没收其财产，解除他们的武装，推翻他们的统治。目前我们着重于抗日救国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组织抗日救国会与改良人民生活的工作。目前不必立刻在教堂区成立苏维埃，而首先成立救国会。把教堂弄得太红在目前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目前的方针是在教堂区事实上成为我们与白区交通与通商的缓冲地带，对我们守善意中立的地带，这对我们更为有利。我们同那些神甫应该建立很好的友谊关系，以便利于我们同外面建立好的交通与通商关系，使他们为我们做一些好的宣传。”^⑮

中共中央关于民族自治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以及对宗教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原则，有力地促进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新开辟地区的巩固和发展。

哥老会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及周边地区广泛存在的一种帮会组织。

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宣言肯定哥老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光荣的事迹”，并指出：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⑩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

10月6日，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周恩来致函中共陕西省委郭洪涛、王达成、龚逢春等，指出开山堂是争取哥老会的有效方式，过去有些同志没有着眼于争取哥老会的广大群众。中共争取对哥老会领导的最基本任务是：将苏区的哥老会引导到保卫苏区的任务上来，将边境白区的哥老会引导到发展苏维埃运动上来，将一切哥老会会员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来。为此，要求陕西省委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党内进行争取哥老会基本方针的教育。^⑪

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的指导下，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于同年8月在保安县永宁马头山召开。会议提出了哥老会抗日救国十大条规，并通过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简章，选举产生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对哥老会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哥老会广大群众的团结，也推动了哥老会的逐步改造与走向进步。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面调整政策，西北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政治上民主团结，经济上充满生机，人民生活日益得到改善的大好局面。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3 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4 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4 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5 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5 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5 页。

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6 页。

⑧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6—147 页。

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7 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43 页。

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49 页。

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45—546 页。

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46 页。

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46 页。

⑮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330 页。

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57—558 页。

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331 页。

第二节 西北地区联合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一、中共中央对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认为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是首先能够争取的统战对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主张，争取使其成为联合抗日的同盟者，改变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被动态势，造成西北地区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于1935年11月26日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信中指出：“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与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①在此前后，毛泽东同彭德怀、王稼祥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于当月发布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②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加强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此前后，红军将大批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

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遣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前往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驻地洛川城，先后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于1月25日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

国人民抗日的先锋。”^③2月25日，李克农再次前往洛川，于3月2日达成了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的口头协定。3月4日，李克农与张学良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在洛川交换了意见。

根据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于4月9日前往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二九师驻地延安，在城内一座基督教堂内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中，张学良表示接受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开展工作。

5月12日，周恩来再次前往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双方就东北军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此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军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这一文件共包括十项内容。

在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的同时，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工作。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信中写道：“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即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④毛泽东还在当天致信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⑤随后，毛泽东指派曾在第十七路军从事过兵运工作的汪锋前往西安，当面送达写给杨虎城、杜斌丞的信件。汪锋到西安后，和杨虎城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王炳南也相继到杨虎城处做争取合作抗日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中共与第十七路军的关系已初

步得到了确定，在红军与十七路军接触的地带，实际形成了停战和互不侵犯的状态。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通过各种渠道，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做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合作，并在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内部展开各种形式的联合工作。经过各方努力，张学良与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杨虎城，提出：“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阵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①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杜斌丞，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对西北各部亦望他大力斡旋。此后，毛泽东指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于8月26日来到西安。经过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张文彬作为中共和红军的代表驻西安。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9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93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508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9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95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2月第1版，第495页。

二、中共中央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从1936年初起，中共中央还先后开展了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信驻防陕北绥德一带的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提议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等谈判合作条件。信中指出：“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①经过沟通与谈判，高桂滋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

8月14日，毛泽东致信绥远省主席、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信中写道：“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②

红军西征期间，还发布了给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倡议书。

经过多方努力，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地区联合抗日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22页。

第三节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

一、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9月两广事变^①结束后，蒋介石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北地区。10月22日，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等人的陪同下，由南京飞抵西安。在西安期间，蒋介石调集军队，加紧部署，企图以武力向会聚于西北地区的三大主力红军发动进攻。在西安，蒋介石分别召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向他们面授“剿共”机

宜。10月29日，蒋介石一行乘专列前往洛阳。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自己的五十寿辰。随后，他将两广事变期间南调的30万大军大部北调，屯集于平汉路、陇海路之间待命，准备进发西北地区。蒋介石还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机场，将100多架新购进的美式战斗机、轰炸机部署在这两个机场，准备伺机而动。蒋介石还先后与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等将领一起，部署“剿共”事宜。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部署，蒋介石于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并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陈诚、卫立煌、陈调元、蒋鼎文、朱绍良等军政大员也先后抵达西安，下榻于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

蒋介石到西安后，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西北地区的红军，并“荡平”西北根据地。蒋介石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军队全部开赴“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若张、杨拒不从命，则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将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西北地区“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几天向蒋介石“进谏”，希望蒋介石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但都遭到蒋介石的斥责。

12月9日，西安近两万名学生发起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公然向游行队伍开枪，打伤了东北竞存小学一名12岁的小学生。惨案发生后，游行者的无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愤，遂前往临潼，准备向蒋介石当面请愿。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驱车追赶游行队伍。在西安城东十里铺，张学良劝阻学生不要前往临潼。张学良为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之内答复学生。

同一天，蒋介石致函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让他向《大公报》驻陕记者披露将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的部署。蒋介石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为了增强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压力，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

12月10日、11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却被蒋介石斥责为“犯上作乱”。在此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出路。他们遂秘密部署，调兵遣将，进行“兵谏”的准备工作。

12月12日清晨6时许，临潼扣蒋行动和西安城内的战斗同时打响。东北军包围了华清池五间厅，随后将跳墙逃跑、躲藏在骊山半山腰虎斑石石缝中的蒋介石扣留。第十七路军在西京招待所等地也扣留了随蒋介石来陕的军政大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提出八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①1936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反蒋，并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通过收买陈济棠部属余汉谋等人，迫使陈济棠下野。随后，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达成和解，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变得以解决。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致电中共中央，告知了发动事变的经过，并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人前来协助工作。张学良、杨虎城还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人和各地实力派领导人，说明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经过和主张，希望得到理解和响应。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国际舆论也沸沸扬扬。

12月12日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府委员在南京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做出决议，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委、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并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委会直接指挥。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由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从当天起，何应钦

命令空军出动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而宋子文、宋美龄则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各地实力派领导人中，少数人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是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这些实力派领导人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得知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做会议结论时指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①

12月14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指出：西安的抗日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赞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蒋介石，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②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政府诸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希望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③。

12月15日清晨，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离开保安。12月17日，周恩来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从延安抵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单独会谈。随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他同张学良会谈情况。12月18日上午，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了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

12月18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西安事变发表公开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当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提出具体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参加。

面对西安事变之后急速变化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迅速而正确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各项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得到了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的认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即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于12月22日来到西安。蒋介石见到宋子文、宋美龄后，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

12月23日下午，博古、叶剑英乘坐张学良提供的飞机，从延安抵达西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的具体分工是：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博古主持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的工作。

从12月23日起，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以下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④

12月24日晚和25日上午，周恩来再次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表示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态度立刻发生了变化。在他的授意下，张学良被扣留，并遭到军法审判。从此，张学良在所谓“严加管束”的名义下，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蒋介石还调集重兵，进逼西安，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情况下，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一部分激进的青年军官杀害，酿成了充满血腥的“二·二”事件，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制定了一系列保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果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在苦撑危局的杨虎城和于学忠等人的协助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得以巩固，内战危机被化解，从而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1937年3月上旬，东北军主力部队被调往河南、安徽、江苏一带。5月初，第十七路军建制和西安绥靖公署被撤销，仅保留第三十八军番号。杨虎城被迫辞职后，于同年6月底出国考察。1937年12月2日，在蒋介石授意下，杨虎城被从香港诱至江西南昌，从此身陷囹圄达12年之久。1949年9月7日，杨虎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21—622 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22 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23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246 页。

三、重建中共陕西省委与恢复陕甘省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陕西党组织虽经多方努力，多次组建临时省委，但省委机关始终无法正式恢复。1936 年 2 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谢华等人在十七路军宪兵营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鉴于中共陕西省委屡遭破坏的沉痛教训，西北特支受命“与地下党组织不发生关系”，“自成一个机构”^①，主要在第十七路军内部从事统战工作，并领导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

1936 年 12 月 25 日，博古在西安北门内二府街二府园 3 号院主持召开重建中共陕西省委会议，罗瑞卿参加了会议。博古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和人事安排。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贾拓夫任重建后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担任省委常委的有欧阳钦、张德生、朱理治、李一氓、彭加伦、惠子俊，委员有李初黎、崔廷儒、谢华、王俊。省委秘书长由彭加伦兼任，副秘书长崔廷儒；组织部长张德生，副部长谢华；宣传部长李一氓。1937 年 1 月，省委增设青年部，部长王俊；妇女部，部长危拱之。省委还下设有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理治；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欧阳钦；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赵伯平。

中共中央在宣布重建中共陕西省委的同时，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1936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陕甘省。李维汉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秘书长申力生，组织部长张邦英、副部长曹德茂，宣传部长李华生，统战部长杨一木，军事部长刘景范、副部长张仲良，妇女部长先后为刘锦如、白国英。与此同时，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刘景范，副主席霍维德、艾楚南，财政部长由艾楚南兼任，国民经济部长李会友，教育部长李之钦，粮食部长郭子青。陕甘省的治所先后设在甘泉县高哨和中部县店头镇，下辖淳耀、赤水、永红、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等苏维埃县治。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进入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

①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117页。

四、神府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7年1月初，国民党地方当局乘神府苏区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情况尚不了解之际，对神府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这次“围剿”行动以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为总指挥，共调集第八十四师李少堂团和史文华骑兵营，第八十六师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营，晋军第二〇九旅段树华部四个团，共两万余人，分别由佳县、榆林、米脂一线向北进攻，企图将神府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压至一个狭小地区加以诱降或武力消灭。

面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共神府特委虽然不了解西安事变的详情，但基于坚持自卫的原则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在军事上坚决抗击国民党军的“围剿”，在政治上则积极开展统战宣传，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月中旬，神府独立师第一团在佳芦县薛家会村设伏，打垮“进剿”苏区的国民党军一个连，击毙敌连长，并俘虏数十人。第二团则

在王家塢打伏击战，俘虏第八十六师某团团附苏鼎臣等十余人。中共神府特委从苏鼎臣处始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的消息，经过教育，将苏鼎臣等人予以释放。

1月28日，神府特区在温家川召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将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改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乔钟灵仍任主席。

同年2月，中共中央派遣王宝珊、杨文谟、张江全回到神府苏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张秀山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宝珊任神府独立师政委，杨文谟任参谋长。

随后，张秀山主持召开神府特委扩大会议，决定继续打破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军事“围剿”。为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会议决定派遣独立师打进佳县、米脂一带，通过国民党的报纸让中共中央得知神府苏区仍然处在反“围剿”的战争环境中。会议同时决定主动给“围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写信，呼吁停战，一致抗日。

3月20日，神府独立师转战至佳县、米脂、榆林一带，与“围剿”之敌展开周旋，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神府独立师的行动引起了山西和陕北国民党地方当局舆论的重视，一些关于神府独立师活动的消息被披露报端。

正在西安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谈判的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神府苏区尚处在国民党军“围剿”之中的消息后，立即向顾祝同提出交涉和抗议。此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对神府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被迫停止。中共神府特委先后派遣王恩惠、武开章、杨文谟、刘北垣、毛凤翔、杨和亭等与苏区周边的国民党驻军展开谈判。双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精神下，达成了停战协议。

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致陕西省委转神府特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你们长久离开省委和中央的领导，独立的在神府艰苦奋斗，保卫了神府苏区，扩大了地方武装，最近自动的和进

攻部队协商停战。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非常愉快，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民族革命敬礼！”^①

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派出以张邦英为团长、吴溉之为副团长的工作团前往神府苏区，全面检查特委的工作。1937年5月，工作团来到神府苏区。工作团充分肯定神府特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工作比较扎实，游击战争打得机动灵活，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工作团要求神府苏区继续宣传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积极准备投入抗日战争。根据工作团的指示，神府苏区以抗日为中心，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加强。随后，神府独立师进行了整编，师长王兆相，政委王宝珊，参谋长杨文谟，政治部主任王恩惠，下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警卫连，并将原骑兵团缩编为师部直属的骑兵连。同年7月底，中共神府特委决定将原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和下辖的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佳芦县苏维埃政府、府谷县革命委员会予以合并，改为神府县抗日民主政府。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74页。

第四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使命的转换

一、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西安事变爆发后，由陕西省政府委任的肤施县县长高锦尚于1936年12月17日晚弃城逃离。延安各界民众遂自发组织起来，捣毁了国民党肤施县党部。12月18日早晨，红军围城部队和游击队开进延安城。

红军进入延安城后，成立了以王观澜为书记的工作委员会和以李坚真为团长的群众工作团，并决定成立以白志文为司令员、江华为政委的延安城防司令部。由于白志文一直未到职履责，延安城防司令部司令员一职由政委江华代理。

同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通报了红军南进和陕北苏区恢复的情况。电报说：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①12 月底，富县、甘泉两地也被移交给红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机关即开始部署进驻延安的工作。1937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离开保安，前往延安。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延安城，延安从此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628 页。

二、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功，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937 年 2 月 9 日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提出“五项要求”，希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还提出“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也是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而“四项保证”则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

这一让步是有原则性的，也是必要的。只有做出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电文发表后，得到了全国各界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

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提出了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案草案，但遭到与会的多数人的反对。21日，会议通过了五届三中全会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决定将“武装剿共”改变为“和平统一”共产党的方针。会议还在外交政策上提出了“对日让步如果超过忍耐的限度，只有抗战一途”的口号。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就表明，由于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以及蒋介石态度的有所改变，国民党已经开始接受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明蒋介石在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的同时“树起了根绝赤祸的旗帜”。我们应在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对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以求重登全国政治舞台，参加和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①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人事和特区组织机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苏区工作委员会可暂不成立，中央在此，特区政府当然要归中央管，不归工作委员会管。会议决定：政府名义暂时不变动，工作由林伯渠负责，暂时不成立苏区工作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何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张浩任中共中央工农

部部长；李见珍（李坚真）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邓颖超参加工作。

②

3月5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示：陕甘宁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林伯渠为主席，经费（包括保安团队在内）每月30万，又收回苏票200万。^③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会谈。周恩来和叶剑英将双方一月来谈判予以归纳总结，其中关于陕甘宁行政区的内容为：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④但此后，顾祝同约张冲、贺衷寒对3月8日的提案做了重大改动，其中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等。^⑤

国民党谈判代表的倒行逆施引起周恩来等人的强烈抗议。周恩来随即电告中共中央。3月12日、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复电周恩来：顾、贺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做起。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⑥3月14日，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共中央不承认顾、贺方案，谈判须重新做起的电报转给张冲。3月15日，周恩来同张冲谈判。张冲申明贺案作废，改以3月8日提案做谈判基础。^⑦

此后，周恩来于3月下旬赴杭州，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经过谈判，蒋介石表示：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

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4月26日，周恩来携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由延安飞抵西安。随后，又与顾祝同、张冲在西安进行了谈判。

5月23日，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秦邦宪），提议边区政府委员会由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高岗、郭洪涛（或马明

方)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张冲、杜斌丞组成。此后,周恩来从6月8日至15日,在江西庐山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会谈中,蒋介石就红军改编、释放在狱中的中共党员等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边区政府人员组成问题,蒋介石仍然坚持边区政府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谈判问题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于6月25日起草了关于谈判的新提案,其中提出:陕甘宁边区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36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54—655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59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363—36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36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365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367页。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取得明显进展、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1937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设立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起草陕甘宁特区的选举法、政府组织法、文化建设计划和经济建设计划。

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由蔡树藩负责，成员包括周景宁、谢觉哉、萧劲光、郭洪涛、董必武、王观澜等。

特区行政组织法起草委员会由谢觉哉负责，成员包括蔡树藩、林伯渠、黄亚光、周兴等。

文化建设计划起草委员会由徐特立负责，成员包括凯丰、廖承志、郭洪涛、向仲华、冯文彬等。

经济建设计划起草委员会由蔡子伟负责，成员包括伍修权、马明方、曹菊如、宋裕和、汤振连、王海山等。

5月12日，西北办事处行政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了陕甘宁边区实行抗日民主制度的组织形式和具体内容。5月17日，西北办事处召开各省、特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林伯渠在会议上做关于由苏维埃制度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的报告。会议决定，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法规，从当年7月起进行第一届选举，采用普选的办法选举各级议会，并由议会选举同级政府。

从同年7月开始进行的边区第一次民主普选，自下而上进行。乡级选举于同年8月底完成，区级选举于9月20日左右完成，边区议员选举于11月底完成。

在中国革命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①是5月2日至14日举行的。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博古做《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做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②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后，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于5月15日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84人。会议由林伯渠主持。经过与会代表的充分讨论与表决，分别通过了中共中央于5月1日批准的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17人和候补执行委员6人的名单。随后，会议进行正式投票选举。根据选举结果，当选为执行委员的是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坚真、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白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李维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的是罗梓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佩勋。

5月17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推选郭洪涛为书记，并选举产生了常委会。会议决定：高克林任秘书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张邦英任副部长；吴亮平任宣传部长；王涛任统战部长；李坚真任妇女部长。

从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

陕甘宁边区党委成立后，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相继撤销。中共关中特委则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6月20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公布民主政府施政纲领，共16条，主要包括：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抗日战争；实行民主普选制

度与议会政治；发扬苏维埃时期实行的各种民主设施；加强人民的抗日武装组织；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

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主席团其他成员为博古、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

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①当时称之为苏区党代表会议。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61页。

结束语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及经验总结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创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区域涵盖了东临黄河之滨，西到六盘山下，北起长城，南至桥山的广大地区，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陕甘边、陕北区、陕甘晋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各级中共组织的领导下，根据地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卓有成效。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由一块地方性的革命根据地转变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出发点。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共产党人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在陕北和关中地区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三原、旬邑、淳化等武装起义和交农围城斗争。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开创了人民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先河，在西北地区首次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人民军队中第一次设立了政治委员。上述起义虽然坚持的时间不长，但是它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陕西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西北地区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刘志丹、谢子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兵运工作，刘志丹终于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一起，构成了后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基础，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陕甘边革命武装发展壮大的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猛发展。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地区相继组建了十多支红军游击队，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正式成立。陕北游击队和红二十七军转战陕北地区，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下，两支红军团结奋战，西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1927年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西北红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

（二）西北红军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

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和战斗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也通过各自坚苦卓绝的斗争，同样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6个师、30个团约5万兵力，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在西北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根据地军民密切配合，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历经10余战，开敌8000余人（包括民团3000余人），占领了6座县城，将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并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扩大到近万人，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

1935年7月，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有向西北转移的意图后，又调集陕、甘、宁、晋、绥的国民党军及张学良的东北军，总兵力达10万之众，由其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歼灭西北红军，摧毁西北革命根据地，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在慕家原、定仙塬、横山等战斗中获胜，给敌以重创，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牵制了1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的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的长征，也拉开了红军会师西北苏区的序幕。

（三）壮大了中国革命武装力量，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奠定了基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及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吴起镇时仅余8000多人，西北红军（包括红二十五军）及地方游击队达1万余人（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9个团近5000人，先期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

二十五军 3000 余人，红军游击队 4000 余人)。三支红军的会合，壮大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11 月 6 日，中共中央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建制。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

1935 年 12 月后，中共中央陆续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和神府独立师、陕甘独立师。1936 年，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东征、西征战役，编入红一方面军的西北红军英勇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奠定了基础。

^①《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50 页。

（四）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仅存的一块完整的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在祖国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些根据地后来都遭受了严重挫折。到 1935 年下半年，除西北革命根据地外，各根据地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而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等人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援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根据地人民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军费，踊跃参军、参战，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为了扩大红军，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保证

了中央和红军的衣食用度，为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毛泽东 1945 年 4 月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①。

^①《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297 页。

（五）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地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时提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和扩大红军力量的方针。经过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多次谈判，逐渐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合作局面。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积极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此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经过多次艰苦谈判，终于实现了两党二次合作，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土地革命战争的终结地，八路军东征抗日的出发地，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六）长期的斗争实践，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著名的领导人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地区共产党人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始终坚持武装斗争，坚持从西北革命的斗

争实际出发，正确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著名领导人。其中，有著名的群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有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岗、习仲勋、马文瑞、汪锋，有一大批党、军队和地方领导人，如马明方、阎红彦、张秀山、王世泰、张邦英、郭洪涛、崔田民、张达志、贺晋年、刘景范、吴岱峰、赵启民、张策、李启明、高锦纯、黄罗斌、王兆相、高朗亭等，还有一批为创建和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献出宝贵生命的著名烈士，如李妙斋、王泰吉、强世清、金理科、杨重远、杨森、杨琪等。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和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根据地，有以下几点基本经验。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普遍性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斗争中，经过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创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和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根据中国社会与革命的特点，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完全具备，非常相似，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条件有着类似的共同点。

1.渭北、陕甘边和陕北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渭北、陕甘边和陕北等地陆续建立了基层组织，党员活动几乎遍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县、乡。另外，中共组织还在陕西 60 多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 37 万人，农民自卫武装 10 万人以上，^①同时在甘肃的兰州、天水、导河、泾川等地也建立了农会组织。中共组织和农民协会、农民武装在陕甘两省的普遍活动，宣传、教育了广大群众，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先后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三原起义、旬邑起义、淳化起义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也为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

^①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7 月第 1 版，第 62 页。

2.地势险要，利于游击队活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个地处桥山山脉，梢林茂密；一个地处陕北高原的白于山脉，山、梁、峁、沟、塬密布，沟壑纵横。两地的共同特点是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易守难攻，适合红军游击队活动，不利于国民党军大部队作战。同时，根据地地处陕、甘、宁、晋、绥、蒙几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对此，中共陕西省委在 1927 年 9 月底就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西北所处的地理位置，指出：“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即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①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37 页。

3. 陕西、甘肃都是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陕北、陇东尤甚

由于自然环境和战祸、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一带人口稀少，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社会生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生产基本处于封闭的、自给和半自给的简单再生产状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有利于红军筹粮筹款。

4. 周边革命形势的发展，地方军阀之间矛盾的加剧，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土地革命战争中，在陕西的周边存在着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陕南根据地，诸多根据地的红军与国民党军战斗，牵制了蒋介石集团的大量兵力，客观上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起到了策应的的作用。尤其是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创建的鄂豫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界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吸引了杨虎城、张学良、胡宗南及四川军阀的力量。同时，西北革命根据地周边的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之间钩心斗角，非常利于红军在其间周旋活动。西北红军充分利用其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5. 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八七会议精神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起义大都归于失败。此后，陕西省委派大批党员到陕、甘、宁、晋边界的国民党部队、保安团队从事兵运工作，在此基础上，领导建立了红军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继而发展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到 1935 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下辖 5 个建制团，兵力近 3000 人，游击队达 2000 多人。在陕甘边红军创建的同时，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建立了 20 多支红军游击队，继而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下辖 4 个建制团，兵力近 2000 人，游击队达 2000 多人。西北红军的存在，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将其作为长征落脚点的根本原因。

6.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是根据地发展、巩固的首要因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始终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不论是早期的武装起义，还是后来开展兵运、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都毫不动摇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早在1927年9月召开的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中共陕西省委就做出了接受八七会议等决议案，明确提出“在党的总政治口号之下，勇猛的继续反帝国主义反新旧军阀的斗争，以期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促进中国革命”^①，要求“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②。对党员“实行军事训练”，“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③。从1927年9月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到1934年7月陕西临时省委遭受破坏的7年间，陕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和给各地组织指示近70件，在对各地的指示中，都对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予以指导。当然，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省委的有些决策也是脱离实际，甚至是错误的，但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信念始终是坚定的。

在创建红军的过程中，陕西省委高度重视党的领导。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中建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西北工农革命军中分别建立了军事委员会、中共工农革命军委员会，设立主席和书记，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尤其是渭华起义中建立的工农革命军，首次设立了政治委员，开创了人民军队设立政委的先河，比红四军至少早了一年半。1930年后，中共陕西组织在领导创建革命武装的过程中，都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党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贯彻实施。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8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0页。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特殊性原因和条件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各个根据地在斗争的实践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具体做法，成为其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敌人的主要原因。

1.中共陕西组织始终把革命斗争的重点放在农村

依据陕甘地区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缺衣少食，有着强烈革命意识的实际情况，中共陕西省委始终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形成了寺村原、照金、南梁三个中心；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安定和绥米佳吴清及神府几个中心区域。这些地方都是远离大中城市的偏僻农村，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有利于红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所谓的“梢林主义”。虽然中途受到“左”的错误影响，导致了红军的暂时失败，但是，这从反面教育了党和红军，更加坚定了陕甘红军、陕北红军贯彻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2.坚持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的重要原因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在创建革命武装的过程中，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始终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建军思想、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游击战的方针贯彻到建立红军、创建根据地的实践中去，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创新，从而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建立红军的过程中，刘志丹提出的“三色”论，为在西北创建红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照金和南梁时期，根据地领导人坚持军事运动和当地农民的分粮、分地、分财物以及抗税、抗租、抗债、抗粮、抗款斗争结合起来，同建立中共地方组织与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充分

调动了贫苦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在建立、发展中共组织方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所不同。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先建立各县中共组织，再由中共组织领导建立游击队、正规红军，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直至建立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则是先由共产党员开展兵运工作，建立游击队、正规红军，继而通过军事斗争，在地方建立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47页。

3.在战略采取以根据地为中心，建立相对独立的游击区，主力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打击敌人，各路游击队坚守在根据地或者游击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期，红二十六军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了二路、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分别在照金、南梁恢复和建立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的回旋余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则以安定为中心，创建了绥（德）米（脂）佳（县）芦（堡）清（涧）和神（木）府（谷）两个游击区。在战术上，刘志丹等人总结了寺村原时期强攻王郎坡、死守五顷原、三嘉原突围失利的教训，坚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积小胜为大胜，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4.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过程中，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充分发挥了“法宝”的作用。1929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陕西的实际情况，指示陕西省委“打入农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如民团、红枪会、土匪哥老会等），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①。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加强红枪会、土匪、民团中的工作，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夺取其下层群众”^②。在统战工作中，刘志丹提出了“敌人

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等观点，丰富了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对地方民团，根据其对红军的态度区别对待，凡与红军对抗的，坚决消灭；凡与红军友好或保持中立的，则尽量争取他们，以便红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对于非法武装，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参加革命，走上革命道路。正如习仲勋所说：“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③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95页。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81页。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页。

5. 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贺晋年、崔田民、张达志等一批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个领导核心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坚持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不搞小团体，坚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终于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

6. 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的重要条件

革命为了人民，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都体现了革命为民、执政为民的理念。在根据地创建初期，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就十分注意建立农民协会，依靠群众打土豪、分财物，解决贫困农民的生计。根据地建立后，进行了土地分配，满足了农民对赖以生存的土地需要。在根据地建设中，

注意发展经济，设立集市、医院、枪械修理所、学校，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十大政策》，对土地、财经、粮食、社会、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只要“政治上清楚，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①，从而吸引了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促进了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

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普遍性条件和特殊性条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并不断巩固和发展，最终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根据地的主要原因。

^① 《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39页。

主要参考书目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吴志渊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第 2 版。

张宏志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朱根生著：《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三秦出版社 1990 年 5 月第 1 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李振民著：《陕西通史·民国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房成祥著：《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陈元方、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姬乃军、申辉著：《西安事变实录》，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王健英著：《红军统帅部考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 卷、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后 记

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就开始了对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相关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2008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将《西北革命根据地史》列为陕西党史重点研究课题，纳入编写计划。该课题由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文琦、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员姬乃军共同负责。姚文琦、姬乃军共同起草了编写大纲，刘玉平参与了编写大纲的修改工作。

2009年9月底，由姬乃军和西安邮电学院讲师姬睿完成了本书初稿的撰写工作，共有五编二十章。姬乃军撰写了前言和第一至四编（第一至十五章），姬睿撰写了第五编（第十六至二十章）。其后，由姚文琦、刘玉平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2010年1月底，姚文琦、姬乃军、刘玉平就书稿的修改工作交换了意见，确定由姬乃军对全部书稿进行第二次修改。3月底，姬乃军完成了第二稿的修改工作，将全书调整为七章三十七节，另有前言和结束语各一篇。此后，由姚文琦、刘玉平负责，从结构、内容、文字等方面先后对全部书稿进行了三次修改，订正了部分史实，增加了部分注释，姚文琦重新撰写了结束语。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参考了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同时吸收了党史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邮电学院、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为本书绘制了地图，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的张季、高子果参与了书稿的打印、校对等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西北革命根据地时间跨度长，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众多。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地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有关决议为准绳，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其中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恳请党史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西北革命根据地史》编辑组

2014年10月